

目 录

一 中共中央有关文件

- 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节录）……………（ 1 ）
- 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节录）……………（ 10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
方针的决定*（节录）……………（ 15 ）
-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节录）……………（ 16 ）
- 中央政治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
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 17 ）
-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
任务的决议（节录）……………（ 19 ）

二 中共中央西北局、湘鄂西分局有关文件

- 湘鄂西特委关于解决秦伯卿部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21 ）
- 红四方面军陈昌浩给四川省委信……………（ 22 ）
- “中央分局”给四川省委信……………（ 24 ）
-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26 ）

三 中共四川省委有关文件及各地党委给省委的报告

- 四川省委兵士工作计划（节录）……………（ 29 ）
-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拥护红军入川的特别通知（节录）……………（ 31 ）
- 中共四川省委特别紧急通知（第二号）
——为拥护和援助绵安红军游击队（节录）……………（ 33 ）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拥护川东北红军反对国民党“围剿” 宣传大纲》(节录)	(35)
四川省委致中央的报告	
——关于巩固通南巴苏区反对军阀进攻红军问题(节录)...	(37)
中共四川省委、团四川省委号召全川民众反对军阀战争参加 民族革命战争宣言	(39)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在四川反革命军阀战争中争取革命战争胜 利的决议(节录)	(42)
中共四川省委接受中央指示信的决议(节录)	(46)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纪念的决定(节录)	(51)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决议	(52)
中共四川省委为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征收“剿赤捐”致全川 各地党部信(节录)	(57)
中共四川省委致三台县委信(节录)	(59)
中共四川省委致邛大党及川康红军游击队指示信(节录)	(62)
中共四川省委致遂安县委指示信(节录)	(65)
中共四川省委全川综合工作计划(一·二八至 三·一八)(节录)	(67)
中共四川省委致中江县委信(节录)	(68)
中共绵安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	(70)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川工作的决议(节录)	(72)
四川省委平同志①(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对左右倾路线的批评和组织工作(节录)	(80)
中共四川省委致中央分局报告(节录)	(83)
为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与北平“三·一八”惨案八周年纪念 告全川民众书(节录)	(84)
中共四川省委全川综合工作计划(七·一至 九·一八)(节录)	(86)

四川省委接受国际第十三次全会提纲与五中全会决议的 决定·····	(88)
中共、共青团潼川中心县委为工农红军占领通南巴告 农民书·····	(101)
中共上川南特支告工农兵书 ——为邓殊抗捐运动告工农贫苦民众及抗捐军的 士兵弟兄·····	(103)
中共四川中江县委给省委报告(节录)·····	(105)
中共青神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节录)·····	(108)
中共四川三台县委报告·····	(111)
中共川南特委制订《游击区域红军家属暂行优待条例》 ·····	(121)
中共川特委制订《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	(123)
四 各地起义、抗捐宣言、通电及党报刊载资料	
上川南抗捐大同盟宣言(节录)·····	(127)
上川南抗捐大同盟通电·····	(130)
上川南抗捐大同盟敬告各县民众书·····	(131)
四川民众抗捐军指挥部布告·····	(133)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135)
《红色中华》载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三混成旅 参加红军宣言·····	(136)
《红色中华》载中央政府嘉勉川军两团投入红军·····	(138)
《红色中华》载四川西部抗捐斗争情况·····	(140)
《红色中华》载四川苏维埃运动发展情况(节录)·····	(141)
《红星报》有关叙永游击队的报导·····	(142)
《红星报》有关川南游击队的报导·····	(143)
五 各地武装斗争简介	
川东游击军·····	(145)

华蓥山武装斗争·····	(149)
南江平民军·····	(154)
德阳孝泉兵变·····	(158)
南部升保农民暴动·····	(163)
蓬溪东乡民众自救团·····	(169)
三台柳池农民暴动·····	(173)
苍溪苟英寨农民暴动·····	(175)
盐亭保安大队兵变·····	(180)
南充西区农民暴动·····	(182)
苍溪三堆石农民暴动·····	(187)
阆中老观农民暴动·····	(192)
上川南抗捐军·····	(197)
黔江红军游击大队·····	(202)
安县保卫团兵变·····	(205)
中江文家桥农民暴动·····	(208)
遂安农民暴动·····	(211)
涪陵土地坡农民暴动·····	(217)
盐亭农民游击队·····	(220)
越西农民暴动·····	(223)
酉阳红军游击队·····	(227)
万县第二次兵变·····	(231)
叙永特区游击队·····	(235)
崇庆分州兵变·····	(239)
南六游击队·····	(243)
青神西山农民暴动·····	(245)
剑阁兵变·····	(250)
云阳武装暴动·····	(253)
峨眉武装起义·····	(255)

川南游击纵队·····	(258)
川陕游击队·····	(264)
沐川天宝山农民暴动·····	(269)
合江石鼎山武装起义·····	(271)
隆昌石包店工农暴动·····	(275)
南部升钟寺独立师·····	(277)
沐川高笋农民暴动·····	(279)
冕宁抗捐军·····	(283)

六 回忆资料

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王维舟	(285)
红三十三军之成立·····	傅 钟	(292)
回忆廖玉璧·····	张 翼	(293)
谈孝泉兵变·····	骆是愚	(294)
我参加升钟寺暴动情况·····	冯成义	(296)
回忆蓬溪东乡民众自救团暴动·····	蒋仁凤	(298)
中江文家桥农民暴动经过·····	钟炳云	(299)
回忆苍溪苟英寨农民暴动·····	何知春	(301)
从三堆石到延安·····	赵 继	(304)
参加阆中老观农民暴动情况·····	赵承平	(310)
遂安农暴前后·····	邹凤平	(311)
土地坡暴动和弹子山游击队·····	廖瑞呈	(313)
谈越西起义·····	陈占英	(316)
回忆酉阳南腰界红军游击队·····	刘应学等	(318)
一九三五年峨眉武装起义情况·····	和成孝	(321)
关于叙永地区游击队的一些情况·····	朱光壁	(323)
关于青神西山暴动·····	周亚光	(326)
剑阁县高石坎革命兵变始末·····	李 鹏	(327)
回忆云阳武装斗争·····	张述成	(329)

战斗在川滇黔地区的红军川南游击队·····	朱光璧	(333)
陕南游击队和川陕游击队·····	袁克服	(342)
谈沐川天宝山农民暴动·····	张兆廷	(343)
发动石鼎山起义策应红军·····	李亚群	(344)
对石鼎山起义的回忆·····	赵欲祺	(348)
沐川高笋农民暴动情况·····	钟福兴	(351)
谈冕宁抗捐军·····	陈野苹	(353)

七 参考资料

共党最近之工作计划及其组织·····		(355)
士兵运动大纲·····		(358)
成华特区军事工作的提案·····		(361)
成华特区军事工作报告·····		(365)
南溪农民起义全县震动·····		(368)
邻水县知事呈请并恳通令严缉事·····		(369)
四县团防围攻凌霄山·····		(371)
绵竹农民暴动大纲·····		(372)
绵竹被围 全城戒严·····		(373)
张治关于绵竹暴动向省委的报告·····		(374)
丰都栗子寨打出红军旗帜·····		(376)
平民革命军揭竿而起·····		(377)
城口被共军攻下·····		(378)
涪陵县长谢汝霖给刘湘呈函·····		(379)
涪陵的红军·····		(380)
梁山虎城乡又发现红军游击队·····		(381)
江津兵变与合川地方暴动·····		(382)
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一师司令部训令·····		(386)
铜梁县保卫团办事处 咨文·····		(388)
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第十二混成旅司令部训令·····		(389)

富户陈益卿等人恳请铜梁县府缉拿严办共党人员的呈文……	(390)
廖玉璧在岳池从容就刑……	(391)
任伟章率部在南江起义……	(392)
德阳孝泉发生兵变……	(393)
二十九军军长田頌尧给南部县政府训令……	(394)
蓬溪东乡民众自救团袭击县城……	(395)
老观农民武装夺取区乡政权……	(396)
黔江游击大队的实力调查……	(397)
龚昌荣率部激战黔江黄泥坝……	(398)
安县团总被炸受重伤……	(399)
王敬德在安县被捕牺牲……	(400)
遂安农暴领导人邓雍被捕牺牲……	(401)
涪陵弹子台发现游击队……	(402)
何超腾等五人在万县被捕牺牲……	(403)
青神西山农暴情况……	(404)
青神梧桐乡共党暴动……	(406)
王逸诗对于消灭川南共产党及赤卫军游击队布置的意见……	(408)
四川省政府保安处第九区代电……	(411)
四川省第六专署截击红军游击队报告……	(412)
四川省第十五区保安司令部训令……	(414)
敌四五〇旅“围剿”川陕游击队经过……	(415)
合江县政府通缉令……	(418)
屏山县团委会给县政府的咨文……	(419)

附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武装斗争概况表

后记

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节录）

（1933年5月20日）

（一）一般形势与前途的简单分析

（略）

（二）四川的条件和四川党的任务

（1）（略）

（2）四川农村方面的条件，更加有利于我们，尤其是东部和东南部，由于封建剥削，军阀战争，苛捐杂税，重利盘剥，强制征收，无偿的强迫劳役等等，使农民群众日陷于饥饿死亡的人间地狱。赋税预征了四十年以上，而佃租、军事附加税、临时捐、民团捐、教育额外捐、谷物税以及其他层出不穷的名义之下的抽剥——已经足够使农民革命化了。他们必须在土地革命中找得唯一的出路。

军阀刘湘一年征税五次之多，这就是等于民众一年付五年的赋税。军阀田頌尧，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存厚也是借口“剿共”进行同样的予取予夺的诛求。

在这样条件之下，农民群众的革命的力量的集合，必定向着抗捐抗税，反对战争，反对强夺，强迫劳动的路线，由防御的经济斗争开始而引导到政治斗争的较高形式上去。如果能够适当的引导并配合反对军阀、豪绅、地主、富农、高利贷的战争，且与现存的游击队和红军取得联络，向共同的敌人作共同的战争，那

末，这一切力量是能够在最近的将来，在最广大的四川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四川的客观的条件是非常成熟的。惟一的缺点，就在于我们的力量的薄弱，而这又由于我们在农民中，失业的农村工人中，难民中，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中的落后的和不适当的组织工作的缘故。

十倍的向这方面努力，必定能改变这个形势，而补偿过去的损失。

(3) 军阀军队的士兵。

在上述的四川现在的背景之下，在四川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和更残酷的战争（最近的战争，死伤士兵在十万人以上）的背景之下，我们的传单能在军阀军队中发生很大的影响，那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必须摧毁军阀手中的压迫工具。我们的路线是：第一，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宣传，建立我们的秘密支部，扩大在士兵群众的影响，组织他们为要求关饷、食物、衣服，改善待遇，代表权的日常斗争，创造并领导士兵反军阀战争的群众组织，反帝国主义同盟等）去摧毁战争机关而使之中立化。阻止他们去进攻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民暴动而使之与后者亲睦起来。

第二，使士兵组织积极化起来，推动他们，从单纯的中立而进到积极的援助我们的队伍。使他们成为我们在敌人队伍中的同盟者（妨害进攻革命力量的命令，以武器和子弹帮助革命力量，以敌人的进攻计划通知我们，阻止反动部队解除我们同盟者的武装和进攻红军之企图，征〔争〕取这些部队的士兵到革命方面来等等）。

第三，兵变。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如果不再早些的话，敌人必定用一切手段来阻止革命的发展。这样，势必被挑拨来做强制的及未成熟的兵变。我们的特别单位和地方组织的领导者，必须预

料这种场合。我们决不应在不知不觉中被人暗算，如果被迫进行兵变，必须尽可能的带走我们能够得到了〔的〕武器与弹药，破坏敌人及其长官的剩余供给物，而加入最接近的红军或帮助地方工农作反对地方统治者，地主，豪绅、富农的斗争，被迫的兵变不能过夜者，敌人的准备不能长久掩盖得住，因此我们应当最善的去利用牠，调出我们的队伍和地方的组织在一起，积极的去抵抗危险，根据预定的计划，从防御的地位转到攻势去。

第四，有计划的暴动。革命力量的计划的暴动与整个部队之计划的兵变的配合。我们在组织上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以此为目的——革命的艺术与工作之最高的形式。不消说，这必须作大规模的活动，不能以一地方为范围。这种暴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或以警备队的兵变为开始点，或以城市及地方的革命的群众之叛乱与暴动为开始点，或以红军从外面来进攻为开始，或由三个或三个原因互相配合而开始。在每一场合，开始发动的部队，应依照当地的领导机关的计划行动，互相保持密切的合作，取得邻近地方的援助。邻近地方的任务，是防止敌人生力军之侵入。

（4）四川的红军

强大的红军部队之出现及其活动，必定激动了东部和北部的整个形势。我们在那里，及其邻近的地方党部得到了工作上一个新的推动力。这个新的要素，使四川与其他苏区一样站到目前革命阶段的前线。因此，整个四川组织所应担负的责任是非常之大的，改进工作，批评自己过去的迟钝，动员新的积极的力量，加强自己的队伍和群众组织，一步一步的在各地方去展开土地革命，进至集合力量来开展大规模的和广泛的运动。同志们，最近将来你们所应担负的任务，是伟大的，条件是顺利的，事业之成功依靠于你们的准备工作，你们的积极活动及决心。

(三) 四川省委的缺点与错误以及如何在将来避免这些缺点与错误

(1) 对军阀战争的态度

你们对于军阀战争的估计，当你们把牠与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分开来看的时候，是不正确的。在四川，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可在地方军阀的斗争上看出这些事情。日本正在瓜分着中国，英国实际上已取得西藏，而且准备占有西康，四川，回教徒的地域如甘肃，新疆作为牠自己的堡垒。只有在这一观点之下，我们才能理解四川及边境的军阀战争的意义。英国在那里牵着引线，其目的就是为侵入西藏及进一步侵略的清道与准备。

(以下略)

因此，以为“反对军阀战争重要，而反对帝国主义不重要”的想法是错误的。在你们宣传大纲上又说：“因为红军伟大的胜利，更加促进军阀的冲突”——这也是不正确的，尤其在我们宣传上是有害的。恰恰相反的是正确的，因为无论何处，真真受了革命的威胁时候，军阀们将暂时的停止他们的战争，因为红军力量是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的共同的敌人。

因为你们对于这问题的估计不正确，所以在宣传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你们提出“反对一切和平的非战运动”这个口号时候，你们真是太马虎的放弃了在形成广泛的群众组织上很有用的武器。在我们对群众的鼓动上，必须有开始的地方。真的，只是“和平”当然是不够的。但是，你们怎样才能够从“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上抓住群众呢？不要最初一步还未开始之前，就想跳到较高的阶段去。我们必须利用群众对于和平及他们反对军阀战争的愿望，来发展积极的革命的斗争，以至于群众的武装暴动。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号召“党员与群众到白军中去当兵”是危险的，而且无用的，因为你们的弱点是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把“群众”送到敌人的队伍里去——决不是我们的事业。纵令是以瓦解军阀军队为目的，我们也没有这许多同志，离开自己重要的工作而去参加军阀的军队。这应该由党组织来做，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个别的个人，而且要秘密的去进行。你们必须承认，这不是广泛的群众宣传的事情，而是要非常秘密的组织的问题，根据所采用的计划，派少数特别选定的同志去执行。

现在四川军阀战争又重新爆发起来。我们必须领会过去反对军阀战争的教训，纠正以前一切错误，去开展反战工作，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去参加这种斗争。拿上次军阀混战的莫大牺牲与痛苦，去鼓动与领导群众，首先是成都兵工厂数千失业工人，无数难民，伤兵与一切劳苦群众，去反对军阀战争。党应当立即去发动他们的斗争，要求失业救济，要工作，要饭吃，反对军饷、捐税，拉夫，驻扎民房学校等等，要求改良士兵生活，要求抚恤伤亡士兵，把这些斗争与反对新的军阀战争联系起来。向群众解释，军阀战争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产物，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才能消灭军阀战争，才能获得民众的解放。在新的军阀战争之下，我们要动员一切劳动群众，用有准备有群众的兵变与游击战争，以真正的革命战争，去消灭军阀的反动战争，联合与创造新的苏区，这是我们的任务。

（2）兵变与游击战争

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四川党所做的主要工作，只是孝泉兵变与升钟寺游击战争，而这些行动都遭了失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策略的错误，我们的领导的错误，机会主义的消

极与脱离群众。省委曾经决定要发动脱离群众的“数十人的兵变”，这除了错误的策略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同时省委又在士兵中采取“化零为整”的策略，这也是同样错误的，当我们的力量还分散于白军各部队中而没有取得广大的士兵群众时，我们采取这种策略，只是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我们的活动基础，这对于我们的事业只有害处。

在这种情形之下，孝泉兵变遭到惨败，是毫不奇怪的。本来在廿六团中我们有兵支与群众组织，我们有一切可能去夺取多数的士兵群众。但是由于整个组织对准备与领导兵变表示消极，和群众脱离，没有与士兵本身的日常斗争配合起来，领导机关本身的秘密工作非常之糟，把事情委给无经验的同志，而且其中有几个同志在政治上是不属于我们的，没有计划，无人知道怎样做，到什么地方去，不敢与反动派作斗争，不去发动群众斗争来拥护自己，而是向反动军官“借路过”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次兵变要走到失败道路上去。事实上也是如此，孝泉兵变只经过三日就被敌人解决了。这样的兵变对于革命没有任何的帮助，反之只有危害我们的工作，牺牲我们的力量而已。

升钟寺的游击战争起于农民斗争的坚决以及没有驻兵的条件之下，这种发动是成功的；民团被解除武装，以后有县民团开来又被解除武装，约有一百支枪，处决了地主，农民自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这时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行动不活泼，缺乏领导，缺乏计划。发动后经过四五天群众几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是领导同志还是不动，不去解除土豪劣绅的武装，……这次斗争经过了八天就被敌人打败了。这次的失败完全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领导的结果。

(3) (略)

（4）拥护红军与苏区

无疑的，我们都同意“拥护红军与苏区”的必要，自红军进入四川以来，苏维埃区域正在建设着，四川的党担当了组织拥护红军与苏区的新的急迫而最重要的任务。

考察你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看到这样的口号：“反对国民党四次围剿”，“夺取刘湘的军队”，“组织兵变”，“拥护红军”，“动员全党同志与群众到川东白军中去当兵”。最初的四个口号是正确的，但太一般的，单是这些口号，在领导下级组织的工作，没有多大实际行动的价值。第五个口号是危险的，已经在前面批评过。这样的拥护工作，就令都能实现，对于红军也没有多大效力。我们所需要的是：第一，在要进攻苏区红军的白军的后方，组织游击战争。在这种场合，象升钟寺那样的暴动，决不是“左”的倾向，反而是必要的。就是基础比较狭小的暴动，都应当立刻发动起来，其唯一的目的就在于牵制白军，使他们撤退苏区。第二，切断白军各部队间的联络。第三，组织同志，使其紧密的注视白军的行动，向红军报告到来的危险。第四，我们在白军中的支部，发动在士兵中宣传不打红军，加倍日常工作，为改善士兵待遇而斗争等等。第五，在驻扎白军地方的农民之间，散播我们的影响，反抗长官的征税募捐，供给粮食和服务军队的命令。第六，在党组织，赤色工会，失业者，难民等等之中，加倍你们的努力，使其大大的活动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给失业者以工作与粮食，救济难民等等，一切都集注一个目的，即唤醒群众的阶级意识，把他们经济的斗争与拥护红军，反对白军的政治宣传配合起来，说明白军对于劳动民众的作威作福和他们所能希望于红军的東西（农民中也应做同样的工作）。

如果我们象一个布尔什维克，不是象一个官僚主义者，用出我们所有精力来这样干的话，这就是我们对于红军最善的服务。

因此，只要派去最小限度的同志，每个人秘密的负担一定的任务，到首先被征调去进攻红军的白军部队中工作。

(5) (略)

(6) 职工运动与农民运动

在国民党的封建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剥削与榨取之下，在不可忍受的苛捐杂税与重利盘剥，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之下，在长久的的军阀混战之下，四川工农劳苦群众的痛苦已经达到极点。这种情形，不能不推动群众走到革命斗争的道路，同时全国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之高潮，苏维埃革命在广大的领土的胜利，川北苏区的建立，更促进了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以下略)

为夺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党必须立即组织与领导正在发展的抗租抗税抗债分粮等的斗争，尤其在川东北，川西北，以及川南的嘉定，内江，青神等地，把这些斗争发展到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配合川北苏区与游击区。为创造与巩固苏维埃而斗争，坚决的纠正脱离群众斗争与抛弃抗税而布置秘密的游击战争(如潼川)的错误。加强宣汉游击队的领导，扩大南部升钟寺，阆中东坝及顺庆西区的游击战争，努力准备与发动中江西区，潼川北区、盐亭、苍溪，安县，绵竹等地的游击战争，在这些斗争中绝对不许重复升钟寺游击战的错误，须知游击战争只有依靠广大的群众，才能获得胜利。必须尽量去发展川北各地的农民群众的组织，扩大与巩固南部，三台北区的农民协会，使其包括最广泛的劳苦农民群众，而不仅象现在一样只有一千以上的会员。在农民协会中开展反富农的斗争，团结贫农中农分子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肃

清农民协会中的富农分子，保证党的领导。在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可用各种形式去组织农民，如农民斗争委员会，抗捐抗税委员会，灾民委员会等，不一定要采用农民协会的形式。党应当到下东与川北一带各种农民的宗教团体与秘密结社中去，如“八德会”，“联英会”，“梅杉教”，“红灯教”等的组织中去积极活动，夺取其中的下层群众，揭破与反对其上层的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消灭他们在群众的影响。在农民运动中应当坚决纠正富农路线（梁山）盲动主义，以及掩饰对农民切身要求，怠工的所谓“要大干不小干”，“有武装才能抗租。否则不能斗争”等等的机会主义。南部斗争中没收中农甚至贫农的财产，这是绝对不允许继续，这是破坏基本农民群众利益的办法，实际上是帮助反革命的。反对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与倾向，这是胜利的领导与开展广大的农民斗争的先决条件。

（以下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节录）

（1933年8月25日）

一、（略）

二、目前四川的形势与红四方面军及四川党在冲破五次“围剿”中的具体任务

目前四川的形势，对于开展四川的苏维埃运动，是非常有利的。你们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这一顺利的形势决定于：

（一）红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与川陕边苏区的扩大。据“申报”所载，红四方面军已增至十万人以上，而昌浩报告，则谓苏区现已包括通、南、巴、庆、万、绥、营、宣、阆、苍、宁、城、西、镇共川陕十四县，通、南、巴全为苏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

（二）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更加兴奋了四川劳苦群众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在许多地方演成了武装战斗的形势，树立起声势壮大的抗捐军和川中及滇边的游击战争，这是削弱敌人，有利于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最有利的条件。

（三）四川各系军阀间的冲突，又一次的酿成了全川的军阀战争。刘文辉固然败退岷江西岸，或被迫去入康边，但刘湘所领导之下的联军，亦已受创不小。而四川的统一，除我们的革命战

争来完成外，对任何的一个军阀都将是梦想。联军内部的冲突，仍旧是存在，防区割据的制度，并不会就能消减，这将继续牵制各派军阀彼此削弱自己的力量。

自然，对于这个基本顺利的客观形势的分析，并不能使我们因此可以忽略四川整个形势之其他各方面。这一种忽视会造成你们自满自骄，过于看轻敌人的力量，以松懈我们的工作和动员，而重复你们在鄂豫皖苏区曾经犯过的因轻敌而使鄂豫皖苏区遭受部分失败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中央同时要求你们严重的看到下面的几个事实：

1. 据天津日本军事情报处报告：英公使蓝博生到四川重庆去的主要目的，是同刘湘讨论划定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和这两处贸易的可能；并且谈到二千万的英国大借款，用以购买飞机、军火和其他商品。同时，法国总领事梅礼霖也曾到过重庆，进行怎样把法国势力更深入到四川而巩固起来。这些事实，使英文“密勒评论报”的记者，都不得不认为：“……四川军阀……接受新的借款，英国人就不但得以统治西藏，而且可以统治四川了。此外，联合进剿四川东北边境的红军的事实，也很有可能性”。

红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与四川革命运动的壮大，使得四川的统治阶级更直接的乞援于帝国主义；而且使帝国主义自己也感觉到他们在西北统治的致命威胁。英国之实际占有西藏与向东发展，实在积极准备着就近的军事根据地，以企图直接武装干涉四川的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法帝国主义，则虽与英有利害的冲突，但在压迫苏维埃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你们应当看到这种逼近的危险，来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2. 最近四川军阀战争，以刘文辉之惨败渐趋结束，而刘湘

等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积极督促与帮助之下，对你们大举进攻的危险更加紧张；并将首先驱使四川较小的军阀为“剿赤”的先锋，以消磨我们的力量，而造成他们的“优势”。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则更多倚重刘湘，资助他来与我们为敌。你们决不要轻视这一个反动的武装所给与我们的困难与威胁。

3. 四川党的薄弱，没有很好的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还没有普遍的开展起来；这些游击队伍中，有的还在反动豪绅操纵之下，没有完全夺取到我们领导之下，把他们的行动汇合起来，统一起来，很有被军阀武装暂时击败的可能。

这些事实，虽不能改变目前基本上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但要求你们很敏锐的估计到这些我们发展中的困难与障碍，并用一切力量来以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克服这些困难，才能使你们在开展你们的整个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目前的形势，给你们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以极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变成实际的。自满足于胜利的可能性，而不以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可能，不算是真正的革命政治家。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的指示，是值得你们深刻的去了解的。

根据这一形势的分析，你们的具体任务就应该是：

(一) 巩固现有的苏区，与将这些苏区联合成为一个不互相隔离的整体。在这里，中央要求你们深刻领略你们过去轻易将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而没有为保卫苏区根据地战到最后可能的错误。你们应当了解：红军是苏区的支柱，没有红军，则苏维埃政权无从树立得起。苏区是红军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红军不但将无从壮大，而且必流成散漫的游击队伍。因此，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执行中央给与你们要在渠江与嘉陵江

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将现有苏区内敌人一切残余的力量，完全肃清，把其他苏区，都变成通、南、巴一样的整个的苏区。

(二) 为巩固苏区与向前扩大，必须加强和扩大红军。中央认为你们有一切可能与必要在今年内创造真正富于战斗力的主力军五万人，这样，才使你们能打碎任何敌人的优越部队和夺取中心的城市。

(三) 必须动员你们一切力量和整个的四川党来争取十数县以上的抗捐军的领导，及发动川中和川陕边及川滇边的游击战争。报载川滇边(古宋一带)的游击队有四千余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务必派人去沟通关系，使他们在整个计划中行动，以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

(四) 你们现拥有三千里以上的苏区，范围已经很广，因此，使红军各部间的行动统一，非常必要。

(五) 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加强各级苏维埃的工作，确立正确的经济政策，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六) 加紧反帝的工作。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开幕，你们和四川党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加强反帝工作，来拥护这个大会。应加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及到处建立反帝的群众组织，筹备召集救国御侮的代表会等，以动员群众。

(七)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于“广暴”纪念日在中央苏区举行，你们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拥护二苏大会。在川陕各苏区举行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并选举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务须于十月底即派来上海。

中央责成你们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加强全线上的工作，工会工作尤居首要。你们应巩固与省委的关系，

即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亦不应断绝。

三、赤化四川全省的任务很迫切的摆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在整个苏维埃的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在执行这些任务中每一成绩，都将增强革命势力的比重。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国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亦遭到‘赤祸’之蹂躏盘踞，将来发展，宁不可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

中央向你们和红军四方面军全体战斗员致极热烈的革命敬礼！

（原载《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第5—9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 行动方针的决定*（节录）

（1935年1月1日）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渡过乌江，跨过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所予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一部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甲〕立即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第二兵团）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乙〕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

〔丙〕……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

〔丁〕同样在这一时期内，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

（以下略）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第1—2页）

* 此即猴场会议决定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节录）

（1935年1月14日）

各级政治机关：

（甲）党的当前任务是要在四川贵州广大的区域中与敌人主要是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决战，争取这一决战的完全胜利，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来创造四川与贵州的新苏区，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极大地发动当地群众的斗争，来配合红军争取决战的胜利，造成迅速创立新苏区的顺利的环境。

（乙）我们发动群众的总方针是要迅速的广大的发动群众斗争，武装当地群众，依靠这些武装起来的群众来扩大红军，配合红军作战，消灭当地国民党地主的武装，来建立革命的政权。

必须估计到红军开始到达地区中，不是已经赤化了的苏区，必须估计到这些区域中进行群众工作的目的，是为着争取红军在决战中的胜利……

1. （略）

2. 我们必须领导群众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军阀与群众痛恨的豪绅地主，而对富农商人知识分子等，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以免红军在决战中造成更多新的困难。因此，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和对富农商人的刻板的办法，都会障碍我们的发动群众，增加我们在决战中的困难。

（以下略）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第26页）

中央政治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

(1935年1月22日)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的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薄，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野战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

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政治局及军委

（摘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第24页）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 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节录）

（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儿盖会议）

.....

（六）番民中的工作必须有迅速的转变。总政治部应搜集各地番民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教育自己的干部。用一切方法争取番民群众回家，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革命政府等。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主力到甘陕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族须作更大的努力。

（七）广大的白区的工作，首先是邻近白区工作，目前应该有计划的开始，发动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与游击战争，响应与配合红军的行动，创造游击区与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党中央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去加强川陕甘三省白区党的领导。同时对长江下游及华北、华南各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及农村中的斗争，应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及新的有利的环境中极力加强自己组织与领导的力量。

（八）必须立刻开始白军中的士兵的工作以瓦解国民党的部队。（下略）

（九）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工作与游击战争的领导。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

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

.....

(十二) 采取必要方法，加强对于其他苏区与游击区的领导，使各方面的行动更能取得相互的呼应与配合。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64页)

湘鄂西特委关于解决秦伯卿部 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1931年1月2日)

中央：

我第二军团自南渡以来，因交通断绝，就未做报告了，兹补报告于下：退兵走马坪后消灭改组派，甘秦张诸匪的部队。18日晚总指挥部是夜从间道向刘家厂退却，19日清晨至刘家厂，20日六军之一部与十六师之部亦到，谁知匪走马坪却意外的做了一件有政治意义的事……。改组派甘秦张诸联……。总计有众三千余人，枪二千支，他们宣言参加红军，而且声言竭诚参加红军。我们一面以数部队凭山守险……。调二、六军兼程开来，准备武力解决……。29日我们坚决将甘张秦三部完全包围缴械，其团长以上完全处决，……。这一处置，我们自认是绝对正确的，……。在我们没有弄清上述情形以前，我们还有保存，……。真的如果我们犹〔尤〕为犹豫，则必然受此种叛贼的欺骗，截击的危阴〔险〕因此我们亦将其部队缴械。并将秦本人处以死刑。此事的真象如此，特报告中央，并请批评。

(中共忠县党史办公室提供，摘自湖南桑植县档案局《湘鄂西特委给中央的信·报告》卷)

* 标题为编者所加。

红四方面军陈昌浩给四川省委信

(1933年8月16日)

川省党：

六个月来未取联络，工作上大损失，我军此次空前胜利，田逆四十六团，几乎完全消灭，获枪六千支，机炮百挺，俘敌旅团长八人，官兵五千，杀伤敌万人以上。田逆残部只十团，乱窜阆、昭、剑、潼，已溃不成军，我军正前进，距广保三路只几十里，决以灭尽田逆为目的。绥刘杨陕军均备要打击不敢进。赤区现已包括通、南、巴、广、万、绥、营、宣、阆、苍、宁、城、西、镇共川陕十四县，通南巴全为赤区，现赤区万人参加红军，群众热烈至极，土地分好，苏维埃纷纷建立，川陕省委、省苏壮大起来。各边区群众大动，已不断与红军联络，将努力大进，配合全国红军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积极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彻底推翻国民狗党。

自与阆中县委同志晤面后，知你们工作还停滞于和平缓慢狭隘、关门主义富农路线的基础上，还不是深入群众的斗争的与有生气的广泛发展的工作，尤其这次对我们帮助太小，不能令我们满意，现在应真正转变，在红军伟大胜利推动与群众积极发展的时机之下，目前必须：

1. 动员全四川党团群众配合红军行动，深入群众中，具体宣传我们的胜利与田逆的罪恶，号召群众斗争迅速组织各种革命战

争，发动到游击队，分田打土豪，破坏敌人后方铁道粮站，骚动敌人，造谣等等，动员群众来参加红军。

2. 迅速开展抗捐抗税抗粮斗争，马上间接与直接进行分田以至游击队与武装斗争，公开的秘密的大大活动，成立赤卫军，初步建立红军，建立地方斗争或革命委员会，以致转变为苏维埃来领导群众的斗争，并提拔斗争中积极工农干部来领导，坚决反对富农投机分子。

3. 广泛开展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证明红军是唯一反帝力量，国民党军阀卖国，阻止红军反帝，反帝必须首先消灭国民党与参加红军。

4. 迅速动员党团员群众到刘湘、刘自乾、刘存厚、田陕军^①中去工作，切实深入群众，由大大小小斗争转变为大大小小的兵变。把红军反帝协定宣言，欢迎官兵一同去反帝，不放弃一个投诚官兵，红军有公田，待遇平等，等等大大宣传。

5. 沿赤区四周建立秘密交通网，有系统的侦察敌情与消息，并设法暂时将我们必需品送来，请速派人来布置全川工作，请与汉中党联络送大批人来训练为要，替我们派人到刘文辉中办外交，请速经过阆中县委发生关系，送大批文件来由阆中转。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亲笔

1933年6月2日

(摘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第154—155页)

^① 田陕军即川军田頌尧部及陕西军。

“中央分局”给四川省委信

(1934年2月28日到)

川委：

目前四川国民党军阀，以刘湘为首，正在对于川陕苏区大举进攻，四川白区党的任务，是在加紧领导工农士兵劳苦群众起来，以一切斗争的方法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进攻川陕苏区保卫苏区。

第一，要加紧领导川北川东赤区周围一带农民反军款反“剿赤经费”及征发，抗租抗债破仓分粮一直分土地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武装群众打土豪，广泛的扩大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电话、粮道、仓库、飞机厂等等，配合红军主力行动，消灭刘湘。你们要特别注意梁开和忠丰一带的工作，迅速与梁、开黄大万区郭代林同志所领导的游击队打通关系（据最近消息，红二方面军已占黔江，因此你们应当注意忠丰一带的工作）。

第二，要迅速的加强几个中心城市的工作，特别是重庆、万县、顺庆，加紧领导重庆兵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采用一切可能去建立起万、渝海员工人码头工人工作，从这些工人的日常斗争中去宣传组织他们起来拥护红军，不造一枪一弹，不运输一枪一弹来进攻红军，以怠工的方法来援助红军，在可能的时候要尽量破坏敌人军火船只，进行有组织的破坏爆炸工作。

第三，要百倍努力加强士兵团丁中的工作，领导他们要饷要作

战费，改良他们待遇，反对虐待的斗争，在士兵中加紧宣传红军官兵待遇平等，分土地的好处，广大的散布红军优待条例，把士兵大大小小的斗争，变成大大小小的兵变投红军，特别要加紧刘湘中心部队中的工作，训练一批干部进去，根据过去的经验专门组织兵变，也要打入刘邓杨田各部中去工作。

以上几样工作，是要密切联系□□□尤其是反日及英美军舰集中万县，反对刘湘出卖四川，号召工农兵士群众起来，联合红军，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为了在白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保证党的组织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致遭受严重的破坏，能够顺利的进行工作，你们应当特别注意秘密工作。根据各次全国和四川党的血的经验，尤其是此次团省委全体的破坏，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秘密工作，无情的反对对于秘密工作不注意，实行严格的惩罚一直到开除党籍，严格的实行党内情况，不许一个不坚定的分子留在党的机关内，坚决的引进工农干部参加领导机关。

此次团省委的全体破坏牵及党省委方面的详情，望作一详细报告来。最近四川党的工作状况如何？团省委破坏波及那些地方？你们采用了什么方法反对叛徒的进攻，各地秘密工作检查过没有？均盼详细报告。

为了密切赤白交界区域双方党的关系，川陕党省委决定将阆南中心县委划归赤区方面领导。

苏区干部一样的恐慌，无法派到你处工作，省委干部定要你们自己解决或向中央请求与其他地方交换。

下次交通来，望以一切方法将嘉陵江的地图带来。

川省委抄于1934年2月10日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 报告（节录）

（1934年9月15日）

.....

四、黔东苏区的创立与现状；

自从六月十五日到了印江沿河交界之沙子坡，我们与当地的神兵斗争取得了联系，到了枫香溪以后，我们估计到：（一）群众的斗争与情绪；（二）敌情的薄弱就决定了在印江沿河发展苏维埃运动，就决定调集一批干部把军委会的机关建立起来，即刻成立军委会的宣传队，印江、德江、沿河婺川一带，去年有神兵的组织，他们的发动是为反对派苛捐杂税而起，他们到处设有神坛，神坛设有佛祖，练有神兵，俨若政府，神兵与当地驻军战争失败，于是就渐形瓦解，但是组织还没有破坏。

我们认为神兵是一种农民斗争的原始形式，但是被地主豪绅领导出卖群众的斗争。我们的策略，首先在接近他们，在接近了他们以后，主要的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夺取下层群众。同时我们在群众中还直接的单独的组织农民团体，当时采取了这个工作的路线。

我们当时组织群众的方式是两种：（一）是组织游击队同着红军行动；（二）是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斗争纲领是抗租抗税抗债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发动土地革命，会员是雇农贫农中

农，这是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之前白区组织农民群众的一个方式），继农工会在这一地方群众斗争发动了以后，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和建立苏维埃，以后在建立两个区的革委以后，已经有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农民协会的形式就不用了。到了一地就直接组织农民小组，这种小组都举有代表，以后就转变成为苏维埃。在红军占有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乡苏维埃成立以后，就开始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大约快的七八天，迟缓的是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分配土地，成立游击队。这个快慢，主要的是依据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有的区域，是成立了游击队，以后才派人去组织群众。或者因为神兵关系群众已未参加红军，该地还没有实行革命，主要的是干部以前准备不充分，在开展地方工作，红军成为发展地方工作的骨干，现在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队，连有流动宣传队，从红军中调去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约100人，参加独立团的约近300人。

（原载《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

四川省委兵士工作计划（节录）

（1931年4月21日）^①

（一）推动全党同志参加兵士工作

A. 每个党的支部必须讨论兵士运动工作，介绍兵士同志，但经支部同志介绍士兵入党后，即应转交当地兵科编组管理，不再与介绍人发生关系。

B. 实行每个同志必须有一个以上兵士朋友的口号。

C. 鼓动同志和群众（失业工农分子）到白军中去工作。

D. 省委在计划期间特别注意在出川“剿共”白军中的工作，应当经过政治活动，实际派遣上二十个同志和群众到刘湘出川白军中去，并注意北道李、杨可能出川的部队。

E. 必在加紧拥×拥红拥苏反帝反战的政治中心口号之下来加紧兵士工作。每个同志都必须向白军士兵在支部的督促之下，随时作以上的政治任务的个别宣传鼓动。

（二）恢复旧有军支

A. 急待恢复的江津、邻水、忠丰、遂宁、安岳、顺庆、青神各军支。

B. 江津、邻水、忠〔县〕丰〔都〕由江巴负责去恢复，其余直接由省委去清理。清理恢复方法，由省军委决定办理。

C. 全党同志都应负责找寻恢复以上各军支的线索。

^① 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时间。“4月21日”是收文日期。

(三) 发展兵支组织

A. 在计划期间以下各地兵士同志应有以下的数目：

成华二十人，泸县十人，绵竹十人，江巴四十人，梁山二十人，青彭眉十人，顺庆三十人，潼川十人，自贡十五人，忠丰石三十人。

B. 各地同时须注意士兵群众的组织的发展，而且群众组织应比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发展特别重××的增加。

C. 各地群众组织名目不必一律，可以叫“兵士委员会”、或“联合会”、或“革命兵士联合会”等，首先不必马上要求群众的统一，只依各地情形，各连驻营情形，在兵士日常斗争中建立起来。

(以下略)

(摘自《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五卷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拥护红军入川 的特别通知（节录）

（1932年9月27日）

在全川军阀混战愈形加剧，各地群众斗争普遍开展当中，红军由城万、夔巫、昭广等地入川了！红军入川以后，更激起和兴奋群众的斗争情绪，动摇国民党军阀政权；尤其是军阀军队整个恐慌，兵士群众不满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倾向红军，想哗变到红军中去的革命条件，普遍存在于各部分军队中。

红军的入川，完全是全国苏维埃和红军积极发展，广大群众起来实行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的实际行动。只有红军在四川的胜利才能消灭四川军阀混战！目前四川军阀混战更形扩大，各部分军阀尽管宣传和进行二刘合作，围攻省刘，……等等的各色花样，但军阀互相间的矛盾，只有使军阀混战成为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局面。虽在红军入川以后，国民党蒋介石一再命令各军停战，举行内江会议，一致进攻红军，然而军阀的矛盾，在进攻红军之下，混战仍会是继续进行的。工农贫民群众仍是在混战影响之下，受尽苛捐杂税逼债拉夫抓丁等的剥削和压迫，惨渡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只有拥护红军建立川东北苏区以至争取全四川苏维埃的胜利，才是革命群众的出路。党在此时，特号召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起来，积极的领导群众斗争，组织反战罢工，组织失业工人和灾民斗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夫抓丁，领导贫

民破仓分粮，发动游击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入川。尤其在梁、达、顺、潼、绵、安及成、渝、井等地，应加紧领导群众斗争。发动川东、川西北各地游击战，征调工农群众组织红军预备队，有计划的打入川东、川西北的进攻红军的军阀军队中去，组织革命兵变，到红军中去巩固红军。解决土地问题，创造川东北和川西北的苏区。

……………最后省委要各地立刻组织红军预备队、慰劳队、救护队、苏区红军参观团，送同志到宣达保南^①等地白军中去当兵，并把这一工作迅速变成群众工作，不仅仅是动员！各地应当在工人、农民、学生、自由职业者群众中即刻开始征求军事政治人员、文化工作人员、慰劳品、专门技术人员去援助红军；广泛的进行飞机募捐运动，领导兵士群众兵变到红军中去。从现在起，立马开始此项工作，并规定成华征求10人，自井20人，顺庆30人，三台28人，绵竹20人，其余各地自行规定。各地党部接得此通知后，应即分发支部讨论，切实执行，否则以违反纪律论处。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① 保南即指阆中和南部。

中共四川省委特别紧急通知（第二号） （节录）

——为拥护和援助绵安红军游击队

（1932年10月25日）^①

（以上略）

十月二十一夜，绵竹河坝场驻军（二十九军）独立师二十六团第三营士兵，在四川及全国军阀混战，中国红军苏维埃伟大胜利，各地工农革命浪潮高涨，绵安农民抗税捐、反对加租另佃、反对高利贷、破仓分粮、要求增加雇农工资等的影响之下和本身这次斗争的进展当中，举行了革命的兵变！兵变后，杀死反动长官，杀死团总土劣，成立川西北第一路红军，在秀水河、小坝、汉坝、喷水场、天台山等地与农民结合，杀死土劣，提了保护土劣的团枪四百多支。二十九军开去追赶的军队又在喷水场哗变一连，国民党军阀田頌尧等恐慌万分。绵竹、安县等地工人农民兵士情绪异常高涨，绵竹工人的同盟罢工、农民的各种斗争、兵士一般的动摇和反对战争、酝酿兵变等正在开展，川西北群众拥护红军的热情壮烈的激荡。

同志们！在这全国全川军阀混战之下，在这成都巷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之下，绵安的兵士首先举行革命兵变，给国民党军阀一

^① 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文件戳记上的时间。

猛烈的直接打击，实际的拥苏拥红，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军阀屠杀工农兵士群众的战争。各地党部接到此通知后，即应在群众中报告此次消息，号召群众起来拥护和援助绵安红军和游击队，公开在群众中通过，发出宣言、通电，发动各种斗争。尤其成华在田頌尧、刘文辉、邓锡侯等互相布置巷战之下，除依照有关第一号特别紧急通知执行外，应鼓动群众起来拥护川西北第一路红军，加紧组织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贫民要饭吃等，在兵士中加紧兵变宣传，在巷战开始即领导工人、学生、贫民群众夺取军阀武装，组织革命兵变，与工人、学生、贫民结合，以破坏军阀战争，以与绵安红军游击队战争响应和联系。在内江、遂宁、江津、江巴、永荣等地，应坚决组织军阀混战前线兵士的兵变，到农村中去创立游击队。在三台、盐亭、南部、顺庆、广〔安〕岳〔池〕等地，应坚决领导农民斗争，革命兵变，发动游击战争。

（以下略）

（摘自《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B卷，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拥护川东北红军反对国民党‘围剿’宣传大纲》(节录)

(1933年2月19日)

(上略)

第二、我们必须抓住目前广大的农民斗争，在和工人中的工作一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搜刮农民去进攻红军和扩大红军胜利的宣传，募捐援助红军，慰劳红军战士。我们必须针对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剥削和增加苛捐杂税，鼓动他们起来反对增加一个钱的捐税去进攻红军，反对烟苗捐、亩捐、垫捐、门户捐、爱国捐、国防捐、剿赤捐……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从抗租、抗粮、抗债、吃大户、破仓分粮去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去促进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的游击战争，烧毁地主豪绅的一切剥削契约，没收地富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及红军兵士，建立新的苏区、新的红军来响应川东北的红军。

第三、我们必须在千千万万的难民灾民（尤其在川南、成都等战区）之中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之猛烈的斗争，暴露国民党如何没收一切赈款，修马路筑堰堤的公款，如何不顾灾民的死活去进攻红军的事实，宣传红军怎样去帮助农民耕种，兴修水利，改良种子，开辟荒地……并与灾荒斗争，克服灾荒的情形，来与国民党白匪如何制造灾荒对比，使广大的灾民群众认识只有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拥护自己的工农红军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许国

国民党拿一个钱的赈款提一个钱的修路筑堰公款去做进攻红军的经费；反对二十九军及一切白匪和地主豪绅商会报馆等募捐去做进攻红军的经费，反对二十九军估提各县地方财政款项去做进攻红军的款项，要拿来救济国民党军阀战争区域内的灾民难民和失业工人；宣传并组织吃大户，抢粮米，占公房的斗争，来响应川东北红军，捣乱国民党白匪的后方，发动游击战争，扩大四川苏区和红军。

第四、在白军兵士中，特别是在田颂尧、刘存厚、刘湘、杨森等主要部队中，开展广泛的兵士的斗争，抓住反动军官克扣军饷、殴打士兵、枪杀逃兵以及一切士兵之不满的机会来发动斗争，扩大红军士兵生活及分得土地等一切优待条例之宣传，使白军士兵了解只有投到红军中去才是唯一的出路。宣传刘汉雄部掉转枪头杀死反动长官，整整两团革命兵变的事实，以及省内外各部兵士和下级军官的纷纷投降红军，对于增加士兵的斗争情绪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必须在白军士兵的斗争中大胆的宣传鼓动来瓦解敌人的队伍。在白军中积极开展拥护红军和反对白匪“围剿”的工作，是促进红军迅速胜利之最大的武器。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四川省委致中央的报告

——关于巩固通南巴苏区，反对
军阀进攻红军问题（节录）

（1933年3月）

（以上略）

（1）……支配着全川一切的主要事变，是红军的入川和通南巴苏区的创造及日帝国主义在华北新的进攻。四川的国民党军阀只注意去围攻红军，极明白的表示为帝国主义清道夫的作用。截至现在为止，田、杨、刘三部已经动员了四十团以上的兵力去进攻红军。……

在全川军阀进攻红军中，目前自然尚得不到充足的一致，因为红军在通南巴方面的发展，还不是即刻接触到所有军阀的防区。因此，目前白军在指挥上反映出来非常的不统一，……

（2）在这样形势之下，四川党认识了红军入川与通南巴苏区的创造，一方面消灭了军阀战争，另一方面启发着全川工、农、兵士反帝和土地革命斗争之严重意义，因此摆在四川党面前的〔是〕巩固通南苏区与反对进攻红军苏区的严重任务。……

目前宣、开已发动游击战，开江虽遭部分挫折，但仍在继续进行，宣汉游击队与通江游击区相距不过数十里，南部升钟寺，阆中东观坝及顺庆西区的游击战已小规模爆发，中江西区正在发动，潼川北区、盐亭、苍溪、安县、绵竹等地正在积极准备发动

游击战。川东北、川西北的普遍抗捐抗税抗债斗争各地不断爆发。川南的内江及嘉定、青神，亦在红军入川的激发和捐债租的加重，群众斗争的开展，正在向着爆发游击战的途径前进。这些游击战之爆发和准备，都是在接受升钟寺前次失败的经验之下精密的审慎进行的。虽有三台（即潼川）中心县委重复升钟寺精神布置中江游击战，省委对此即迅速的严格纠正领导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

党在升钟寺前次游击战失败后，即派有参加游击战的干部到任玮章的平民军中工作（后被廿九军收编成旅交刘汉雄指挥），红军在南江方面与刘部激战时，即在后方举行全旅兵变，南江即入红军之手。成都、三台到前线与红军作战之白军亦不断有少数的兵变，这当中大部分是党的领导。……

A、农民抗捐抗租债的斗争，正在普遍的起来，特别是战区一带，而且许多地方群众采取自发的武装反抗；杀收款委员（中江、广元……）和实行分粮（如南部），热烈表示欢迎红军，拥护红军，为要土地而斗争。宣汉、达县、南部、阆中、三台、绵州、安县，各地正在党领导下举行杀豪绅地主反抗统治阶级的游击战争。……

（摘自《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卷，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印。）

中共四川省委、团四川省委号召全川民众 反对军阀战争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宣言

(1933年5月)

全川的工、农、兵士、贫民、学生及一切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东三省，席卷热河以后，更不断的进攻平津及华北诸省；英法帝国主义积极的经营康藏滇桂及新疆等省；美帝国主义亦继续增兵来华，这完全是表现强盗帝国主义更公开的进一步侵略瓜分中国领土，奴役整个中华民族。

国民党政府一贯的不抵抗、出卖、投降、步步退让，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拘捕整批的抗日民众和兵士，镇压反日斗争、抵货运动（即抵制日货运动）与义勇军，不断的动员一切武装，连三再四的去围攻抗日反帝的工农红军和已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的苏区，使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更顺利的侵略和瓜分。

正当着中国民众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四川的国民党军阀，除了以一部分武装去围攻通南巴的红军外，又将继续去〔为〕屠杀工农兵士的军阀混战，帮助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东三省、热河的惨状，快要临到四川来了，成万的劳苦民众和兵士，快要葬送于残酷的军阀混战当中。

铁的事实是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在占全国四分之一的苏区之内，肃清了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势力，正在同苏区的民众积极冲破国民党的围剿，以便同全国民众的联

合，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政府在全国民众面前宣言过：只要能接受“①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②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③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条件的任何部队，红军愿与之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全国的工农兵士贫民学生及一切民众们！要彻底免除国民党军阀牺牲民众的循环混战的痛苦，只有坚决的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混战，反对进攻红军的战争，要求民主权利，创立武装义勇军队伍，进行一致联合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及领土的完整。

工人们！不造一枪一弹来供给国民党进攻红军与军阀混战，不运输国民党进攻红军和军阀混战的武器及辎重，组织反日及反战罢工，要求发清欠薪，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反对停厂关厂，要求失业救济及津贴。

兵士们！不接受进攻通南巴及各地红军和军阀混战的命令，不打自己的弟兄和红军，联合红军及抗日义勇军一致对日作战，组织革命兵变，帮助农民贫民的斗争，拖枪到红军和游击队中去，要求发清欠饷，改善伙食，反对枪毙逃兵，反对克扣军饷。

农民及城市贫民们！不缴一文钱的捐税供给国民党进攻红军及军阀混战的费用，不供给粮食与国民党去进攻红军和军阀混战，反对一切捐税，实行武装抗捐，反对拉夫拉兵、驻扎民房，发动游击战争。学生们！反对国民党提拉教育经费去进攻红军和供给军阀混战，反对奴隶教育及法西斯蒂，反对关闭学校，缩短

受课时间，要书读，要求减免学费，力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择师、反日等自由。

全国的工农兵士贫民学生同一切民众们！将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混战，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走狗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出卖投降的斗争联系起来。

共 产 党
中 国 共 产 青 年 团
四川省委员会

1933年5月印发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在四川反革命军阀战争中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决议（节录）

（1933年5月8日）

（一）略

（二）四川目前的“两个战争”

（3）在四川目前存在着两个战争，即是工农兵士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与通南巴红军苏区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围剿的革命战争，和全川国民党军阀争城夺地争夺剥削工农贫民屠杀兵士劳苦群众的反革命战争。

（4）去年红四方面军远征军的伟大胜利，陕豫川边苏区（在川是通南巴）的建立，曾经使四川军阀暂时停止了全川军阀大混战，一致去进攻红军。

（5）1932年四川军阀战争的结果产生了各部防区的巨大变化和矛盾，破坏了军阀间的均势；另一方面因为通南巴红军暂时还只是给予了一部份的军阀（田刘）以重大的打击，因此在最近全国全川统治阶级一致进攻红军的当中，四川的国民党军阀间的反革命战争跟着军阀的混乱又到了不能不迅速爆发的情势。

不仅在川南荣、威、嘉、仁间二刘的作战准备日益加紧，川西北方面遂、潼、顺间也达到极端的紧张。在川西方面对刘的防区的争夺战争部分的已经开始了！

(三) 拥护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军阀混战。

(6) 这一反革命的军阀战争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不管双方作战的对象是否发生变动，不管谁胜谁败，其对于地方经济的破坏，工农兵士贫民的屠杀、压迫，群众负担的加重，总是一样的。可是在国民党军阀无耻的宣称“红军妨害抗日后方”的时候这一反革命战争的爆发，完全在群众面前揭穿这一投降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历年以来四川的多次军阀战争明示了这一反革命战争的不彻底性，愈打愈复杂，永远没有谁能够克服一切得到统一。每次军阀战争的结果，只是必然的更加一层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压迫和剥削，再又种下一次更扩大更残酷的恶战。

(7) 只有以通南巴苏区红军为主力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军阀的反革命战争，只有红军和工农兵士劳苦群众革命战争的发展，才能够决定这一反革命战争延长的时间和范围；只有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够求得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解放，脱离历年以来军阀战争中群众被逼受饥饿、死亡、流散。

(8) 因此党的任务是在于拥护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的军阀混战，拥护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民族革命战争，加紧拥护通南巴苏区红军的工作，变军阀的反革命战争为革命的民族战争，以士兵的兵变来消灭军阀战争，联合红军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四) 目前的中心工作

(9) 为了在反革命的军阀战争中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党应当执行下列的中心工作：

A、在工农群众日常迫切要求的基础上，对照宣传两个战争的意义，去组织领导一切形式的群众斗争，首先注意成渝泸顺

等各中心城市工人经济斗争，开展失业工人要求救济的斗争（特别是因战争而失业的），组织成都潼川各地中心工厂工人的破坏工作（怠工或制造事件），使其失掉作用，组织运输工人不搬运军火的斗争。

组织苦力、农民反对拉夫，反对强迫兵役，反对军事征发骚扰的斗争。组织破坏军阀双方军事交通（电话、道路、渡口）的工作，坚决发动三台、中江、绵安的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阆中、南部、宣达的游击区域。

B、加紧兵变的准备和领导，严守双方军阀的失败主义，宣传士兵不打士兵，专打反动长官，在士兵的日常要求上去团结群众（如要欠饷、要双饷、要津贴，反对急行军，反对戒严令，反对枪毙逃兵等），加紧士兵和下级军事干部中的反日宣传，揭穿军阀的不抵抗主义，宣传不参加军阀战争，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联合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进攻红军，实行兵变投红军，兵变到农民中去作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和红军。

C、加紧组织城市贫民的抗捐税斗争，组织各种城市贫民的要求的斗争（如要工做、要求平米价、反对屯米屯柴），把这些斗争联系到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临时军费，拥护民族革命战争上去。组织和领导学生的罢课，反对估提教育经费，反对军队驻扎学校，反对军事压迫学生，要求读书择师的自由，反对学校与政府当局干涉学生参加反日运动。

D、最后最重要的是加紧拥护川陕豫苏区红军（通南巴红军苏区）的工作，努力的发展苏区周围的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加紧进攻红军的白军中的工作，组织兵变投红军，破坏白军后方交通，截夺白军武器军需，继续发展群众中的拥红拥苏宣传，扩大募捐帮助红军，使每个工农兵士贫民群众明瞭，只有红军苏区

的巩固和扩大，才能够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消灭反革命的军阀战争。

在执行这些工作中党还应当特别注意发展党的组织，实行工人、贫雇农民、贫民、学生、士兵中的公开征集，扩大战区和邻近区域的群众组织，这才是革命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中共四川省委接受中央指示信的 决议（节录）

（1933年7月17日四川省常委通过）

一、目前四川的革命条件

（一）……

（二）在农村方面群众的革命化正在日益卷入土地革命的狂潮中。川东北达、宣、阆、苍、南、营、蓬一带游击战争的蓬蓬勃勃的生长，中江、绵安、顺庆、农民抗租抗税反高利贷、杀收款委员的斗争，以及川南邛大、永宁一带的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军阀抗捐的运动（虽然后者部分是豪绅分子在领导），川东的农民神会、教民运动（八德会、联英会），这一切表示着在这一方面革命条件是如何的顺利，同时，告诉着虽然在一部份地方如阆、苍、南、营、达〔等〕党的工作有着相当的进展，可是我们看见我们许多力量仍然在许多地方非常薄弱，甚至有些农民的斗争没有我们的领导，自动的在进行（如川南的农民武装行动）。

一般的说来我们仍是落后于群众运动，四川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到更高的阶段，实现土地革命的时期。中央指示一切农民斗争与红军的联络，“能够在最近的将来在最广大的四川开展土地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三）目前在四川的情景之下，革命条件的顺利特别表现在强大的红军部队之出现，通南巴苏区的建立及扩大。另一方面则

是英国帝国主义操纵指使之下的军阀战争，更残酷的正在表演，同时全川的军阀准备着一致进攻红军与苏区。在前者红军新的伟大的胜利，的确激动了川东北的整个形势，使当地党和群众得到工作上一个新的推动。后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造成的川战，毫无疑问的使工农兵士群众的革命化，特别英国的积极进攻康藏更使川西南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状态。的确这些新的要素，使四川与其他苏区，站到目前革命阶段的最前线。

在这样的上述各方面革命条件的非常顺利之下，中央指示了暴动条件部份的成熟，这更是非常重要的。

二、……

三、四川党的任务

(一) (略)

(二) 加紧在农民、灾民、兵士、革命学生、少数民族中的工作，使这些群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围绕党的周围。

在农民中为了夺取广大群众，党必须坚决组织与领导农民抗捐税、抗租、抗债、分粮的斗争，把这些斗争提高到土地革命与游击战争，联合川东北的苏区与游击区为创造与巩固苏维埃而斗争，省委应当迅速的通过巡视员帮助地方党部去组织与开展青神、眉州、嘉定、邛大、内江以及川东北和川西绵安、中江、三台等农民抗捐、抗租、抗债的斗争，加紧对于邛大游击队的领导使其在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拥护参加之下扩大起来，特别要集中注意加强宣汉、阆苍各地游击队的领导，纠正这些游击队没有坚决的采取进攻策略，不积极在田、刘军各后方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如升钟寺与宣汉），努力去发动三台、中江、嘉陵江西岸田军后方与绵安的游击战争。在这些斗争中，绝对的不允许犯脱离群众的

富农路线，忽略富农分子反革命性的以及盲动主义“有武装才能抗租”、“要大于不小干”的错误，必须注意尽量发展农民的组织，尤其是扩大和巩固南部、三台、顺庆等地的农协，建立游击区的贫农团，肃清农协中的富农分子，保证党的领导。凡没有农协的地方，应当用各种形式去组织农民（农民委员会、抗捐抗租同盟、灾民委员会……）。此外，更须注意到下东与川北的农民神会与秘密结社中去（如八德会、联英会、松杉教、红灯教）积极活动，夺取其中的下层分子，反对其上层的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在农村灾民中，坚决去组织和领导吃大户、分粮、不还债的群众斗争。

在国民党军阀积极组织对于川北红军与苏区的“围剿”中，在四川军阀的酣战中，加强士兵工作，加紧组织革命兵变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一任务的执行，首先应当在士兵群众的日常要求上（要饷，改良伙食、服装，改善待遇，要津贴，反操课，要代表权）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在组织上与思想上（建立士兵反军阀战争的组织，反帝同盟，红军之友等）阻止他们去进攻红军。在刘湘、杨森以及田頌尧的中心部队中，党应该遣受过特殊训练政治上坚决的同志去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领导革命兵变投向红军，和到农村中去联合农民实行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在这些工作中应当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所谓“化零为整”（原文如此——本书编者）、组织“几十人的兵变”脱离群众的路线（以下略）

（三）……

（四）巩固川东北苏区和创造新的苏区，为了全川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成为目前四川党的任务之中心的中心。这一任务的执行，首先须要无情的打击过去的省委和全川党对拥红拥苏

工作的迟钝性，实际在群众中去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六项拥护红军与苏区的具体工作。

根据川东目前形势的开展，红军伟大的新的胜利，和阆、苍、南、宣、达、营、渠一带接近苏区地方游击战争的生长，省委应当特别注意阆南与宣达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坚决去建立阆南的矿工、嘉陵江上游运输工人与城区工人的工作，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改善和扩大现有武装组织，尽量吸收工人、雇贫农参加进去，并且要适当执行化整为零与积极采用袭击进攻白军的战术，同时尽量去开展农民灾民抗捐抗债抗租，要救济、吃大户的斗争。更要注意去领导通南巴难民的工作，分化其内部，组织被迫逃亡的贫民在白军后方进行扰乱工作。汇合这些力量，党应当坚决去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布置有计划的暴动，利用农民的游击队的暴动、军队的哗变或红军的接近作为首先发动。

四、……

五、青年工作与C.Y.问题

……

关于中央来信的几点声明

……

(1) 升中寺暴动问题，由于××同志报告事实的不忠实，以致在中央信中只注意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于游击战争出卖的严重的罪过，而没有指出暴动是不成熟的，是右〔左〕倾不要群众的盲动。因为第一，在时间上升中寺的事变暴发在红军入川前〔两〕月，当时连风声都不知道，红军〔会〕迫近川北。第二，当时只有极少数的群众参加，而且是在不明确斗争前途的情况之中被少数当地上层同志（如张友民）等鼓吹起来的。这些分子首先自

已选择个人的逃跑计划，或者是大干，或者逃跑（怕群众的抗捐税与其他斗争开展，影响他们不能在当地立足）。第三，不选择时间，不充分准备，省委巡视员××同志到升钟寺仅两天，出席了一个支联会就动手，实际是应该迟移至少两个礼拜，尽量开展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当地群众斗争一开始就被“暴动后才有办法”“左”的词句所抑制了），同时作更周密的布置。第四，所谓暴动第二天就解决进攻的敌人一百多条枪，实际上并无其事。当然不明瞭这些事实的中央的指示是不错的，错误是属××同志的报告应当负责的。

（以下略）

（原件存四川档案馆）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十月革命十六周年 纪念的决定（节录）

（1933年9月30日）

二、加紧领导广大群众反对剿赤捐及一切捐税的斗争，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去广泛的发动抗捐斗争和抗捐军，在每个农村中去加紧领导农民的大小的一切斗争，建立农民委员会与扩大农协组织，普遍的以各种各式的武器武装农民，在顺、蓬、中江、三台、绵安、内江、安岳、青神、合江等农区中，坚决从农民的一切斗争中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创造赤区。扩大邛大遂宜的游击战与赤区，开展农民阶级斗争，深入土地革命。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游击战争和 地方暴动的决议

(1933年10月12日)

在目前革命形势猛烈开展，阶级斗争日加尖锐，农村斗争很容易走到武装冲突阶段，迫切需要党去组织群众的游击战争与农民暴动，以达到创立新苏区，争取一省或数省政权首先胜利。

可是四川的党一年以来，因为对当前形势估计不足，不了解正确的游击战争，公开取消地方暴动，致使许多区域的游〔击〕战不能发展，许多农民运动遭受打击。

省委在中央指示领导之下，以布尔什维克的彻底性对于过去错误严加检讨，具体决定今后游〔击〕战和暴动的正确方针，以作全川同志的指南：

(一) 过去错误的检讨

一、四川的党过去对于游击战争，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把游击战争看成是离开群众的秘密阴谋的军事行动。认定群众斗争是一回事，游击队的行动又是一回事，规定“秘密的审慎的小规模的”原则为组织游〔击〕战的基点，限制要以①政治认识坚定，②射击命中，③体健耐劳的三个条件，为这样游击队员标准。这充分表现是脱离群众，脱离斗争，与中央关于农民运动决议内的“游击队是从农民群众中日常斗争中产生的，它不但不能脱离斗争，而且只有发动群众斗争，依靠群众斗争的原则”完全相反，

脱离广大群众斗争，把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对立，不依照中央决议“在群众斗争中坚决解决民团军警武装，武装自己，这样来组织游击队，来开始游击战争”，而要在脱离群众“秘密的”限于三个条件去物色少量分子，成立“小规模”的游击队。这种“小规模”的游〔击〕战错误路线，障碍许多群众正确游击战争的发动和进展。

至对于农民暴动和地方暴动，在中央来信以前简直完全取消，认定目前四川任何地方都没有暴动条件的成熟，提到暴动；便认为立三路线的盲动。

因此，一年以来，四川党对于游〔击〕战暴动问题，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升钟寺的总结，本着取消暴动和‘小规模的游〔击〕’精神。三台、中江、顺庆，都在升钟寺总结影响之下，停止组织暴动，障碍游〔击〕战的发动和发展。

本年中央五月来信后，省委对于此点，仍未检查出〔来〕。中央认为升钟寺游〔击〕战，“起于农民斗争的坚决，以及没有驻兵的条件下，是成功的。”省委在接受中央指示的申明中，仍站在取消暴动的立场，认定当时“升钟寺暴动是不成熟的，是左倾，不要群众的盲动”，对于“小规模的游〔击〕战”路线的错误和领导人机会主义与不坚决的先后逃跑（从张×民到平同志）反认为是主因。

这样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若不严加打击和纠正，四川的党是不能在群众斗争开展和川陕苏区和红军胜利当中，实际争取苏维埃在四川全省首先胜利的任务的。

（二）今后组织游〔击〕战和暴动的路线

在资本主义稳定终结全国国民经济总崩溃当中，四川广大的农村，尤其是东北部，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苛捐杂税，高利重税

的层出不穷，加以强大的红军出现，各地群众斗争的发展，正如中央在北方会议中指出：“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环境之下，许多极小极小的斗争，往往迅速的发展到武装冲突与武装暴动。”因此，在群众斗争过程中，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组织与武装工作，积极领导群众斗争，在激烈发展形势之下，发动游击战争、农民暴动和地方暴动，是四川党的目前主要工作之一。

中央在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上，指明“估计到农民群众日常斗争，一开始常常是同国民党军警民团直接冲突，党在这斗争领导中必须特别注意农民的武装，在斗争一开始，就应该号召农民用各种各样武器（梭镖刀矛等均可）自动武装起来，必须在斗争中坚决解除民团军警的武装，武装自己，这样来组织游击队来开始游击战争。”四川的党，在领导农民游击战争中应依照中央这一指示，纠正“小规模游击”路线的错误，坚决的在川东北、川西北及川南各地农民反“剿赤捐”及各种苛捐杂税、抗租抗捐、破仓分粮等斗争中，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武装农民，在斗争剧烈发展之下，解决统治阶级武装，武装群众，成立游击队，以发展游击战争和农民暴动。

游击队的组织，依照中央的指示，应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绝不能脱离群众，秘密的定出三个条件招募人员。因为游击队应在战斗中训练加强其作战能力，把游击队的个个队员，在战斗中训练成为政治认识坚强，身体健强耐苦，作战能力强大的战斗员，绝不能组织游击队时，限制三个条件，对广大的要求参加战斗的群众把门关起。

游击队的作战，应配合群众斗争，与群众斗争不可丝毫离开。游击战争，要给群众以直接利益，离开群众日常利益的游击战争，不但不会发展，且会与群众脱离以至瓦解。游击队的作战

计划，固应秘密，游击队的行动，不能与广大群众一刻脱离。过去的“秘密的小规模的”军事阴谋行动，当然不适用，与正确的游击战争自然不同。

游〔击〕战开始，应立即执行土地革命，依照土地法，把地主阶级土地没收，分配给雇农贫农和游击队员。富农土地亦要没收，在不反革命条件之下，分给他较劣的土地。深刻认识过去对土地革命认为遥远的错误，接受城口、万源、梁〔山〕、达〔县〕、忠〔县〕、丰〔都〕、升中寺等处没有执行土地革命，致使富农抬头，陷游〔击〕战于失败，以及邛〔崃〕大〔巴〕不执行土地革命，结果土匪发展比我们多……的一切经验，依照中央五月来信的“必须在土地革命中，找得唯一的出路”的指示，在现有各游击区（邛〔崃〕大〔巴〕、宣〔汉〕、达〔县〕、阆〔中〕、南〔部〕）中立刻执行土地革命。新发动的游击区域，在发动游击战中，对土地革命应同时执行，给雇农和游击队员以分得土地的利益，保证游击战争向前发展，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应注意不防害中农利益，不去动中农土地。

至农民暴动与地方暴动问题，在斗争形势开展，达到暴动条件的农民区域或某个地方，应依照中央五月来信，有计划的布置和发动农民暴动及地方暴动，把握的中心区域取得邻近地方的援助，“或以警备队的兵变开始，或以城中及地方革命群众变乱与暴动为开始点，或以红军从外面进攻为开始点，或以二个三个原因为开始点”，依照暴动计划，夺取统治阶级政权为革命委员会，为临时政权机构，号集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正式苏维埃，实行土地斗争，成立红军独立营、独立团或独立师，扩大和发展游击队、赤卫队或少年先锋队，巩固和发展苏区，以与川陕苏区及各地的苏区打成一片，达到四川全省革命首先胜利。暴动是一

种艺术，在事前应精密的布置，严格纠正升钟寺不完成艺术，而只认为是一种民变的儿戏暴动倾向。

最后，特别指出，在反对过去机会主义的取消暴动和小规模游〔击〕战路线中，同时反对一切游〔击〕战和暴动的左倾空谈，纠正团省巡视员在阆南认为“组织暴动就用不着游击战争”，纠正南充中心县委在升钟寺暴动前的空喊动员八路人马，纠正棉〔绵〕安等地的“只要大干，不要斗争”右倾实质。

为要顺利的启发群众斗争，实现这一决议，党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持久性与顽强性，来开展反富农斗争，坚决领导雇贫农的抗债分粮等等的斗争，来反对富农，对富农不应有丝毫的幻想和投降，肃清富农在农民群众组织中的领导，洗刷富农出农会，同时党必须开展反对富农路线与反对富农意识和倾向的斗争，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统一，保障游击战争与暴动彻底的胜利。

省委号召全川同志细心研究此问题，本着中央指示，纠正过去一切错误，在群众斗争进展中，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农民暴动和地方暴动，创建许多新苏区，同川陕新苏区打成一片，达到赤化全川，争取苏维埃在四川首先胜利的目的。

四 川 省 委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2期）

中共四川省委为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征收“剿赤捐”致全川各地党部信(节录)

(1933年10月12日)

党在此时应抓紧群众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情绪，抓紧群众反对“剿赤捐”的要求，广泛的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抗捐斗争，是粉碎军阀刘湘“围剿”川陕苏区最中心而有效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立即：

一、动员各地支部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抗“剿赤捐”斗争，抓着群众大大小小的抗捐斗争加强领导，扩大抗捐运动，反对征收“剿赤捐”去进攻真正反日反英反帝的川陕苏区和红军。在“不缴一文捐款给军阀进攻红军之用”的口号周围。召集各种群众大会，通过抗“剿赤捐”纲领、文电、宣言，成立抗捐大同盟，成立民众抗捐军，包围统治机关，举行示威游行，杀死提款委员，杀死为军阀收“剿赤捐”的土劣，立即变成游击战争或农民暴动与地方暴动，迅速烧毁剥削贫雇农的契约与实行分田，深入土地革命，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

二、在抗“剿赤捐”的领导当中，应纠正过去对群众的关门主义，怕深入到群众中去，怕动员广大群众，错认抗捐同盟是辅助组织或赤色组织，拒广大群众于千里之外，自己只在秘密的狭隘的圈中盘旋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应灵活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抓紧贫农和贫民群众，建立和保障贫民在抗捐斗争中的领导

权……

三、保证党在抗捐运动中领导权的中心，是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邛大抗捐军发动以后，因为没有迅速地执行土地革命，所以后来分化时，土匪发展比我们领导的游击队超过数十倍。这是因为我们对贫苦农民迫切要求的问题（最主要的土地）没有具体的解答，当然我们就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党在抗捐斗争中的发动中就须广泛的宣传土地革命。抗捐斗争转变到武装斗争时，须立刻开始执行土地革命，在群众会议上通过立刻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平分，立刻烧毁契约，公推农村中最熟悉土地情形的雇贫农成立土地委员会，依照土地法令来处决土地问题，要使群众不仅要武装反抗捐税，而且为了保卫自己分得的土地而有武装斗争的决心，才能保障这一斗争，真实建立起新的苏区的任务。

四、抗捐运动的领导，抗捐同盟的组织及抗捐的发动，目前是刻不容缓的。刘湘匪首十月四日就职后，调动了十万以上的白军“围攻”川陕苏维埃区域，各县和成都的催收捐款急如星火。川西北的中江、绵安、三台，川北的广、岳、营、渠、顺、蓬、遂等地及下东、川南各地，应即刻开始抗捐军、抗捐同盟的领导，发动武装抗捐，扩大抗捐军的战争，建成游击区域，实行“不缴一文捐款与军阀去进攻红军”，响应红军的发展，骚扰国民党军阀后方，与红军的行动配合，达到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新造许多游击区和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四川全省首先胜利。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中共四川省委致三台县委信（节录）

（1933年10月23日）

三台县委：

我们根据你们最近工作计划、县委给北区区委信、盐亭巡视报告及省巡视员登报告，讨论以后，对你处提出如下的意见：

一、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由登同志传达省委接受中央指示纠正错误的意见，你们是在观念上改变了过去的脱离群众的狭隘秘密的行动，接受了正确的意见，但在这里我们有两点意见要提出：

第一，三台党在一贯的富农路线、右倾消沉、等待红军、压制群众斗争的错误当中，现在我们要去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自然要反对右倾等待，要坚决的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可是反富农斗争，在斗争中克服富农路线的障碍，成为党发动游击战争的枢纽。就以北区一地而论，富农路线障碍斗争的严重，应该值得全党警觉的。如“两月以前群众因粮税的加重，压迫的加剧，迫切的要求斗争，可是北区党的右倾领导，却证明两次无耻的破产”。

“在两星期以前，区委召集了农民活动分子讨论斗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到了一百多人，而区委负责同志毫无准备，事前无周密详细的讨论，临时措手不及，拿不出主张来，结果群众失望的去了，这真是玩弄群众的可耻举动。”……这样的例子我们不再引了。三台县委对这样严重的问题，采取了什么方法纠正呢？……省委现提起你们在这一问题的严重注意，并指出下列反富农斗争的具体

方法：

1. 在抗捐款的下层统一战线中，应坚决去开展雇农解放斗争，反高利贷及抗债斗争，破仓分粮吃大户，雇农加工资的斗争，不要为了与富农的联合战线而压制雇农贫农的斗争。

2. 农村中坚决建立雇农工会、农协中划分贫农小组，这都是你们干脆忘怀了的。要百分之百的警觉呀！没有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组织（雇农工会），要建立党在农民斗争的领导权，这是无法的。

3. 在领导抗捐斗争积极推动到武装抗捐的行动中，党应注意推动大批的贫农雇农加入武装抗捐队伍，使雇农贫农作为抗捐军组织的骨干。

4. 在抗捐斗争过程中，党应加紧土地法令的宣传，及苏区分配土地的情况，大大的提高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热情。党应迅速领导农民的抗捐斗争进而转变到土地革命。当农民抗捐斗争转入到武装斗争阶段时，党即须领导群众在会议上通过土地革命的办法，立刻焚毁红契佃约，由群众选出对土地有经验的雇农贫农（中农也可）成立土地委员会，依照土地法令分配土地。坚决打击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或长期游击运动以后才能实行土地革命的机会主义，不领导群众很迅速的实行土地革命，单纯的为了抗捐而实行武装斗争，则党没有办法防止富农在中途出卖和叛变。只有在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为了保障土地革命的利益，坚决起来实行武装斗争的情形下，才能使这一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新苏区的任务。

5. 你们采取的排斥富农分子出领导〔机关〕的办法还不够，而且有缺点。不仅要排除富农出领导机关而且在党和农协的组织中一般的原则都应拒绝富农分子。但个别的从富农出身的党员，只

要他在斗争中一贯的拥护贫农雇农的利益，坚决的为党的路线而奋斗的，那又在例外。同时更要反对党内的富农路线（如对富农认识不够，幻想富农），与个别同志的富农意识和倾向。

第二，从你们的文件中看见你们把游击战争和骚动工作混淆不清。游击战争的行动中自然可以大大的破坏田匪的设防，但是简单的一个特务行动（如割电线挖马路等）绝不是游击战争，这在游击战争以前都可以做到的。目前你们对这一拥护红军的特务行动应加倍的去进行，但你们在计划上所写的，只动员武装群众去进行，那是不够的，应动员广大的群众用一切可能去进行。注意呀！不是要你们离开群众斗争专门去进行这样的特务行动。

关于游〔击〕战问题，我们除了提出上面两点意见外，我们认为在盐亭客观上存在着暴动的条件，望你们坚决领导群众斗争，配合着团练的哗变去组织暴动，那管是很小的一个暴动，都是对红军极大的帮助。这并不是说盐亭就应取消游〔击〕战来专门组织暴动，而是根据当地群众对红军的影响与斗争的开展，只要党坚决走领导斗争，前途的开展绝不限于游击战争，相反的游〔击〕战的开展正是创造暴动的有利条件。

（以下略）

（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中共四川省委致邛大党及川康 红军游击队指示信（节录）

（1933年10月29日）

一、目前政治形势与邛大特区及红军游击队的任务

在国民党四次“围剿”失败后，更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在国际联盟及各帝国主义强盗的大借款、军械品，军事顾问的指挥和帮助下，进行对红军作第五次的绝望的进攻。在整个国民党的反动卖国，残酷进攻革命以图最后挣扎的情形下，四川国民党军阀也在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的赞助下，大兴六路军马向红四方面军及川陕苏区进攻。在国民党军阀财政的困难（如四百万“剿赤捐”，现在尚未要足）及各个帮口派别的矛盾冲突，尚未到预定计划动员清楚时，旬日之间，红军已占营渠，取广岳，克绥宣城万，击溃杨森、刘存厚两部队，白军各部胆战心寒，连日军阀豪绅从渝蓉兑价〔款〕到沪作避难费的已达四、五百万元之巨，使市场银价大涨。另一方面则造成广大群众对红军的热望与斗争的风起云涌，革命的火炬使国民党军阀只得把进攻变为防守，就是在邛大一带的边防军李其相匪部也赶急抽调两旅向川北增援。……

根据这样的环境，邛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任务，是在加紧赤区内阶级斗争的发展，领导群众执行土地革命，加紧赤区的肃反运动。广泛的武装群众及扩大红军游击队。同时应发动赤区周围的群众斗争，坚决的领导群众斗争及武装队伍，配合红军游击队

的行动，向白军进攻，领导群众战斗的动员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川康新苏区、川康新红军的创造和扩大而斗争。

二、……………

三、今后的工作

根据上面的任务，反对过去的错误，对于今后工作的进行，省委提出下面的意见：

第一、巩固赤区和扩大赤区的问题

1. 党和游击队应用最大的力量去发动赤区的阶级斗争（抗租、抗债、分粮，雇农加工资等）。游击队不仅是一个战斗员，而且要成为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斗争发动之先，一定要召集群众的会议鼓动和讨论，坚决反对游击队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和代替群众的分粮抗租等行动，游击队的行动必须密切联系着群众的斗争。游击队必须成为群众斗争中的先锋队和领导者。

2. 在苏维埃政权未建立前，农会的主要作用是领导群众斗争。有时还可用斗争委员会或农民委员会的名义去领导斗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参加各种斗争，建立雇农工会（可以包括农村的手工业工人）和农会的贫农小组，（准备很迅速的在苏维埃政权之下转变成贫农团），应该成为当前第一种重要任务。

3. 党应领导赤区农民以各种各色的武装（快枪、刀矛、土炮、镰刀、斧头……等等）自动武装起来，把现在有的枪应立马拿出武装贫农，向农民解释不要怕军队，我们群众人多地势熟，军队本身是动摇的，只要群众配合游击队坚决向军队进攻，我们一定得到胜利。……

4. 肃反工作与反富农斗争。你们从经验中已经认识出肃反的对象，不仅是团总、团正，他的爪牙（甲长、排头）也要注意。必须坚决动员群众一致参加这次〔项〕工作，反对单纯以游击

队去打土豪的办法。这里同时要提出来的，反对富农斗争，应该成为你们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5. 在赤区立刻鼓动群众起来分配土地，反对把土地革命看成遥远的事的机会主义。立即在农会中、雇农工会中、游击队中讨论土地革命，立刻加强群众分粮斗争的行动和领导，提高群众的觉悟与积极性，一直到为土地革命而斗争，焚毁其佃约当约，从农民群众中选出雇农、贫农、中农成立土地委员会，依据土地法处理土地问题。

6. 加紧红军在川东北大胜利的鼓动宣传，召集举行庆祝红军胜利大会，密切联系到反帝斗争。……

7. 立即建立赤区中的党的委员会，立刻进行〔建立〕自下而上的苏维埃政府，加紧动员扩大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深入肃反运动的乡村，即应召集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

8. 在赤区附近区域，不要只拿游击队去活动，一面党应派人去工作，更要通过群众团体的关系去工作，发动白区群众斗争，一致开展到群众的游击运动。

（以下略）

（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中共四川省委致遂安县委 指示信（节录）

（1933年12月10日）

1. 目前形势的估计及遂安党的任务

.....

遂安的党处在白军进攻红军的后方，巩固川陕苏区的前线，应该正确的估计这一形势，把握群众的情绪和顺利条件，广泛发动群众当前切身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斗争，特别〔是〕雇贫农的斗争，夺〔争〕取广大的工人、雇农、贫农及一切劳苦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巩固雇农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武装农民，引导斗争到较高的阶段——武装冲突以开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武装暴动，迅速建成在遂安区内创造新苏区新红军的伟大任务。

.....

3. 遂安党的具体工作应该是：

（一）广泛的启发和领导群众当前的一切大小的斗争。抓紧目前抗剿赤捐，抗军粮及一切捐税，抗债分粮吃大户，反对抽壮丁，反对运军火出境等斗争，组织农民起来包围区乡团正保甲，杀收款人员，捣毁收款机关，焚烧剥削群众的契约，领导现已编成之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配合群众力量，起来去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破坏桥梁、砍电线，解决个别豪绅团防的武装，袭

击军队，截夺辎重军粮武器，以至分土地，开展和扩大游击战争。抓紧斗争开展剧烈的区域为中心，来组织暴动，与新近区域的配合与声援。

立刻将各个乡农会健全和巩固起来，建立农会自身的系统和各种工作，普遍的加紧教育工作，培养农会的干部，普遍的讨论苏维埃的土地法令与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提高一般群众对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情绪和信心，唤醒一切群众以各种武器普遍的武装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保护斗争获得胜利。赤卫队、少先队的组织应普遍的扩大，并加以军事常识和政治训练。

立即组织雇农工会和农村手工业工会，坚决启发他们目前种小春的加工资和改良待遇等斗争。农会中应立刻组织贫农小组，准备苏维埃建立后即改贫农团。……

无组织的农村中，应抓紧目前抗捐税、抗债分粮等斗争的领导，应用下层统一战线去组织各种斗争委员会，绝对保障贫雇农在这组织中的领导作用。（以下略）

（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中共四川省委全川综合工作计划 (一·二八至三·一八)(节录)

(1934年1月)

二、农村工作

(二) 发动游击战创造游击区域。

1. 加紧邛大、中江、遂安、南部、古宋等地的抗捐抗税抗债分粮等斗争，积极发动创造游击区域。

2. 加紧领导绵安、彭华、盐亭、内江、青神、峨眉、乐山、井研、泸州、合江等地的抗捐斗争，推动武装斗争，发动游击战。

三、兵士运动

(一) 创造和恢复兵士工作

1. 创造万县、江巴、绵阳及剿赤前线的兵士工作。

2. 造成华、嘉定、泸州、遂宁、雅安、涪陵几个中心城市的兵士工作。

3. 恢复廿军、廿四军的旧军支及雅安失业军官的工作。

4. 建立和扩大上列农村附近团防中的工作。

(二) 加紧兵士斗争领导组织兵变

1. 加紧省军科直辖□□□□两军支斗争的领导，积极组织兵变。

2. 加紧剿赤前线□□军支斗争领导，组织兵变投红军。

.....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中共四川省委致中江县委信（节录）

（1934年1月20日）

田頌尧军阀为要进攻川陕红军，一年来在防区内预征粮税将近十年之多，剿赤捐、团防捐等更层出不穷，大量的搜集粮食，扩张地主豪绅的地方武装镇压群众斗争，以巩固其所谓的剿赤后方。地方豪绅的剥削亦空前厉害，加以今年农产品价格低廉，捐款催收又急如星火，高利贷较前更加活跃，中江的广大劳苦群众在无钱缴捐，没饭吃的压迫下，日益倾向革命，群众的斗争，普遍的不断的爆发。更加以红军继续胜利的推动，川陕苏区的扩大和巩固，以及土地革命深入的影响，更使他们需要土地、政权迫切万分。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虽然部分的遭到失败，但仍前赴后继的向前开展。

自文家桥斗争后，抗捐浪潮波动中江全境，以及邻近数县，风起云涌的自发斗争普遍的爆发，群众斗争情绪大大提高，愈使他们相信只有从斗争中来找寻出路。同时反动统治动摇万分，不得不施行白色恐怖，以清乡捕人，十家连坐，办团等等方式来镇压群众斗争，更加使群众感觉到武装斗争的需要。因此中江党不仅要积极的去领导抗粮款、抗捐税，分粮、吃大户，抗债等武装斗争，而且应该进一步的从领导这些斗争走向与敌人作武装冲突来开展游击战和组织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创造中江及邻近数县内的新苏区新红军，与川陕苏区打成一片，便成为了中江党最迫

切的具体任务。

.....

中江比较接近川陕苏区，是田匪进攻红军的后方，巩固川陕苏区是中江党的任务之一。党不仅要领导斗争发动游击战去牵制敌人，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要创造新苏区，才是你们拥红最具体的工作，对破坏桥梁、电线，应该基于群众拥红的积极性上面。领导广大群众去进行破坏工作，经常不断的砍电线，拆桥梁，挖马路，截军米，夺辎重和枪械子弹，毁坏兵器厂、武器库，不要限于少数人的行动和间或的执行。

募捐运动应普遍起来。要到无组织的群众中去募捐，把出了捐的群众组织成“红军之友”。经常领导群众研究苏维埃的土地法、劳动法及各种条例，召集庆祝红军胜利的会议，组织苏区参观团到苏区参观，为苏区红军征求和输送各种专门人材，更应该不断的扩大苏红的影响，揭破敌人对苏红的诬蔑和武断宣传。

到兵工厂工人中去鼓动罢工怠工，拥护红军，不造一枪一弹去进攻红军。在广大劳苦群众中鼓动实行不缴一文钱的捐税给田匪去进击红军。到兵营团防中去鼓动不打红军，要求抗日抗英。在学生中鼓动实行反对拉扯教育经费停办学校去进攻红军。执行领导反帝拥红工作，绝对要和群众当前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才能使工作更加开展。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中共绵安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

(1934年1月23日)

省委：

自玩君^①和交通被捕后，一个多月没有得着你们的指示和文件了，同时我处情形你们当然也是非常隔膜，严格说起来是我们在目前阶段中得着一个非常大的遗恨，我们为了要使你们了解我处情形的实际的指示和纠正与帮助起见，兹将我处的政治形势和工作状况及组织现象逐次报告：

1. 自安县和绵竹东区事变后，党的工作在严厉的白色恐怖下遭受很大的打击（部份的组织倒台和群众不敢斗争）顿成混乱与倒台之状，但是在红军胜利影响和田颂尧豪绅地主严重剥削下的绵（竹）安（县）各地的工农劳苦群众，由于生活恶劣之更形尖锐，不能不日趋革命和对革命之更进一步的坚决性，因此在敌人残酷的进攻与武断宣传欺骗之中，党的工作能于短时间之中，大部份恢复原状和一部份的开展，当然不是偶然的问题。

2. 关于转变问题：在两次（绵安）事变后党的当前任务是：（1）反（富）农路线。（2）反白色斗争……而遭受第二次惨败虽然在县委坚决反对和督促之下，在秀区睢水、绵东、高桥等处是把这些倾向克服了，而且正向着斗争的道路开展和一部份的已经爆发斗争（秀区）。

3. 工作状况：

^① 玩君即罗万均（罗辑），当时是省委巡视员。

.....

d. 在两月来的工作主要精神是在集中力量反富农路线，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清理整顿各地组织，除安县的茶坪外，各区都把工作恢复了，并且秀（水）塔（水）两处有新的进展，.....

f. 互济工作：现由（秘）密发起组织川西革命互济会，已开始进行大批募集救济同志，在安县是非常开展。

g. 宣传工作：在绵东在一月前出过两次壁报，列李卢纪念，县委出了六百份宣言。

h. 组织现象：.....B. 在安县未发生事变以前，安县有支部二十个、同志百余人，事变后现仅清理起八个支部、同志卅余人，绵竹十个同志未编支，总计县委管理十四支、同志六十余人。C. 群众组织，绵东区四十人，安县秀（水）区约一百人，睢水、高（桥）正在猛力清理中现尚不能统计，罗江五十余人，德阳十余人，彭（县）什（邛）少数组织未统计。D. 兵士工作，在安（县）之秀（水）塔（水）沸（水）三场有五六人的团丁组织，城内有团丁群众二人，绵竹民丁十余人驻军有些关系，群众武装绵东二十人，高桥七八人，.....。F. 妇女工作，在安（县）有七八十人支部二，河（清）秀（水）沸（水）各地有少数组织，绵东有三十人的妇女组织。

.....

5. 关于茶坪破坏之经过及玩君树椿^①现在的情形。安县发生事（变），茶坪亦大受影响，.....。

绵安中心县委

1934年1月23日

（中共安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① 树椿即蔣树椿，当时是县委委员。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川工作的 决议（节录）

（1934年2月3日常委会通过）

一、目前四川革命形势的估计

（一）在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的基础而产生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战争，帝国主义是以全力疯狂的进行着，帝国主义正在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它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完全殖民地的计划，国民党亦正在忠顺的执行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道夫的责职，五次“围剿”，正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瓜分中国最具体最凶恶的步骤，它不仅以借款武器，军事顾问，法西斯蒂干部等等的供给和帮助，而且来组织和领导这一次的“围剿”，在五次“围剿”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更积极的向察省内蒙和华北进攻；英帝国主义亦积极领导藏兵渡金沙江，企图将川康变为西藏第二；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军舰驶川直接参加国民党“围剿”川陕红军湘鄂红军的战争，这完全证实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目前四川同样处于整个民族危机和争取两个道路决战的时候。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血腥统治所造成的中国经济浩劫，一年来帝国主义商品侵略的加紧（美棉麦来川，日本丝纱入川，较往年增加，帝国主义直接剥削四川劳苦群众的盐税加重——每担正税五元等）和国民党两次军阀混战的摧残；四川经济的崩溃更

大踏步的前进，工业更陷于破产的地位，顺广，嘉定丝业的塌台，遂泸火柴厂、成都两大兵工厂的关门，川南川北的盐业及各地织布业生产大大的缩小，千百万工人遭受失业饥饿的痛苦。一般资本家都积极将资本主义危机的重担转嫁工人身上，普遍的加长工作时间和夜工，减少工资，大批招收学徒代替成工，一切待遇恶劣万分。全川国民党军阀捐税的压榨为全国所罕有，而且是空前加重，（田颂尧已预征六十年以上，刘湘军阀防区虽一年四征而附加比正粮多之四倍，实际比十几年更多）附加厘金更是有加无已（成都最近两月内，所添捐税有二十三种之多）。各地豪绅地主富农的租佃高利贷剥削愈加残酷，农村经济已陷绝境，广大劳苦农民已陷于赤贫完全破产的地位。加以帝国主义的棉麦洋米洋面等大批入川，使农产品价格骤低，农民收入不够上捐纳租口利，国民党军阀更大量搜集粮食，没饭吃和被捐税压迫的劳苦民众遍于全川，尤其是川东北接近苏区的劳苦群众受国民党军队蹂躏屠杀，更惨不可言，岷江昆河及松茂灌的灾民大批的冻死饿死。

（三）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由于工农红军英勇善战、军事技术的提高、政治觉悟的坚定和赤白区工农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不仅巩固了原有苏区，而且在四川扩大了许多新苏区。最近为了战略关系，红四方面军曾放弃了部分地方，但是击溃了四川国民党军阀的主要部队，特别是击溃了刘湘的主力 and 消灭了刘存厚全部。这一胜利不仅给予全川工农斗争以有力推动，而且更是提高了群众斗争的情绪和要求政权土地的决心，使全川工农劳苦群众认识了只有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将中国从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中挽救出来，才能取得民族和社会的解放，更加决心为苏维埃

中国而斗争。

(四) 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川经济的破产，工农生活的恶化和红军不断的胜利，促进四川革命形势飞跃的开展。反帝运动虽在国民党残酷镇压之下，仍然继续的生长，反帝情绪在全川广大群众中仍然伸张存在着（重庆反对美舰浪沉煤船、赤水驱逐洋人、成都兵士纪念“一·二八”），而且反对国民党出卖投降表现不满。工人自发加薪斗争，反对资本进攻普遍的爆发（泸州织布工人加薪，键乐盐工加薪，成都印刷工人反对开除工人，新都店员要求改良待遇，井研失业丝工反对黄色工会等），罢工斗争运动正在生长和扩大（成都兵工厂索薪罢工，包车夫减底罢工，重庆电报工人罢工），农民抗捐税斗争遍于全川，杀提款委员和团甲，包围政府机关不断发生，而且有些地方已走到武装斗争和游击战（邛大、中江、罗江、盐亭、绵安……），抗债分粮斗争也日益开展（邛大、遂安、成都近郊）。兵士亦因生活恶化日趋革命，索欠饷、反对长官等斗争亦处处皆有，前线士兵亦不断发生倒戈投红军和兵士整排的逃跑（成都、崇宁）与雅安自发的兵变。在这些斗争中特别表现群众的顽强性和积极性，前赴后继采取进攻，连彝民（越西）卷入抗捐打死团总的浪潮。

(五) 正因为四川革命形势的开展和高涨，以及红军的胜利，更加尖锐了四川两个政权的对立，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四川的统治表现出进一步的动摇和剧烈的崩溃。四川的国民党更加露骨的投降出卖，动员了六路人马将近二十万的军队向红军苏区“围剿”，阻止红军抗日反英，厉行全川法西斯蒂白色恐怖，镇压反帝运动和群众斗争，各地宣布戒严，禁止集会罢工，普遍的清乡捕人，实行连坐，特别是疯狂的向四川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进攻，利用和收买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大批逮捕监禁屠杀共

产党员，强迫群众悔过反共，威胁学生作反共宣传，尽量加紧捐税收割（剿赤捐附加实券……）和地方豪绅武装的扩充（剿赤义勇军、民团），动员了全川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及各反革命派别，一致向革命进攻，采用武装宣传尽量造谣诬蔑红军苏维埃，同时进行改良主义的欺骗、麻醉的宣传（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抚恤匪区等等），企图作最后挣扎，挽救其垂死的统治，使四川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四川党正处在革命与战争和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一个急剧转变的关头。

（六）估计目前的形势应该指出，四川目前革命形势之新的紧张化，造成了阶级力量的对比更有利于革命。国民党各个军阀在政治上军事上大大的削弱，财政上的困难亦随着四川经济崩溃而日益增加，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和事实更使广大劳苦群众对国民党愤恨和揭破其武断民族宣传。四川各派军阀的矛盾是无法解决，军阀混战虽暂时停滞，然而终于不可避免的部分爆发（上南二刘对立，下南川黔军冲突，川北各军阀对立），全川兵士生活愈加恶化，日趋革命，中下级军官怕进攻红军心理普遍存在。尤其是全川反帝运动和工农革命斗争，不管国民党如何的镇压，仍然前仆后继的向前开展，以及川陕红军、川湘鄂红军不断的胜利，积极打成一片，这些都说明了争取全川苏维埃的胜利是极顺利的条件。

二、半年来四川工作的检讨

……

（二）领导了几处的农民武装斗争（邛大中江）农会和平发展转向能够领导农民的日常工作（邛大、绵安、彭华）雇农工会的独立组织部分党部开始了，反富农斗争各地都注意了。

（三）兵士运动纠正了上层活动，开始了下层的工作，运用

了公开活动方式。

.....

三、四川党的任务和工作

目前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更加露骨和积极了，民族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和紧张。英帝国主义在国民党投降出卖政策之下，正在无所忌惮的从康藏向四川进攻，四川的国民党“围剿”川陕红军的所谓“第二步计划”又快要开始了。在这样的尖锐形势之下，领导全川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巨流，与川陕、川湘鄂的红军苏维埃胜利的汇合，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运动在全四川以至全国的胜利，成为了四川党之中心的紧急战斗任务。为要完成这一总的任务，全川的党和同志应该以布尔什维克的持久性和积极性来执行下列工作：

.....

（二）反帝运动与拥护红军

全川的党和同志不要一刻忘记了去年五月中央来信上以反日反帝的实际工作，以动员反帝群众斗争与行动来检查四川党的工作的转变，来衡量四川党对于中央指示与路线的执行的严重意义，省委特号召全党起来，与忽视反帝运动的倾向作斗争，把这一工作提入各级党部的议事日程。

（1）首先必须抓紧目前日帝国主义进攻华北，英帝国主义领导藏兵抢渡金沙江，各帝国主义军舰来川和国民党出卖投降的事实去刺激群众，启发反帝情绪，鼓动领导反帝国的斗争和行动，密切□□群众日常斗争的联系，不应有丝毫的分离割裂，领导起失业工人饥民灾民去检查和没收仇货，发动群众去包围川南川北的盐场的稽核所，重庆的领事馆和各地教堂，向他们示威抗议，按照赤水驱洋人的经验，领导群众反对基督教，驱逐洋人和

牧师。根据中央“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去建立反帝群众组织，建立义勇军武装反帝群众组织，特别要注意建立无产阶级的反帝运动中的领导，纠正过去认为工农不反帝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鼓动兵士不到川北打红军，要求到川□抗英，领导武装民众在民族革命军□□□与土地革命的汇合。

(2) 不断的暴露国民党投降出卖和阻止红军抗日抗英的罪恶，宣传红军是反日反帝的武装，为争取中国独立统一与保护领土完整而战，号召群众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红军的示威和抗议，拒绝搬运进攻红军的军队武器辎重，不出一文钱捐税去进攻红军，反对扯拉教育经费去进攻红军，与目前群众的经济斗争取得密切联系。

(3) 打□党对粉碎五次“围剿”的消极怠工，把巩固苏区拥护红军的工作紧张起来，经常不断的揭发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和造谣诬蔑，介绍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生活和一切建设，积极为苏维埃红军征求技术和各种技术人材，征调失业工人到红军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组织苏区参观团实行到苏区参观。

(三) 农民运动与少数民族工作

目前四川农村经济剧烈崩溃，国民党捐税剥削空前的加重，广大农民在捐税逼迫没衣穿没饭吃的环境下，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加以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和红军的胜利，影响他们需要土地和政权更加迫切。四川的党应该坚决去领导抗捐税分粮抗债等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创造新的苏区与川陕，川湘鄂苏区汇合来实现一省和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

(1) 领导抗捐斗争，扩大抗捐运动：抗捐税斗争成为目前农村中广大农民最迫切最普遍的要求，必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和利用公开的可能把广大的中农雇农团结在抗捐同盟、抗捐游击队

（或抗捐军）中来，扩大抗捐运动。为要保障这一运动彻底胜利和党的领导应该动员广大的贫雇农和同志及农会全去参加，防止豪绅地主富农来窃夺这一运动的领导，同时党必须抓紧贫农雇农尽量启发和领导分粮抗捐反富农豪绅的斗争，尽量推动这一斗争走上武装冲突开展游击战深入土地革命打击幻想联络勾结土匪散民领袖及豪绅地主富农和限于抗捐税斗争的阶段等机会主义。

（2）开展游〔击〕战深入土地革命：要了解目前农村斗争的尖锐，任何一个斗争都容易引起武装冲突。党在领导斗争之前，必须准备武装冲突之到来，同时必须有坚□的推动斗争到武装冲突的阶段，以开展游〔击〕战实行分配土地，因此目前武装农民的工作是一刻不允许迟缓的。在准备斗争的过程，同时必须以一切武装来武装农民（接受中江妇女锥子锥死团总的经验），普遍建立赤卫队或自卫队的组织，以保护农民当前的利益和准备□武装斗争，打击崇拜枪杆和秘密的脱离群众去编制所谓小规模游击队的倾向。

（3）领导雇农斗争与雇农工会独立系统的建立：加强领导雇农和农村手工业工人的加薪改良待遇等斗争，把广大的雇农和手工业工人（无单独工会的）组织在雇农工会中来，建立独立的系统工作，以团体名义加入农协，以巩固在农协中的领导作用。领导贫农联合中农，坚决的同富农斗争。这样才能保障农村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才能肃清党内富农路线。

（4）农妇青农的工作：农协或农民委员会应成为乡村的政治机关，应该号召农协中的一切农民（男女老幼）来加入农协说服农民的落后意识，使他介绍自己的妇女和青农来加入农协。各级农协领导机关，建立妇女部和青年部，同时更应经常召集妇女代表会青农代表会，号召无组织的（未加入农协）农妇和青农来

参加这一会议，讨论他们的特殊要求，征取他们入农协。

(5) 少数民族的工作开始在叙永古宋苗民、西昌越西的夷民、松茂的番民、成华及各地的回民、峨边的白骨头(娃子)中建立工作，鼓动他们民族自决，联合他们，鼓动援助他们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扩大叙古苗民自治会的组织，建立各地少数民族的自治团体。党应抓紧下层最受压迫的群众，启发他的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的捐税和反对少数民族中勾结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土司村长，黑骨头(贵族)富农豪绅，反对土司村长富农豪绅的压迫剥削，以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同时要变种族间民族间的仇视为阶级仇视，建立苗汉夷番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

(四) 士兵运动和团防中的工作

(1) 领导士兵斗争建立士兵群众组织，必须有计划的经过同志和群众的关系去建立兵士和团防中的工作，抓紧领导他们要欠饷要棉衣反对长官虐待反对枪毙逃兵等斗争去建立士兵的群众，各级党部应该经常讨论这一工作，〔聚〕集各种线索和关系，决定同志专门负责或派少数能力〔强〕干部打入军营中当兵，去进行这一工作(但须保守秘密)，尤其是进攻红军和敌人主要部队，纠正过去动员一切同志去做士兵运动和公开宣传的错误。

(2) 领导兵变配合游〔击〕战：在领导士兵团防的斗争中必须鼓动和准备兵变工作，有计划的推动斗争到兵变的阶段，领导兵变执行游击战争或配合游〔击〕战，绝对纠正过去领导几十个兵变的错误和未成熟的兵变，但是在□□进攻红军、游击队的□□条件的兵变。

.....

(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省委平同志^①（给中央的） 报告（节录）

——关于对左右倾路线的批评和组织工作

（1934年2月8日）

（一）目前四川党最严重的现象，是罗明路线下的取消主义，主要的对于敌人的力量过分的估计，对于群众斗争的估计不够，不认识斗争的尖锐化，更是有利于革命的向前开展，在很多地方群众的抗捐分粮的斗争和游击战争，被党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领导失败之后，便放弃了那里的斗争工作，认为那里的群众在白色恐怖严重压迫之下是消极的，是无法再去工作的。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如邛大赤区游击队失败之后，群众天天望游击队回去，曾经有一个游击队员回到赤区去，驻军团防以为是游击队回来了，便一齐逃走，地主土豪现在还是警卫森严，不敢擅出。广大的群众在捐税重重压迫之下（特别是印照捐），没有饭吃，要求抗捐分粮，反对清乡捕人的斗争，非常迫切，尤其是要求武装的反抗，这是我们□动群众斗争，恢复赤区工作重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区最有利的条件。但邛大的党，却在创造新的赤区口号之下，把赤区的工作放弃了，而省委更同意他们的这一取消的路线，揭示他们“以创造新的苏区为工作中心，恢复赤区工作为

^① 平同志即徐平，1934年1月由中央派到四川，参加省委常委。

次要”。这不是十足的罗明逃跑的路线是什么？不仅邛大如此，最近绵安对于茶坪小坝，遂安对于通员场五通场的工作的放弃，嘉定县委和党团跑掉了八九十人，泸州把县委搬到叙永，都是极明显的例子，这里必须特别指出，这不是四川党目前才有的现象，而是省委领导的一贯的精神（如过去对于梁、万、忠、涪、叙府、南溪、顺庆、自井、资中……等等处工作的放弃）。因此，彻底的打击和克服罗明路线下的取消主义是转变四川党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环。

（二）目前四川党仍陷于富农路线的泥坑中，这主要的表现于和平的发展，阻止和不积极去领导群众斗争（绵安、嘉定）；或空喊暴动，要大于不要小干，认为抗捐是牛刀小用（遂安）；或勾结土匪教民的上层，而不去夺取其群众（绵安、邛大）；或秘密的和狭隘的去组织群众游击队而不去采取公开的路线和发动群众斗争和武装反抗（中江、嘉定、泸州）。同时农民中心主义更是笼罩着全川的党，他们认为苏维埃革命是农民运动，工人不是反帝和土地革命的动力，四川经济落后，雇农又是工人的极少数，因此只有从乡间的农民干起来去占领城市，城市工作自然会干好的（省巡视员周□同志），是十足的农民中心主义代表的意见，无疑的也是富农路线的最坚决执行者。而富农路线在四川党的根深蒂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四川党没有真正变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党，甚至有很多地方还在富农分子把持之下（如绵安县七个县委中，没有一个雇工贫农的分子），这样不能不阻止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不能不葬送群众的革命斗争（如绵安、遂安、邛大……）。

……

5. 关于打通贺龙及川陕苏区的关系，现已开始这一工作，

决定调三四个同志到万县去（有两个同志在最近两三天内即可动身），三个同志到忠丰涪去（几天内可动身），依照你们的指示去完成与贺龙打通关系的工作，以及恢复下川东的工作。与川陕苏区的关系并未断绝，省委派去的同志，前几天已回来（但中央派去的交通未回，不知何故，罗唐两同志已到，国焘有信来）。现在川陕省委已将阆南中心县委划归直辖，为的是更巩固与川委和中央的关系。省委现努力设法来完成巩固这一关系的任务。这里我应坦白的承认，我对于与苏区打通关系的政治任务，的确还是认识得不够。我到此后虽然把这一问题提得非常严重，但具体来执行这一工作，还是现在才开始，这是非常之不应该的。

（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中共四川省委致中央分局 报告（节录）

（1934年3月10日）

关于恢复下东工作与红二军〔团〕取联络问题，省委正在运动以组织去发展组织，动员全党去完成这一工作。首先派遣川东的同志回去，执行的结果，已有万县突击队（二人，一个去当兵，系前年派去当兵的，他还能清理前年与他一路去当兵的失掉关系的同志，一个去建立万县工作，并设法去到红二军〔团〕方面去建立关系，他认识贺龙，他原是贺龙旧部）已起身二十日。……现又新吸收一个，将到陈鸣谦部（与贺龙直接作战的白军）任副官的同志，并要他去建立关系。省委更准备派一二同志与他同去。这个动员才在省委本身和成华绵安三区已有了这些成绩。省委准备在红五月中抽一常委（不认识叛徒的）到重庆去建立川东的领导机关，巩固这些成绩以开展工作。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为巴黎公社六十三周年与北平 “三·一八”惨案八周年纪念 告全川民众书(节录)

(1934年3月18日)

.....。

全川民众们：今年纪念“三·一八”应该毫不犹豫的起来！

(一) 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来纪念“三·一八”。反对英帝国主义进兵班洪，反对藏兵抢渡金沙江进攻川康，反对国民党宋子文、刘湘出卖川康！全川的民众自动武装起来，联合反英抗日的红军，进行反英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刘湘法西斯镇压反英抗日运动，力争反英抗日集会、罢工等自由！

(二) 扩大抗捐运动，实行不缴一文捐税给国民党去进攻川陕红军，不造枪弹、不运粮食、辎重帮军阀去进攻红军，要求抗日反英不进攻红军，反对停办学校，扯拉教育经费去进攻红军。拥护反英抗日的川陕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进攻红军，轰炸和屠杀苏区民众！

(三) 要求增加工资及失业救济，反对关厂、开除工人。反对国民党的一切捐税，实行分粮抗债，增加雇农工资。要求澄清欠饷，反对枪毙逃兵！反对国民党刘湘清乡捕人，压迫群众斗争！学习“三·一八”暴动的艺术！接受“三·一八”失败的经

验，争取苏维埃□□□中国！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

1934年3月18日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共四川省委全川综合工作计划 (七·一至九·一八) (节录)

(1934年6月)

(三) 保护川陕、川湘鄂苏区与拥红工作

- ① 派干部清理××军支组织兵变投红军；
- ② 派干部加强重庆、两开^①、顺庆的工作；
- ③ 省委直接派干部和动员忠丰涪万的同志打入八德会建立工作；
- ④ 省委直接派人和推动遂安、三台党去恢复阆南、顺庆等地工作；
- ⑤ 派人与创造嘉陵江船夫与宣绥长途运输队与万县码头工人的工作；
- ⑥ 再翻印五千份红军优待条例与抗日会宣言；……
- ⑦ 省委直接派人和××赤水开万党部去打通与建立川陕与川湘鄂苏区的关系。

(五) 创造游击队与新苏区

① 首先抓紧邛大区的群众抗捐分粮夺取土地打土豪等斗争，建立新的游击队，发展现有的游击队，执行进攻策略，准备

^① 即开江和开县。

邛大周围的兵变，由附近各县征调工人贫雇农去扩大游击队，建立赤区根据地。

② 加紧中江、遂安、绵安、青神，并研农民抗捐分粮打土豪分土地斗争，组织新的游击队与开辟游击区。

③ 加紧××兵营要欠饷反对开去打红军，组织兵变，配合郫县农民抗捐斗争，创造游击队和游击区。

④ 征调干部打入古宋抗捐军与川滇边游击队中取得领导。

⑤ 加紧××师兵士斗争，积极赤化全××师的工作。

⑥ 创造渝万、三台、遂宁、雅州的兵士工作。

⑦ 调三个以上的工农同志来专门受游击战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准备分配到游击区内去。

⑧ 加紧领导几个主要农区农民反对清乡拉夫拉兵，扩大青神等原有赤卫队组织，创造邛大、中江、遂安、绵安农民的赤卫队。

⑨ 在成都、重庆、嘉定、雅州、邛大、崇宁等处组织不打内战，不打红军，要求抗日斗争，建立兵士反战组织。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4年第1期）

四川省委接受国际第十三次全会提纲 与五中全会决议的决定

(1934年6月11日省常会通过)

省委讨论了国际十三次全会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和五中全会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后，认为完全正确。而且认为国际十三次全会与五中全会对目前世界和中国的形势的估计，同样是根据于国际十二次全会的基本论点的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虽然在部分问题上有些差别，但在原则上并没有丝毫不同的地方；由几月来的事变，更加证实了这一提纲与决议的正确。省委除了诚恳的完全接受外，并作四川党执行这一提纲与决议的决定。

(一)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到了新的阶段——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四川的民族危机，与全国一样的比过去任何时候还严重了。日帝国主义最近向华北新的进攻，并将其势力向华南伸张，取得了国民党新的出卖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便争先恐后的来直接瓜分中国，英帝国主义公开占领班洪，运动南新疆独立后，更积极经过其傀儡——西藏政府，向川康进攻，西康二分之一的领土，已被四川国民党军阀刘湘、刘文辉秘密的出卖了（反动报载西康共三十四县，川康军仅占其半）。卖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开的派遣卖国专使黄慕松，亲到西藏去交涉出卖川康和中国整个

西北部的生意。法帝国主义亦积极将其势力侵入川东南。各帝国主义军舰大批的集中渝、万，准备随时占领四川与直接参加进攻川陕、川湘鄂红军的反革命战争。

帝国主义强盗正在努力领导和帮助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经过这一“围剿”来实现瓜分中国的具体计划。四川国民党军阀刘湘等同样在清道夫作用下积极的、忠顺的执行这一计划，新增加五师以上的生力军和帝国主义帮助的各种新式枪弹、毒瓦斯，拚命的向川陕红军作“第三期”、“第四期”的绝望进攻，残酷的去毒杀苏区及其周围的劳苦民众，更疯狂的执行法西斯蒂恐怖，无限制的提高狭义爱国主义，来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作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走卒（如中国目前无力反帝抗日，要在大战中去找出路），与“民族复兴”的欺骗宣传，以及奴隶化中国民族的“新生活运动”和“文化统治”，来屠杀全川的革命群众，镇压、和缓全川的反帝运动与群众斗争，加速度的来殖民地化四川和西康。

在世界经济恐慌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刻化，帝国主义更加紧向中国侵略与过量的倾销洋货，已深入了四川的穷乡僻境，使四川的经济达到了极度的恶化，四川国民党军阀所造成的经济浩劫，亦愈演愈烈，四川的民族工业与农村经济已到了空前的破产与完全毁灭的状态；帝国主义最近更经过国民党的“技术合作”与刘湘的“生产建设”来增加和巩固其在四川的经济势力，大量投资于准备战争与镇压革命的军事工业（开采石油、筑铁路与航空线等）；刘湘更减轻进口的海关税，欢迎和奖励帝国主义洋货大量运川，允许日帝国主义恢复川江的航运，使四川的经济走到更不堪设想的地步，广大的劳苦群众更多的破产、失业、饥饿与死亡。

在帝国主义的洋货大量入川与国民党的捐税加重，资、内糖业，荣隆麻布业几乎是完全塌台；自流井、犍乐的盐业生产亦大大的缩小；嘉定、重庆及川北的缫丝业有十分之八九关门；成华生丝长机与各地的织布厂和作房一半以上的停业；成华印刷厂亦表现不景气；比较新式的工业如民生公司、汽车等完全为帝国主义军阀投资与垄断。失业工人是普遍全川，在业工人生活亦恶化万分，资本家藉口关厂、开除的威胁，来任意减少工资，加长工作时间与待遇恶劣；采用扣薪、压薪、储蓄、罚金向工人进攻，加以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军事管理与工厂法，连环保的束缚，与禁止工人反帝罢工与黄色工会的欺骗，工人最脆弱的自由，已被剥夺殆尽。广大的劳苦农民在饥寒交迫中，犹不能免掉国民党捐税催逼与地主豪绅的剥削，特别是接近苏区的川东北数十县的粮食尽被国民党抢夺，强迫无代价的服务运输进攻红军的军器粮食，而且随时在拉夫、拉兵、杀烧的威胁下生活着。

由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严重，四川国民党统治又进一步的崩溃，特别是红四方面军最近的新胜利与红二方面军向川、黔发展，威胁重庆，以及反帝斗争的高涨，工人加薪索薪反对资本进攻斗争的积极（成华抛丝女工、兵工厂工人、嘉定盐工、织工等），自发罢工斗争的发生（遂宁兵工厂），同盟罢工的酝酿（嘉定盐工、成都包车、赤水兵工厂），工人反法西斯主义亦开始生长（成华长机），农民抗捐、分粮，反对拉夫、拉兵等斗争普遍各地，打甲长，杀提款委员成了家常便饭，自发武装斗争（古宋越嶲抗捐攻城）与新游击队出现（川滇边、梁山），兵变亦不断产生（邛大、顺庆、川黔边），邛大游击队的重新活跃，更加速了四川革命危机的成熟。但许多尖锐的斗争，因为党的工作落后，还是出于自发，而没有得到党的领导以走上更高的阶

段，纵有，亦非常微弱（如越嶲古宋武装抗捐），或在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下而葬送了群众的斗争（如中江、遂安、邛大）。

目前形势的尖锐，四川与全国同样的处在战争的干涉与革命和两条道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生死存亡决斗的时候，虽然客观上对革命有许多的顺利条件，但绝不是说革命的发展是自流的，毫无阻碍的上升起来，而不遇到相反的力量抵抗，这是需要四川的党忠实的执行国际十三次全会与五中全会所给予的任务，和布尔塞维克的艰苦不倦的群众工作和不断的奋斗来争取危机中的革命胜利。

（二）省委完全同意五中全会对于中国党在四中全会后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获得的成绩与进步，省委并根据这一精神来检讨四川党在四中全会到现在的工作。

四川党从四中全会到现在，虽然部分的有些微弱成绩的收获，但是整个四川党是没有真正转变的，首先是省委没有真正了解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四中全会的决议，对于中央几次的指示采取可耻的两面派的机会主义抵抗，以中央不明白“四川情形或某些问题误会”来掩饰自己机会主义的错误，口头上虽然表示接受，而实际上是轻视与否认中央的指示，而继续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始终徘徊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歧途，以致对反帝工作的领导，始而“左”倾关门主义放弃，继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一直到取消，忽视了无产阶级在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放弃职工运动，取消了工会的建立和工作与罢工斗争有计划的领导；富农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立三路线的残余，领导梁山、南部、顺庆、中江、安岳几个较大的游击与暴动走失败的道路；右倾机会主义断送了绵竹、嘉定壮大的兵变；秘密的狭隘的曲解“赤色组织”、“辅助组织”的关门主义，阻止了党与群众组织

的扩大与发展，取消了群众组织的系统与领导机关的建立；省委逃跑搬家放弃川东党的组织而遭受大的破坏或失掉关系，两条战线斗争的不开展，带有极浓厚的调和主义的倾向与腐朽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省委本身，对工作表现于不容许的萎靡、消极与怠工。

今年一月，省委在中央组织部同志的直接领导与帮助之下和全川同志的努力，以及基于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四川党的工作是开始了走向中央路线之下，并获得初步的成绩，这些成绩表现于：

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打击了部分党部（遂安、绵安、中江）脱离群众，均是投机的游击战，以暴动及富农路线，初步克服了农民中心主义，有些党部（绵安、邛大）开始了注意职工运动与雇农工作、工会工作，在泸州有了新的基础的建立，兵士运动纠正了上层活动，收得了新的组织的建立，妇女工作有了新的收获（青神、井研、中江、绵安、成华），克服了畏惧白色恐怖逃跑搬家与对叛徒的认识不够（部分党部），开始了反法西斯蒂与叛徒的斗争（成华在援助在狱战士募捐与对叛徒的仇视），特别是打击了省委本身个别同志的机会主义（×云）与调和倾向及自由主义，开始四川党在思想上的一致。

党的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和成份的改造，新的产业支部（赤水）和单位的创造，少数新党部的建立与川东党的工作开始恢复，许多中心党部领导机关成份的改造与新的工农干部的引进，教育工作有系统的注意，新的工农干部正在增加，省委和部分党部有了集体的领导，特别是秘密工作有了些进步和改善，开始了运用新的领导方式，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是逐渐克服。

虽然有了这些新的进步与成绩，但不能丝毫掩饰党工作的落

后，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及过去各种错误的继续，首先表现于中央测验四川党转变程度的反帝工作，除了部分党有很少的成绩（赤水、××兵营）外，一般的还是停滞在决议与计划，没有真正去执行中央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信与每个具体的指示，还在继续过去在反帝工作的取消主义，认为“工农不需要反帝”（遂安），“日常斗争领导起来，反帝就不成问题”（嘉定），以及把已有的群众组织改一个名字，或者从这组织中找些人去建立反帝组织等机会主义，与秘密狭隘只限于小组活动的关门主义。

职工运动之重要还只限于口头上承认，领导工人斗争、厂内活动、工会工作，还没有那一个党把它列入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省委也没有具体的讨论过一次。嘉定、泸州有了工会基础，始终继续关门主义，不去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扩大的、有系统的把工会建立起来，没有坚决去建立工会本身应有的工作，党还在包办工会，实际上还是取消工会，对斗争的领导不是空喊“罢工”“加薪”而不顾工人当前的要求（如成华），就是只限于日常的斗争而不积极推动到更高阶段（嘉定），更没有计划的去组织和领导罢工斗争，工人自发斗争，党是隔岸观火的态度，而不积极去取得领导，青工、失业工人、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还是没有引起全党的注意，青工在成华虽有初步成绩，但重庆、顺庆丝厂中的工作是没有了。

拥护红军与保护苏区的工作，还限于庸俗的募捐，组织参观团等方式，而没有以极大努力在敌人进攻红军有决定意义的主要企业中去组织工人的罢工，到后方去组织农民的游击战与暴动（成华）；就是这些简单的庸俗的工作也做得不够，或者还是在口头上、决议上。在农村工作中还没有大胆的明确的提出“打土

豪”、“分田地”的宣传与发动，没有抓紧斗争的中心（抗捐、分粮）。纠正了“左”倾盲动（绵安、遂安、盐亭），又走入了右倾不去发动斗争，或者是对斗争不相信，采取失败主义。合江、青神、井研的党仍然陷于极深沉的富农路线，阻止了斗争的爆发；邛大的党仍徘徊于“左”右倾机会主义，不敢去领导分粮、分田地、打土豪的斗争使游击战不能开展扩大起来，雇农工作仍没有认为是中心，成绩还只有少数小组的收获，特别是兵士运动，只注意到组织前线兵变投红军，而取消在后方兵变创造游击队的策略，以致有组织的兵士团防没有去计划发动斗争，组织兵变，学生运动又走入了取消的倾向，少数民族工作，在观念上还保存着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不敢去提出“民族自决”、“苗民自治”的口号。

征取党员的关门主义与非阶级路线障碍了党的发展。许多重要的产业和企业中不但没有支部，连单位都没有；党团工作是没的，一般的是以支部或个别同志去包办，代替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取消了群众组织的独立工作与有系统的组织，几个中心党部（〔泸〕、嘉）对秘密工作依然不注意，还在继续发生组织破坏与同志遭捕，党的领导方式还带是不深入群众去了解群众等官僚主义，斗争口号还是一般的，呆板的不具体，集体领导仍未很好建立，还是表现个别同志英雄领导和自由主义倾向，不相信新干部和工农同志，不敢拿工作去分配给同志担任，而表现一二人包办一切（彭华区书亲身来任交通工作），对青年团的工作是采取包办或取消（〔泸〕州），嘉定、内江、邛大的党是没有团的组织。

最后，省委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承认自身的错误。省委对于中央的指示仍未坚决的以一切有效的来执行，为中央路线而斗争。缺乏自我批评与严格的检查工作，还保留着官僚主义的

残余，许多工作尚停滞于文字上、口头上，没有决心去克服工作进行中所遇到的困难，表现极浓厚的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对下级党部没有负责经常不断的去督促和检查下级党工作执行的程度与具体指示。嘉定、涪[泸]州等地党部对省委指示表现抵抗与怠工，没有及时予以打击和帮助其转变，两条战线斗争还未普遍开展到下级党部中去，以致四川党的转变还未深入下级党部。

（三）两个道路决定胜负的决战已摆在全川党的面前，迫切需要全川党在这个紧张与负责的关头以一切力量来准备迎接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彻底的要求四川的党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与五中全会的精神下来一个真正的转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赤化全川而斗争。省委特号召全川的党与全体同志，艰苦的执行下列的任务与工作，予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和五中全会的决议以布尔塞维克的回答。

1. 全川党的动员来加紧反帝工作的领导，不容许一个党部一个支部没有反帝工作；抓紧目前华北问题、川康问题，以及帝国主义每一个进攻和侵略的具体事实，特别是与群众生活有关联的，在广大的群众中作有力的煽动和宣传，真正运用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去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反帝斗争，那怕是最小的驱逐洋人反对基督教的行动，党都应该坚决去领导，提高群众的民族醒觉与反帝情绪，具体的执行中央关于华北问题的通知与目前反日策略的指示信，把中央所提出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的纲领去宣传和组织群众，以各种反帝名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领导群众，为着中央所提出的那些基本行动纲领实现而斗争，特别在群众中暴露国民党每个出卖投降的具体罪恶，及其殖民地化中国的法西斯蒂的政策，广泛的散播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全国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的号召及其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在进攻红军的部队中加

紧鼓动“不打红军，要求抗英、抗日”的斗争；特别是加紧巩固无产阶级对反帝斗争的领导。

2. 今年“八一”纪念，全川党必须举行热烈的群众反对战争与保护苏联的运动，扩大法西斯主义猖獗与战争危险的宣传，动员群众以各种方式来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与进攻苏联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反对狭义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复兴”的欺骗宣传，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它对立起来，指出“十月革命”才是中国民族唯一的出路，抓紧目前群众对国民党法西斯蒂恐怖政策的不满来加紧反法西斯蒂的斗争。而且在领导反帝运动与群众斗争必须密切的联系到反法西斯蒂的斗争，尽量暴露国民党法西斯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与清道夫作用。

为了保护川陕、湘鄂苏区，使两大苏区打成一片，必须有决心的在敌人进攻有决定意义的企业中去组织罢工，与敌人后方侧翼去开展游击区与暴动，以及组织前线上、后方的兵变，同时坚决执行省委以前关于拥护红军的各种具体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表现出来，加紧进攻红军的白军中的工作，继续动员全党来恢复川东与邻近苏区各地的工作，把这些区域的工作加速的恢复与壮大起来，以适应目前革命形势的需要。

3. 集中力量向着四川工作最主要而又最薄弱的一环——职工运动。从省委到支部必须把职工运动列入主要的议程，有计划的经常不倦的去加紧工厂、工会、罢工的工作，首先应集中力量在军事工业（兵工厂、子弹厂），嘉陵江、涪江及长江的码头船夫海员，中心城市的码头运输工人，以及最受资本进攻威胁而带决定意义的产业企业中的工作，最短期内必须恢复创造自流井重庆两大产业区域中的工作，在成华更应该积极创造汽车、印刷、电灯与扩大包车中的工作。各地方党部应首先抓紧去建立所在区域

内最主要的产业与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作，党要经常不断的检查执行的程度与困难的解决。要特别加紧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坚决与发动领导大大小小的斗争，推动斗争到更高阶段，有计划的去组织工人部分的罢工与同盟的罢工的斗争，而且要保障取得胜利，运用下层统一战线，不分派别、帮口、先进的与落后的都组织在斗争委员会中，把赤色工会有系统的广大的建立起来，成、渝失业工人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即刻开始，谁忽视逃避工会工作谁便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塞维克。

4. 在农村中鲜明的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鼓动，应抓紧抗捐分粮的斗争为中心，大胆的普遍去发动与领导，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去团结被捐税逼迫与饥饿无粮的广大群众，在抗捐同盟等斗争委员会中来，抗租佃、抗债等斗争亦不应丝毫放松，尤其要以一切有效方法打入自发抗捐运动、饥民分粮斗争中取得领导，推动斗争到游击战与暴动，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雇农与农村手艺人、苦力成为最中心的工作，不断去发动加薪等斗争，那怕是争取一双草鞋、一片烟都不放松，雇农工会应独立系统的建立起来。坚决执行以雇农、贫农为中心，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策略，无情的反对党内的富农路线，肃清富农与代表富农利益的分子出党及农协领导机关以外去，以防止富农阻碍斗争与叛变。省委特别指出首先抓紧邛大赤白群众抗捐等斗争的领导来扩大游击运动，提出分配土地的鼓动与准备，在中江、盐亭、绵安、遂安打击对群众领导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积极发动斗争，有计划地组织游击与暴动，建立新的游击队，泸州党应坚决打入古宋抗捐军与川滇边的游击队夺取领导。合江、青神、井研、内江党应残酷的开展一个反富农路线的斗争，积极发动群众斗争，走向武装冲突。

每个党部都应有计划去建立兵士工作，决定出兵运负责人，集中力量在敌人的主要队伍中与几个中心城市去工作。农村斗争开展区域的周围军队团防中，要去加紧兵运，积极发动斗争，有计划的组织兵变来创造游击队或配合农民游击队。

5. 加紧在川康边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尽量宣传苏维埃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纲，与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在十月革命后在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及中国苏维埃内少数民族的生活，大胆鼓动苗民、夷民的自决与独立自主运动，扩大的建立苗民、夷民的自治团体，加紧发动反帝国主义国民党、抗捐、反豪绅的斗争，建立少数民族的下层统一战线，发动反对村长、黑夷、土司、地主的阶级斗争，打破汉夷、汉苗的仇视，变民族仇视，为阶级仇视。省委特责成泸州党部加紧苗民支部的领导，去执行上列的任务，峨边、曹日、越西的党，应立刻以有效方法打入白夷和娃子中去工作，越西的党刻不容缓要打入夷民武装抗捐的群众中去。

6. 青年和女工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认为是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从省委到支部都应经常讨论这一工作，除了发动他们参加工农斗争外，更应经常召集青工代表会、女工代表会、农村妇女代表会，讨论和领导他们的特殊斗争。有团组织的支部，应当帮助青年团支部面向青年，纠正与党争群众和对立的倾向。没有团组织的支部，更应特别讨论青年工作，指定有青年情绪的或接近青年的同志专门负担这一工作。学生中的工作，是应当加紧起来，首先是成、渝两地，应设法打入川大、华大、重大以及中心城市的主要中学校中去领导学生争自由、反帝、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没有青年、妇女的党，不是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党。

7. 巩固党的组织，是四川党在目前最重的任务。首先是巩固和壮大现有的几个产业支部，积极的创造重庆、自流井、成都

等处的产业企业中的支部，在几个主要农区中应建立壮大的革命模范支部，加紧培养支部的独立工作能力与支部生活与支部工作的建立，加强支部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改善支部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在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应即刻建立“党团”的组织与工作，经过党去领导群众组织，猛烈的发展同志与新党部的建立，大胆向产业工人、雇农、贫农、兵士开门，继续动员全党去恢复川北的党的组织，与创造各地产业区的主要城市的党部，有计划的经常培养与训练工农干部，引进领导机关来担负党的工作。

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集体领导与各部工作，首先应从几个中心县委、主要党部（重庆、邛大、中江）与产业支部与农村模范支部开始。改善领导方法，根据决议有计划的，不断的来进行检查工作，加紧秘密工作的注意与改善，以及反叛徒奸细的斗争；健全省委及主要党部的巡视工作与支部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在各地方党部和支部，必须立即把党的宣传工作有计划、有系统的建立起来，建立宣传部和支部宣传干事的工作；各级党部对青年团要加强政治上的领导与各种帮助，党不能任意将团干部和同志升党工作，实行同级党与团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但必须纠正相互间横的关系与秘密工作的注意。

8. 要保障这决议在全川党很顺利执行，必须把反倾向斗争深入到下级干部中去，打击四川党目前最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任何“左”的倾向亦不应丝毫放松，同时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自由主义、两面派与调和倾向，更应该打击借口五中全会的决议没有根据国际十三次全会的提纲，而对五中全会决议表示轻视与怠工的机会主义。在经过这两条战线斗争以后，而不放弃他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或不能转变的同志，应采取组织上的纪律制裁，撤销工作以至开除党籍；同时必须开展布尔塞

维克的自我批评，揭发以改正自己的错误，实现新的领导方式，不屈不挠的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斗争，才能在伟大的历史阶段，担负起共产主义先锋军的光荣任务。

(原载《六大以来》上册，第632—63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中共、共青团潼川中心县委为工农红军 占领通南巴告农民书（节录）

（1932年12月31日）

农友们：国民党军阀去围攻红军失败后，自己争地盘暴发了军阀大混战。所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只有穷人背时的。除了拿几十万士兵弟兄去为军阀当炮灰外，在战区的工农贫民直接遭受屠杀饥饿死亡。只有有钱的人可以跑，无钱的人想跑无钱，只有当军阀混战的牺牲品。而非战区的人民受预征粮税、临时军费等，逼得工农劳苦群众卖儿卖女都要缴这款子，真是叫苦连天！军阀混战把许多士兵弟兄作无代价的牺牲，还不足心，现在又来拉夫，拉我们去当兵。可怜无辜的村民眼睁睁的又要拿去送死，家里的父母妻儿□□□□的悲惨呵！

好了！工农红军有万余人，于十二月二十日占领通南巴。现在通南巴的农民，在实行破仓分粮，没收土地归农民了，准备建立川陕鄂苏维埃政府，吓得田冬瓜^①屁滚尿流！现在调罗乃琼全部去抵抗，各处遣兵调将呵！起来拥护红军，武装抗粮抗捐，破仓分粮，发动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组织红军预备队、破坏队、宣传队，尤其要揭穿军阀的诬蔑说：“要共妻呀！年满五十要杀呀！杀人放火呀！”这些都是军阀的反动宣传。但是，我们铁的事实粉碎了国民党军阀一切的诬蔑欺骗。

^① 即国民党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

1. 工农兵士贫民起来武装拥护工农红军!
2. 发动游击战争拥护红军!
3. 武装抗粮抗捐不缴一文钱捐税去打红军!
4. 工农兵士贫民贫苦学生参加到红军中去服务!

中国 共 产 党 潼 川 中 心 县 委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1932年12月31日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共上川南特支告工农兵书

——为邛崃抗捐运动告工农贫苦
民众及抗捐军的士兵弟兄

(1933年8月6日)

工人、农友、及一切贫苦民众们！抗捐军的士兵弟兄们！

自王店抗捐斗争爆发以来，我英勇的工农贫苦民众不断的上前奋斗，抗捐运动，风起云涌的的弥漫了邛崃各地。使得军阀刘文辉手忙足乱，应付无方，这就证明群众的力量是强大无比，要推翻国民党军阀，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有可能。

现在邛南的抗捐运动，已经得着了相当胜利，国民党军阀再也收不到我们的捐款。但这些胜利的成功，大都是我们工农贫苦民众的力量啊！然而我们劳动所得的利益，却仍大半归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我们一家老小，仍然吃的没有，穿的没有，向粮户买升米，仍然少不下二百钱，欠豪绅的债，仍然少不了一角利。我们用鲜血换来的，不过替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作牛马而已！

现在事实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只是抗捐抗税是不能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只有更进一步的抗捐抗债破仓分粮，以致土地革命，才是我们的出路。所以国民党军阀是压迫剥削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起来反对他；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还是压迫我们的敌

人，我们也应该起来对付他。我们决不要依靠谁个有钱有势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团结力。我们知道，打倒苛捐杂税，是我们工农贫民的力量。难道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要靠别人吗？

努力呀！团结呀！将我们的枪头，打开自己的出路。将不要只是去替人拚命，也不要只是顾个人私利，去作戕害工农贫苦的绿林勾当。只有大家起来组织农民协会、红军之友、红军预备队，成立真正的红军，到真正能够拥护工农贫民利益的红军中去，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邛崃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中共四川中江县委给省委报告（节录）

（1934年）

中江文家桥农民抗捐斗争^①

A. 斗争经过：十九日拂晓时，文家桥方面突来保安队数十人，包围清乡，逮捕了一人。天明县委始知此事，尚未说明时，团队已迫近机关所在地。当时，县委同志及几个党团同志及十多个群众突围向附近徐家堰方面移动，始明了敌人真象，当即鸣锣噪动城藏寺和徐家堰两地群众起来援助，一方面通知□区区委动员附近各地群众。九点钟时，各地群众均纷纷到来，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男女老幼均二千余人。这时，团队已撤回场上。县委首先对于这一斗争的布置，分为：①动员当地及附近群众（以抗捐名义），②要人转来，要团队立刻离乡；③如果群众能大多数动员，即提团枪，然后抢攻永兴场。及至团队已走，群众始陆续到来，这时，得了党团县委的决定，更变路线，到团正家里去吃大户，向团正要人，即召开群众大会，通过这一路线。这时，群众情绪很好，男子均手执刀矛锯子等武器，妇女儿童均拿着木棒钻子等物，准备战斗，静候上头的命令（党的策略路线，当通过党的路线时，有部份党团同志和群众曾主张进至永兴场要人）。在大会前，捕获两个反动派，群众情绪更高。这时，党团县委均属把握不住，所有群众均是第一次参加斗争，分派去扎堰口、当

^① 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交通等职务,均不能明了责任。大家趁热闹跟着大众走,不负责。当从集合起到团正家,距离约四里,沿途陆续均有群众来参加,络绎不绝,大家都高呼“到保正家去吃大户要人”、“实行抗粮款”、“那个不来便是反动派,转来便去吃他家的大户”,个个都很激昂。抵团正家时,家人都闻风逃遁,群众小部份进去搜索,其余则在外面包围屋子,搜出许多粮款借约,当众烧毁,其余粮食什物,因有少数群众不主张拿,屋子也不主张烧而算了。这时群众情绪真是到了沸腾点,大家都喊着去哄垭口店(即永兴场),两路口的会场均为群众所占据,包围着党团指挥同志听命令。而党团负责同志已完全不能把握了,怕群众没有经过斗争,不能到市场上去,而主张①派人煮饭,实行吃大户;②团队来时即提枪。群众算是盲目的通过了,即就地坐下。将坐下时,团队果然来了,在出山即鸣枪示威,大家都无把握,不知来了多少人。正当惶恐之际,先时捕获的反动派是捆着同群众一道到这儿来的,即趁着这时挣脱,高呼“快走,来了!”挨近他的一部份群众(团正族人和邻居)即跟着逃走。团队乘势追赶,即向人开枪,结果打死一个妇女群众,打伤一男一女群众,逮捕了二十余个妇女群众,在场逮捕了两个男群众(逮捕者现已大多释回)。迫急时,有数人反攻,团队自己打死了一个。脱离了团队追赶时,过后仍遣散,只剩下二十余个男女同志和群众跟着党团指挥人走,不愿散去,这一斗争就此结束。

B、关于这次斗争的检查(略)

C、斗争后的影响:①这次斗争主观上虽说经历了失败,可是它于中江全县,以及邻近县如潼川、罗江、德阳等县的群众影响很大,广大群众并不因斗争失败而表示退缩,一般的都是情绪更加高涨,打击了过去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右倾观念,要求武装斗争

已更普遍了。十三日潼川八洞口、华树场三处群众自动的哄委员、大石岗的杀甲长，即最近事实的反映。②斗争结束后，统治阶级动摇万分，施行白色恐怖和改良主义的手段欺骗，如大举清乡按名捕人，在文家桥地方实行十家连环保，利用豪绅甲首监视群众，用种种手段来领导群众，团正向群众立誓“再不管事”，反动县长、公安局长到各处借清乡为名，召集群众开讲演会，灌输反动宣传，企图麻醉群众。这些手段的施行，虽有一部份不坚决的群众被吓跑了，这不算是损失，这是每一个斗争过后应有的现象。最好的是大部份群众情绪仍在继续增高，都要求继续干，爆发游〔击〕战是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此区党的组织，还没有受着坏的影响。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95年第2期）

中共青神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节录）

（1934年2月20日）

1. 主席□□□ 记录□□□

.....

4. 检查：

（1）整个青县工作：（一）嘉定中心县委对青神之领导方面完全是一贯的包办。（二）嘉定中心县委〔问题〕之二，巡视工作之马虎在未出发时无有详细讨论计划。（三）青神县因消灭叛徒和反逮捕失掉许多群众和同志，这完全是斗争没有详细讨论和计划布置以至如斯。（四）不能抓紧中心地区来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来实际斗争。（五）县委领导上不一致。（六）对同志以蛮干。（七）组织领导上表现□□。（八）没有站在革命组织立场上来领导斗争。（九）刊物没有积极出版。（十）拥苏红仅执行了少部份。（十一）反日反帝没有去做过。（十二）对群众领导最高机关不建立。

.....

7. 群众工作：

A. 县总工联合会，工联合的划分：（一）工会划分的意义，（二）划分的方式；（三）划分后的领导。

.....

B. 县农会区农会——东山：罗湾、河坝子、麻柳场、郑阳

场成立一区农会。城区：段河坝、倒拐店成立一乡会。夕阳坡、汪泉滩成立一乡会。莲市成立一乡会。以上三乡会共成立一区农会。龙市成立一区农会。土市、梧市共成立一区农会。由以上区农会成立县农会。区农会、县农会于第二次扩大会实现。照原人数增加一半。

.....

11、拥红工作：将过去募捐一律收齐，选举赠旗代表。

12. 土市游击战争：

土市最重要的情形，是反对逮捕。

（梧土区）土市经济：土地完全集中于二三地主之手。贫农占全数十分之八。出卖米每月三千石平均每月洋三万元。柴每日平均二百一十担合洋四千二百元。其它油烟包谷平均每月合计得洋二百元。共计三万四千四百元。租谷三七成。高利四分五。

政治：群众生活在水平线上是够半年，阶级仇恨最大，需要直接革命。统治压迫、逮捕催索拷打处罚金，调查侦探五家连坐法。土梧、汉刘、桂龙、新场土门各联合。土梧汉共计八百以上的土枪，门户练每甲十人，开始操练门户练——数量一百六十人——能力较低——武器较多——徒群众十分之二。

赤卫队——数量一百人——能力较强——武器较少——革〔命〕群众十分之八。

13. 斗争领导：

（1）斗争种类——A、减租，B、反债，C、反逮捕，D、反拉夫。

（2）领导：一，执行民主选举与抛开一切动摇犹豫分子。二、加紧注意群众领导机关的党团作用。三、注意每分钟的斗争环境与策略及时的转变。四、提高领导机关的威信与力量。五、

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六、准备组织游击队。七、调查武器——敌我。八、军事训练与经常战术的讨论。九、在群众中积极讨论破仓分粮，消灭豪绅与分配土地，没收现金。十、提高群众与游击队的纪律。

(3) 兵士工作：A、……。B、策略路线：以统一战线的方法去斗争，由大小经济斗争发展到示威、罢操与武装反对，以及兵变。

(中共青神县委党史办公室提供)

中共四川三台县委报告

(1934年4月7日)

龙潭斗争之准备和行动之经过：

甲、龙潭的形势和我们的决议。(1)龙潭在国民党军阀田匪(即田頌尧)层层压榨之下，苛捐杂税多之如毛，二十二年粮款的摊收在十月末十一月初时急如星火，当地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中农，在田匪之数十次各色花样收剥后，粮食都卖完了，吃饭随时打断顿，哪里还说完得起粮？出不起只有拖延了——普遍在农民中发生拖粮运动(自发的)。但田匪对捐款之急催是无以复加的，每场都有差狗、委员催逼勒收。委员、差狗和团甲互相为用，威风更是十足，一打二骂三锁押四立刻要钱。农民们在层层压榨和鞭打之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对于抗捐款要求真是迫切万分。绵州围城，罗江烧粮簿影响于前，杨家井大礮礮打收款委员影响于后，特别是红军在保宁(即阆中)方面及下东伟大胜利和他们个别英勇份子在三台场借故把差狗打了来出事的情势之下，是跃跃欲试。(2)县委在清楚的认识这一龙潭形势之后，坚决以下列口号组织群众抗捐军，实行武力抗款：1. 实行抗捐罢款；2. 焚烧粮簿；3. 打死差狗，杀死委员以及收粮款的一切走狗；4. 打倒田冬瓜(即田頌尧)，实行不缴一文钱的捐款。并慎重考虑以打差狗委员为中心来发动这一抗款运动，并站在下层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指示，只要真正赞成上列纲领，实行

武力抗捐罢款，并服从指挥，不论男女老幼一概欢迎。并议定：第一，凡是出不起款、不愿出款，真正实行抗捐罢款者，不论贫富一概欢迎；第二，凡是真正帮助抗捐罢款实行打倒田东瓜者，不论共产党红军，就是团保也一概愿与合作；第三，凡是破坏抗捐罢款、造谣污蔑以及收粮派款的一切走狗，决定赶紧杀绝。并指出田匪不出一兵一卒去抗日反帝，而是收款养兵镇压百姓（根据上面出了宣言）。

县委认定根据上面做去，无条件要得广大农民热烈回答和拥护的，并认定能以广大群众作基础，组织群众的打委员差狗的行动，并领导群众武装冲突，坚决解除民团军队武装自己，成立群众的抗捐军，进行群众的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创造以龙潭为中心的赤区。

并在组织的准备工作中，指示应以召集抗捐代表大会为中心进行公开的活动，反对单个约人的方式（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而是以甲为单位，在约人之前开一个会议，把所要发展之甲的地主富农以及与他们勾结之走狗特别提出后（提出名单），其余的三十家五十家去约，以排为最小单位，举正副代表各一，成立全甲的抗捐代表会，举三人或五人（斟酌情形），负责进行各种事务，反对过去三人为一小组的组织法。

考虑了抗捐打委员的斗争不仅是群众的行动，在目前尖锐形势之下，必然要发生武装冲突，在我们坚决领导之下，不仅要发展成为群众的游击战争，走向创造苏区，因之县委特别决定准备群众武装（从小刀一直到土枪土炮快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要保证将来转变为土地革命，党的成份的创造（龙潭以前只有一个工人同志）决定应一反往前对知识分子开门对雇农贫农关门，而实行对知识分子暂时不发展，要选真正勇敢坚决的中农，

对贫雇农实行大开门，使龙潭党的成份最近转变为（贫雇农）80%，中农及知识分子20%。

最后对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在三台县委看来，是成为这些龙潭斗争之能否发动与斗争之能否深入和扩大的枢纽，并决定用统一战线的方法组织雇农工会、建立贫农团（因为我们觉得统一战线的方法任何群众的斗争、任何群众的组织都可以运用，现在我××是这样）来建立抗捐运动的领导。

乙、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富农分子之反抗和克服：（1）……龙潭分支负责同志向□□……因为上场开会，适逢豪绅把他密告后派人来捉他。当即将他逮捕，被捕后县委指示坚决号召群众起来“夺人”，因为当日上午被捕，到天黑时才知道，把人动员起来时，人已被弄起走了。领导的人感觉无事做，宣布解散了，及县委派人星夜去时已散过了。县委当还是把群众当前的粮款问题抓紧，继续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县委……明确指示，目前不是编抗捐军，而是集中一切组织抗捐代表大会，准备动员打委员的斗争，一面成立自卫队，一面人人自动准备武装。

县委派一巡视员去实际帮助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

在抗捐打委员差狗号召之下，召集了一个抗捐代表大会，到三十余人。宣布开会后，主席向大家宣布，作了极短的煽动，结果大家提出：款是确定出不了，大家也都是不愿出款和反对款项才来的，我们应立刻商议好久干呀，并且要怎样干呀！

在过去，党在错误泥坑中时很少召集群众会，纵然开会都是放了一些空炮，空叫抗捐抗捐，群众当然像听讲圣谕新闻，今天忽然听说商议“好久干”，“怎样干”，当然兴奋极了，但在党过去错误意识笼罩之下，又未经过斗争，群众中的落后意识很

多，群众中有的问我们带了好多枪去，叫发枪给他；有的问我们联络了好宽，报告给他听，好约个口子一齐干；有的认为打委员这件事小了，要“大干”“暴动”；有些人这样说，我们这里人少了，不忙干，等到别处干起来了，我们干就是了，红军几时来呀！总之，议论纷纷，各执一辞，我们当时对这些错误倾向落后意识，采取了这样的战术与他作斗争：不同这些为群众所提出的错误倾向各问题作解释工作，而抓紧了这些问题来与当前款项逼得太紧了，委员差狗太可恶了，和人人不愿出和出不起款项想抗款这个情势极尖锐对立起来，一个一个提出在群众中讨论。联络好了才干吗？好的，未联络好当然不干咯！好，一月未联络好我们出一月的款，一年未联络好我们出一年的款罢，唉呀！我们大家还是想出款嘞！好了，散会吧，各人还是回去出款吧，大家还有钱嘞，愿出款嘞，群众全体都说哪个还有钱？哪个愿出款？对于枪杆的问题，我们当然答复没有。我们又提来讨论，没有枪我们就不干，有枪才干吗？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枪，不干好了，还是回去出款罢，等别人等红军来，田冬瓜是等不住的。说是“大干”，小干都不敢那里还敢“大干”，说来香嘴的。是算作红军来了，但我们已遭田匪剥够了，何况目下二十二年的粮人人出不起呢！等人家干起来才干，好比打锤（即打架），大家把定子（即拳头）捏起你等我打，我等你打，结果大家都不打，现在我们就是要想个办法，没得枪，就是我们今天到这儿沟儿岔的人，不等别个不等红军，又要抗款又要走得脱。各个代表全体突然兴奋，群说我们就在找这个法子呀。于是我们一个同志把根据党的指示做的宣言启事（见《晓报》五十期，已投去）拿出在群众中去讨论，群众欢喜极了，代表等对于这宣言极热烈的拥护和发表意见。大家都懂得这一点，运用统一战线的方法，可以“把

有钱的弄在杆杆上站起（中立的意思，群众说的，短时期的）更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抗捐不是我们的目的，大家都觉得从罢捐抗款来“民变”（群众说的），把大粮赶起跑了，除了不出款还要把债打落，还要分一股地方，大家真是空前的热心了，积极了。研究从怎样开始弄起走，又由我们一个同志提议打委员，群众一般都集中在委员以现有的人打不打得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①目前人人不愿出，人人痛恨委员入骨，若是打，不在会的都打得；②红军在前方胜利，田匪后方很是空虚，委员又没得枪一路；③各处都在打委员，就是三合场头次打了都未出鬼；④我们去打他，未放信打个冷不防。因之全体一致决定都说打得。怎样去打法，讨论了一阵，决定派人去惹他，他一定要骂的，马上就打起来。有群众提议打了委员派兵下乡来怎样办？有群众热情的接口说，我们只有夺枪，把枪夺在我们手里，那就对了，我们就算出头了。这几句话激起了全场的欢呼，乘兴就讨论群众武装问题与反对下乡侦探的赤色戒严问题，决定人人制一把刀，一把枪，打起来，调查豪绅火药及枪支，以及各人负责守某一节路，互相呼应，发觉侦探时斟酌情形处以死刑，特别是董麻子（田匪谍查长）。如绑着我们的人，以鸣锣为号，各堵口子夺人。并特别决定各代表回去应加紧发展组织，根据启事一沟一岔三十五十家去约（即根据党所指示的方式），并定出谁负责发展和谁做什么，完全是订出来了的，并决定二十七场打委员。各代表在极兴奋紧张的情形下散了。

现在要特别写的有两件事：

1. 当正在开会时，忽然由不远处来了两架马灯（乡里是最特异的），群众立刻由闹动而恐慌起来了，认为土劣发觉捕人来了，有些就想要跑，但领导同志当时非常镇静，立命全体群众卧

地不准作声咳嗽，一面派遣特别本地人前去打探，一面全体准备武器，打探结果才知道是代表来开会的。自然咯，是熄了灯才准他到开会地点的，不过全体代表对他们几个人不满，同时主席立刻抓紧当时机会提出讨论夜间开会该不该打灯，并连带讨论一切夜间动作的技术问题，决议：夜间开会和行动①不打灯；②不穿白色衣，包白帕；③不咳嗽，咳嗽时爬地；④不吃烟，不带火。同时对于发现了事者之恐慌却很不客气的纠正，认为不镇静是坏事的根源，要在任何情形下都要镇静。受了批评的非常的接受。大家都觉得他们之小心谨慎讲技术和镇静，完全是为抗捐落债分粮，一般地方是多么有关系的。

2. 三台县委关于党员和群众军事化问题，决不是省军委前次通知要利用什么打猎呵，拳术的团体来进行，但群众都是些找钱吃饭的，他们随时有活路做，这样来进行军事化是很不对的，但决不是把这种方式完全放弃。我们进行全三台党员和群众的军事训练问题完全是在一切行动中，一切工作中，一切集会中，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来进行军事训练。因之在这次会议时，会议地点是有步哨的，地点的情形先是有相当考虑的。在后，党又特别召集了放哨的人来检阅这一工作在军事上经验与教训的，比如先讨论技术时也是指示他的军事上的意义的。我们在以后环境严重时，曾经把群众带上山去分成几堆，采取一种军事上互相呼应联络睡觉的，以防敌人对我们的袭击和发生事情后的互相救应。

会议开会到处都蒸蒸日上，向上发展，党与当时决定创造几个主要区域的支部（以前无一完整的支部）三四天内就建立了四个支部，分布在四个主要区域，特别是以□家坪支为最好，并建立龙潭的区委，把区常委的同志每区域一个去参加和领导支部工作，区委的决议，在散会后自己回自己的区域去负责传达支部同

志，并推动支部立刻在群众中去为区委传达决议而奋斗，召集各样会议（代表会以排为单位，或两三排合并号召的群众会，积极分子三五人等）。参加区委的同志又把活动经过转报常委，常委又根据报告讨论和结束这两天的工作进行和状况之经验与教训来作出下两天的进行计划。一切工作是集中在打委员，准备武装冲突来检查的。检查是集中在四点：①各种反对倾向怎样用说服来克服的。怎样克服法；②指出的那些区域的发展如何；③两天来的武装增加怎样；④富农分子的活动之状况和怎样与他思想上组织上的斗争。每一次会议毕，对会议本身都有极简单的批评和与上次的比较，集中在这几点：⑤开会的秩序和精神（活泼的热烈的有条理的）；⑥发言人说话之切要简明精当具体，态度之豁达镇静；⑦会议准备的程度；⑧特别指出此次在各方面新的收获和成绩。这样一来，大家在每一次过后都眉飞色舞，立马分散去干自己的事去了，为的在全部过程中，天天有新的成绩新的经验新的教训，给我们新的鼓励，使我们人人得了新的工作精神，走向新的园地，很热烈的去作新的开垦。二十七日来了，动员了三百多群众上街去打委员去了。我们犯了下面的错误，致未把那天的行动干起来：①政治上的在不侵犯保守的机会主义路线。原定差狗委员找我们要款，我们就骂他，或他骂我们时候我们就打他，一是他打我我还手，结果当天未向我们的群众要款，我们就无法，等看到委员把款收起走了，群众看未见动静，有事的也就走了许多，结果未斗得起来。②群众总指挥部未建立起来，对于这次斗争的干不起也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缺乏总的领导，群众上街在街上是涣散的无组织的，群众在街上飘来飘去，下动员令呢，你找不着我，我找不着你，由党决定的总指挥呢，因出不得头（红），一面未拿在群众中去通过。同时党和团在此次领导和

指挥内部负责的，当时也拿不出主张，交通联络不好（可说无有），结果看见委员走了也就算了。③区委和当时负主要责任的同志未用全力来组织这一斗争是很有大作用的。把群众煽起来了，在未斗争之前觉得各方面都准备对了，但斗争时各方都成了问题了，交通联络无精密的准备，一切将使我们受到牵制和无办法，还有多少如总指挥问题，各区群众之配备问题，各区群众之负责指挥人的问题，通通都是原则未详细具体规定的，以致表现出零乱无次张惶失措的深刻的教训了。我们原则是不能领导具体事件进行的（区委检查大要）。

第二次，初二日动员群众上塔口场去进行，上面那些错误自然是纠正了大部，而且订出切合实际的执行计划，但不了解这一点实际情形，初二日塔口场的差狗委员上盐亭去缴款去了，二场未斗争，又无结果而散。我们又犯了一个最严重错误，不把实际情形弄清楚，便把群众动员到街上，这确实对于群众斗争有影响的。头次未干，二次又弄不清楚，又未干成，这简直等于“玩弄”。

同时又与玩弄斗争群众情绪消沉的意见作激烈的斗争。不是说群众要想出款了吗？这当然不是的，群众决不是要想出款的，而是我们当在群众中去公开认识我们近于“玩弄”的错误，指示决定初七日打委员行动，应一致最大的决心拿在群众中去。一解释当然很明白，永〔并〕没有什么消沉的，大家热心的准备着初七日打委员的行动。

初七日打委员的全部行动经过是这样的：

在行动前首先做了下列的事：初六的夜召集了代表会议，会议做的事：①选举了总指团〔挥〕，人数三人，一主席；②全体群众以中心甲为单位，分成五队，集中于五个茶铺（他们该区人

随时往来的)，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队下设中队一队至五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中队下即就原来排所举出之正副代表统率各该〔排〕之人，归中队长指挥；③设立了一个交通联络队，以专司其事，并详定各队与总指挥处之密切关系，当时派哪些去惹，都是决定了的。

初七日把群众动员上街来了。因动员不充分，每个场只举代表来的关系，人数是减少了，只有一百多了，当然还是要打的。群众看见提款委员来了，人人喜极了，但我们的人还未来齐，而委员收款很忙，几下子把款收起就走了一个（共三个），等我们人来齐了，委员已走了一个，其余两个还在场上四处转要。我们的群众都把他跟上跟下，都不出手，看看下午来了，才由我们的负责同志出去督促和出手才打起来，有一个挨了打跑了，有一个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一个群众把他死死抓住，怕他跑了，他也把我们群众死死抓着，很有几个去拆都未弄开（是我们的人不放的）。全街的人拥来了，我们的群众看见摆了祸，就走了许多，团保就把我们这一个人抓着关起。当时我们就集中人去掠，但只有二十人的光景了，我们带的武器放在店里的，现在被群众拿起走了，所以我们才决定火速各回主要区域集中力量黄昏夺人，依地区划分成三队，全体先在猴窝集中，然后分路围场掠人。第三队在回猴窝等了许久，会着第二队派来的两人，说第二队在土门窝集中，相距十余里，然而最中心的第一队呢，负责同志不知去向，人只来了两个（这两个都是来与我们放信的），说人都有，若要干带个信就来，但是喊立刻带信去齐人，人呢，已经单个到别处去睡去了，在房里没得几人；一面又看见有十多人到被捕者家里去捉人，有枪十二支，但我们当时第三队群众全体只有二十多人，有枪没有火药，用得刀只有四把，其余尽是小刀，大家都

以为敌人有准备了，所以只好宣布回去，另想办法。第二队呢，看久不来，也就各自回去了。是后，第三队又来一分队共九人，还是各人回去了，敌人第二日把人弄起走了，这个夺人之事也就放置了。……

事情并未结束，统治阶级节节向我们进攻，每一排都搭了一个哨棚，排甲也在各处清人了，我们组织的群众红的有些跑了，有些不敢在家，日夜都在坡上，我们在那里做工作的同志吃饭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有几个豪绅带起来到处寻找我们最红的同志群众去了。保卫团一面也派了一班人到那里来伙同当地门户练来清人了。当然咯，谣言更甚，曾经决定组织小队伍去袭击豪绅，但群众口上答应了，并不去。不得已，于是离开那个区域了，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告一结束。

（原载《四川档案史料》1986年第2期）

中共川南特委制订 《游击区域红军家属暂行优待条例》^{*}

(1935年4月)

游击区域的红军家属处在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下，他不能享受工农政权——苏维埃中央政府所颁布优待红军家属条例实行优待。

中共川南特委为着暂行解决游击区域红军家属的困难问题，规定游击区域红军家属暂行优待条例。

一、凡在中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组织如工会农民委员会，红军之友社等应实行优待红军家属无代价的供给红军家属的劳动力（如耕田割谷。种菜砍柴等）。

二、凡在中央领导下的一切工农武装部队应尽可能组织耕田队割谷队砍柴队无代价帮助红军家属。

三、凡在中共领导下的分粮斗争应首先供给红军家属的粮食，没收分配地主财物时应首先供给红军家属的要求。

四、在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成立川南红军家属优待委员会，讨论计划募捐，处理川南红军家属优待工作。

五、凡与红军订立作战协定之一切武装部队应尽保护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之义务不得侵犯红军家属的利益。

^{*} 此条例颁布于1935年4月，用毛笔字书于威信县金鸡乡铁炉队陈兴田、陈兴君家房屋壁上，保留至今。已列为县的保护文物。

六、凡属红军家属得准许其自由迁入苏维埃区域居住，享受分田与苏维埃红军家属同样优待。

七、凡在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家属……（原文驳蚀）常召集红军家属联欢会及派代表慰问红军家属。

八、红军战士为革命牺牲或成残废时中共领导下之一切武装部队及群众组织应即以物质上之优待每年得向红军部队之政治机关领取抚恤金至少大洋二十元。

红军川南宣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中共川南特委制订 《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

(1935年5月1日)

一、川南工农劳苦群众在卖国的国民党军阀刘湘及官僚团保豪绅地主（绅粮）的压迫剥削、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天灾军阀混战之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自由、土地、房屋和衣食。

二、川南工农劳苦群众受尽国民党军阀团保苛捐杂税的剥削，预征田赋，忍不住的饥寒穷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捐抗税斗争，组织抗捐同盟与武装的抗捐军，捉杀收款委员、卡员，打倒一切税局关卡，配合工农红军消灭抽收苛捐杂税的国民党军阀团保，才能免除一切苛捐杂税的剥削，改善自己的生活。

三、目前正是春荒，将要到来的青黄不接，饥寒交迫的工农劳苦民众，只有拥护和实行共产党所领导的分粮运动，组织分粮委员会，武装的分粮队，到绅粮、团保、军阀、官僚的家中去破仓分粮、焚烧田契、借约，实行抗租抗帐，没收绅粮团保的耕牛、农具、种子、衣物，分配给工农才能免除劳苦。

四、川南的工人、雇农（长年及经常帮人的零工在内），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赤色工会，实行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反对东家工头的打骂，工人有组织工会、怠

工、罢工的自由。

五、民团是保护豪绅地主镇压工农革命的反动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应该反对民团，反对保甲制度，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工农的赤色游击队、游击小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抗捐军分粮队，为自己的解放、土地、政权而战。

六、白军士兵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官长的压迫、打骂，要求发清欠饷，要求增加津贴，打牙祭，星期例假，发草鞋衣服，发负伤费、抚恤金，免费坐轮船，免费进戏院，组织士兵革命委员会，杀死反动官长，行动起来，拖枪来加入红军。

七、川南贫苦的农民在国民党苛捐杂税地主豪绅的地租债务剥削底下，要求彻底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祠堂庙宇的财产田地，分给少地与无地的农民，根本消灭封建剥削，才能解除赤贫与流亡的灾祸。

八、苗彝瑶僮等弱小民族历来受帝国主义、汉人中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失去土地自由，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民族自决，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才能争取民族解放。

九、革命的教员、学生，自由职业者，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麻醉青年的党阀教育，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组织红军之友社、反帝国主义大同盟、苏联之友社等革命团体，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用请愿示威罢课等手段来援助红军扑灭国民党军阀。

十、劳动妇女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旧礼教的压迫，反对买卖婚姻，反对虐待平长媳妇，反对强迫包小脚，穿耳朵，要求结婚离婚自由，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给，

劳动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委员会，组织洗衣队、慰劳队，帮助红军洗衣服，做鞋子，补衣服。

十一、一切失业的贫苦民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分粮斗争，加入红军游击队，组织抗捐军、分粮队，推翻创造失业的国民党，为土地为政权而斗争。

十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为工农民众的自由利益而斗争。先进的工人、贫苦农民、坚决英勇的教员、学生，应加入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共产青年团。

川南革命的领导，为苏维埃的川南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川南特委制

1935年五一劳动节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上川南抗捐大同盟宣言（节录）

（1932年）

剥削民众的国民党军阀，筹款的方法，真是无捐不苛，无税不杂。近年来的捐税名称：什么烟捐、统捐、灯捐、特别捐、刮房捐、门牌捐，以及一切计不胜计的苛捐，什么预征粮税、正税、付税、契税、油税、印花税、过道税。以及一切说不胜说的杂税！！还有他妈的什么护商费、公告费、团费、军服费、兵差费……等。的确，他们的筹款方法多，他们的走狗也多，他们刮削的民脂民膏也多。

被压迫的民众们，卖尽田地房屋，卖完妻室儿女，完不清军阀们一年几次预征的粮税，血汗掉来的金钱，缴不清军阀们的杂税。生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中华国度里，生在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中华国度里，外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内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当此财产已卖尽，血汗已榨干的时候，民众们的生机，一天一天的微弱，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却是一天一天的有加无已！！！！

本大同盟为了要打倒一切苛捐杂税起见，为了要与国民党军阀作殊死战，不得不集中武力，外同帝国主义者宣战，内向国民党军阀拼命，因此本大同盟的任务：是——对外打倒各帝国主义者，对内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民众自己的政府。本大同盟深知道要想完成以上的任务，必须被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

来，向着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豪绅进攻，拥护真能取消苛捐苛税的政府，拥护为民众解除痛苦的抗捐军，一方面反抗一切苛捐杂税，一方面根本消灭剥削民众的军阀和走狗，谨此宣言。

一、抗捐大同盟斗争纲领

1. 实行不缴国防捐。 2. 反对预征借垫粮税。
3. 反对抬粮及估收欠粮。 4. 反对抽取团款、烟款、灯捐、印照、茶捐、泥秤、印花税等一切苛捐杂税。
5. 反对估买彩票。 6. 铲除压迫民众的军阀土豪劣绅。
7. 没收军阀土豪劣绅团总的财产——一半作抗捐军饷，一半振救饥民。
8. 反对军阀筹款打仗扰害人民。 9. 武装起来组织抗捐军。
10. 推翻军阀豪绅统治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

二、抗捐大同盟斗争口号（口号共42条，有的条略）

1. 受苛捐杂税预征借垫振〔整〕得要死的民众们快团结起来，要大家齐心一致的抗捐才没有捐款！
2. 打倒替军阀收款乱抬包袱的滥团总滥公事！
3. 打倒筹款打仗扰害人民的刘自乾军阀！
4. 打倒只办捐款不管民事的走狗县官和政府！
5. 打倒包办捐款的土豪劣绅！
6.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抗捐军！
7. 打死军阀的忠实走狗提款委员！
8. 打死估收欠粮抬粮的滥公事！
9. 打死只知收款的滥团总！
10. 打死乱派款子的团、保总！

11. 打死搯索人民的粮差!
12. 要想不出捐款只有加入抗捐大同盟!
13. 抗捐胜利万岁!
14. 要想免出苛捐杂税的痛苦, 只有加入抗捐大同盟。
15. 要想脱离军阀豪绅团总的压迫, 只有加入抗捐大同盟。
16. 要想根本没有预征借垫只有消灭军阀打仗。
17. 要人民自动团结起来才能够根本消灭军阀打仗。
-
42. 要想抗捐完全胜利必须团结广大的工农兵群众。

三、进行方针

1. 很快把掉谱团体发展起来转移为抗捐大同盟的组织。
2. 把纲领口号抬到各种各色民众中去宣传如同意者即吸入抗捐大同盟。
3. 目下应适用一切软抵抗的办法, 如双方形势尖锐即执行打死团总。
4. 立即调查各团总及土豪劣绅的枪支子弹以便将来夺取。

四、组织

各场组织分会由各该地代表负责

五、临时提议 (略)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月 日

(中共邳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上川南抗捐大同盟通电

(1932年)

忠、丰、涪、石、永、梁、绥、仁、彭、崇、眉、广、岳各地抗捐大同盟，暨抗捐军各部钧鉴：窃以军阀混战，餉械所需，尽属民脂民膏，捐税频征，吸尽民众血汗！哀我无辜民众，外受帝国主义者经济之侵略，内受国民党军阀捐税之剥削，民生凋蔽，已非一日，贵大同盟组织抗捐军，为民前锋！起义兴师，救被压迫民众于水火，战军阀豪绅于前敌，旌旗所向，军阀心惊！抗捐胜利，不卜可知，川南被压迫群众，莫不同声颂祝。惟查上川南各县刘自乾军阀割据以来，苛捐杂税，无所不用其极！预征并征粮税未已，而催收国防捐之令又下，各军阀走狗贪官土劣等，因催款而吊打花名者，逐处皆是，为收捐而侮辱妇女无地不然，催差四出，搯索骚扰，民实难堪，同人等为自救计，为消灭苛捐杂税推翻军阀豪绅计，爰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上川南抗捐大同盟，业已组织上川南抗捐军，誓与军阀作殊死战，并与贵大同盟及各路抗捐军取一致行动，消灭剥削民众之敌人，完成抗捐之任务，用特分函电达，敬希南钟时赐，用匡不逮，是盼是感！

上川南抗捐大同盟印 东印

中华民国廿一年 月 日

(中共邛崃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上川南抗捐大同盟敬告各县民众书

(1932年11月10日)

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们：

走到穷途末日的时候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刘子乾及其爪牙，一味的横征暴敛，不顾广大劳苦民众的生计，一年预征七、八年粮税犹不足，还要抽什么国防捐、马路捐、爱国捐、青苗捐、田亩捐、红灯捐、彩票捐、车辆捐、门牌捐、过道捐、茶捐、统捐、酒捐等说不完的苛捐；预征什么印花税、护商税、印照税、验契税、附加税、肉税、盐税、糖税等计不胜计的杂税。此外还有其忠实走狗土豪劣绅，滥团总提款委员的浮〔胡〕派乱收什么招待费、手续费、公告费、团费、帮费，以及一切可能取名的滥费。这真是“豺狼当道，苛政猛于虎”啊！！

更痛心者是收款的时候，缴款如慢了一点，或说半个无字的话，轻则受其捆、绑、锁，重则施以关监毒打，以致于枪毙，即妇人孩子亦不能免受此殃。总之，收款催款的走狗们，仗着军阀的淫威，无所不用其极！只以拿钱为目的，逼得弱小民众无以聊生。数月来因无力缴捐上捐而悬梁跳水死者，不可胜计。

被压迫的民众们：当地卖田，仍不足以饱军阀的贪囊，卖儿鬻女，尤不足以填豪绅的欲壑，啼饥号寒，悬梁跳水，更不能动豺狼虎豹的野心。现在只有团结起来反抗，杀死压迫民众的军阀豪绅，推翻统治我们的现政府，建立起无捐无税自己的政府，才

是唯一的出路。目前本大同盟正在与压迫我们的敌人，实行拼命的斗争。但责任重大，爰力难成，务希我全体被压迫民众，赶快觉悟，依据本同盟公布的纲领和口号与章程组织起来。并积极编制抗捐军，以便早日肃清压迫我们弱小民众的敌人——军阀、贪官、土豪、劣绅、滥团总，共上光明的道路。

1932年11月10日印发

(中共邛崃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四川民众抗捐军指挥部布告

(1934年春)

照得民国成立	今年二十三春
皆因军阀混闹	年年都打战争
苛捐杂税如林	粮款一年十征
可恨贪官污吏	以及土豪劣绅
大家凑奸为恶	一齐害我人民
田地当卖干净	难把款来交清
富者已振〔整〕穷困	贪者无处求生
不是逼来当匪	便是饿死沟心
下难供活儿女	上难奉养双亲
横顺都是该死	不如死里求生
因此大家商定	成立抗捐同盟
民众一致武装	才把抗款军兴
实行抗捐抗粮	捐款不出一文
凡我各界民众	工农商学士兵
大家一致联合	务要协力同心
不论城乡市镇	成立抗捐同盟
武装第一要紧	组织抗款民军
只要赞成抗捐	尽都是我友军
阻挡我军前进	便是民众敌人

本军为民除害
铲除民众仇敌
成立人民政府
取消苛捐杂税
特此布告远近

不惜阵前相拚
推翻军阀豪绅
解放劳苦人民
大家同享太平
具各一律知闻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
一切夷汉平民，
可恨四川军阀，
苛捐杂税重重，
红军万里长征，
今已来到川西，
军纪十分严明，
粮食公平购买，
凡我夷人群众，
赶快团结起来，
设立夷人政府，
真正平等自由，
希望努力宣传，

解放弱小民族，
都是兄弟骨肉。
压迫夷人太毒，
又复妄加杀戮。
所向势如破竹，
尊重夷人风俗，
不动一丝一粟，
价钱交付十足，
切莫怀疑畏缩，
共把军阀驱逐，
夷族管理夷族，
再不受人欺辱，
将此广播西蜀。

红军总司令 朱德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过冕宁时，所发布告。

《红色中华》载国民党二十九军 第三混成旅参加红军宣言

(1933年2月19日)

全中国四川劳苦群众们！全中国全四川武装同志们！我们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剥削压迫下，真弄到要生不能要死不得了，我们成了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罪人，我们的生活，只是痛苦、灾荒杀戮、死亡、铁链枷锁和牢狱。我们要想翻身，只有坚决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掠夺我满州，霸占我上海，又复轰炸我榆关，进攻我热河与平津。列强帝国主义强盗们，更于沿海各省及长江沿岸，麇集炮舰，肆行屠杀。这是帝国主义强盗们，更进一步的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的侵略呵！无耻的国民党不但不出兵抵抗，反而拚命集中一切力量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和压迫工农的反帝运动与义勇军，尤其是四川军阀混战连年，死的均是我们的兄弟，焚毁的是我们穷人的房屋，加以苛捐杂税，压迫重重，逼得千百万工农群众卖妻卖子，死亡载迫〔道〕，这是何等伤心惨状呵！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后，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没收了地主豪绅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号召一切革命将士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的战争，军至之日，四川劳苦群众望风响应，全川战士踊跃来归。焯章^①等出身穷家，久历

^① 焯章即任伟章。

行伍，自愧二十年来在军阀统治下奔走牺牲，无非受人驱使利用，每欲参加革命又未得到良好时机，当此工农痛苦益深，民族国家益危，以及红四方军到来的时候，故特坚决宣传脱离反革命二十九军系统，加入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誓追随广大工农群众之后，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全中国工农群众们，武装同志们，一致起来罢，幸勿再为军阀爪牙当炮灰，我们应该自己保护自己，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而斗争，我们一致来参加红军，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争取全国工农解放的成功。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任焯章草

团长张紫光 李光章 政治部主任载浦 参谋长张友民^① 及全体三千同人印

(原载《红色中华》1933年2月19日第1版，
转载于《四川党史资料》1982年第7期)

^① 张友民即张逸民。

《红色中华》载中央政府嘉勉川 军两团投入红军

(1933年2月19日)

红四方面军自积极向川北发展后连获大胜利，击溃川军六团兵力，缴获枪械二千余支，毙敌旅长团长各一，并且占领了巴中城。在红军这一伟大胜利面前，四川军队大大动摇，许多白军中革命的士兵拖枪投诚红军，高举了红旗为谋自身解放，坚决起来暴动，脱离军阀的羁绊。川军田部两团也于一月二十七日投入红军，现已改编为独立第一师，全体战士并且发表了哗变经过，以及号召全中国白军起来暴动的通电。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了嘉慰他们，也发了一个通电，兹录其全文如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转独立第一师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你们英勇觉悟，坚决果断地打碎了自身的锁链，脱离了军阀的压迫，站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成立工农红军，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本阶级——工农阶级的解放与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一幕。目下帝国主义正在积极瓜分中国，国民党军阀本其无耻的投降出卖政策，不但毫无抵抗，且在帝国主义的直接组织与指挥之下，动员一切反动力量，向全国苏维埃与红军举行四次大围攻，革命与反革命到了生死决战的紧急关头，你们认清阶级，掉转枪头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火的英勇行为，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确实是粉碎敌人大举围攻的一支生力军，苏维埃中央

政府对你们表示无限的敬意与嘉慰。中央区红军继续击溃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主力，取获伟大胜利，正在继续消灭敌人的进攻主力，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以夺取抚州、南昌，实现江西首先胜利。更望你们继续这一光荣的伟大事业，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建立正规红军制度，成为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铁军，来为中国民族的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底，目前应在四川猛力开展反地主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拥护工人的利益，帮助工农群众组织与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与发展苏区。只有在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中，才能锻炼你们自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铁军，只有坚决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与获得广大工农群众拥护之下，才能保障你们在中国革命中一切任务的完成，来配合全国红军与工农群众，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和在全国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原载《红色中华》，1933年2月19日第1版。）

转载于《四川党史资料》1982年第7期。）

《红色中华》载四川西部 抗捐斗争情况

(1933年7月14日)

上海工农电讯：我红四方面军自入川以来，连战连胜，共消灭敌人十余师，此次占领保宁（即阆中）后，潼川（今三台）、蓬安、营（山）渠（县）等县日益危急，四川国民党军均震恐不已。四川西部民众因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组织了十九县民众抗捐大同盟，声势浩大，刘文辉派兵前往“围剿”被击退。离成都四十里即有红军活动，成都的豪绅地主极恐慌。

(原载《红色中华》1933年7月14日第4版，
转载于《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

《红色中华》载四川苏维埃运动 发展情况（节录）

（1934年1月1日）

四川代表谈最近四川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情形，极为详细。四川最近苏维埃区域已发展到十三县，面积比我们江西苏区还要大，以通、南、巴三县为中心，全川民众因连年受了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地主豪绅们的剥削压迫等等痛苦，革命的要求非常迫切，各地普遍组织了迎红会，以武装暴动推翻地主豪绅的统治来欢迎红军。抗捐抗税大同盟更是极广泛的群众组织，各地革命斗争非常高涨。

（原载《红色中华》1934年1月1日第5版“全苏代表大会访问记”，

转载于《四川党史资料》1982年第7期）

《红星报》有关叙永游击队的报导

(1935年)

四川叙永县黄泥嘴一带，去年八月中，生长一支抗敌游击队。正因为四川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群众生活痛苦到极点，所以远近各处的劳苦群众，纷纷响应，起来组织农会和加入游击队，夺取地主武装，抗交捐税和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游击队成立之后，六个月就发展到二三百人，赤色农会发展到一万余人。

中央红军到了云贵川边，他们更加兴奋起来。现在与我们取得联络了。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这支游击队毫无疑问的将成为赤化云贵川的生力军。

(原载中央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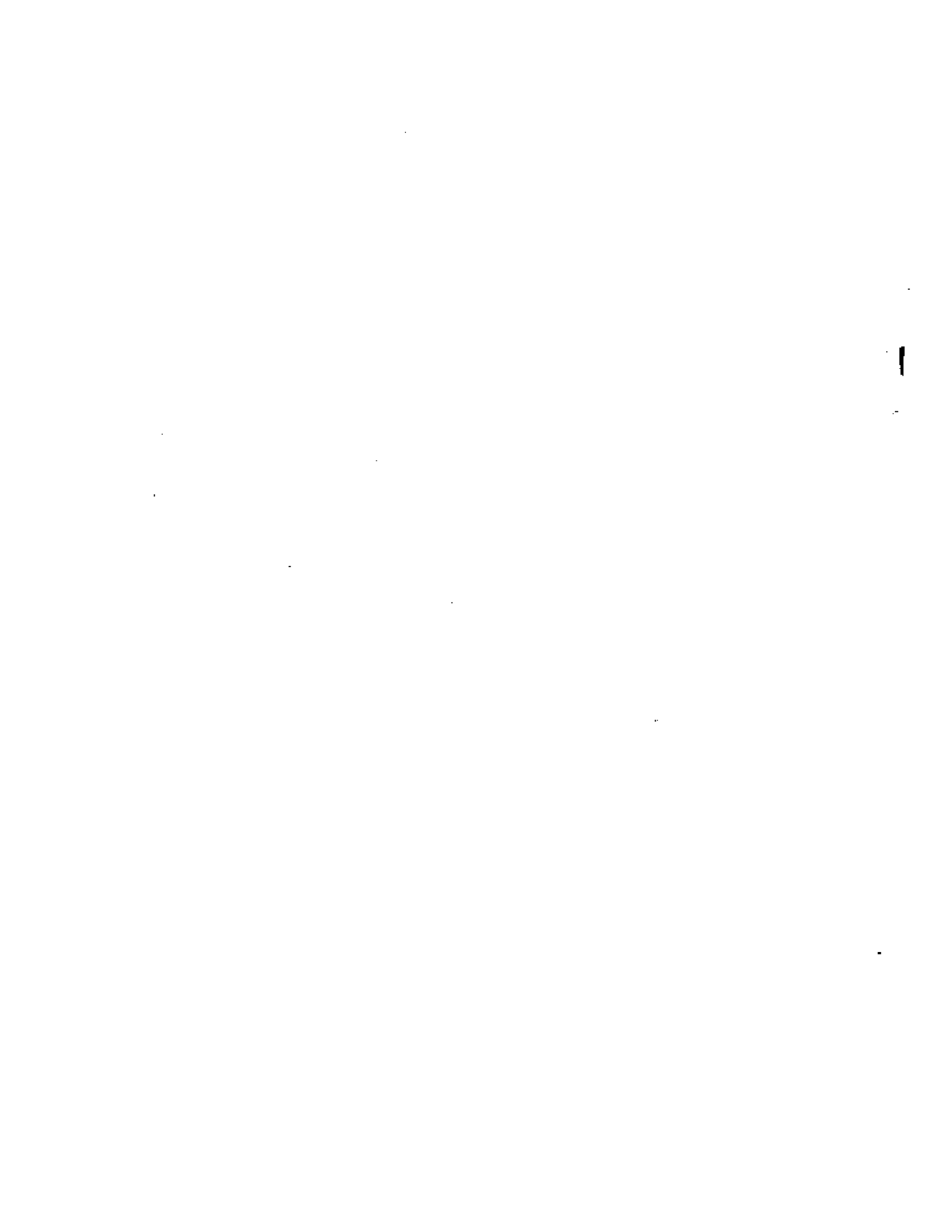
《红星报》有关川南游击队的报导

(1935年)

叙永通讯：本报简载之叙永游击队黄泥嘴、五龙山一带，于上月初接连打了两个胜仗：第一次是在五龙山附近，打败古成章（团总）、陈诚吉（乡长）所带领的云南保卫团二百多人，（从阴历正月二十二至二十四），缴枪七十余支；第二次是和二十一军第五师陈师长所率领的川军和永宁精选队约三团打（从阴历正月三十至二月初二），结果也大获胜利，缴枪一百五十余支。

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他们在半个月内，已扩大了三倍。并且已经建立了七个乡的革命委员会。群众非常拥护他们，经常向他们报告敌情。

（原载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1935年第14期）



川 东 游 击 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的前身是川东游击军。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东北部组建和领导的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它“使下川东十余县反革命之军阀、地主、豪绅为之震恐，寝不安席”。它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巩固，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川东北位于川、陕、鄂三省接壤地区，山势陡峻，交通闭塞，封建势力深厚。人民惨遭暴敛，苛捐杂税居全国之冠，农民受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加之土匪猖獗和连年天灾，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0年，王维舟去上海，经朝鲜共产党员金笠、李×介绍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年底赴苏联学习，聆听了列宁的教导。1923年，他回家乡创办新群女子高小并接办宏文学校。在此期间，他联络进步教师宋更新、冉雨生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共产主义，为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被党派回家乡，在宣（汉）、达（县）、开（江）一带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点燃了川东北革命斗争的烈火。

大革命失败后，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共产党员李家俊等于1929年5月领导了著名的固军坝起义，正式宣告成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发展了革命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后由于敌人以优势兵力围追堵击，起义军于1930年7月失败。

1930年7月在李光华、王维舟、覃文等领导下举行了虎（城）

南（岳）农暴，建立了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又名川东游击纵队）。这支起义部队奉命东征，遭到敌军围攻，不幸失败。部分同志在王维舟等领导下，继续在开江、梁山、大竹、达县、宣汉边境开展游击活动，积蓄革命力量，为川东游击军的再起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31年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中心县委，领导群众配合川东游击军的斗争。

1931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会议，王维舟前往参加。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在川东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王维舟回到宣汉后，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一、二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井岗山为榜样，制定了新的策略，开展斗争。川东游击军迅速建立起以宣（汉）、开（县）、开（江）、达（县）边境为主体的游击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川东游击军分为三个支队开展活动：一支队在曾莱、蔡奎的领导下，活动于虎（城）、南（岳）、大（树）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粮和割谷斗争，以游击队为骨干，带领群众“破仓分粮”，惩治恶霸地主，给敌人以很大打击，重建了虎南大游击区。但不幸在胜利开展武装斗争中，遭叛徒金方勋投毒和引敌围攻，使游击队受到惨重损失，领导人曾莱、蔡奎等先后壮烈牺牲。二支队在开江广福、甘棠、靖安、任市等地发动群众，得到了发展壮大，部队发展到数百人、枪。后因交通员邱福俊叛变投敌，敌人掌握了游击队的活动规律，派兵到广福“清剿”，游击队损失很大，于是决定分散隐蔽暂停活动。三支队以大山坪为中心，活动于宣汉、万源、达县和平昌等县的边境地区，建立健全了各种组织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在打击土豪劣绅中，用罚款的办法筹集资金购置枪弹，发动

群众进行抗捐、抗租，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军阀统治的斗争，打击敌人；打入敌人营垒，掌握敌人政权，掩护革命活动；打击顽固派，同敌人开展夺权斗争；奇袭敌军，消灭敌人等，使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梁山中心县委遭敌破坏后，1932年夏，省委决定将梁山中心县委改为梁达中心县委，杨克明任书记。中心县委迁驻达县蒲家场，与川东军委一起共同加强对川东游击军和地方工作的领导。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川东的革命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省委及时指示梁达中心县委和川东军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大力恢复和发展农民群众组织，猛烈发展游击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主动争取与主力红军会合”。王维舟根据省委指示，立即召开军委会决定：游击队主要力量转入接近主力红军前沿地区，配合红军作战；立即派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积极扩大各种群众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动员青壮年参加游击队，迅速扩大武装。通过一系列活动，各种革命组织得到迅猛发展，游击队扩充到两千余人。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在粉碎军阀田頌尧的“三路围攻”以后，乘敌六路围攻尚未行动之际，主动发起了仪（陇）阆（中）、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川东游击军积极策应，派支队长蒋群麟前往苏区同红四方面军联系，在军事上协同配合；派一、二支队在宣（汉）、万（源）、通（江）边境袭击敌人；派三支队在宣达边境袭击敌人。同时，集结力量，堵截从万源、宣汉溃逃之敌。

1933年10月17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宣达战役后，游击军分线截击敌人；西线游击队在双河、明月、马家等地协同红军作战；东线游击队在黄金口等地打击敌人。

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亲自指挥游击队在东线马立爪拦截

刘存厚溃军，一举歼敌一个连。游击军牵制敌军约两个师的兵力。1933年10月21日，刘存厚部溃军约八个团逃窜到南坝场一带。为向敌军近逼，川东游击军将总指挥部迁于下八庙文家祠堂，指挥游击军与敌两个团大战于黄泥嘴。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赶到后，协同作战，一举将敌击溃。

红军解放宣汉后，徐向前总指挥来到宣汉城，听取游击军代表王波汇报情况，徐总指挥即派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率七十三团赶至下八庙与王维舟会见，共商攻打南坝场的计划。两军协同作战，10月27日攻占南坝场，将敌追至开江县边的杨柳关凉风垭一线，直至高桥关、破池子，先后歼敌八团之众，缴枪千余支。

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游击区联成了一大片，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空前扩大。由于川东游击军在长期艰苦奋战中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部队发展到万余人，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川东游击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下设三个师，九十七师驻达县蒲家场，师长蒋群麟，九十八师驻三湾岩冉家垭口，师长冉南轩，九十九师在南坝宣告成立，师长王波。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西门操坝召开宣汉解放和红三十三军成立的庆祝大会，周围场镇的群众都兴高采烈地远道赶来参加，到会者上万人。

红三十三军成立后，为巩固和发展苏区，转战川陕边境，累立战功。以后参加长征，在苦战雪山、草地，鏖战甘肃高台，反对张国焘“左倾”错误和分裂红军的斗争中，立下功勋，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唐敦敦整理）

华蓥山武装斗争

华蓥山中段北麓，渠江和嘉陵江之间的岳池、广安、武胜广大地区，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是军阀垂涎、争夺的一块沃土。1924年以来，在军阀罗泽州、杨森的暴戾统治下，无法维生的农民群起反抗，被迫步入绿林。华蓥山北麓、渠江下游一带的大股农民武装就有十八支，约三千多人。

1927年冬，共产党员杜桴生、金化新等肩负革命重任，从白色恐怖的武汉撤回岳池，在积极发展党员的基础上，将中共岳池支部扩建为特支，杜桴生任书记，金化新、刘汉民、熊尧冀为委员。1928年春，杜桴生奉调离开岳池，金化新继任特支书记。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精神，岳池特支研究确定：在开展城市学运、工运的同时，应着手组建党直接掌握的队伍和积极改造绿林土著武装的工作。

1931年秋，岳池特支决定由共产党员廖玉壁筹组华蓥山游击队。11月，廖玉壁在岳池罗渡乡的魏家沟等地组织农民魏云安、伍登先、尹锡之等四五十人，建立起了基本队伍。以“打富济贫”为号召，打击了一些豪绅巨富，没收其财物作军饷开支和周济穷人。特支派金化新、罗方域等先后深入到岳池的高兴、阳和、罗渡一带作绿林武装工作。金化新还亲自到刁玉甄队伍中去作报告，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思想，随后又派共产党员罗方域到刁部工作。通过一段时间对绿林武装的争取工作，刁玉甄、王道纯、屈由路等和党领导的武装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

党组织在建立自己的武装，争取改造绿林队伍的同时，还注意了对地方民团的争取工作。1932年党组织通过社会关系，使进步人士徐新甫当上了岳池县团练局长，共产党员刘汉民、段前迪分任团练局训练股长、庶务主任，以逐步掌握团练局内的一部分人、枪。

1932年春，廖玉璧与刁玉甄联合行动。不少农民前来投军，队伍扩大到四五百人。当时，杨森在岳池驻有第一、四混成旅，共计三千人；广安驻有第五混成旅千余人。专横反动的杨森决不容许他的防区内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存在。对于岳池蜂起的绿林武装，妄图用招抚的办法予以解决，借以扩充、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年春夏，各股绿林武装先后被招安。活动在岳、广一带的廖玉璧、刁玉甄部，为了取得弹药、给养，壮大队伍，向杨森提出以不改编队伍为条件，假意受招抚。5月中旬，廖、刁将游击队结集在岳池的余家场整训，进行革命前途教育、军纪教育，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游击队在驻地买卖公平，对群众和气，对遭受灾祸生活困难的农民进行扶助，深受群众拥护。

1932年10月，杨森调一、四混成旅到资阳参加刘湘与刘文辉的混战，仅留第五混成旅夏炯部驻守广、岳，岳池城内兵力空虚。廖、刁计议，决定在年关乘杨森第一、四混成旅尚未回防之机举行暴动，夺取岳池县城。后因失密，夏炯有所防备，暴动计划未能实现。随后从徐新甫处得悉夏炯将于腊月初八派罗润德团剿杀游击队。廖、刁分析，敌强我弱，不宜迎战，率部撤走。罗润德部赶到余家场扑了空。夏炯闻讯，甚为恼怒。不久，即开始大“清乡”，在县城、兴隆先后逮捕了金化新、刘汉民、段前迪等，于1933年2月8日杀害于广安百花山。罗方域随游击队战斗，于1933年3月在武胜治病被敌人抓捕，保释后病故。

游击队撤出余家场后，1933年1月中旬，转移到岳池文昌寨。杨森随即调来一个团约一千人，紧紧包围寨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从清晨打到中午，始终未能攻下。游击队奋勇迎战，毙伤敌十多人。午后，因弹药将尽，孤军无援，游击队始从清吉门突围向余家场、太平场方向撤走。文昌寨战斗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廖、刁将部队化整为零，活动在余家、罗渡、齐福、义和等广大乡村。敌人数次清剿皆扑空，便加强了特务暗探活动，四出侦察游击队行踪。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战火将烧到杨森防区。杨森急令广、岳驻军夏炯旅及精练司令向廷瑞部开赴营、渠、巴三县交界处布防。廖、刁率游击队乘杨森后方空虚，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活跃在广、岳一带，打击豪绅巨富，扰乱敌人后方。

1933年夏，廖玉壁率张翼等二十余名战士，于一个深夜，袭击岳池大石乡民团，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夏末，乘石埡场一个逢场天，刁玉甄又带三四十人打击了恶霸尹元亨。尹虽越墙逃脱，却大杀了恶霸的威风。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发起营、渠战役。一举攻克营山城，并解放了渠县、蓬安两县的部分乡村，先头部队直抵广安花桥。为了发动群众配合前线，策应红军，游击队与当地党组织配合行动，一夜之间在岳池的花板、姚市、罗渡及广安的长生寨等地贴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军阀”、“工农红军胜利万岁”等标语，使地方反动势力十分惊恐。11月1日晚，又由屈由路就近带十几个游击队员奇袭罗渡镇，当场击毙巡官汪海洋，打伤警士二人，并没收了镇上土豪劣绅的财物。广安驻军闻讯，派一连人星夜赶来，游击队早已转移。

为了“绥靖”后方，避免腹背受击，杨森令其侄儿、军部手枪大队长杨汉印出面向廖、刁招安。廖、刁会商决定，将计就计。仍以不受编为条件接受招抚，借机取得军饷、装备，进一步巩固壮大队伍，以图发展。1934年2月，杨汉印同五县民团总指挥叶济到岳池与游击队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游击队改称大队（即一个团），刁玉甄为大队长，划广安河东新街为大队驻地等。3月，廖、刁部队驻岳池文昌寨、姚市桥和广安长生寨一线，进行扩军整训。此时，恰值守岳池的第四混成旅在各场收得税款送往前方。廖、刁得知后，便派人截取了这笔税款。杨森闻讯大怒，急电令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率部“清剿”。向廷瑞立即派出两个侦缉队、一个特务连进攻文昌寨。又调驻赛龙场的罗有江营往花板桥截击。廖、刁急速收扰部队向广安长生寨撤退。当罗有江营赶到花板桥时，廖、刁部队已经通过。向廷瑞部跟踪追击，双方在广岳交界的枣子垭、李家大沟等地展开了激战，中午，向廷瑞部撤回岳池。廖、刁率部二百余人开往广安，驻县城对岸新街，其余的队员或留驻长生寨，或散居广安城内，观察动静，以待时机。

4月，游击队得知杨汉印企图强编游击队，为了便于隐蔽，决定队伍分开活动。廖玉壁带领基本武装活动于广安的代市、禄市，岳池的高兴、阳和一带，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刁玉甄带领一部分人在岳池、武胜、合川沿渠江一线活动。

1933年秋到1934年春，中共南充中心县委成员陈永年和岳池地下党联络员黄贞沧相继叛变，岳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防备杨森利用叛徒破坏游击队，廖玉壁将队伍分散隐蔽于广安、岳池沿华莹山边的天池、双河、阳和、高兴等地。杨森严令向廷瑞悬赏六百元大洋通缉廖玉壁，终无法获悉廖的踪迹。

1935年2月21日，向廷瑞利用曾鸿策与廖玉壁的社会关系，诱捕了廖玉壁。23日，廖玉壁英勇就义于岳池县城南较场。接着敌人对游击队进行疯狂清剿。6月3日，又将季星北、余树清、陈博斋等九人杀害于广安南园。

(中共岳池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南江平民军

“平民军”为任伟章组建。任伟章曾受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影响。1929年，他任川军二十军第二混成旅旅长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冬，旷继勋领导的“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军委派李载浦到任伟章所领导的二十军第二混成旅策动起义。这时，二十军正酝酿缩编，控制极严。至1931年冬任伟章方从军内转移出一批武器，积极进行起义准备。

1932年2月，中共阆南县委在南部三元街福音堂召开会议，作出“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反对军阀政府征粮征税”的重要决议。这时，任伟章返南部省亲，会见同学、时任中共升钟区委书记的张友明，张希望他支援升钟游击战与地方暴动，任表示愿密切配合。3月，杨森颁令第二混成旅移住渠县，任伟章署渠县县长，稍后又免去任伟章第二混成旅旅长职，改任第六混成旅副旅长。原定起义计划被迫停止。5月，任伟章遂以自己的积蓄作给养；以原所部被缩编掉的军官为骨干；秘密建立“平民军”，并选择渠县特支工作基础较好的岩峰出境，离开渠县，暂避杨森耳目。

“平民军”初有二百人枪，由任光楣（任伟章侄儿）、谭席贞领导分散活动于南部铜钱山、新镇坝，西充槐树场和西充与南充间的岳山寺，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军阀征粮征税，相机打击小股的军阀驻军和团防小队，夺取枪支弹药扩大队伍。部队多活动

于杨森、田頌尧两军阀防区交界处的空隙。偶遇敌犯，如系二十军的，部队即移往二十九军防区，若系二十九军的，部队则又移往二十军防区。两个月后，平民军不仅得到保存，而且成倍发展，积极配合了升保地区发动的抗捐抗税，请愿示威游行等斗争。

杨森派人四处搜集平民军活动情报，并派军部中校副官田子宜到渠县暗地监视任伟章。7月下旬，杨森设下陷阱，要亲自在南充“召见”任伟章。任伟章识破其阴谋，在卫队和一部“平民军”掩护下，在槐树场西禅寺，公开宣布就任“平民军”司令。8月中旬，平民军即发展到千余人枪，除设特科大队、手枪大队（司令部保卫队）外，其余人枪编为四个作战单位，张紫光、周正志、俞嘉林、陈世昌分别担任一、二、三、四大队大队长。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指示，由参谋李载浦、副司令谭席贞率领部队，转移到川陕交界的大山区南江县桃园寺，开辟根据地。9月中旬，任伟章率特科大队、手枪大队最后离开西禅寺到升钟，同张友明讨论如何配合开展升钟游击战问题。然后，取道南部县城向南江进发，月底抵达桃园寺。

1932年9月初，“平民军”更名为“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以下简称“川北民军”）。当时，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后，“川北民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领导南江人民掀起了反抗军阀增加捐税的斗争高潮。

“川北民军”重视部队的纪律教育，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在桃园经过两个月的建设，“川北民军”影响扩大到邻近川陕两省六县（通江、巴中、广元、宁强、汉中、南郑）。部队采取种种方式，短期内壮大到一千六七百人，其中，行伍出身的约十分之二；穷苦农民约十分之三；青年学生约十分之一，专门编有一个学生队；流氓无产者约十分之二；收编土匪约十分之二。将原大队、中队建

制变为团、营、连、排，另增“敌察队”和通讯、交际、税务、管理等部门。李载浦任参谋长。二十九军驻广元独立师刘汉雄，见“川北民军”军威日壮，即邀二十九军驻巴中第三师罗迺琼，意欲武力招讨（南江属罗辖区）。罗迺琼派参谋梁甘辛携大洋一千元，往桃园游说“招封”。在强敌面前，民军表面上留下送来的“二十九军第三师川陕边防军”关防。南部升保暴动失败后，张友明来到“川北民军”任参谋长，决定于1932年12月21日，由任伟章亲自率领主力袭击南郑县城（周家坪），夺取大批武器后，再同刘、罗决一雌雄。当部队进至南郑黄官岭，“敌察队”回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已渡汉水到达川北通江。任伟章立即率领部队返川，往南江与通江接壤的贵平关迎接红军。

任伟章抵贵平关时，红七十三师主力已进入南江官禄口，并立即派干部上贵民关同“川北民军”联系。张友明、李载浦随往红七十三师前哨赶场溪高壁庵，会见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1933年1月19日，任伟章亲自率领特科大队长陈贡枢等十余人到高壁庵，接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军旗（以下简称独立师），随后，将全军集中于赶场溪七星坝，含编入的团丁共约三千六百人，编为三个团一个营。师长任伟章，参谋长张友明，政治部主任李载浦，一团长张紫光，二团长魏德华，三团长李宪章，特务营长陈贡枢。改编为独立师后，经过三天学习，于1月25日即配合主力红军投入“尖山战役”，担任攻打鹿角垭的战斗任务。独立师不惜牺牲，苦战十日，得鹿角垭后又乘胜依托有利地形，支援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强攻甄子垭。陷于孤立的甄子垭守敌，迅为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歼灭。2月1日，南江县城解放。独立师驻南江县城休整。红四方面军总部派去五十多名干部，刘杞任师政委，视战斗减员情况，全师整编为一、三两团。此间，

任伟章署发了《我们要想翻身，只有坚决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宣言。经短期休整，独立师担任主力红军向北发展之右翼，向广元推进。进军中，任伟章坚决抵制打土豪中的过左政策，在军内普遍建立与发展党团组织，部队向前推进十分顺利。采取从各连队抽调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游击营”，以精锐对顽敌，一举击败范子龙，占领普子岭，逼近广元县城。为当时川陕苏区向北发展速度最快、最为靠前的一支红军。

1933年2月中旬，田頌尧向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独立师于普子岭阻击敌第二路司令刘汉雄第十八旅后，转移长池地区扼守马桑庙，英勇迎击十一旅李均陶团、十三旅谢安华团、十二旅袁国训的连续轮番进攻，协同红十一师在长池坝上作战八天，歼敌五千。取得红四方面军反敌“三路围攻”中的最大战果。

2月下旬，独立师奉命收紧阵地于杨坝、坪河，接受中共川陕省委巡视员余洪远检阅。余洪远将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作了报告，认为整个部队是可以信赖的。

3月16日，独立师再次收紧阵地于赶场溪，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严密监视已占领南江之敌。这时，敌人利用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数次编造所谓任伟章“反水”的“罪证”，传送给红七十三师司令部。这样，任伟章及独立师一批干部于四月被陷害。独立师遂缩编为“独立团”。7月，贯彻红四方面军“木门军事会议”精神，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六七团。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二六七团第九连编入“川北边区镇守阵地游击队”（后发展为“川陕游击队”），在桃园继续坚持了长达五年的艰苦斗争。1949年全国解放后，任伟章、张友明、李载浦、刘杞曾追认为革命烈士。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潘广炎整理）

德 阳 孝 泉 兵 变

1932年10月，中共绵竹中心县委（辖绵竹、安县、什邡、彭县、罗江、彰明等县）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反对军阀混战，发动和领导了田頌尧部驻孝泉待命参战的三个多连士兵起义。

1931年春，中共四川省委为加强绵竹中心县委工作，派省执委委员曾海云任绵竹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夏，中心县委派骆是愚去安县清理党员，恢复了党、团组织。中心县委机关由绵竹先后移至安县的汉昌坝和晓坝。1932年，省委又派刘逸仙任中心县委军委书记，直接领导军运工作。从1931年起，绵竹中心县委即着手在军阀田頌尧部队中进行士兵工作，同时，在农村积极开展农民运动。计划进行一次将农民暴动与革命兵变相结合的军事起义。

早在1931年初，二十九军第二混成旅二十六团驻绵竹部队中，就有我党的活动，群众基础较好。党在该团的军支负责人是一营见习排长王敬德和团副赵秉贤。1932年4月，在二十六团建立了党的支部及外围组织“苏红之友社”、“士兵互助会”，有共产党员三十多人，外围组织成员一百二十多人。党支部建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在士兵中秘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同时，结合士兵的切身利益，开展一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如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的旧军阀作风，提倡官兵平等，不准克扣军饷，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等，深受士兵的拥护。但工作发展不平衡，开始，一营的工作开展得较好，三营次之，二营基本上是个空白，因为二营营长见一、三营苗头不对，便加强

了防范，采取措施，派他亲兄弟（中士）和一些心腹监视士兵的行动，把部队控制得十分严密。为了打开二营的缺口，党支部作了研究，一营党的负责人张绍武（上士班长）主动提出，去争取二营营长的弟弟，以打开缺口。张绍武常陪他赌钱喝酒，他见张绍武很够朋友，逐步消除戒心，时相往来。有一次，他家有困难，便去找他哥（二营营长）要钱，不但没要到，还挨了一顿臭骂。张绍武知道此事后，便慷慨相助，他感激地说：“你真是比我的亲哥哥还亲”。天长日久，他对张绍武更加亲近，偶尔向张绍武透露一点军情。张绍武一面暗中摸底调查，串连士兵，一面对他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通过教育，他逐步懂得了一些道理，阶级觉悟有所提高，表示不再给他哥哥卖命了，后来发展他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苏红之友社”。这样，二营有了自己的人，逐步打开了局面。这中间引起了连长的怀疑，他故意刁难，叫士兵在营房内打苍蝇，规定每天每人交几十个，又不准到营房外面去打，士兵都很反感，群情激怒。党支部抓住这件事，向连长提出，要完成这个多打苍蝇的任务，只有到外面去打才行。支部一动员，士兵都很拥护，连长也无可奈何。党组织就这样因势利导地经常开展一些有节制的斗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二十六团三个营基本上控制在我们手中。

1932年9月，中共安县临时县委为给二十六团起义创造条件，遵照省委“以正确的策略去组织与领导反日运动，动员每个支部的同志去组织公开的群众反帝到反国民党的斗争”的指示精神，9月18日，发动汉昌、秀水等地农民、秀水学校师生和秀水驻军三百多人，在秀水街上举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省委巡

视员、团省委书记苟永芳参加并领导了这次活动。10月10日，安县临时县委利用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一周年，又组织群众、师生、士兵四百余人，在秀水街上搭台演讲，宣传抗日；宣传抗粮、抗税、抗丁；宣传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听讲群众深受教育，顿时怒火满腔，义愤填膺，哄斗了街上的大土豪邓瑞廷，要他答应给农民减租减押。但这次行动最后遭到地方反动武装和二十九军来秀水“清乡”的军队镇压，逮捕群众二三十人，党的地方组织受到一些损失。

10月初，邓锡侯、田頌尧联军与刘文辉的军队在成都发生激烈的巷战。田頌尧八个旅的兵力，作为后续部队早已从绵竹开往绵阳集结，随时准备开往成都作战。绵竹中心县委分析了形势，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在二十六团发动起义，并向省委写了报告。省委批准了这个行动计划，指示暴动后的部队番号改为“四川西北工农红军”，开赴安县山区，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任命省委组织部长廖恩波为四川西北工农红军党代表，骆是愚为政治部主任，王敬德为总指挥，赵秉贤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二十六团开拔到绵阳新店子后，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公开提出“反对军阀混战”，“不为军阀战争卖命”，“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等口号，顿时军心动摇，士兵反战情绪高涨。田頌尧对二十六团的活动十分恐惧，为了防止引起连锁反应，下令把二十六团随第二混成旅全部调离新店子，到德阳、绵竹两县所辖的孝泉整肃，准备暗中消灭。

第二混成旅到孝泉后，即对二十六团的三个营严加控制，从驻地安排、枪支弹药入库到站岗执勤人员、携带武器都作了策划

和部署。二十六团驻孝泉场外延祚寺，另有一个团驻延祚寺左侧的姜公庙和延祚寺右侧文武庙，又一个团驻陕西会馆和川主庙，对二十六团形成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县委立即决定把起义时间赶在敌人去成都参加巷战之前，定于1932年10月25日。并派王敬德、张绍武潜回部队，与赵秉贤等紧急磋商，部署战斗。针对敌人已将武器集中专人看管的情况，决定首先夺取枪支，然后肃反，割电线，断交通，还商议了联络暗号。商议妥当后，党支部利用黑夜在田坝里召开了一百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开会时被敌人的巡逻哨发现，军支决定提前一天起义。当起义的枪声打响时，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从总指挥到士兵都齐声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军阀！”“反对军阀战争！”口号声不绝。起义部队兵分两路，一支约四百余人，冲向营门，另一支约三百余人直奔延祚寺后院，越墙而出，接应从营门冲杀出来的同志。由于起义提前，仓促上阵，未顾上破坏通讯联络，以致起义不久，敌人很快调来数倍于我之敌，在营门前围得水泄不通，冲向营门的同志个个奋勇拼杀，冲出重围，与越墙而出的同志会合后，取道绵竹齐天乡向安县山区进军。

由于起义提前行动，有一个营未来得及通知，该营共产党员、行动组长任卓章闻枪声起，便带领部队向营房外冲，不幸中弹，身受重伤，仍高呼“同志们前进！前进！胜利属于我们！”直至倒在血泊中，光荣牺牲。

起义部队冲出重围后，取道齐天，经拱星到安县汉昌坝去沸水，连续数日不停顿地长途行军，忍饥挨饿，后有田頌尧的追兵，前有各处团防武装的阻截。起义军迂回战斗，解除了几处团防的武装后进入山区。由于人烟稀少，给养更加困难，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饥饿疲惫不堪。田頌尧从德阳、罗江、绵阳调来几路

追兵，起义部队便向沸水与太平连界的山区退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起义军在沸水庙被迫解散，起义归于失败。

(中共安县党史工委办公室、中共德阳市市中区党史
工委办公室提供，陈兴荣、周映壁、江放勋整理)

南部升保农民暴动

1932年11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南充中心县委和南部县委在南部县的升钟寺、保城一带组织领导了一次以农民为主体和手工业工人、国民党士兵参加的武装起义。

四川军阀田頌尧部二十九军驻防南部、阆中、盐亭、剑阁等二十余县，在防区内委官设卡，横征暴敛。驻防南部的旅长李炜如更是贪婪凶狠，强征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土地兼并现象尤为严重。

1928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南部县安坝乡人）化名王可，偕同南部籍的地下党员李载浦、马安华、王元修、李蜀俊和阆中籍的孙肇明、傅小苾等回到南部，组建了第一个党支部。同年夏，利用国民党南部县指导委员会成立之机，杨永盛、赵世忠、尹绍伊、罗星樵、陈安国和张宜和等相继被党派回南部，以县指导委员会委员或干事身份，从事党的工作。在城乡举办青年、妇女、农会等训练班；在三合、永定、谢河、元坝、黄金、流马和寒坡等区、乡组建了农民协会，并在县城桅杆湾设立了县农协会的办事机构。秘密发展党团组织。为适应工作需要和党组织的不断发展，至1932年升钟寺起义前夕，全具有区委四个，支部二十七，党员二百五十多人。

1930年夏，地下党员张友明、赵子文、汪治国和张绵枯（均系南部县人）等，在遂宁因军运工作事泄回县。秋，张友明经陈任民推荐，出任县公安局长。10月，中共南充中心县委根据当时川

北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确定开展三项重点工作，即南部县的农民运动；南充缫丝厂的工人运动；广安县的士兵运动。根据这一精神，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先后派了一批党的干部来南部，在当时农运基础较好的升钟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农协会，建立革命武装。中共南部县委也相继派张汉儒、赵子文、王群英、王子君等，到升钟寺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1931年初，组建了升钟寺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由张汉儒任书记。

1931年春，中共南部县委，由杜维新任书记，李汛山为巡视员。4月，县公安局长张友明因共产党嫌疑被撤职后，亦被派回家乡升钟寺开展党的工作。秋，中共升钟区委建立，由张友明任书记，辖七个农村支部，三个党小组和五个完小支部。

1932年春，区委在升钟地区秘密组建了游击大队，由张友明任大队长，覃文任政委。下属四个中队，有队员六百多人。游击大队制作了“川北工农红军”的旗帜，刻制了苏维埃印章。11月7日，升钟区农民协会印发了《农民协会纲领》和《农民协会章程》，进一步开展农运工作。

1932年11月中旬，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专门开会研究部署升钟寺起义。会议认为，升钟地区地处南、阆、剑、盐、梓五县交界地，山高地险，林密沟深，开展游击战争的地理条件很好；广大农民群众苦大仇深，群众基础好；党团组织建立，有党、团员一百四十余人，农会会员一万二千多人。这些都是武装起义的重要条件。会议暂定在农历冬月底举行起义。由中心县委军委书记罗敏（罗南辉）和省委巡视员覃文去升钟寺负责军事指挥，中心县委书记何芾联络南部、阆中一带革命力量，负责策应支援。

1932年初冬，起义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1月8日，被敌收买的游击队员陈顺仙向敌告密。升钟区区长赵昌荣，团总何义普获

悉升钟暴动的消息后，即派人呈文报县政府，请求迅即派兵镇压。11月15日，县政府派县保安团的一个分队到达升钟，并委任皂角乡大恶霸、民团团总宋西元为“剿匪司令”。11月20日，南部县政府又增派县保安团的一个中队到达升钟，妄图借团总何义普11月25日娶儿媳的机会，将“共党分子”邀来作客，一网打尽。敌人的这一阴谋被地下党员杜彦波获悉。根据敌情变化的紧急情况，覃文、罗敏、张友明等领导人于11月21日晚，在铁罗寺召开了有区农会和游击队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计就计，提前于11月25日举行武装起义。会后，覃文、张友明和蒲刚等共同拟定了联络信号及统一安排武器等准备工作。

1932年11月23日晚8点，游击大队副大队长任足才在皂角乡铁罗寺集中了二百多名游击队员，编成三个中队，趁天黑下山，首先捕杀了叛徒陈顺仙。随后带领三个中队隐蔽在与升钟区公所隔河相对的八庙场河边待命。覃文、张友明、罗敏、李汛山和汪治国等领导人，也进住在升钟场靠河边的游击队员蒲云川家，召集游击队负责人研究了起义注意事项：规定鸣枪为号；口令是“工商——整干”；脱掉左膀衣袖为标记等。这天晚上，升钟场一片漆黑，区公所内却灯火辉煌，人声喧哗。何义普、何光荣正大摆酒席，由区民团分队长杜彦波巡岗查哨。晚上十点，任足才带领游击队员任宗尧、冯成义、任国隆和任春华，利用杜彦波值班之机，潜入区公所后院。通过后门值岗民团士兵李秋阳（游击队员），运出步枪十余支。随后，冯成义和任国隆又潜入区公所，控制了正在打麻将的区民团团总伏蕴山等。

午夜，汪治国摸至区公所门口，将敌哨兵击毙。枪声一响，集结在升钟场和附近的游击队员呼喊声涌入区公所，占了民团的军械库，缴获了全部枪支弹药。那些酒醉饭饱的民团士兵，突然听到

枪声和喊杀声，想抵抗的已来不及，想逃走的又被游击队员持枪拦截，只得举手被擒。民团团长江蕴山、大队长杜廷直、豪绅敬道周以及负隅顽抗的十多个民团士兵被当场击毙。区长赵昌荣、民团营长何明山、团总何义普等乘混乱之际逃走。经过短时间的战斗，迅速地击溃敌人的全部武装。参加起义的群众情绪激动，口号声、欢呼声通宵达旦。覃文、张友明和李汛山迅即集中起义队伍宣布了几条纪律：一不准报私仇乱杀人，要把目标放在抓恶霸上；二不准烧房子；三不准随便损坏财物。罗敏负责清理了缴获的全部武器弹药和物资。对当夜的起义情况，升钟乡豪绅在给田頌尧的状辞中写到：“10月28日夜（即阳历11月25日），突有数百人手持刀棒火枪，飞奔区公所，民团枪支尽行掠走，吼杀之声四野皆闻，民以为滥军，未敢回视而跑至山林……”。剑阁县县长吴龙骧给四川省政府的请折也称：“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当省战暴发赤匪乘机侵入通南巴之际，南部匪党张友明啸聚数百余人，于11月25日在南部属第九区升钟乡地方揭红军旗帜，该匪首自称川西北红军总司令，张贴布告标语，焚毁区公所……提去团枪，戕害教练长意图响应徐、旷诸匪……”。上述状辞从反面反映了起义的情景。

11月26日拂晓，起义队伍在铁罗寺进行整编，将游击大队改编成“川北工农红军”，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中队，一个特务队，一个补充队。每个中队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十五人。中队配有宣传员、侦察员、炊事员三人，共计二百余人。总指挥部设在铁罗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其分工情况是：总指挥张友明，政治委员覃文，副总指挥罗敏，李汛山负责党群工作，罗守朴负责财经工作。

部队整编结束后，在铁罗寺附近的蒙垭庙召开群众大会，公

开审判，枪决了密报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恶霸地主杜彦凯。11月28日，剑阁县金仙场的近三百名农会会员响应起义，前来升钟寺参加了“川北工农红军”。

起义后，“川北工农红军”配合起义地区的一千多名游击队员和农会会员打土豪，破仓分粮。还公开处决了一些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升钟寺豪绅赵一阳在给田頌尧的状辞里写到：“考其原理，实由匪首张友明、分队长杜彦波、任足才等暗吹共产主义，日渐聚集，演成暴动行为，于11月30日夜（即阳历11月27日）蜂拥来家，枪械刀棒四面攻打，喊杀之声如同雷炸。将民家所贮改良洋厂丝十二担，约值洋八千余元，悉数搜尽。苦民所有一切文约及胞弟赵俊臣充任团正各项帐据概被火焚。”反映了“川北工农红军”打土豪，破仓分粮的壮举。

升钟寺起义后，二十九军军长田頌尧闻讯，急电令驻阆中部属罗迺琼师的两个营和阆中县保安团从阆中方向扑来；电令盐亭县、剑阁县保安团和江油、剑阁边区联团大队前往剑阁县金仙场一带堵截。11月29日，南部县流马区的团队在观音乡的石板庙、小皂角埡与罗敏、任风舞率领的起义军战士接火。起义军奋力冲击，缴获了一些武器，抓住几个俘虏之后，撤至升钟桥坝凭河据守。11月30日，店埡乡民团从保城直攻升钟，扼守在道埡口的郭海峰和宋江元率领的起义军战士，凭着少量步枪和大量明火枪，以及自制的“牛耳大炮”，据险固守，将敌击退。同日，由阆中来的张、廖二营敌军，经老土地、罗寨埡直插皂角场，进逼铁罗寺。12月1日，覃文、张友明率领起义军战士与敌军交战，坚守在大小山头的起义军战士居高临下，用滚木擂石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虽然起义军人数众多，作战勇敢，但装备低劣，枪弹缺乏，敌军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进行围剿。起义军先后在

兰靛埡、泥砌山、黑牛包经过了几场恶战，伤亡减员较大。仅黑牛包一战，就壮烈牺牲四十多人。因敌我力量悬殊，总指挥部决定率领队伍向双凤场转移。李汛山率领部分游击队员在转移中被敌冲散，撤至升钟、保城交界处，安排游击队员就地疏散隐蔽后，回到中共南充中心县委汇报升钟寺起义情况。

12月4日，敌张、廖二营和剑阁县团防队伍直压双凤场，妄图全歼起义军。在这危急关头，总指挥部在双凤乡米家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散转移，保存实力。接着，覃文组织全体战士宣誓，不背叛组织，不出卖同志，坚定革命信心。宣誓后，全体指战员分别向赵家沟、双柏埡和向家坝方向陆续转移隐蔽。覃文和罗敏化装成商人，经阆中回四川省委。张友明转移到驻防于南江县桃园寺的任伟章旅做军运工作。

升钟寺起义受挫后，南部、剑阁、阆中等县又先后派出保安团和民团到升钟地区进行“清乡”，杀害共产党员、农会干部、游击队员和工农群众二百八十二人，烧毁民房一千一百二十九间。

(中共南部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蓬溪东乡民众自救团

1932年10月，四川军阀混战重新爆发，蓬溪过境部队如蚁，顿成兵城一座。他们强索硬拉，奸淫估霸，致使四乡纷扰，全县惊恐，百姓受尽蹂躏。

驻防蓬溪的二十九军第一路司令部亦派出大批官兵到中、东两乡催粮逼款。军阀的残酷压榨和催款人员的贪婪横霸，激怒了东乡的各阶层群众。东乡民团负责人蒋渭溪、蒋御光、蒋辉伍等和各场民团负责人，不满军阀所为，各界群众，不堪忍受军阀的压迫、凌辱和淫威，准备把东乡各场民团组织起来，进行武力反抗。

就在这时，中共四川省委特工队队长蒋述法，受省军委侯伯英派遣，与江银合、屈双全，赴南充与中心县委书记罗汉文接头后，肩负着“组织武装，发动游击战”的任务，回到东乡。中心县委把在遂宁边防军里做军运的地下党员陈远荣、肖啸虎也调来东乡协助蒋工作。他们一面积极展开宣传，发动群众；一面对各民团负责人和一些匪首做工作，晓以大义，提高对反军阀斗争的认识，为控制民团，并逐步把它改造成为一支进步的、革命的武装作准备。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入川，蒋述法等闻讯后，深受鼓舞。为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红军入川，他们邀约已建立了联系的绿林武装首领何致远，共同商定以“反抗军阀苛捐杂税”为口号，把反对军阀的东乡各场民团联合起来，把林钜卿等的绿林武

裹数百人集中起来，攻打蓬溪县城，然后打出红旗，从西充、南部到通、南、巴投奔红军。

为此，蒋述法、何致远于12月下旬，策动东乡民团负责人蒋渭溪、蒋御光、梁辉五出面，召集各场民团负责人和一些绿林首领在集凤龙岭寨开会，共同制定了“反抗军阀压榨，攻打蓬溪县城”的武装暴动计划。会上，决定成立“东乡民众自救团”，由蒋渭溪任总指挥，梁辉五任副总指挥，蒋御光任参谋长，蒋叶南负责政治宣传工作。蒋述法等地下党员则在其后运筹指挥。

会后，东乡民众自救团指挥部（公开名称为“东乡团练联合处”）在蓬南场成立，积极进行暴动准备工作，蒋御光、蒋叶南共同起草了《东乡民众自救团宣言》，声讨军阀田頌尧部李炜如旅剥削压榨蓬溪人民的罪行，号召各阶层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军阀的黑暗统治。《宣言》油印后广为散发，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蒋渭溪、梁辉五则往返于各场，整编团队，训练战术，进行思想动员。蒋述法、何致远一边召集绿林队伍，一边派人到县城侦察驻军人数、装备情况。自救团经过整编后，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独立营。一大队长欧耀光，二大队长任子山，三大队长梁仁山，四大队长李惠安，独立营长何致远。每大队分三个中队，每中队分三个小队，每小队三十余人。共有战士约一千五六百人。到1933年1月初，武装暴动准备就绪。

1933年1月7日（农历12月12日），当二十九军第一路司令部（李炜如部）为索取进攻红军之军需，派江忠国到东乡提取预征到民国四十九年的粮款尾欠四万余元时，民众自救团即将其扣押，粮款没收，然后速调早已整装待发的各大队和独立营在遂蓬边界的河沙场集中，以免被敌人发现。黄昏时，队伍赶到离蓬溪城三十里的鸣凤场待命。夜幕降临，自救团的一千多名战士向

县城急驰。

四更时，自救团打先锋的三大队消灭了母地垭的岗哨，在高家垭同敌人接火激战；何致远独立营在打铁垭，四大队在高坟嘴亦先后同敌军交火。由于敌军皆多新兵，素质差，枪械劣，在一千多名自救团战士的打击下，节节败退。天明时，三大队已拿下高家垭，追至县城南门外，打铁垭、高坟嘴也相继攻克，直逼县城。二十九军第一路参谋长兼县长唐宜耀见攻城队伍来势凶猛，县城危在旦夕，慌忙向来县提烟款的第三师所属的两个手枪排求援。排长石增伦带领部下登上南门两侧山头，集中火力向攻南门的起义战士猛射，并急吹进军号，在山上摇旗呐喊，虚张声势。此时，民众自救团冲在最前头的一个中队长张德修（又名张志国），率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南门外发起几次冲锋，均未得手，在城墙下中弹牺牲，另有几个战士负伤。敌人的火力突然增强，使打后援的一、二大队不敢上前，民众自救团的指挥者们亦疑惑中计，在没有摸清敌人虚实的情况下就下令全部撤退了。

8日凌晨，攻城队伍经鸣凤退至任隆场，于要道处置重兵把守。晚上，自救团在福音堂召开干部大会，除中队长以上干部十余人参加外，还邀请了进步知识分子王叙五、柏勋、任兴成等参加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下步行动。讨论中，有的人主张解散队伍，但大多数人要坚持长期斗争，于是，会议决定：一、加强政治宣传工作，由蒋御光、蒋叶南、王叙五、柏勋负责对战士和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二、举行隆重的总指挥就职典礼，大造民众自救团决心与军阀斗争到底的舆论，争取群众支持；三、将扣留的二十军第一路所征的四万多元粮款全部作为自救团经费。

9日，民众自救团在任隆禹王宫召开军民大会，举行总指挥就职典礼，蒋渭溪、蒋御光、王叙五、柏勋等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东乡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军阀压迫剥削。会后，几天之内，携带各种武器报名参加民众自救团者达千人。

军阀田頌尧得知民众自救团武装攻打蓬溪县城的情报，立即派警卫第三旅旅长蔡海珊率一个团的队伍来县协防。在县城、鸣凤场、寒坡岭三处派重兵把守，民众自救团亦调集队伍与之对峙。

2月初，民众自救团扣留二十九军的四万多元粮款即将用完，经济发生了严重危机，且内部成分复杂，逐渐发生分化，战士纷纷离去。王叙五、蒋叶南、柏勋、任兴成等进步知识分子总结民众自救团的经验教训，深感发动农民的重要性，陆续离开部队到农村去开展工作。自救团的上层人物在自救团面临瓦解的情况下，各为私利谋算，余部由何致远带领，投靠川康边防军李家钰部，被李收编为一个独立团，何致远任团长，受边防军陈绍棠独立旅节制。

暴动失败后，蒋述法派人与南充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当时，中心县委为响应红军进川，在南充西区发动游击战，急需加强骨干力量。3月，即派蒋到西区，参与领导游击战。蒋带领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屈双全、江银合、尹少武等十余人和八支手枪到西区，继续战斗。

（中共蓬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席拥政整理）

三台柳池农民暴动

1932年冬，中共四川省委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先后派出李绍华、黄天元、周司合（大足县人）到三台加强工作，组织农运，筹建武装，计划在北区开展游击活动。

北区在李绍华等的指导下，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抗粮、抗捐、抗债的斗争，创造条件开辟游击区。到年底，北区党团和外围组织发展到柳池、三合、会龙、苏河、刘营等乡，当时号称为“三台的赤区”。

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连续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潼川中心县委响应四川省委“拥护红军入川”的号召，于12月31日发布了《为工农红军占领通南巴告农民书》，号召工农、士兵、贫民、学生起来拥护红军，参加红军，开展抗粮、抗捐、抗债斗争。1933年1月，北区区委遵照上级指示，为了配合川陕苏区的军事行动，分散敌人的兵力，计划于春荒时节在柳池、黄泥井一带组织农民暴动，先解除附近几个乡的团丁武装，割断电话线路，实行破仓分粮，然后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向盐亭方向发展。

1933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柳池乡团总刘公辅趁这天逢场，用高压手段逼迫农民交纳预征粮款，因交不出粮款当场遭到扣押的群众有三十多人，遂激起群众反抗，事情闹得很凶。李绍华、黄天元、周司合以及北区负责人张天汉等乘机鼓动群众，并组织张家湾、胡家沟等处的一大批农民，于傍晚时把团

总刘公辅包围在米市街茶馆内。刘不得不让步，将被扣押在团甲公所农民全部释放，粮款的事也不敢说了，斗争取得了胜利。

刘被哄后，并不甘心，遂与区长刘雨三商计，连夜赶到三台向县府密报：柳池有共产党组织“暴乱”，要求派兵镇压。

1月25日，县府突然出动保安团队近百人，身背快枪马刀，分两路向柳池进发，当天停宿在常乐寺庙内。1月26日拂晓，两路人马分别包围了活动据点张家湾、石缸湾。北区区委张天汉、王光林、胡继瑗和省委巡视员李绍华、特派员黄天元同时被捕，当场搜查出枪枝弹药、书籍文件、标语传单及油印机等物，因受牵涉一起被捕的还有王吕恭、张开涛等六人。

在狱中敌人反复审讯，用尽各种刑法，均无口供。3月1日（农历2月6日）中午，张天汉、王光林、李绍华、黄天元四人在西外牛头山下壮烈牺牲。5月间，胡继瑗在南桥上被枪杀后，遗体被抛入河中。

柳池暴动的另一个据点在苏河、黄泥井一带，那里已经有规模较大的农协组织，还争取了云同保安队和转龙桥蒋保长三十支枪参加，准备同柳池一起行动。后因试枪被人密报当地团总，举事未成。2月7日（逢场），当地农暴负责人之一郭良武在苏河场被捕，经多方设法营救无效，9月4日，郭良武被害于西外牛头山下。柳池暴动遂告失败。

（中共三台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苍溪苟英寨农民暴动

1930年春，中共地下党员张仁权、何芑等回到家乡——三川新观，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雍河的土岭坪和新观的陈家村建立起农会，并在农会中发展党员，建立起土岭坪、陈家沟两个党支部。这年2月13日，党组织召集两处农会代表在苟英寨开会，把两地农民组织联合起来。从此，苟英寨就成为农会和后来游击队的活动基地。

1930年2月13日，正是农历正月15日，陈家沟、土岭坪的农协会会员代表以走亲戚、拜新年为掩护，纷纷向隐匿在密林深处的苟英寨集中，到会代表三十多人。何芑主持会议，张仁权作了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经过酝酿，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会议号召大力发展农会组织。为了隐蔽起见，采用“同心会”、“坨子会”、“拜把”甚至“宗族会”等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展活动。会议开得很成功，代表们情绪激昂。有些代表磨拳擦掌，急不可待；有的代表还随身带上梭镖、大刀等武器，大有立即冲杀之势。散会了，代表们还很兴奋。有几个代表把砌寨的大石条从山上掀下，震得寨下巨响如雷。好似鸣放着战斗前的信号大炮。

不料，这一巨响，震惊了周围的群众和保甲。团正李尊五向苍溪县政府和阆中驻军罗迺琼的师部。密告张仁权、何芑。罗迺琼派军警逮捕他们。南充中心县委及时将张仁权、何芑转移，另派王灵山去负责。

1931年春，为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陈家沟、土岭坪的党支部也停止了横线联系。在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的时候，地下党和农会得到了三川团总马南卿的掩护。马南卿受其子马老四（后参加红军）的影响，同情革命。党支部成员张宗世、张德益、张宗海都得到他的保护。陈家沟支部书记张宗华被敌人追捕，站不住脚，后给马南卿当了侍卫，便没人敢再追问了。

1932年冬，地下党三台中心县委又派少共书记陈子谦来苟英寨担任领导职务，这年冬天建立了三川区委。值红四方面军已入川，对这里的农民斗争鼓舞很大。中共四川省委秘密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拥护红军入川的特别通知》中指出：“党在此时，特别号召党部及全体同志起来，积极地领导群众斗争……发动游击战争，组织革命兵变，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入川……”党组织及时作出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部署，并提出了：

（一）发展组织，充实力量；（二）大搞宣传，发动群众；（三）打击土豪劣绅，夺取武器。他们经过周密的策划，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包围了大地主祖元直的庄园，逼迫他交出五支钢枪和一些刀矛弹药。他们又通过马南卿了解到陈家沟天主教神父和地主杨老三有枪，用同样办法袭击教堂，也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苟英寨农民的第一次武装行动就取得了胜利，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1933年初，震惊川北的升保起义失败，参加起义的部份领导人如于岱生、陈洪钧、何芑等到了新观，领导力量更强了。2月，正式成立有七十多人的游击队，陈洪钧任指导员，陈子谦任队长。于岱生则活动于三川寺、三堆石、阆中老观场等地，并把这些地区的农民武装串联起来。

农民的第一次武装行动被告到县政府。不久，县府派来三名

恶差办案捕人，点名要抓杨良知、杨良彦、何知春。没捉到这些人，就把排首李桃春（支持革命的）和杨良泽的妻子抓住，押解到县。游击队得知后，决定拦截营救。下午三点钟左右，当押过土门堰高朝树屋侧坟陵时，游击队一拥而上，先将李桃春等二人解开，然后将三个恶差押到旱山梁就地处决。几天以后，县府又派出武装抓捕“异党”，游击队闻讯后，将队伍埋伏于土岭坪至新观的要道隘口上。他们充分利用地形，进行突然袭击，当场毙敌五人，缴获步枪五支，其余兵丁抱头鼠窜，逃回县城。

游击队的两次行动，使当地一些豪绅十分惊恐，便与团防勾结起来，准备更加猖狂地向游击队发起进攻。这时游击队面临着险恶的形势。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地下党和游击队决定将分散的小块的兵力都集中起来，举行公开暴动。连夜赶制红旗，进行各项准备。为了保存实力，避实就虚，游击队首先捉了团总、保长的两名狗腿子，把这两个家伙带到事先安排好的堰口上。这里插上了红旗，有六名队员拿着大刀长矛，守卫十分威严。要他们回去把团总抓来，否则就砍头。然后把他们放走。红军入川的消息本来已使敌人闻风丧胆，狗腿子再一回去报信，一些地主豪绅更是坐立不安，当夜就带上团防武装、金银财宝，绕道往苍溪、顺庆（南充）、重庆等地。游击队得到团防“内线”的报告，立即派队伍追击，当场击毙了一个团总和一伙帮凶，并缴获了七条枪支和一些弹药。1933年4月4日，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会上宣布游击队的建立，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参加工农游击队，扩大人民武装。会后，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和其他物资分给贫苦农民。广大劳动人民看到革命与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参加游击队的人迅速增加，不到五天时间，队伍扩大到五百余人。游击队已由苟英寨、陈家沟的小规模活动

发展到新观、雍河和龙王场的大部分地区。以三溪口一线为界与敌形成对峙局面。在这个基础上，游击队整编了队伍，成立了一个一百五十多人的基干游击队，其余的编为赤卫军，共同保卫革命根据地。

1933年4月，县团防三大队和民团，妄想夺取苟英寨，对苟英寨实行钳形包围袭击。他们从龙王场申家沟到金凤山沿途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游击队乘机化装成新观方面的团防，兵分两路：一路埋伏于北门下树林内，一路从东门直进到三大队面前。游击队用步枪猛烈射击，敌人知上当时，已措手不及，从北门逃走，恰巧遇上埋伏，两面夹攻，激战两个小时，打死敌三十多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挥师南下，游击队派陈子谦去通江和红军联系。不久，陈子谦来信，叫游击队整理好队伍，马上去旺苍庙儿湾红七十三师（木门会议后扩编为三十一军）师部领武器。这一消息使大家无比振奋，立即整装待发。队伍从白云庵出发，经过雍河、傅家槽、庙垭儿下山头到广元的张化沟，与红军的搜索队接上头，便随红军到了庙儿湾。经过七天的培训，学习了红军的宗旨、纪律和军事知识。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游击队仍回苟英寨战斗。临走时红军为他们发了武器。在返回的途中，从庙垭口下山，在傅家槽遇上了国民党团正汪淮泗所带的团防三十余人，当即给了他个迎头痛击，打得敌人四处逃窜，缴获了一批火枪、刀矛和物资，胜利地返回苟英寨。

1933年6月，红军进入苍溪境内的石马乡，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于1934年9月22日攻克苍溪县城，全县获解放。这以后，这支队伍还攻打玄坛庙，袭击龙王场，血溅剑门关，打过不少的胜仗，屡立战功，受到上级的多次表彰。以后，游击队在广

元县九皇宫加入了红四方面军，扩编成为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七七一团三营特务连，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

(中共苍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盐亭保安大队兵变

盐亭，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地处山区，素称苦寒之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盐亭属田頌尧二十九军的防区。那时，军阀与地主豪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摆脱痛苦的生活。

二十年代，盐亭去上海、成都等地读书和工作，以后加入中共党、团组织的一些教师、学生、军人，回县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5月，建立起中共盐亭特支。1933年秋，建立了中共盐亭县委。此后，龙潭子建立了党的区委，玉龙、麻秧、巨龙、毛公等地建立了党的支部，共有党员近百人。党领导的各种外围组织，相继涌现。在龙潭地区和玉龙、麻秧、巨龙、毛公、章帮等地，都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巴中2月，解放了南江。通南巴是二十九军田頌尧的防区，因此，二十九军就成为红四方面军主要消灭的对象。省委给三台中心县委（辖三台、射洪、盐亭、中江）的任务是：在二十九军防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抗粮、抗债，组织兵变，实行游击战争，支援苏区，支援红军。

为了支援通南巴苏区红军的斗争，三台中心县委即派胡曼石到盐亭，组织盐亭县保安大队中的刘仰高、虞永清实行兵变暴动。1928年，刘仰高在陈书农部当营长时加入共产党。1932年12月，由四川省委派回盐亭从事地下工作，侦察田頌尧驻军情报。刘回县不久，被推举为县保安大队长。虞永清是盐亭地下党派进

县委保安大队的党员。兵变是在省委指示下发动，计划兵变成功后，成立“川北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并组织前敌委员会，汪克明（又名李文俊，三台中心县委书记）为前委书记，刘仰高为指挥员。正在拟定兵变行动方案的前一日，由南部县方向突然来了敌一团人，因疑敌人发觉，而又众寡悬殊，兵变未遂。

（中共盐亭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南充西区农民暴动

1928年初，共产党员苏俊到南充西区七宝寺小学任教务主任，在学校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1929年建立了七宝寺党支部。并据此向四乡发展，至1932年夏，西区的七宝寺小学、金宝石马垭、龙泉安乐园、中和石海院和三元乡等十个乡都建立了党支部及党的外围组织，并发展到蓬溪和西充县境内。整个西区已有党团员二百多人，赤色群众几千人。西区区委应时成立，于泽南（于江震）任区委书记。

西区区委成立后，省委特派员覃文来南充中心县委检查工作，传达省委关于大力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创造川东北苏区的任务”的指示。由于覃文曾任过南充中心县委书记，他对西区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亲自到金宝乡召开西区党员骨干会议，传达省委指示，要求作好1933年红五月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

在这段时间，西区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金宝石马垭、龙泉安乐园、中和石海院发展党员较多。党员们经常在夜间外出贴标语、散传单，利用一切机会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

1933年初，红军解放通、南、巴之后，省委指示南充中心县委：在西区建立农民武装，迎接红军到南充。1933年2月12日，中共南充中心县委和团中心县委在南充西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升钟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定利用西区有利的地形和党在那里打下的基础，在西区建立分散、隐蔽的游击队，并决定由西区金宝乡石马垭、龙泉乡安乐园、中和乡石海院三个支部抽

人组成游击队骨干，其余支部到有具体任务时，再抽一部分骨干参加。这样可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保密。游击队长由何宣昭担任，罗汉文、张宏道、张子文也直接到西区参加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力量，中心县委还调在二十九军驻西充陈宗进旅搞兵运工作的杨德元到西区帮助指挥。为了与西区游击战争相呼应，中心县委指示罗洪恩加紧策动南充驻军边防军独立营和中江驻军同时起义。派吕樊山到升钟寺地区清理组织，建立游击队。由张子文负责办游击战知识训练班。遵照省委指示，覃文、罗汉文分别辞去省委特派员、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由罗天照接任南充中心县委书记。

杨德元到西区不久，金宝乡的袍哥何富章探知其弟何树清（党的交通员）的底细，趁机敲诈要钱，否则就向敌人报告。党派杨德元在猪市坡上，用手枪将何富章击毙。不久，党组织叫何兴碧组织袍哥“大同社”，他利用“大同社”打了金宝场作恶多端的伪乡长任力阶。这两件事却成了敌人第一次对西区进行“清乡”的导火线。

为了建立西区根据地，党组织要何注江竞选龙泉乡乡长。在党组织的部署下，何注江竞选成功。被何注江逐个排除七宝寺小学的青年党党徒，便凑在一起想方设法给何注江罗织“罪名”告状。杨森一接到状子，就派第六混成旅的张玉辉营于1933年2月21日，到西区“清乡”，捉拿何注江。到中和场石匠岩时，抓到西区区委秘书王大树、共青团员王大周，将他们押到金宝场进行吊打审问。他们不承认写过标语和参加了共产党。第二天一早，张玉辉亲自押着王大树、王大周包围七宝寺小学。七宝寺支部负责人任逐非早已布置学生将凡能引起敌人怀疑的书、本子、歌单等收藏起来。张玉辉在校折腾了一阵子，毫无所获，只好带着匪军押

着王大树、王大周在西区各乡游了一转，作为他们“清乡”的“功绩”，便回城了。为了防备游击队，张玉辉还命令各乡在大路旁或垭口上搭哨棚，每个哨棚叫团首派人看守。盘问夜间来往行人。这样，给游击队夜间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

1933年3月下旬，罗汉文、张子文、何宣昭等开会决定，要求游击队在一夜间将敌人的哨棚全部烧毁。当晚，金宝乡石马垭支部、安乐院支部均派出游击队员行动，连夜拔掉十多处哨棚，缴获团刀一百多把，把哨棚全部烧毁。

西区游击队火烧哨棚后，1933年4月初，杨森得到报告，又派张玉辉带领一营人马再次到西区“清乡”。张玉辉在金宝、龙泉、中和等地查不出谁是游击队，只好把七宝寺小学校长何瑶阶捉去交差。后何被保释出狱。

1933年4月初，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罗汉文等，在金宝乡石马垭开会，决定夺取大悲寺公安分队的枪。大悲寺古庙驻有莲池乡的公安分队，昼夜监视来往行人。罗汉文派杨德元到蓬溪调原省委特工队的蒋述法等来西区协助游击队。4月30日晨，游击队派何正典到大悲寺探听虚实，从和尚口中了解到这个公安分队共三十二人，有长枪三十支，短枪二支，还安有电话机。并了解到当天晚上他们要到莲池看戏。于是游击队决定晚上动手。天黑时，金宝乡石马垭支部的负责人赵吉州集中了党员赵全英等及部分赤色群众，并挑选出一批青壮年出动，留下一些人在金宝通往龙泉的路上执勤。不久，何正典、何家贵、何宣昭等几路人会齐后，将三十一人分为两组：何宣昭带领蒋述法、何正典等十四人从前门进庙，提取枪支弹药；另一组由何正昭带领杨德元、何德义等十七人将庙子包围。游击队包抄大悲寺时，公安分队已看完戏回来。何宣昭首先夺下庙前哨兵的枪，何正典带领大家直扑公安

分队的住房，将兵士镇慑住。游击队夺得二十九支步枪和所有的子弹袋及几箱子弹，迅速撤退。何宣昭又决定连夜去收拾西区大地主何坤举。何坤举被反动政府安插在七宝寺小学当庶务，是监视我地下党组织活动的钉子。当游击队冲进他家时，他正在床上睡觉。游击队把搜出的两匣子契约全部烧掉，绑走了何坤举，以后将他杀死于蓬溪黄泥。

不久，杨森派营长文济川带领队伍再到西区进行“围剿”。敌人包围了安乐园黄桷树下的院子，妄图把安乐园支部主要负责人一网打尽。敌人挨家挨户搜查了半天，才发觉包围错了。敌人在安乐园、龙泉、金宝等地找不到游击队的线索，最后，只好将一个小学教师何淑修抓进城交差。

1933年5月底的一天深夜，十多名游击队员冲入青年党徒、西区督学袁国仕家，将酩酊大醉的袁国仕砍死在床上。在他身上贴上红军宣判处决袁国仕的十大罪状的布告后撤走。当晚西区各乡都贴出了红军宣判袁国仕死刑的布告，并警告劣绅恶霸们必须立即停止作恶，改邪归正。

杨森得到西区游击队杀死袁国仕的情况后，感到如不进行大清剿，势必使通、南、巴之势在西区重演。因此，决定先派人去侦察，再派大部队去清剿。两天后，杨森派出一个排长和一个士兵化装成“补锅匠”，在金宝场侦察。当晚即被游击队员捉住，并立即将他们处死。杨森见侦察人员一直无消息，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围剿”西区。1933年6月7日，杨森调第六混成旅刘治国的两个团，又抽回杨汉域的文济川营和田颂尧的蔡海州旅共同对西区进行大清剿。罗汉文、蒋述法得知消息后，连夜转移。敌张晏团，文济川营和南充保卫团直扑金宝、龙泉、中和。各乡团总也带领团丁协助四处搜捕地下党员及赤色群众。青年党徒更是卖命四处

引路捉人。敌人到石马垭首先逮捕了赵全英，并挨家挨户地捉人。将赵全英和一些革命群众关押在金宝川主宫学校。最后敌人将赵全英、赵海周、赵学周等党员和赵朝文等赤色群众五十一人押到城里，关在大南门监狱。

7月11日，文济川营包围了中和乡石海院等地，逮捕了正在开会的熊兴凯、何宣昭、何德义等西区负责人。龙泉乡乡长任锡玉带领团丁和驻守大悲寺的部队到安乐院“清乡”。

由于蟠龙王化民的叛变，两次带领反动军队和团丁到中和、金宝、龙泉、蟠龙抓捕了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数十人。还带着军警到蓬安县抓了龙华、张育才、吴文武等九人。

张宏道被捕叛变，杨森部队里的党组织首遭破坏。以后，岳池、蓬溪的党组织也被全部破坏。省委和红四方面军设在遂宁的联络站也被破坏。

苏俊在狱中，鼓励和教育群众坚持和敌人斗争。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1933年6月10日，敌人将苏俊、任逐非杀害。接着6月17日，赵全英、任怀德等十人又被杀在西桥河畔。29日，敌人又将在西区逮捕的地下党员及赤色群众十七人关进大南门监狱。中心县委书记罗天照被捕，遭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7月10日，被敌人大劈，壮烈牺牲。至此西区农民游击队遭到失败。

(中共南充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苍溪三堆石农民暴动

三堆石，现属苍溪县中土乡，位于嘉陵江的支流东河（又名宋江）东岸，因有元山子、罐儿山、马鞍山三山相连，形成一个每边相距约五华里的三角形而得名。

1931年1月中旬，中共阆南中心县委派在阆中联立中学加入共产党的苟旭元（住三堆石）、罗治平（住王座山）、黄维德（住黄家山）、李廷斌（住铜鼓山）、赵鲁平（住回龙场，现属阆中）等，陆续回到家乡，以教书或作生意等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运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在三堆石一带先后发展党员三十七人，建立了地下党中心支部。1933年春，早在阆中联立中学入党的孟晓川（又名孟知光），在潼川中学入党的陈子谦，以及在成都大学入党并参加“升保农民暴动”的陈洪钧，根据党的指示，先后来到三堆石。随即将三堆石中心支部扩建为区委，书记孟晓川，副书记赵鲁平、陈子谦，区委下面有三堆石、罐儿山、新庙梁、王座山、麻坪梁等五个支部，共有党员四十多人。

早在1932年1月，党组织开始发展第一批农会会员，有黄正禄等十几人。1932年下半年，三堆石周围的几个乡，二十四个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小组（每五人一组）。不久，正式成立了农会、女工农协会和少年先锋队，年底还组织了儿童团。党组织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抗丁抗税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1932年秋，根据省委和南充中心县委关于“拥护红军建

立川东北苏区”的指示，三堆石地下党决定组织游击队，逐步把群众武装起来。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三堆石地下党抓住红军入川的大好形势，在1933年的春节前，组织力量写了五百多幅标语，如“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工农红军”、“打倒军阀田頌尧”、“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在除夕之夜，贴到王渡场、朱彩垭、袁家岩等一带醒目的地方。1933年2月，游击队处决了大恶霸蔡老三的几个无恶不作的儿子，鼓舞了群众，打击了敌人。

游击队的兴起，使敌人惊恐万状，四处调兵遣将，企图将游击队扼杀在摇篮里。朱家灏驻扎着仲积三民团；狐狸山驻有李钊全民团；红山庙、鸡山梁驻有屈璧的团防；王渡镇、烟丰楼一带，也驻有民团和罗迺琼的部队；三堆石活动区，基本上处于敌人四面包围和白色恐怖之中。面对严重的形势，党组织讲究斗争艺术，成功地争取了王渡镇罗敬三民团的起义。

红四方面军入川，给游击队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1933年3月，三堆石地下党派罗茂修去南江长赤，与红军取得联系，罗返回苍溪后，党组织决定进行武装起义，并通过罗敬三民团筹办枪支、弹药。首先是李斌进城，以防范红军，需要补充枪支弹药的名义，搞回一批武器弹药，悄悄运送过河，藏在三堆石一户农会会员家里。其次是以民团中的进步团丁的私人关系以物易物，把换掉的弹药秘密传送过来。一次，利用王渡一家死了人归葬河东，把枪支弹药藏入棺材，上面放着死人，以送葬方式把枪支弹药送过河东。

1933年4月22日傍晚，赵鲁平、孟晓川在三堆石黄正禄家，举行游击队成立大会，全队共三十二人，队长车云海，副队长黄

维德，指导员孟晓川。接着他讲了当天晚上的行动方案，然后给大家发枪。当夜，游击队捉住寨子山恶霸苟大树、王座山反动甲长赵继正、罐儿山反动甲长黄正统，予以枪决，并将枪决布告用石头压在尸体上。公开打出了“红军三堆石游击队”的旗号，向群众宣传武装暴动的胜利。接着又组织了赤卫队，任务是保卫群众利益，维持社会秩序，站岗放哨，监视坏人，配合游击队行动。

不久，敌人命令一个营同民团一起对游击队发动“清剿”，罗敬三立即把消息传给游击队。次日上午，罗敬三民团伪装进攻的架势，从梨辕滩渡河“成功”，抢先到达王座山。赵鲁平带领一部分农会会员和老百姓，手持大刀、长矛，在煤油桶里燃鞭炮，刹时“枪声”大作，把民团包围起来，民团团丁纷纷举手缴枪。车云海则带领游击队在王渡新场埋伏，乘罗迺琼部队过河半渡之际，一齐开火，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掉转船头就跑。这次“战斗”，罗敬三民团共送来步枪百余支、子弹二千多发。罗敬三民团采取同样办法多次给游击队送来武器，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了二百多人。这时党组织决定，把游击队扩建为独立营，车云海为营长，黄维德、李廷斌为副营长。

1933年5月10日，三堆石召开数千人大会，热烈庆祝苍溪县第一个乡苏维埃政权的诞生。会场扎有彩色大牌坊，游击队、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扛着长枪，手执刀矛，列队入场。孟晓川宣布：“苏维埃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接着宣布了选出的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和六个村苏维埃的干部名单。

新政权的建立，更使敌人惊慌不安，连忙调来李家钰部的两个营和阆中田敖民团，同沿江河防敌军共约三千人，向三堆石游击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在这严峻的情况下，党组织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将三堆石车云海独立营、红山庙李斌独立营、

四蛮寨李开湘独立营扩充为独立团，由车云海任团长、黄维德、李斌任副团长，赵鲁平、孟晓川任政委和副政委，下设三个营。这时独立团共有一千二百多人，四百多条枪，还有套筒枪、鸟枪、土炮、大刀、长矛等武器。并动员赤卫队、农协会、女工农协会，在东河沿岸加紧岗哨，监视敌人，修筑工事，严加防范。两天以后，得到罗敬三民团送来敌人布署的情报，独立团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用口袋阵歼灭敌人主力。由黄维德、李斌率两个连埋伏于麻坪梁右翼；赵继胜、罗治平带两个连隐藏于冉家梁左侧，以断敌人之后路；中路由车云海带两个连诱敌深入；另两个连作预备队。敌人从麻溪滩、朱家滩分两路过河，企图对三堆石实行钳形包围。埋伏在麻坪梁、冉家梁的游击队放过敌人，将其退路截断，而车云海则按预订计划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两里以外的元山子。这时只听军号一响，埋伏的游击队、赤卫队以及农会会员和群众数千人如潮水般涌出，喊杀声震天动地，吓得敌人忙从原路撤回。待退到麻坪梁、冉家梁时，又遭我黄维德、赵继胜两部的夹攻，敌毛营长急呼罗敬三增援，罗假意增兵，途中竟被我“活捉”，吓得毛营长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东河西岸。这一仗是游击队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敌人被打死打伤，跳岩摔死，跳河淹死不计其数，被俘的就有二百多人。而罗敬三的人一个也没伤，尔后敌旅部还说罗敬三增援有功，给予嘉奖。

三堆石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与发展，为红军解放苍溪奠定了基础。红四方面军还远在旺苍的木门，南江的长赤，就派人来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交换了军事情报。1933年5月18日，红军一个团政委带着一个营的队伍来到三堆石，侦察地形，绘测地图，举行军事演习，驻扎了一天一夜。以后红军的军、师、团以

上领导干部曾多次来三堆石一带活动。6月下旬，红军进入苍溪境内，攻占了石马、高坡、文昌等地，月底解放了苍溪东河以东大部土地，并在文昌宫设立了县苏维埃。8月13日，红三十军派出一个主力营和三堆石独立团配合作战，一举攻占了罗迺琼坚固设防的大获城。8月18日，独立团又抽调部队配合红军一个团攻占了元坝场，歼敌一部，并在元坝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打击了罗迺琼的嚣张气焰。

三堆石游击队自创建到红军到达，经过大小一百多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并在战斗中发展和壮大起来。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发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11月上旬，独立团奉上级指示，整编为正规红军开赴万源前线作战。接到这个命令之后，三堆石苏维埃政府为独立团召开了欢送大会，广大群众抬着猪羊，打好草鞋，为自己的子弟兵送行，同时掀起了一个参加红军的热潮，争相参军的场面十分动人。独立团将全团一千二百多人的全部武器弹药留给了地方赤卫队。在车云海、赵继胜等带领下，于11月下旬开赴万源，正式编入红三十军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以后进军北上，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共苍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阆中老观农民暴动

老观是阆中东部边缘的一个小集镇。它东连仪陇、巴中，南通南部，西至苍溪的龙山、白庙，北邻旺苍、南江。

三十年代初，老观一带土地兼并的现象非常突出。由于大量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吞、占有，农民被迫承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军阀强加在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也十分繁重，盘踞在阆中的军阀罗迺琼（田頌尧部师长），十分贪残，在其防区内强行拉兵，任意派款，诸如枪弹捐、被服捐、团防捐、民卡费、慰劳费等，多如牛毛。在军阀、官僚、地主的残酷压榨下，为了求得生存，不少农民铤而走险，由捆打甲长、团总，发展到自发的联合起来同军阀、官吏、豪绅地主展开斗争。那时，老观贫苦农民中的“摇钱会”、“济贫会”、“贫农会”等，就是在同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形成的自发组织。

1929年阆中县就有了党组织。1930年春，彭蕴山等人在老观山区建立了党小组。党小组建立以后，决定每个共产党员分别在本乡本村宣传革命道理，做好对劳苦大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壮大党的队伍。1932年7月，党的负责人彭蕴山于老观庙召开了党的骨干分子会议，正式建立了老观党支部，由彭蕴山任支部书记，王仕福任组织干事，张兴邦任宣传干事，侯正方负责军运工作。

老观党支部建立后，立即作出准备暴动的初步计划，提出三项任务：1、多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做好贫苦农民的思想发动工

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动员更多的农民起来开展抗捐、抗税斗争；2、发展党的组织和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准备农民武装暴动；3、做好老观及附近民团的争取工作和各种自发组织的转化工作，从各方面掌握武装力量。这一时期，老观一带党员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也有了良好的基础。

早在1930年，侯正方就打入老观彭典初民团内担任队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在民团内通过交朋友、聊天，关心团丁家庭疾苦等方式，秘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扛枪为穷人才有出路的道理，启发团丁的觉悟，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掌握了他所领导下的这一部分民团武装。他多次去石滩、苍溪的王渡等地做民团的瓦解工作，争取了这两处的民团武装。这样，老观党组织便掌握了一支近百人的民团武装。

1932年7月，老观乡的各种群众组织，如“摇钱会”、“济贫会”等会员已发展到三四百人，共产党员王仕福、邓彦邦等深入基层，到会员中去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这些组织逐步接受了党的领导，后成为老观农民暴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建立和发展农民武装，迅速组建游击队。老观党支部指派王仕福、刘兴邦、刘朝金等党员，先后分别回到西山、老观毛庙子、龙蟠坪等地，组建了三支农民武装游击队。由张兴邦、杨万银、侯正孝分任游击大队长，下辖若干中队。不到四个月时间，游击队发展到三百六十多人。每个游击队员均自备大刀、长矛或铁棍、火枪等武器一件。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使老观的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和贫苦农民受到很大鼓舞。1933年2月，党组织派刘朝金扮成小商，绕道甘、陕去苏区，于通江毛浴镇找到了红军，向红

军汇报了准备暴动的情况，红四方面军立即从政治部派出共产党员、组织科长冯伦奎与刘朝金一道来到老观。

1933年6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的先遣部队，直抵苍溪县的白庙场，距老观场仅十余里。在此形势下，老观党支部认为，经过长期准备，举行农民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立即行动，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以胜利迎接红军的到来。于是老观地下党在小老君山两次召开党、团员和骨干分子会议，成立了老观农民暴动总指挥部，由彭蕴山任总指挥，侯正方，王仕福任副总指挥，冯伦奎任军事参谋，赵元荣负责宣传工作。又确定暴动时间在6月7日（阴历五月十五日），趁当地豪绅地主都在过端午节（当地民俗，阴历五月十五过大端阳）的时候，分头开始行动。制定了暴动路线，一路由侯正方掌握的民团负责牵制老观场上敌人的兵力，并负责联系王渡、石滩的民团按时赶到老观增援；二路由张兴邦带领老观游击队，从毛庙子出发，向老观场包围；三路由杨万银带领西山游击队，从小老君山一带出发，沿天回山、严家坟向老观场包围；四路由侯正孝带领龙蟠坪游击队，从龙蟠坪出发，经老君山脚下向老观场包围。各路游击队又从“济贫会”、“摇钱会”等组织中抽出一部分人员，随大队参加进攻老观场的战斗。为了抓捕四乡豪绅地主，派一部分共产党员，组织农会会员和贫苦老百姓分头行动，抄其老巢，开仓分粮。规定了暴动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老观场上的民团武装，区、乡政府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会后，参加暴动的成员立即行动起来，擦拭武器，赶造刀矛，斗志十分高昂。

正当临近暴动的时候，不料事机泄漏。即改变原定部署，提前于6月6日晚上举行暴动。1933年6月6日深夜，暴动队伍在总指挥统一指挥下，兵分三路，按时出击。这天夜里，侯正方将老

观民团岗哨换成我方掌握的团丁。各路游击队和石滩、王渡两处的民团包围老观场与民团相遇后激战，多数团丁当了俘虏，少数从混乱中逃上了老君山。接着，彭蕴山带领游击队员冲进区政府，团总彭典初、区办事处的张子厚、傅定九等头目漏网潜逃。其余敌军政人员，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擒。暴动队伍迅速摧毁了老观区、乡旧政权，烧毁了一切文书档案，击毙敌人四十余名，缴获枪支四十多支，子弹千余发，没收了土豪劣绅的财产，取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

暴动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派出部分代表于当天到达老观，军民共庆胜利。老观解放后，该地即划归川陕苏区长池县管辖，编为长池县第十一区。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这次暴动给予表扬，将亲笔题词“曙光在前”的锦旗一面，派人专程送到老观，给老观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老观农暴胜利后，党组织挑选了一百多人编成三个分队，分别由侯正贵、李仕美、赵银章担任分队长，由侯正方带队，参加了红军。余下的武装，组建了“川陕省游击队独立营”，就地维持社会治安，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1933年7月6日，田頌尧军罗迺琼部与地方民团屈碧部，共约二千余人，向老观场疯狂反扑，妄图一口吞掉新建立起来的老观苏区。当时党在老观场附近的武装力量，仅有四百多名赤卫队员，而且居住分散。武器多为长矛、梭标、大刀、斧头等，武器装备、作战训练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老观党组织负责人彭蕴山、红军代表冯伦奎一面组织群众沿着方山、朝白庙一带疏散，一面领导赤卫军与敌人巧妙地进行周旋。赤卫军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牵制敌人。7月12日，敌人倾巢出动，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齐向老观场上扑来，因敌我

力量悬殊，赤卫队主动撤离，老观场被敌人占领。7月13日凌晨，彭蕴山在察看阵地，部署战斗中不幸牺牲于罐山堡。7月15日，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从苍溪白庙派出一个连的兵力，配合赤卫军，向敌占区发起猛烈反击，敌一触即溃，老观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7月中、下旬，红军解放了苍溪，在文昌宫建立了中共川陕省苍溪县委和苍溪县苏维埃政府。老观场划为苍溪县管辖。

（中共阆中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上川南抗捐军

1933年6月26日，正是岷山地区邛崃境内的王店逢场。中午时分，突然出现了几十个带着各式武器的农民，封住了场头场尾。随着场外山包上传来的清脆枪声，他们立即亮出武器，边射击边冲进石品山茶馆。将正在茶馆内商议加紧派款收捐的郑店、王店团总及其两乡的甲长一齐缴械活捉。接着，带枪的农民打出了川南抗捐军的红旗，召集群众大会。并遍街贴上“打倒军阀政府”、“实行抗款抗捐”、“建设人民政权”等标语。抗捐军战士的手臂和各式武器都拴上了红布条。大会上，抗捐军总司令孟光远（共产党员）宣布“上川南抗捐军总司令部”成立，宣读了说明抗捐军宗旨的文告。旋即召开公审大会，当天将王店团总孟仲道、郑店团总郑佐清和孟朝阳、孟彩丰四人枪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支农民抗捐军，就是中共邛大地方组织，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拥护红军入川的特别通知》等指示精神，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

抗捐军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夹关镇。区团总李明发和驻夹关催捐逼款的王营长，集合军队与团丁向王店扑来，妄图将抗捐军一口吞下，结果大败；六县清乡司令兼县长陈少夔，于6月29日又率两百多名团丁来攻打，也被抗捐军打得狼狈逃窜。

1933年7月2日凌晨，抗捐军分兵五路按计划向夹关进攻，准备一举歼灭驻夹关催收捐款的军队和区团防队。不料敌已于半夜闻风逃遁。抗捐军占领夹关的当天下午，公审处决了土豪劣绅

吴连廷、吴华廷、杨五弟和从廖场捉回的提款委员。群众非常满意，纷纷要求参加抗捐军，部队发展到六百多人。

抗捐军占领夹关后，省委派上川南特支书记陈伯峦（余宏文，宜宾观音人）来总司令部任政治委员。

不几天，县长陈少夔又奉廿四军军长刘文辉之命，率各乡团队配合廿四军的一个营共一千多人来围攻夹关。经几小时激战，抗捐军被迫退到铁碑寺山上。总司令部在铁碑寺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兵突围到总岗山会师。在突围与进军途中，多次同廿四军的部队和各乡团防队激战。9月中旬，抗捐军第一路所属各队先攻下名山车岭镇，接着第二路的各队亦赶到车岭。在车岭镇期间，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处决催捐逼款之向委员和车岭团防队副队长陈××，击溃了前来车岭围剿的廿四军王守一部和团防队。同时，还在群众中宣传抗捐军即将在总岗山建立根据地，成立苏维埃的宗旨。

9月下旬，抗捐军由车岭镇开赴马鬃岭，旋即转移至总岗山。从车岭到总岗山这段时间内，除吸收群众参加抗捐军外，还将通过匪运工作而前来参加的蒲江、名山两股绿林队伍编为第三路。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同时，省委又派军事干部王治安（又名安旭之，绰号王痣胡子）前来加强领导。

总岗山，主峰在洪雅境内，东起新津永岗，西至雅安水口，北对蒙顶、莲花，南接夹江、青神，绵亘二百余里，这里地广人稀，给养困难，部队又要严格执行革命纪律，第二、三路部队，急于要求攻占名山、蒲江县城，总司令部未允。第一路第三大队长植尚荣产生动摇，投奔廿八军刘乃铸部讨官做。这时，边防军敖集生旅驻邛崃，调了六个连来围攻。抗捐军接连打退敌几次进攻后，决定撤回邛（崃）蒲（江）名（山）山丘地带开展游

击战争。撤离中，王德胡子因枪失火负伤，送回成都治疗，又值总司令孟光远又患重病（于1934年8月去世）。抗捐军撤回邛、蒲、名山丘地带后，军需给养除群众送些粮食外，全靠从敌手中夺取。由于敌放部的四面围剿，抗捐军辗转游击于名、蒲、邛、和大邑的王泗、灌口等山丘地带。抗捐军转战到王泗时，由于沿途的伤亡溃散，只剩廿九人。省委接报后指示，将枪弹暂藏，由陈伯峦将现有人员带到成都。

1934年1月中旬，陈伯峦奉上级指示，又将人带回王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34年4月5日，邛崃县委书记在大邑境内被捕（后叛变），陈伯峦将部队撤离王店一带，到邛、蒲、名三县交界处的石头乡境内开展工作。接着省委派曾海云（即张守恒，南溪人，省委委员）来邛担任邛大蒲县委书记。不久，省委又派省军委秘书朱建文（即侯伯英，盐亭人）来邛担任县委书记，曾海云改任省委驻抗捐军司令部特派员。

8月，陈伯峦、曾海云、朱建文等，根据省委指示，将抗捐军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设总司令部，陈伯峦任司令。下辖七个中队，一个别动队，共八百多人。分别活动于邛、大蒲、名、芦（山）等县境内。整编扩大后的红军游击队，其所需武器，主要是从敌手中夺取。冬，游击队在成雅道上巧夺了廿四军一汽车枪弹与其它物资。

整编部队的同时，省委又派来了闵一涵、何曼修、张洪顺（军医）等来游击队，建立了中共邛大游击特区区委，书记陈伯峦，组织闵一涵，宣传兼司令部秘书何曼修，军事委员由朱建文兼任。

部队整编和区委建立后，在石头乡的张老房子召开苏维埃成

立大会，由王甫成担任主席，肖张氏（党员）任妇女委员，李云程（党员）任文书委员。区苏维埃成立后，开展了划阶级，追缴契约、债卷，惩治顽固地主等活动，群众扬眉吐气。

部队经过整编更名后，士气大振，工作开展活跃。这对军阀、恶霸地主的统治是有力的打击。据当时报载：“在由邛州至雅州方向之马路右边一带，所占幅员纵长七十余里，横广六七十里。其中居民五千多户，已被匪赤化”。并谓游击队“组织严密，平时宣传抗捐抗租，号召诱惑。一遇军团，化整为零，分窜各地，故军团一无所获。”“星星之火，深恐为燎原之势。再演成通南巴之惨剧！”（《新新新闻》1934年12月）。从1934年秋起，邛、蒲两县的驻军与团队不断袭击游击区。秋，曾海云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为掩护同志撤退而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石河子支书、游击队中队长严景鸿亦在大兴场开展工作中被捕牺牲。同年初冬，四川军阀政府又委边军总司令李家钰为“剿匪总司令”，率其驻新津、双流、蒲江、邛崃的部队，会同各县团队，向游击区大举进剿。原一批被赶出游击区的土豪劣绅也乘机还乡，纠集一些地痞流氓进行反攻倒算。仅邛崃南二区、南三区、石头、平落等地的团总，就先后捕杀我抗捐军、游击队战士达五十多人和革命群众七八十人。

四川军阀政府先后出动十五个县的驻军与团队，对游击队进行轮番进攻。英勇的游击队虽多次给予了反击，但由于敌众我寡，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坚定分子植齐昆、何俊等人相继叛变投敌。我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与骨干陈伯峦、侯伯英、闵一涵、何曼修、王克光、杨支非、肖张氏、张洪顺等几十个同志被捕，有的先后牺牲。邛、大、蒲境内的大部分党员和游击队战士，便转入隐蔽活动，开展队自为战，人自为战，继续同敌

人进行英勇斗争。后来，他们当中有的随红军北上，有些因联络中断，找不到关系而隐姓埋名他乡，有的转入隐蔽活动继续坚持战斗。

(中共邛崃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黔江红军游击大队

黔江红军游击大队，于1933年秋建立，主要活动于黔江境内的板夹溪、小南海、两会坝、栅山、西泡等地，狠狠打击了这些地方封建势力与地方团防，深得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支持。

黔江红军游击大队的前身，是红三军第二特科大队。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红三军受到很大的挫折。1932年9月，红三军从洪湖苏区突围，经豫西南、陕南、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远征七千余里，1933年初到达湘鄂边，以图恢复湘鄂边根据地。

1933年夏，红军流动游击于鄂川边时，黔江“神兵”（即“联英会”）正危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击败。1933年秋，黔江“神兵”代教龚昌荣和湖北宣恩“神兵”首领黄丁山，在宣恩找到红军，要求参加红军，红三军军长贺龙接见了他们，欢迎他们参加红军。接着，龚昌荣回黔江，在板夹溪，小南海等地动员了侯汉清、周绍云等三十多个“神兵”，连夜经咸丰活龙坪至利川沙溪投奔红军。后来编为红三军第二特科大队，由龚昌荣、黄丁山（后在大路坝战斗中牺牲）负责。龚昌荣率领“神兵”打土豪、团防和国民党军队。经过许多次战斗的锻炼，以后在大路坝战斗中，他英勇果断，指挥第二特科大队冲锋在前，歼灭了一些敌人，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后被任命为第二特科大队的大队长。

12月22日，红三军从咸丰活龙坪向黔江进军，第二特科大队担任前卫，冲锋陷阵，当天攻占黔江县城。次日，龚昌荣率领第二特科大队抵香山寺（现工农乡政府所在地）扫荡残敌，并在那里打开国民党的粮仓，将数万斤粮食分给当地贫苦农民。29日，第二特科大队随红三军撤离黔江，折回活龙坪，在湘鄂川边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4月20日，第二特科大队在活龙坪和红三军分开活动，红三军由活龙坪经沙子场、马喇湖、官庄等地去西阳县境内活动。第二特科大队改称黔江红军游击大队，龚昌荣任大队长，由活龙坪到后坝，在黔江境内坚持游击斗争，打土豪，没收地主粮食，取消租课和高利贷，抗捐抗税，夺取豪绅团防枪支。黔江红军游击大队先后打了向贵清、庞继厚、李德安等十余家大土豪，占领了向贵清的楼房，缴枪十余支，缴获大烟三百多斤，还活捉了向贵清的父亲。

游击队在板夹溪、小南海、两会坝、栅山、西泡等地对土豪是根据情况，区别对待，大体分两类：一是土财主，政治上没有大的罪恶，就罚他们的粮款。二是政治上反动，罪恶大，同红军、游击队和广大群众为敌，对他们就坚决打击。

游击队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肃清当地匪患。那时鄂川边境的匪首范海清等，经常率领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在板夹溪、小南海一带，洗劫村庄、烧杀奸抢，弄得民不聊生。龚昌荣亲率游击队去围剿，终于彻底平定。

游击队以红军为榜样，纪律严明，深得广大群众拥护，贫苦农民纷纷参加游击队，部队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1934年5月30日，川军二十一军四十二团李敬舆部与黔江反动团防一千多人，在虎家垭（属西泡乡），向游击队进攻。激战

一天，游击队退到黄泥垭（属沙坝乡），敌尾追不放，游击队战士把战旗插在黄泥垭最高峰，把敌人引到那里，游击队才退到栅山。这一天歼敌四十余人，游击队战士牺牲三人，大队长龚昌荣腿负重伤，被抢救离开火线。

当天夜里，红军游击队又从栅山撤到八面山上的五架梁子，不料敌人又从三面包围上来，游击大队被冲散。中队长侯汉清带领七十多人撤到小南海，乘两支小船刚离岸，敌人又追到，侯汉清准备带领游击队经大路坝、蛇盘溪向鄂川边红军独立团靠拢。当游击队抵大路坝，又遇敌人阻击，被前后夹攻打散。后来有一些游击队员在侯汉清的带领下，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28日，龚昌荣在鸡胞寨（属后坝乡新建村）被捕就义。此时，白色恐怖笼罩黔江，游击队员被迫分散隐蔽。

（中共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李汉光整理）

安县保卫团兵变

安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是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田頌尧的辖区。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各地“组织革命兵变，以实际行动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入川”。10月，绵安中心县委领导和发动了“孝泉兵变”，计划兵变后，在安县地区创建工农红军和苏区。起义人员组成川西北工农红军向安县山区前进。途中遭敌堵击，兵变失败。省委留下孝泉兵变总指挥王敬德，在安县继续发动群众，筹建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派遣马绍援、陈燮和到绵安中心县委加强党的工作及军事工作。

1933年7月，省委派参加过南部升钟寺暴动的党员任秀全（女）同团员李茂痕（女）来安县协助县委开展妇女工作。中心县委在省委“坚决发动三台、中江、绵安的游击战争”的指示下，决定夺取地方军队枪支，策动安县保卫团兵变。当时，安县保卫团有三个大队，二十七个小队，三百二十四人。保卫团的团长是二十九军军长田頌尧任命县长邱祖培兼任，副团长由公安局局长林华卿兼任。保卫团绝大部分都驻守在各场镇，只有杨茂轩的第一大队驻守在县城。中心县委决定派曾在川军任排长，开展过军运的陈永安协助王敬德的军支工作，利用陈永安在地方的袍哥管事身份，打入保卫团，策动起义。不久，陈永安打入保卫团，联络了部分小队长，并同大队长杨茂轩的心腹、小队长李孝全结

为拜把弟兄，同时，策动地方民团。在这期间，打入公安局工作的地下党员、县城支部书记李世隆将组织印的传单，秘密送往保卫团士兵手中，进行宣传活动。

1933年10月，中心县委初步计划：安县保卫团中参加起义的军队，以出城打野外（演习）为由，倒戈起义；起义时，杀掉反动头目。起义后，将安县保卫团编为“安县工农红军第一大队”，地方民团编为安县工农红军第二大队，农协会等组织成员编为“安县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先捣毁安县县政府，杀掉贪官及反动分子，打开监狱，开仓放粮。最后，由三个方面的人枪汇集千字沟，成立工农红军总部和地方苏维埃政府。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兵痞出身的李孝全突然告密，将起义的计划密报给了敌人，出卖了陈永安和王敬德。保卫团副团长林华卿和大队长杨茂轩密谋，设下圈套，令李孝全通知陈永安、王敬德在10月12日（农历8月23日）到月塘庵商谈兵变事宜。陈永安不知是计，就把李孝全要他去月塘庵谈兵变的情况向中心县委领导作了汇报。中心县委领导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派王敬德、陈永安分头联系，最后在县城集中。

10月12日上午，杨茂轩派中队长刘成贵率领分队长吴元胜、王云松等，埋伏在离月塘庵不远的河对面。李孝全见陈永安一来，就骗陈说：“河那边还有几个弟兄要同你商量。”当陈永安正要准备过桥时，发现河对面动静不对，方知上当，转身就朝山下跑。李孝全饿狼扑食的追赶，见追不上，便向陈永安连续开枪，陈永安倒在血泊之中，英勇牺牲。

当天，王敬德也去县城同李世隆接头，未接上，也不知陈永安已出事，就在过去与李孝全接头的南外茶社等候陈永安的消息。当天下午，李孝全带领刘成贵等人，包围了南外茶社，王敬

德见势不妙，奋力拒捕，被刘成贵开枪打伤了腿，终于被捕。翌日凌晨，林华卿、杨茂轩派兵包围了千字沟陈永安的家，住在陈永安家里的任秀全被捕，同时，陈永安的妻子也被抓。

在敌人的审讯室里，邱祖培亲自审问，当他从李孝全口中得知王敬德就是二十九军多次通缉未获的孝泉兵变总指挥时，便下令进行残酷的刑讯、拷打，王敬德坚贞不屈。14日被杀害于安县城关。

王敬德、陈永安的牺牲是绵安中心县委的重大损失。同时，敌人在高桥一带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农协会员、进步群众，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中心县委为了给王敬德、陈永安报仇，及早组织暴动，派游击小组用手榴弹炸伤了驻桑枣的国民党军营长、地方恶霸易德斋和安县保卫团中队长龙佐清。接着敌人进行残酷镇压，晓坝、睢水、沸水等地党组织和党领导的群众组织遭到破坏，中心县委常委肖前恩被捕，游击小组成员、地下党员胡荣喜、石维林、唐元喜等，被敌人杀害，部分群众被抓。兵变归于失败。

(中共安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陈兴荣整理)

中江文家桥农民暴动

文家桥是中江县大松乡境内的一座小桥，地处中江、三台两县交界处。1933年9月，中共中江县委在泥金乡成立。文家桥属于泥金乡管辖，党组织派人来这里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反动军阀、反动政府的罪恶，发动农民抗粮、抗租、抗债，抗一切苛捐杂税，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这里的农民入党、入团、入会（农会、妇女会）、入队（赤卫队、少年儿童队）的人很多，有的一家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参加了组织，农会开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少数士绅和部分保甲长，因受军阀混战压榨之苦，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之辱，也同情革命。这里是当时地下党开展革命斗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933年11月中旬，有些区委和支部负责人反映：不少农民说，天天喊打倒土豪劣绅，进行“四抗”，怎么又不见行动，要求开展破仓分粮斗争。据此，县委召集各区委、支部负责人开会，会上，大家认为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决定，月底到作恶多端、群众非常愤恨的大地主、永太主任团正曾万一家去破仓分粮，给群众一点利益。

会后，各区委和附近支部分别开会，发动群众准备刀矛、棍棒和口袋等物，县委将暴动的计划报告省委，得到了省委的批准。

几天后，有的区委，特别是北区区委发动农民准备暴动的行动计划被团防发觉。12月19日天刚亮，永太团队便到文家桥包围

了一些农户住宅，抓走一人。并向县委驻地逼进。县委书记钟炳云、军事部负责人于有素等鉴于当时形势，当机立断，决定提前暴动。一面派人迅速通知北区区委，一面派人上山鸣锣通知附近的地藏寺、徐家堰等地的群众带上各自准备的大刀、长矛、木棒、锤子等武器，立即到文家桥集中。

这时，县委组成了暴动临时指挥部，钟炳云、干义素任正副指挥长，黄德华、戴资杰、朱德良、李晓南等任委员。

指挥部组成后，立即定出暴动的行动目标，即以抗捐的名义动员群众，迫使团队交出抓走的人，并要团队立即撤出此地；同时夺取团队的枪支，武装赤卫队，强攻永太场。

上午九时，文家桥附近三十里内外的党、团员、农会会员、赤卫队员和农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人数达三千多人。这时，来文家桥“清乡”的团队，见农民人多势大，立即撤回永太场。

团队撤走之后，指挥部更改了暴动路线，改为到主任团正曾万一家去吃大户，破仓分粮，向曾要人。为了使参加暴动的人明确暴动的意图，指挥部将各地来的群众集合在一起，召开大会。大会上指挥长钟炳云、干义素等人都讲了话。

为了保证暴动的胜利，指挥部派出一些人到大石缸（金石乡、现属三台县）去监视田颂尧的炮兵营。同时派出一些人观察县城方向的动静。同时，下令向曾万一家进发。顿时，几千群众一齐涌向曾家。指挥部的人和区委、支部负责人挤在人群中领头高呼：“到团正家去吃大户！”、“实行抗粮款、抗苛捐杂税！”。一部分人进入院内，大部分人在外面包围房子。这时，曾家的男女老少早已闻风逃跑了。进院内的人挨屋搜查，搜出很多粮款借约、租约当契和一些粮食、衣物。

破仓分粮的计划实现后，指挥部的人和一些区党团干部在院子里将搜出的契约全部烧毁之后，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等待团队再来时便夺枪。

这时，中江县警察局何得刚带一部分人和永太团防队队长许登甫带领团丁共三十多人赶来。因不知虚实，不敢贸然深入，所以一出山便开枪。指挥部立即组织各区委、支部和各赤卫队负责人带领群众撤退。钟炳云则带领一部分赤卫队员殿后，掩护撤退。在团丁的攻击下，赤卫队员文刘氏被打死，文信诗被打伤，林德兴等二十多个赤卫队员和群众被团丁抓走。团丁继续追击起义指挥部和群众，钟炳云开枪还击，迫使敌人后退，党团县委和区委、支部、赤卫队员和几千群众得以安全撤离。

(中共中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遂安农民暴动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不断粉碎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川陕苏区迅速扩大。从迅猛发展的军事形势看，红军将很快打过嘉陵江，解放南充、遂（宁）、安（岳）等地，遂安的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受到极大鼓舞。中共四川省委根据这种有利形势，为创立新赤区和新红军来迎接入川红军。1933年9月底，派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邹风平，化名邹鹏，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同省委军委军事干部王胡子一起到遂安地区发动游击战，组织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迎接红军。

在这之前，遂安县委根据省委响应红军入川的多次指示和遂安革命力量的发展，已有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打算，把党团员最多、群众基础最好的通贤乡列为重点区域。县委主要负责人余若萍、廖伯华住在通贤发动农民。县委还把准备武装斗争的设想向省委作过汇报。

邹风平到通贤后，召集遂安县委有关人员，传达了省委指示，决定进一步领导农民抗租、抗粮、抗捐、抗债，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党团员，扩大农会等群众组织。在宣传、财力、物力、人力和武器方面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如果红军攻下顺庆，就举行暴动。否则，就在年关发动斗争。同时为加强对农民暴动的领导，遂安县委改建为遂安中心县委，书记余若萍。共青团遂安中心县委书记为李子丹。各地开始了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

1933年，遂安地区遭受了一场大旱，农民收成大减，而防区军阀李家钰，为拼凑进攻红军所需之财力物力，对农民摊捐派款，催粮逼租，抓丁索债，更是倍胜往年。广大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剥削压榨，恨之入骨。为唤起农民加入推翻军阀统治的斗争行列，中心县委领导各地党团组织，以农会等形式，就近召集农民，经常在夜间开会。他们一方面向群众揭露反动派的残暴，指出农民深受苦难的根源；一方面宣传我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指出川陕苏区的红军很快就会打过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参加农会，不交租、不完粮、不还债，拖住打红军的军阀，组织起来，打土豪，建立苏维埃，就能象苏区人民那样过上好日子。

党团负责人邹风平等还经常到通贤、来凤、龙台和遂宁太平的各场、村去宣传发动，利用夜间开会，一般二三十人为开会点，不照灯，不互通姓名，不给家人讲。这样的开会点达数十处。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发动，广大农民很快组织起来，党团组织、农会、雇农工会迅速发展。到11月中旬，遂安边境地区已有党员二百多人。来凤区由王自修负责。龙台区邓雍负责，领导龙台、东兴，在龙台街上设了两个联络点。通贤区由康炳轩负责，领导通贤和遂宁太平。三个区纵横五十里，有组织的群众五千多人，乡乡建立了农会。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中心县委加紧了暴动所需武器、经费的筹集。通贤党组织以前由于张育才、康燧等人的串联活动，把一些团丁、门户练吸收入组织，掌握了部分武装。通过一个多月努力，又有很大收获。党员吴刚利用担任通贤场团练局书记的有利条件，为党组织提供了武器和敌方情报，开展团运，基本掌握了七八十名局丁。康燧担任通贤东一甲、五甲团防分队长，党员熊

绍荣也是分队长，他俩分别掌握了所负责操练的四十名团丁。还拦获了通贤大绅粮张绍州家三支枪。龙台区负责人邓雍，担任龙台场团总，为组织游击队提供了武器。胡联武是川北著名土匪，匪队常有人枪两百多，为改造和利用这支土匪队伍，我党早已派党员梅大邦利用他与胡的叔侄关系，打入其内部，做胡的工作，成为匪队二号人物。党员王自修也一直在做胡的工作。1933年冬，胡、梅队伍已接受安岳县府招安，驻姚市镇。中心县委军委廖伯华，亲自领导梅做匪运工作，使胡、梅队伍为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不少枪枝弹药。暴动前夕，通贤场党员康燧等从省上运回了一批武器。中心县委要求每个有组织的群众都要准备好长枪、刀矛、棍棒等土制武器。到11月中下旬，中心县委在通贤、来凤、龙台三个区各成立了一个游击中队，赤卫队遍及各乡。

鉴于遂安地区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省委在12月初发出了《致遂安县委指示信》。信中指出：“遂安的党处在白军进攻红军的后方，巩固川陕苏区的前线，应该正确的估计这一形势，把握群众的情绪和顺利条件，广泛的发动群众”，“积极武装农民，引导斗争到较高的阶段——武装冲突以开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武装暴动”。根据省委指示，及群众对武装暴动越来越强烈和普遍的要求，中心县委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会议分析了遂安形势，制定了以通贤区为中心，包括来凤、龙台两区在内，五六千人参加的农民武装暴动计划。计划在12月24日（阴历冬月初八）晚上举行暴动，以创立新苏区和新红军为目的。以通贤先动，来凤、龙台跟上，先杀各保土豪劣绅，夺取武装，再打乡公所。然后攻县城，破仓分粮，分田分地，建立苏维埃为行动步骤。实行“小部队吃掉，大部队打尾巴”的游击战术。会议推举邹风平、王胡子分别负暴动总的政治、军事指挥责任。会后，层层召开了

动员会议，各地立即行动起来。

1933年12月中旬，龙台区负责人邓雍派党员肖素光去探察了投奔红军的路线。来凤王自修派人从成都运回油印机，印制标语、传单。三个区的党团组织开始在路旁、要隘、岩壁、树干、庙宇、街上大量张贴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标语、传单。党员分别深入各乡镇作发动工作。群众听说快暴动了，非常激动。邹风平、王胡子、余若萍、廖伯华等领导人经常到三个区做发动、布置、检查工作。从各方面弄来的武器，装备了部分游击队员。

这时，来凤王家坝有个名叫王自祥的党员，因醉后失言，传到来凤乡副乡长袁子芳耳里。连日各场各地出现的赤色标语，已引起当地土豪、官吏的警觉。袁一听到这个情况，即派其姑母田袁氏同谢长发一道，对王家坝进行暗中监视。12月19日，田、谢二人至来凤乡公所，向乡长康南溪报告了农民天天开会，即将暴动的情况。康赓即电告安岳县府。在乡公所当团丁的地下党员王绍林，得知了田、谢二人告密之事，立即直奔王家坝，告诉廖伯华和王自修。廖于当天转移，找到邹风平、王胡子，研究了对策，决定王胡子留下观察事态，邹、廖二人次日一早就转移到了通贤。第二天，来凤区负责人王自修被捕，以后接连几天，袁家坝党支书袁泽直，党员袁海林、康吉修、龚明友等人相继被捕。来凤区组织遭破坏后，地方团队和驻军开始日夜在来凤周围各要隘布防。中心县委与来凤的军事指挥员王胡子失掉联系，打乱了整个武装暴动计划，也影响到中心区通贤场。12月21日（冬月初五），邹风平在康燧家同中心县委成员对激剧恶化的局势，取得一致看法，认为“暴动亦牺牲，不暴动亦牺牲，乃召集农会，党团县委及游击队长、赤卫队长开扩大会，成立遂安工农革命委员会，邹风平任主席，决定12月22日（冬月初六）晚上9时，将中

心区队伍集中在通贤场附近三个山头，按原计划暴动。

12月22日天刚晚，邹风平就到通贤场附近一个山头坐镇指挥，余若萍同康燧去陈家大坡组织队伍，廖伯华赴赵家椅子湾的鸣锣坡召集队伍。晚上8点多钟时，邹风平处已有一百多人，陈家大坡达两百多人，鸣锣坡也聚众一百多人。攻打目标人人明确：先搞掉大绅粮张绍州、蒲庆光、蒲守康、李成章等，然后打乡公所，缴团队的枪。暴动战士刀枪并举，土枪洋枪兼用，隐伏山头，待令出动。

在这关键时刻，意外的事发生了。通贤场团总张文华突然带了下乡捕人。原来，初六这天，党员康万益和团员田兴桂给大绅粮蒲庆光帮工，晚上田酒醉失言，泄漏了暴动机密。蒲庆光立即报告了团总张文华，张立即派团丁守护各要道，并亲自率队来逮捕康燧等人，镇压农民暴动。党员康万益见田把事情泄露，旋即借故离开蒲家，火急赶到康燧家报信，刚把文件等处理完，康家便被敌人包围了。

由于敌人各处布防，集中在三个山头的暴动队伍失掉联系，加之，总指挥邹风平不懂军事，所以暴动信号——连打三枪一直没有发出。只有安排在大绅粮张绍州家作内应的党员肖作平、肖素云按时打了几枪，但外面没有配合。另外，鸣锣坡的队伍割了三个桩的电线。敌人深夜下乡抓人和康燧家被围，引起暴动，农民惊慌分散，到拂晓时，邹风平身边只有四个人了。陈家大坡、鸣锣坡的队伍也因一直没有听到暴动的信号而陆续散去。

第二天（初七）早上，李家钰驻军和县保安大队开来，把这几条沟围住“清乡”。肖作平、肖素云、康庆光等十多人当天被捕，以后几天接连有人被抓。在这白色恐怖之下，不少已暴露的党团员和一部分有组织的群众转移外出。县委委员间失掉联络，廖伯

华、余若萍、李子丹先后潜出敌警戒线，转移到东兴笋子场，康燧在暴动当晚，得知家被围后，就转移到了姚市镇胡、梅队伍中。邹风平在初七晚上化装到龙台区巡视布置了工作，准备在通贤场恢复武装行动后，龙台场即发动暴动。尔后，邹潜伏于通贤、来凤两区做恢复工作，不久却被调回省委。省委对这次暴动领导人邹风平、王胡子、余若萍、廖伯华等分别给予了处分。

(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中共安岳县委
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席拥政、蔡建明整理)

涪陵土地坡农民暴动

1930年至1933年间，涪陵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1931年1月，党员戴北星徒步去重庆向省委汇报了涪陵的情况。2月，省委派特派员张德荣返涪陵开展农运，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11月，党员黄尔宜等在南沱、百汇、珍溪一带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上海党组织派田鹤鸣返川组织游击队，“烧川军的尾巴”，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田鹤鸣回到涪陵后即与黄尔宜、秦培吾等筹建游击队。

1932年11月底，田鹤鸣在成都遇见了同乡廖瑞呈，并秘密商议回涪陵一起战斗。二人返涪后住在三合场田鹤鸣家中。当时来到这里的还有黄尔宜派来联系的代表秦一九和刚从成都返涪的张德云以及原在涪陵的戴北星等，经常一起讨论组织武装暴动问题。

1933年7月，田鹤鸣、卢文修、秦培吾、戴北星等从涪陵转移到丰都活动，进一步商讨组织游击队的办法。他们认为地下党员王伯瑜利用堂兄王杰成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招牌，已当上了平安乡（土地坡）团防队长，是组织游击队极为有利的条件。大家决定发动土地坡暴动，奇袭民团，把王伯瑜所掌握的武器拿过来，建立游击队。时间定在次年农历正月十五（1934年2月28日）。会后，随即派人与王伯瑜进行了联系。

根据党组织决定，1934年2月24日，廖瑞呈回涪陵通知田鹤鸣的四哥等，带领三合场的部分人枪参加暴动。同时，党组织又决定

调秦石琴在弹子台所掌握的人枪来参加暴动，调鹤游坪黄尔宜掌握的武装前来与暴动人员汇合。结果，三合场的信未送到，鹤游坪也不见回音，只有弹子台的人员参加了暴动。

土地坡距丰都县城约六十华里。田鹤鸣事先派人通知王伯瑜做好暴动内应的一切准备工作。各方面革命力量奉命于2月27日在朱家咀集结待命。2月28日三时许，队员陆续到达距离土地坡场约三里路的一户贫农家中隐蔽下来。黎明，田鹤鸣除派人到土地坡街上侦察，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外，自己装扮成商人模样与王伯瑜接头，最后确定了暴动步骤和办法。是日夜，皓月当空，土地坡街上的人们正欢庆元宵，人群来往，络绎不绝。农暴人员，杂在群众之中，伺机行动，没露一点破绽。

王伯瑜根据组织意见，早已备好美酒佳肴，招待团丁欢度元宵。团丁们见队长如此盛情厚待，大家齐聚在碉堡的三层楼上开怀畅饮，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把枪全挂在四周墙壁上，完全丧失了警觉。醉了的呼鼾如雷，没醉倒的少数人也两眼朦胧。田鹤鸣等见时机已到，果断地发出了信号，“砰、砰”两响清脆的枪声，划破长空。暴动队按事先布置好的计划投入战斗。田鹤鸣率领三分之二的队员冲进团防驻地。当一阵枪声和“缴枪不杀！”的吼声把团丁们从睡梦中惊醒时，他们已成为瓮中之鳖，全部被缴了枪。为了给王伯瑜卸脱责任，田鹤鸣按原定的办法，当着团丁的面用绳子把王伯瑜捆绑起来，锁在后屋里，留下队员执勤，看管团丁。

在信号枪打响之后，戴北星率领三分之一的队员，冲进乡长何庆余院内高呼：“乡长，拜个年罗！”何正在宴庆元宵。他几乎是在听到枪声的同时见到一群全副武装的陌生人从天而降。何情知不妙，手足无措，忙起身“迎接”。戴北星连说带抓，

一把揪住了何，何庆余面如土色。两个狗腿子在一旁想摸枪，被队员们抓住。戴北星立即缴了何的枪，带队押着何庆余冲出院门，同前来接应的田鹤鸣汇合。途中将何枪决于街角大树下。

参加这次行动的土地坡暴动人员吕民和夏平久，抓住平时作恶多端的恶霸郑亚南，将其击毙。

暴动从开始到结束，干净利落。事成，田鹤鸣等在下场口集合好队伍，清点了人数和战利品。总计缴获长枪二十多支，短枪三支，击毙当地恶霸二人。队员们立即向弹子山方向飞奔而去。

横跨丰（都）、涪（陵）两县交界处的弹子山，绵亘百余华里，重峦叠嶂，形势险要。暴动后，田鹤鸣、秦石琴等带领的一支游击队来到这里，在山区内的弹子台、大木峡、竹枝坝、牛皮坝等地宣传组织群众，惩治恶霸豪绅，建立了游击区，实行打富济贫，准备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

涪丰两县的国民党政府听到土地坡暴动和弹子山游击队活动的消息，组织了保安团两个中队的兵力，对弹子山游击队实行围追搜捕。游击队人枪不过三十，坚持与保安团周旋一段时间后，弹械、医药奇缺，食品供给断源，情势十分危急。前去联系三合场、鹤游坪两地援军的人也杳无音讯。田鹤鸣、秦石琴等决定分散隐蔽。秦石琴带领原弹子台游击队员，化整为零。其余田鹤鸣等人编为一组，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绕过敌人封锁，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转移了。

（中共涪陵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盐亭农民游击队

1933年9月，三台柳池暴动失败后，中共三台中心县委机关开始遭到破坏。中心县委决定，由县委成员、军委秘书翁国强和省委巡视员郭嘉舟到三台和盐亭一带察看地形，准备建立游击根据地。经研究认为盐亭龙潭地区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山区，反动统治势力较薄弱，毗邻南部、西充、蓬溪、射洪，在军事上回旋余地较大。于是决定，以盐亭龙潭地区为基础，作为游击根据地。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也转到龙潭作调查。这时，盐亭已组成了十四人的游击小分队，由邓象舆任队长，何什民负责政治工作。随着斗争的逐步发展，游击队扩大到三百余人，成立游击大队，由何登甲任大队长。

1933年底，汪克明参加了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把三台中心县委迁盐亭，以龙潭地区为中心，开展抗捐、抗粮、抗债，破仓分粮，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迎接和支援红军。从此，三台中心县委的工作向盐亭方向发展，各地农民武装蓬勃发展，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社会上的各种反动势力。游击队活捉了民愤极大的土豪杨寿堂，打了国民党二十九军提款委员吴慎修。斗争胜利后，游击队士气高昂，派了坚强的战士打入国民党的各团防和保安队中，收集情报，使地下党清楚地掌握了当时盐亭城防司令部的武力布防情况。同时，党组织还派了何光清、杜有云、赵明训到三台去参加军阀田頌尧的军队，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兵变。

1934年4月，中心县委迁至盐亭。汪克明刚到盐亭即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汪被押送绵阳后，6月择机逃走，重返龙潭，着手整顿游击队，成立了以贫雇农为基础的农民武装“工农前卫团”。不到两个月，即发展到三百余人。汪克明任团长，王明寿任副团长，何光明、何登甲任大队长，宣布纪律，严守机密，并用红布绘镰刀斧头图案作为旗帜，打制了刀、矛、梭标等武器一百余件。

以“工农前卫团”为主体的农民武装，更是四处出击，打击官绅财主，群众深受鼓舞，掀起了全县革命斗争的高潮。这一时期，全县参加农会的约数千人，其中农民武装近千人。

8月，“川西北抗捐大同盟”也在龙潭积极筹建。这个组织与农协会不同，只要愿意抗捐抗粮的，都可以参加。当时它是农协会的外围组织。并刻制了“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的方形木质大印一颗，计划以这里为根据地，在川西北地区展开抗捐抗粮的农民武装斗争。

“工农前卫团”的成立和“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的筹建，更加鼓舞了党内同志和穷苦农民的革命斗志，党组织逐渐扩大，这时，全县计有党员一百余人，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群众组织的约二千余人。龙潭地区因党、团员多，农民协会及其武装组织普遍建立，使纵横二十华里，成了党领导下的赤色地带、盐亭的革命中心。

1934年10月，中心县委决定在龙潭附近的西山坪召开“川西北抗捐大同盟”紧急会议，动员大规模开展抗捐抗粮斗争。当晚，汪克明按约定时刻赶来开会，因叛徒向敌人告密，情况发生突变，汪克明人地生疏，情况不熟悉而被捕。11月，二十九军在盐亭成立了“军学研究会驻盐临时办事处”，后又改为“盐亭清共会”，纠集各种反动势力，迅即在全县范围内，先后掀起两次“清

共”高潮。由于内的黄泽（1930年任三台中心县委书记）等人的叛变，使敌人摸清了全县党组织及群众组织和人员情况，“清共会”挨门“清乡”，对党团员实行大规模逮捕。“农协会”、“抗债团”、“工农前卫团”、“川西北抗捐大同盟”，以及其他各种群众组织的成员，也被视为“共匪”搜捕关押。到1935年上半年，在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下，全县除个别转移隐匿者外，计被捕四百余人，以共党分子、红军探子之名，有的被迫害致残，被杀的有二十余人。反共之声，甚嚣尘上，致使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至此，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被迫暂时停止活动。

（中共盐亭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越西农民暴动

越西地处西康省，山高地瘠，地广人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国民党二十四军和反动团阀的残酷统治和剥削。

1933年，刘文辉派聂秋涵团驻防越西，1934年3月，聂又兼任县长，新老军阀、豪绅封建势力进一步互相勾结，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越西北乡团总郭鼎更是为虎作伥，配合聂强行鸦片登记，逼烟逼款，进一步加深对彝汉人民的掠夺和压迫，人民无不恨之入骨。一说打二十四军，群众都拥护。1934年5月，在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及红军声威的影响下，越西彝汉人民举行了一次起义。

这次起义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参加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王义芳、蒋明远。1933年，王义芳即开始活动，联系蒋维周、王义全、胡家民等人暗中酝酿起义。利用田间劳动向彝汉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很快就在王家屯、中所、大瑞、保安、海棠等地约集了许多贫苦农民，并先后在王家屯八庙营召开了二十多次会议。在作好当地群众发动工作的同时，还派吴文彬到会理等县联系，准备一起行动，并带回了起义所用的旗帜和印信。

起义前，王义芳等领导人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当地驻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争取驻王家屯的两个排长及部分士兵支持起义。同时还利用彝族头人兹木达曲的母亲被聂秋涵抓去坐质的矛盾，争取了兹木达曲参加起义。少数失业军官和南菁、中所等地民团也参加了起义。按照当地彝汉人民的习惯，起义前夕，起义

军在虎口碓，杀猪宰羊共喝血酒。血酒会上大家纷纷表示：“打倒廿四军！反对苛捐杂税！打富济贫！抗捐救民！打倒土豪劣绅！生死一条心！”等，这些誓言就是起义军的行动纲领。起义军定名为“救贫义勇军”，以王家屯为起义的据点，由起义军主要领导人亲自负责指挥，其他地区随之行动。规定了起义军战斗时臂上缠红头绳作标记。这样，起义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于5月10日（阴历3月27日）爆发了。

5月10日这天，正逢王家屯东岳庙庙会，起义军按预先号令，有枪的带枪，没枪的拿刀、矛、棍棒等，纷纷集结于指定地点。凑巧驻王家屯守军连长侯少先二十六日进越西城，当晚未回。支持起义的岳排长按起义军领导人王义芳约定，将士兵带到营房外种菜，枪留在营房。王义芳、蒋明远带领二十多人越川主庙后墙进入连部，夺得敌军枪支二三十支。正待去取锁在库房里的武器弹药时，由于彝族头人兹木达曲不明情况，带领彝族群众从营门强行闯入，当即遭到门卫反击。曹排长闻声后，立即组织士兵开枪反抗，起义军数人伤亡，王义芳的腿部负重伤，转移到松林养伤，在养伤中被捕。战斗继由蒋明远指挥。起义军经过调整，包围了侯连，战斗暂时成为对峙。此时，敌连长侯少先已从越西赶回，组织残部固守待援。

聂秋涵得到侯连告急，即派谢邦玺连前往增援，援军进至王家屯场外大石桥处，被起义军伏击，谢邦玺被击毙。敌军失去指挥，部份溃逃回城，部份溃入王家屯与侯连会合。侯连遂组织残部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于是夜撤至河东高桥。11日晨，侯连派兵追击，进至通往起义军防线的独木桥时，突然遭到阻击，敌军被迫退入王家屯团总郭鼎家碓房，坚守不出。起义军围住碓房，准备进行强攻。侯少先和郭鼎见难于固守，趁天黑逃回城内。

这时，保安、利济站、梅子营、廖坪等地，也行动起来。由文登朝等人率领彝汉起义军三四百人，全歼了保安驻军一个连，即向王家屯进发与起义军会合。12日，起义队伍在蒋明远、王义全、蒋维周等领导人的率领下向越西县城进军。由于起义军在王家屯、保安首战告捷，鼓舞了人民，附近各地群众都纷纷行动起来。他们带着干粮，拿着火枪、刀矛、棍棒等武器，聚集在距城北两里的青龙嘴。中午，起义军在作了攻城布置和经过准备以后，携带云梯开始攻城。此时城内敌人十分惶恐，有的主张死守待援，有的主张弃城逃窜。恶霸豪绅们竭力主张死守待援。聂秋涵一方面向西昌一三六旅刘元琮求援，一方面以清县里各界人士开会为名，将罗发弟等可疑人士扣捕，并进一步组织所部和各方反动势力加强固守。12日晚，起义军将县城围困，并发起猛烈攻击。数次进攻未克，战斗形成对峙局面。

5月15日，驻西昌二十四军一三六旅旅长刘元琮，派张青岩团驰援越西。该团先头部队一个营到达时，投机起义的团阀倒向敌军，并为虎作伥给先头部队打前锋，将负责在丁山桥警戒的起义军击溃。城内的敌军乘机出击，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大部分被击溃，攻城陷于失败。

攻城失败后，起义军余部二三百人，由蒋明远、王义全率领由青龙嘴分东、西两路向彝区转移。东路由蒋明远率领，退到兹木达曲所辖的彝区。但因兹木达曲的母亲被聂秋涵关在越西狱卡坐人质，聂秋涵要兹木达曲交出蒋明远和起义军方能放回其母亲，并另以白银、枪弹相诱。于是兹木达曲倒向敌人，起义军被出卖。

西路由王义全率领一百余人，退至吊口岩，受到阿尔家支头人阿尔达哈和彝族群众的同情，和起义军喝酒结盟。几天后，张

青岩团派来一个营追击，恰逢大雨，敌军过不了河，只好隔河与起义军对峙。第二天黎明，敌军进行偷袭被发现，敌军营长被起义军打伤，敌军见偷袭不成，只好撤退。起义军在吊口岩虽然可以凭险固守，但因无粮弹，无外援，敌军倘再次围攻，则难以长久坚持。于是，起义部队大部转往外地分散隐蔽，王义全和少数起义军转移到白沙沟，仍隐蔽在彝族家。

保安起义军领导人文登朝、丁明清等攻城失败后，带领部份起义军撤回保安坚持斗争。敌团长张青岩又派出一支部队与板桥团阎吴晓东、保安团总高子清配合，南北夹攻，“进剿”保安，起义军被击溃于关顶。文登朝、丁明清等十三人突围转到石棉。耿太洪等起义军骨干也在保安彝族头人兹木天格的叛盟下，被敌人俘虏。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被扑灭了。

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越西时，在王家屯对这次起义死难人员家属和部份幸存者进行了慰问，每户发了二十块大洋，并给烈士家属发了烈士证。分散隐蔽的起义军人员，在红军领导下成立了五十人的游击队，部份人还随红军参加了长征。

(中共越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李福华、陈之茂整理)

酉阳红军游击队

1934年，贺龙率领红三军，由湘鄂西转战西、黔、彭，攻下沿河，于六月初来到酉阳南腰界，在红三军的组织帮助下，南腰界农民很快建立了四个游击大队。

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贵州德江枫香溪召开，决定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组织干部大队下去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开展政权建设。

贺龙和参谋谷志标亲自在“忠烈祠”（今南腰界小学所在地）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同参加会议的池宽成、刘登元、伍永孝等三十多人，研究了建立游击队和打土豪等问题。会后，伍永孝等回到田坝（今松桃县甘龙乡）发动群众，很快组织了游击队。同时，独立团的覃世安团长，带领工作队及独立团指战员，在南腰界及其周围大坝、香田坝、唐家溪、甘溪、杨家寨等地开展群众工作。

南腰界游击大队是覃世安团长在6月下旬组建的第一个游击大队，池宽成任大队长，符公荣任副大队长，包括楠木箐、香田坝、红岩坪、大坝场、杨家坳、厚木耳、甘家堡、毛鸡塘等八个游击分队，有游击队员一百多人。大队部设在南腰界场上。因有独立团的三名“老兵”帮助带领，游击队旗开得胜，打了杨少光、陈良图等十多家土豪。缴获了大量物资。

唐家溪游击大队也是在覃世安团长等指导下，于1934年6月

下旬分三批组织起来的，包括曾家湾、甘溪（铜矿）、唐家溪、刘家等四个游击分队，吴永发任大队长，邹和清、吴永启为副大队长，有游击队员九十多人。这支游击大队，曾随红军转战川黔边，屡立战功，是一支组织较好，战斗力较强的游击队伍。

大坪盖游击大队在红军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下旬建立，大队长陈良玉。这支游击大队由大坪盖、白溪口、土门等几个游击队组成。有游击队员四十多人，队伍很精干，组织严密，能打硬仗，组建不久，就打了冉崇元、冉崇觉等七家土豪。

龙池游击大队在独立团李世清连长帮助指导下，于1934年7月上旬建立。周廷湘任大队长，辖龙池、山羊溪、易家坨、大坡等四个游击分队，队员有三十多人，游击队成立后，打了罗金仁、欧松廷等十多家土豪。

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四个游击大队，共有队员三百多人，都编入红三军川黔边独立团，由红军干部覃世安任团长，游击于南腰界周围。二、六军团会师后，编入红军黔东独立师，由红军马吉山继任团长。

游击队在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中，锻炼和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了群众基础和干部条件。1934年7月初到7月中旬，先后建立了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四个乡苏维埃政府，杨通科、刘兰成、陈汝光、罗汝仲分别当选为上述四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1日建立了南腰界区苏维埃政府，陈并朝、陈元富当选为主席、副主席。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地主豪绅不甘心失败，采用种种手段拚命顽抗。大恶霸欧松廷乘游击队纷纷建立之机，指使爪牙陈汝跃，打起“游击队”旗号，以假乱真，为欧保镖。秦金光混入独立团，当上了书记官，为欧通风报信。土豪周春茂、管金廷等，

派人混入游击小队，搞“明打暗保”等破坏活动。游击队及时将敌人的破坏活动报告给红军，并配合红军于7月中旬打击了这些暗中破坏的反动分子。紧接着开展锄奸斗争，处决了秦金光、秦登仲等奸细，打了欧松廷等四十多家土豪，镇压了伪乡长罗汝祥和劣绅罗汝荣。

8月初，贵州军阀杨畅时旅进犯黔东根据地，贺龙率红三军主力和部份游击队，离开南腰界开赴淇滩，痛击杨旅。团总冉瑞廷偕其子冉崇侯，带领地主武装窜回南腰界反攻倒算、疯狂屠杀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贺龙得知南腰界告急，立即派钟子廷团长率领红十二团星夜返回南腰界，配合游击队，围歼冉瑞廷。冉瑞廷带领一股匪徒遁入深山，令儿子冉崇侯抵挡待援。红军和游击队分三路包抄而来，冉崇侯率匪徒挟持一批群众，龟缩进了大坎冉家祠堂顽抗。红军采取“长期围困，争取群众，时机成熟，全歼顽敌”的方针，围而不攻，与游击队一道在各个路口修筑了阻击工事，一面天天喊话，争取被挟持的群众。9月12日晚，贺龙亲临前沿指挥总攻。钟子廷团长带领突击队战士发起冲锋，后续部队的炮火轰塌了祠堂的石墙，冉崇侯妄图逃跑被打死在田坎上，祠堂内之敌全部被歼。

歼灭冉崇侯地主武装后，游击队配合红军，先后在淇滩、沙坎、大石墩、玛瑙洞、樵家铺、倒马坎等地，参加了二十多次战斗。此外，在甘龙，活捉黔军一个团长，缴枪八十支；在杉树坳击溃敌军，缴枪十五支；在盘溪，活捉乡、保长十四人，缴枪十支，子弹两箱。游击队在配合红军迂回游击中，屡立战功。

1934年10月，二、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以后，覃世安率领川黔边独立团，一部份随贺炳炎师长编入二军团随主力东进湘西，另一部份编入重新组建的黔东独立师。游击队的火枪、刀矛换成

了钢枪。由王光泽师长和段苏权政委率领，在黔东游击，钳制敌人，掩护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湘西。

10月28日，任永光等一批游击队员编入二军团部，随主力东征。二、六军团主力从南腰界出发东征湘西时，黔东独立师也由南腰界向西迂回，到沿河、印江等地钳制敌人，掩护主力东进。由于湘、黔、川数省敌军逼近川黔边，黔东独立师历经数十次战斗，完成了钳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但在战斗中，独立师损失很大，在向梵净山转移途中，印江独立团团团长宁国学被俘牺牲。后在护国寺与黔军王家烈部激战中又受到很大损失，师长王光泽率余部于11月14日突出重围，由马槽河、普觉、大路河，进入秀山兰桥，沿途均遭敌人堵击，部队再遭损失，且已弹尽粮绝，便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突围中王师长在土王庙被俘，被杀害于酉阳龙潭巫家坡。独立师仅余数十人转战至湖南野猪坪与二、六军团主力会合。

(中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曾汉轩整理)

万县第二次兵变

1934年上半年，下川东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红四方面军从宣汉打到了开县的杨柳关。在这之前，贺龙领导红三军打到了川鄂边界的万县谋道溪。当时，盘踞在万县地区的王陵基，便亲自赶到开县、宣汉等地，与红四方面军作战，万县兵力空虚。这时，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万县党组织，立即进行武装起义，截断长江，让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在万县会师。

万县的党组织在1928年6月和1931年初先后两次遭到严重破坏后，在地方上活动不多。为了使武装起义获得成功，省委指示隐蔽在王陵基部的地下党员与万县县委代理书记吴体珂、县委委员任孟琼及区委书记周晓怀、曾忠庆等取得联系。当时，在王陵基部隐蔽的地下党负责人是邓述民（又名邓和崑，军医），还有张超凡（师部手枪队队长）、何超腾（司令部体育教官）、朱斌（副营长）、曹世新（营部司书）等。

这次武装起义，为了接受1928年万县兵变的教训，党组织作出决定，发动工农兵一齐响应。县委代理书记吴体珂在省万师教书，由他负责发动省万师的学生和学校附近的农民；大周区委书记周晓怀，三正区委书记曾忠庆也分别负责发动当地的农民；县委委员任孟琼指定党员去大垭口煤矿发动挖煤工人；邓述民、何超腾、张超凡等负责发动士兵。

起义的时间，最先决定在元月初的一天晚上，由王陵基的手枪队先起事（因手枪队长张超凡是党员）。谁知张由于心急，不到

预定时间，便下令提前吹集合号取枪，借口出巡准备起事。这一行动引起副官长刘云章的怀疑，便问张：“取枪干什么？”张回答说“取枪出巡。”刘又问：“奉谁的命令集合取枪出巡？”张说不出命令他的人，事机败露，就带领四个人翻围墙逃出了虎口。第二天，王陵基就将张的弟弟、手枪队的军事教官、共产党员张占云捉来杀了头，并在果园路上示众。第一次起义还未开始就这样被扼杀了。

一个月以后，在省委的催促下，邓述民、吴体珂等又积极准备第二次起义。在准备时，邓述民做通了营长雷夏电的工作，他愿率全营官兵首举义旗进行兵变。雷营驻扎在县城对面的陈家坝，起义后，极易与活动于鄂川边的红三军取得联系。雷夏电并借出两支手枪给邓述民，邓便把手枪交给营部司书、共产党员曹世新和司务长龙国璋（龙登麒）去执行一项任务。两人带着枪去马路中华茶馆喝茶，被便衣谍查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枪，就将两人当“土匪”逮捕了。弄到军阀王陵基的司令部审讯时，敌人以处死威逼，曹世新慷慨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是土匪，并要敌人在罪状上也写明自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敌人又审讯龙国璋，要龙国璋“悔过自新”，并以副官相许。龙国璋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便叛党投敌，供出了全部的起义计划，并出卖了组织起义的邓述民、吴体珂、何超腾、朱斌、雷夏电等人。邓述民、雷夏电等在王陵基部队中立即被捕，并逮捕了雷夏电营中的一些人。同时，龙国璋又带领便衣特务和手枪队，在万县城街上到处捕人。由于龙国璋对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十分熟悉，首先逮捕了县委委员任孟琼。县委代理书记吴体珂听说龙国璋叛变了，便去找联络站的任天钧要他通知周晓怀立即转移。吴体珂与任分手后，就到高笋塘去接读书的妹妹一道回乡下去，刚离开学校走到鸡公岭，

便被龙国璋带着特务将他逮捕了。接着，龙国璋又去到杨柳嘴党的联络站，想逮捕大周区委书记周晓怀，未找到周，便把副书记任天钧抓进了监狱。但仍不甘心，又到周晓怀的舅子何炙五家抓周，还是没抓到，就将何炙五抓走了。叛徒龙国璋带着便衣特务和手枪队在一个月时间内，共逮捕了党员和进步群众八十多人。党员王恺，根本未参与这次起义，在街头碰见龙国璋，也被逮捕。

邓述民、任孟琼等被捕后，关在一个牢房里，他们曾商议出钱买活士兵将叛徒龙国璋杀死，死无对证，就可以挽救被捕的人。但因龙国璋叛变后受到优待，住在副官室，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县委代理书记吴体珂才二十多岁，十分英勇，又会拳术，被捕后押送敌司令部，四个敌兵要来给他上脚镣手铐，他便拳打脚踢，把四个敌兵都打退了。后又涌来更多的敌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上了大刑。

当时，党在军阀部队中接二连三的搞兵变，弄得军阀们焦头烂额，如坐针毡。刘湘一听说万县又发生兵变，而且目的是想让两支红军在万县会师，他恨之入骨，便命令王陵基，一定要严加惩办。

7月30日，王陵基在大操场刑场召开大会，公开审讯吴体珂、邓述民等几个共产党员。那正是伏天，大操场搭着高台，王陵基高坐台上。共产党员吴体珂、邓述民、何超腾、曹世新、朱斌等五人，被五花大绑捆进刑场。吴体珂等被捆绑走出营门时，就不断高呼口号，痛骂祸国殃民的军阀。到了刑场，王要他们跪下，他们挺身站，头高昂，一个个横眉冷对，怒视王陵基。王在台上刚一开口问：“你们那个是共产党？”五人齐声回答：“我们都

是共产党！”接着五个党员便把刑场当战场，对着王高声痛骂。你一言，我一语，历数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其中以吴体珂骂声最响。王气急败坏，点着吴体珂的名说，若再骂，就挖他的心肝。吴体珂挣脱捉住他的兵士，往王面前走去，更放高了声音：“挖吧！挖开来，我的心也是鲜红的！”在场的士兵和老百姓，都被共产党员们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王暴跳如雷，摘下墨镜，露出刽子手的本来面目，声嘶力竭地狂呼：“给我杀！杀！杀！”回答他的，是共产党员们的口号声：“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优秀的共产党员吴体珂、邓述民、何超腾、曹世新、朱斌等五人，当即被枪杀了。灭绝人性的王陵基，为了发泄心头的仇恨，行刑后，竟采用中世纪野蛮残暴的手段将吴体珂尸体剖腹挖心。

参与武装起义的雷夏电，当时未被枪杀，被押送重庆刘湘军部关押一年多后释放。雷夏电下面的连排长和士兵，凡是参与这次起义的，都被捆绑着，秘密地弄到钟鼓楼江边沉了水。其余被捕的，如任天钧判死刑，后改为八年徒刑，任孟琼花了五百元大洋才被保出狱。有的受株连的如何炎五等，也被关了一段时间才放出来。这次兵变又遭镇压而失败。

（中共万县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杜之祥整理）

叙永特区游击队

1934年1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在全川工作计划中提出“扩大叙永、古宋苗民自治区的组织，发动游击战争。”同年2月19日至28日，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在叙永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中心县委机关迁到叙永，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以叙永、古蔺、古宋、纳溪、合江、赤水等地为中心，组织群众斗争。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住在叙永，深入到两河口、黄泥嘴、分水岭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春荒斗争，进而引导农民拿起武器，酝酿成立游击队。这一系列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脱党回乡在黄泥嘴活动的王逸涛，于8月12日晚，约集共青团黄泥支部书记饶书麟、宣传委员王元富、组织委员王元贵和群众王元武等十余人，携带手枪三支、步枪两支和梭标、马刀等武器上狮子岩。13日上午，叙永县长秦炯昌派两河镇长杨济安、镇团防队长廖长发率队到黄泥嘴抓捕王逸涛扑空，便将住在城里的王妻逮捕，送往泸州关押。王逸涛等上山后不几天，派王元贵进城向团县委汇报情况，要求上级派人去领导。为了扩大队伍，又派饶书麟到云南威信高田，利用世交关系争取到威信坟坝杨登高绿林武装四十人参加。双方协商结果，仍就地分开活动。中共叙永特区区委将情况向泸县中心县委汇报后，10月，邹风平亲自到游击区，正式成立“叙永特区游击队”，王逸涛任队长。中心县委给游击队提出三大任务：一、打土豪，破仓分粮，给群众以利益；二、恢复群众组织，彻底摧毁农村封建统治机构；三、尽量搜集枪支，武装自己，壮大

力量。并先后派中心县委委员张友德，团中心县委书记曹德渊，叙永特区区委书记李石坚，团县委巡视员朱华清，党员梁亚伯等到游击队去加强组织领导。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扩大了游击队，重建了农会组织，摧毁了部分农村反动政权，建立了公粮公款制度。11月，杨济安、廖长发在县政府的授意下，又率队去袭击游击队。游击队得知消息，埋伏大坳口密林中，待团队一到，开枪击毙廖长发，打伤团丁二人。接着，游击队在川滇边境田沟、黑泥沟、黄丝坳、海龙一带积极开展活动，使敌人惶惶不安。两河镇代镇长杨俊襄向县府报称：“王逸涛勾结郑香谷、艾宗藩、杨登高等匪在滇边田沟、木厂一带，聚二百余人，虎视职镇……”。叙永县长秦炯昌也急电二十一军声称：“查县属两河镇共匪王逸涛，宣传赤化，开枪拒捕，曾经呈报在案，迭经军团攻击，山梁林密，现已逃遁无踪，除严飭团队搜索外，应请军部通令戎区各军，各县政府，协缉归案……”。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叙永特区游击队发展到二百多人；在两河盖首山建立八支拥有二十多人的苗民赤卫队；与云南水田寨郑香谷、艾宗藩武装建立了统战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筹集了活动经费。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到达古蔺、叙永一带。叙永特区游击队派出一名侦察员去探听消息，探得红军已离叙永不远。游击队即派张友德带上一个队员去与红军联系。第二天，张友德回来将情况作了汇报后，游击队立即向红军大部队靠拢。

2月4日（乙亥年正月初一），红三军团到达黄泥嘴时，通知汪洋（王逸涛化名）面谈。当晚部队在木厂宿营，政治部派周守如（原遵义革命委员会成员）、周司和（地下党员、在遵义参加红军）二人同三军团群众工作部部长罗明一道，与游击队负责人开会。会上政治部负责人要叙永特区游击队写个报告，由政治

部转到中央去。同时将周守如、周司和、何宗舟（三军团五师十四团总支书记）、戴元昌（红军干部）和一个姓张的红军战士派到游击队工作。当天晚上，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叙永五龙山张玉恒家，热情地接见了政治部派到游击队的人员和游击队负责人王逸涛、张友德、李石坚、梁亚伯、朱华清等。彭军团长还讲了话，大意是：红军冲破敌人五次“围剿”，经湖南、贵州到四川，走了这么远的路程，想不到在这里会着你们，真是难得呀！他还讲了革命形势和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中央决定建立新根据地的意义，询问了游击队的情况。当听完游击队汇报后，又勉励大家加强团结，坚定信心，在配合红军北渡金沙江时，英勇作战。第二天，三军团派到游击队的人员和留下的一些伤病员，带着五十支汉阳枪、六挺重机枪在叙永石道圈与游击队会合。叙永特区游击队扩充后，共有一百八十多人枪，由王逸涛任队长，何宗舟任政委，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周司和，指导员周守如；第二大队队长曾春炳（原红三军团某部营长），第三大队队长杨登高。不几天，在土城战斗中负伤寄养在五龙山苗民家里的陈兴才（三军团五师十五团副特派员）也到了游击队，负责群众工作。游击队转移到川滇边境活动，派曹德渊、朱华清二人到两河口开展地方工作。

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期间，根据刚颁布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的：“一、三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决定和关于创建川滇黔边区新的根据地的精神，抽调干部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以下简称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下简称纵队）。2月10日，军委在扎西召开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一百多名干部的会议。为了做好留下干部

的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给大家讲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战斗任务，使干部们深受教育，消除了一部份人不愿离开大部队到游击队去工作的思想情绪，一致表示要服从中央分配，安下心来，坚持斗争。根据中央决定，中共川南特委由徐策（原红三军团五师政委）、戴元怀（原红八军团民运部长），余泽鸿（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夏才曦和邹风平等五人组成。徐策任书记。川南特委直属中央，领导金沙江以东，长江以南（含泸县中心县委在内）区域内的工作。中央军委还抽调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个修枪工人，加强纵队力量，并号召行军中掉队的红军伤病人员留下来参加纵队。

2月12日，纵队跟随中央红军后卫部队东进到叙永县底塔四合头，才同主力红军告别。2月14日，纵队到达叙永分水岭附近，特区游击队派周守如前去与纵队联系，叙永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立即赶到树坪与纵队汇合。从此，叙永特区游击队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崇庆分州兵变

1934年2、3月间，中共川南特支派出共产党员严景鸿、孟鹤松和老张（名不详），先后到崇庆分州五团组织兵变。严、孟二人来到分州后，一面鼓励隐蔽待机的一营副营长、共产党员杨家桢投入兵运，秘密在士兵中宣传。为了培养骨干和保密，把重点放在中士和班长一级身上。不久，二营八连六班班长李杰、七班中士王汉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建立了两个党支部，由孟鹤松和李杰分任书记。严、孟二人离开后，川南特支派去了联络员老张。他组织五团党员学习政治和军事，逐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形成了党对分州兵变的领导核心。

7月，老张向五团党组织传达了中共川南特支对兵变的行动指示：把队伍拉到崇大山区，打开局面。老张阐述了发动兵变的必要性、可能性。还分析了在这里组织兵变的有利条件多：一是党的力量强，有士兵基础；二是分州背靠邛崃山脉苟万山区，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力量单薄；三是以团长为首的军官不大管事，便于行动。党内认识获得统一后，便积极开始了兵变的准备工作。

8月，支部书记李杰到大邑县灌口场二营六连驻地，联系中士贺云武，发动他拖出人枪到万家坪参加兵变。贺云武却向连部密报。事泄后，李杰转移。其他党员还在三、八连留守分州驻地城隍庙鼓动士兵，被回防分州的六连长察觉，密报与一营副营长杨家桢。杨以其特殊身份，巧妙掩护，保护了同志。

同时，老张深入到大邑县灌口场李家营、和平乡，向农民、手工业者宣传党的土地革命主张。濒临兵变前十几天，他把四十多名手工业工人、贫雇农青年，派到分州五团当兵，增加了五团起义队伍的工农成份，壮大了基础力量。

9月，中共川南特支与五团党组织分析了起义条件：由于党的组织壮大，士兵基础较好，兵变条件已趋成熟，遂决定举事。

起义前夕，党对兵变的部署，作了周密安排。首先选定一营三连驻地毛郎镇为突破口，该镇虽仅隔分州十来里，但交通闭塞，起义后，只要破坏通讯设施，消息即被封锁；三连是孤军一支，驻毛郎镇与分州难于呼应，加以连长作恶多端，只要有兵变之举，士兵会一呼百应。于是，决定三连发动起义后，即去分州接应其他连队，并攻取团部，然后去邛大与川康边工农红军游击队会合。

10月，兵变之夜，五团党组织将三连执勤哨长换成了党的积极分子中士郑良、朱云清。午夜时分，郑、朱二人在毛郎镇下场口鸣枪数响，发出起义信号，起义兵立即趁报警之机，镇压了连长邓从文。接着，又击毙了为虎作伥、虐待士兵的一排长夏士杰、二排排长刘庆生和反对兵变的副班长罗志普，砸开了武器库。与此同时，兵变指挥者密令起义中要注意控制部分爱闹事的士兵，教育他们同情并参与兵变；一面命令手工业工人出身的周祥久切断电线，中断敌人的通讯联络。部署完毕，就在台子坝召开士兵大会，中士刘杰宣布：我们现在是红军队伍，要马上到邛崃马鞍山去。接着，部队火速开赴分州。到了北门，已是翌日凌晨两点，他们砸开棚门，先奔天侯宫一营部和一、二连驻地。副营长、共产党员杨家桢未得起义通知，已下乡征粮去了。营长陈敬能、二连排长白殿帆、林治狼狈逃跑。一营起义成功。接着，

兵分两路：一路沿棕绳街向二营各连接应，一路进攻团部以打乱敌人的指挥中心。进军中，因二营八连起义时间提前，失去了配合。当天候官传出枪声时，正在八连聚赌的二营长黄光辉，急忙向正西街天主堂团部闯去。八连长朱士玉命令封锁武器库，不准士兵走动。又令连部门口兵士，抽起石板作工事依托，封锁街巷。这时，兵变队伍正向八连冲来，执勤哨长邱少云急令开枪。兵变队伍没有还击，只接走李杰、王汉和黄俊三人。进攻团部时，因口令不合而被守卫阻击。团长闻讯组织二营在分州要道口安步哨、扎口子，力图挽回颓势。

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无谓牺牲，兵变队伍沿西衙门观音阁的小路朝西山乡转移。部队出了分州，行军到崇庆县苟万山区王家沟时，郑良宣布了行军任务，略事休整，作了组织安排，将兵变队伍建成大队，由陶永祥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陶永祥率大队，跨越苟万山区，朝邛崃县急驰。翌日中午，大队才在离分州约八十里的大邑陈家场稍事休息。

这时，黄光辉受旅长黄鳌令指派，带上二营沿晋原山从大邑锄河乡追赶起义部队，崇庆县城杨庶咸旅两个团也参加围堵。为了避开敌人，保守行军秘密，大队离开平坝，隐入山区，在大邑雾中山区行进。

两天后，大队仍未同中共川南特支联络员接上关系，部队中有人主张去投二十四军，意见未得统一。第三天起程时，殿后部队同追兵遭遇。大队就在神仙桥扼守，各中队交叉掩护转移，把追兵甩得远远的。敌人失去追击目标，悻悻地从苟万山区返回分州。

神仙桥阻击战中，党支部书记李杰被捕，大队散失了少数人，经过休整，继续进军。到了第四天，上级党的联络员仍然渺

无踪影，给养几乎断绝，大队的生存受到威胁。上午，在险峻的撮箕口，突然发现有部队防堵，阻住去路。此时大队已失去领导中心，分队长刘杰派人去谈判。经谈判才知部队已进入雅属芦山、宝兴地界，堵路的队伍是特务大队长周少成的队伍。刘杰眼见与党的联络无望，给养断绝，就把队伍带了过去。最后，兵变队伍大部分被二十四军鲸吞，少部分坚持到了邛崃夹关，参加了抗捐军的斗争。

李杰被捕后，在团部大院受审。他慷慨陈词，历数国民党、军阀的腐败和罪恶，遭到毒打，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枪杀。不久老张在大邑被捕入狱，两月后，被大劈于大邑西门，壮烈牺牲。

(中共荣庆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郑世林整理)

南 六 游 击 队

川南六属包括高县、珙县、庆符、长宁、筠连、兴文等县广大地域。它北邻长江，南接云南，是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好地方。

1934年秋，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宋（古宋）、兴（兴文）特支在兴文县五村召开会议，决定以“红军之友社”、“反帝同盟”中的主要成员为骨干，组建“宋兴游击队”。开始时只有十多人，以后发动农民参军，发展到几十人。由特支宣传委员郭平安任队长，组织委员杨泽久任副队长，金泽华任指导员，活动于古宋、兴文一带。不久，特支书记刘复初又到长宁桂花坪，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并通过杨介中争取绿林头目王少章率队参加，在江安楠木林组织了“江安游击队”。特支决定由杨介中任队长，杨淑宽任指导员，王少章任副队长，活动于江安、长宁、珙县一带。同年11月，宋兴特支决定将两支游击队合并，统称为“南六游击队”，由刘复初任政委，郭平安任副队长，下辖两个分队，原“宋兴游击队”为第一分队，原“江安游击队”为第二分队。两队联合行动，在兴文县莲花坳攻打乡长瞿香浦家，缴获民团长短枪二十余支，子弹上千发来武装自己。后来两个队仍按原游击区域分开活动。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渡赤水后，路过五村，游击队曾派人前往取得联系。同年3月初，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到达兴文建武时，刘复初前去联系，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听取了刘的汇报。特委对南六游

击队的情况作了研究后，决定将南六游击队改名为“川南游击支队”，直属川南特委领导，由刘复初任支队队长，派戴德昌（又名邓楷）任支队政委，支队暂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纵队行动。从此，支队活动更加频繁，在江安、兴文一带，打击土豪劣绅，收缴民团枪支弹药，又打进江安红桥，烧了土豪陈学武的碉堡，在街上开仓分粮、分盐给穷苦老百姓，受到群众的支持和赞扬。

4月，支队在兴文青联乡活动时，王德兴带古宋义合民团前来袭击，杨泽久、袁绍明二人牺牲。

7月上旬，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朱家山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师，部队合编为两个支队，纵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后纵队在长官司战斗中伤亡一百余人，特委在簸箕坝开会决定让川南游击支队归队。

川南游击支队接到特委“从速归队”的通知后，便向纵队靠拢，8月30日，从五村进至德广寨，次日拂晓，兴文县保安队长杨吉之带队来袭，支队在大雾中虚张声势，发起冲锋，击毙敌队长周洪发，打伤敌十余人，缴枪十余支和一些子弹。9月2日，支队从顺河回到五村，正逢赶场，在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在麻房抓获的税官周维之，大快人心。当日中午，敌李品三部向游击队扑来，在场上展开了巷战，支队为了保护赶场群众，边打边撤到场外。11日，支队到达兴文博望山，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会合时，只有第一分队六十余人。第二分队因距离较远，未能前来。合队后纵队进行组编，除原有两个支队不动外，将南六游击队编为第三支队。特委决定刘复初任纵队参谋长。南六游击队从成立到纵队合队，经历一年时间，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踏上了新的征途。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叙永县委
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张新时、古高门整理）

青神西山农民暴动

1927年春，在川西特委领导下，中共青神特支建立。1928年下半年，青神特支改为中共青神县委，在各乡广泛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34年，在青神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全县参加工会、农会等组织的群众达1282人；组织了游击队、赤卫队、鲜花队、儿童队等；有计划吸收一批积极分子加入党团组织作为骨干，先后发展党员183人，团员24人。

9月，嘉定中心县委被破坏后，青神中心县委建立，许本达（绰号许黄牛，射洪香山乡人）任书记，刘怀斌（乐山青龙乡人）任组织，段兆麟（青神青城乡人）任宣传，邱骏（井研城厢镇人）任军事，毛慈影（人呼毛姑儿，自贡市沿滩区卫坪乡人）任妇运，邹焜望（即易澄，眉山永寿镇人）任宣传干事，段玉章（青神青城乡人）任秘书。

青神中心县委建立后，遵照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配合红军行动，……迅速组织各种革命战争，发动游击队，分田打土豪，……骚动敌人”等指示精神，认真分析了青神的革命形势，决定组织西山农民暴动。11月下旬，省委派团省委宣传部周亚光到青神中心县委指导工作。

1934年12月11日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西山农民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12月13日晚上，中心县委在土主乡程家祠堂召开起义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梧风、土主、桂花、新场等乡的农民群众，计

约三百余人。军事委员邱骏代表中心县委作动员报告，并宣布了武装暴动的注意事项。

12月14日上午，中心县委在土主乡举行骨干会议，对起义计划进行了详细研究。参加会议的有许本达、刘怀斌、邱骏、段兆麟、毛慈影、王绍清、王绍东等人。决定趁梧凤乡副乡长、团正罗明山建房宴宾的机会举行暴动，争取抓几个赴宴的团正、乡长和冬防队长。会后，又派刘怀斌到新路口找费清华，组织武装响应（后因新路口封渡，未能过河）；还派邓锡成、刘子和、葛洪安先到罗明山家侦察，并在起义队伍集结处四面设岗，以防走漏消息。

12月14日（阴历冬月初八）晚，梧凤乡副乡长、团正罗明山举行新房落成宴会。此时，罗家灯火通明，鞭炮声频频，酒宴正酣。正当土豪劣绅们宴集的时候，梧、土交界的观音阁河坝上，党领导下的西山农民举着土枪、斧头、长矛、手榴弹、马刀、棍棒，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来了。农民起义队伍簇拥着一面大红旗和三面小红旗，大红旗上绣着斧头镰刀和一排闪闪发光的文字：“苏维埃政府四川省青神县西山红军”。起义队伍共约三百余人，分为三个分队，起义首先就从打罗明山开始。这时，侦察员邓锡成赶来报告说：罗明山家的头轮宴席已过，现在已开始坐二轮了。邱骏立即下达出发的命令，起义队伍分作三路，红旗引导，向罗明山家飞奔而去。

罗明山家有两班冬防团丁担任警卫，起义队伍悄悄地将罗明山家包围之后，便迅速分头行动。担负包围任务的在外面将鞭炮点燃，放入煤油桶内，以“机关枪”声助威。担负攻击任务的一涌而上，缴了冬防团丁的械，砍伤了四名企图顽抗的冬防团丁。罗明山吓得躲进内室，被张树荣揪了出来，准备押到梧凤场

街上去处决。这时，大甲长朱银山连忙上前圆场，妄图涣散军心，被周义和飞起一刀砍死。地痞何金海一见杀了朱银山便急忙上前阻拦，邱骏手起刀落，又将何清海斩于人前。接着毛慈影跳到桌上作了简短的宣讲，说明这次起义主要是打贪官污吏，打土豪劣绅，铲除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其他人不要惊慌。乡长何汇川侥幸逃脱。冬防队长杨树高走到东岳庙，听见枪声又转回罗家，刚走到罗家门外警戒处，被站岗的队员结果了性命。接着，起义队伍向梧凤场进发，在途中将为非作歹的的罗明山处决。

起义队伍抵达梧凤场口，受到冬防团丁阻击，邓锡成扔出一颗手榴弹，炸伤了一个冬防团丁，余者望风逃散。起义队伍乘势攻进梧凤场，砸了乡公所，接着便去捉拿乡长何汇川。何从罗明山家回梧凤场后，得知农民起义的消息，便躲藏起来，未被抓获。起义队员们便抄了何汇川的家，将各种田产契约、帐簿，连同乡公所的公文一起全部烧毁。此时，“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震动了梧凤场。随后，起义队伍又急速向土主场前进。

起义队伍到达土主场后，便分兵两路：一路去攻打乡公所，一路去捉拿土主乡乡长刘耀安和团正刘美成。因镇守乡公所的冬防团丁由刘绍轩（冬防队长）带出巡夜未归，乡公所即被顺利拿下，缴获枪两支、电话机一部。刘耀安、刘美成早已闻讯躲藏起来，未被拿获。起义队伍便抄了他们的家，将其田产契约、帐簿，尽行烧毁。

接着起义队伍便火速向夹江的新场进击，砸了新场乡公所，抄了一些土豪劣绅的家，将其田产契约堆于街头当众烧毁，枪支、弹药等武器一并没收，并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万岁”等宣传标语四处张贴，结束了战斗。

这次武装起义，斩杀了恶贯满盈的团正、冬防队长、大甲长等四人，杀伤冬防团丁五人，砸了三个乡公所，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弹药，抄了九户土豪劣绅的家，烧毁了田产契约，取得了重大胜利。战斗结束时，天已将明。中心县委决定：起义队伍中离家近的分散回家隐蔽，起义骨干和离家远的约七八十人开往新场附近的安子冲休息待命，准备十五日夜间攻打青神县城。

当起义队伍刚进梧桐场的时候，青神县政府已得报告。即一面用电话通知眉山、夹江；一面指派县精选队长徐仲容，司务长何德馨，清共会侦缉员吉山（叛徒）等率青神县精选队连夜赶往梧、土、桂、新，镇压起义农民。同时，夹江县长罗国钧也得到土主乡长龚纯嘏的报告，罗即命代理模范中队长何秉荣率夹江县模范中队分三路向新场合击；命特务队长宿炳荣率特务队经土门前往梧桐、土主转新场。并向国民党二十一军驻眉山教导师二旅范子英告急，范即派两个连前往新场配合“围剿”。

12月15日拂晓，各路反动军警陆续向新场聚集。

起义队伍正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突然岗哨飞报发现敌人，情况危急。中心县委命令起义队伍全力抵抗，从后山突围转移。敌人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发起了冲锋。起义队伍由于人少武器少，在敌人猖狂进攻下，许本达、段兆麟、王绍东、王福廷、丁海云、王玉凡等七人当场壮烈牺牲，方友生身负重伤。毛慈影和邱骏一起冲在前面，带领队伍突围，终因寡不敌众，当场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王绍清、宋甫成、罗绍成等二十五人。

12月16日早晨，敌人进行搜山，将许本达、段兆麟、王绍东、丁海云、王福廷、王中品等六人的头颅切下，将身负重伤的方友生杀害，割下头颅。还将这些革命者的人头分别挑回青神、夹江两县，悬于城门“示众”。

接着，敌人又大举“清乡”，逮捕了赵汉生、邓锡成等及其家属共二十多人。

敌人将毛慈影、邱骏等人解送夹江、眉山及成都督办公署将军衙门关押审讯，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手段妄图强迫其叛党。毛、邱二人，遭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从毛、邱嘴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便将他们押回青神杀害。还先后残酷地杀害了王绍清、肖子州、邓锡成、刘荣华、赵永清等。赵杨氏、宋甫成被关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至此，西山起义的革命者共被反动派残酷杀害十八人之多。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

（中共青神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中共夹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剑 阁 兵 变

1933年,中共四川省委军委负责人侯伯英遵省军委指示,打入驻崇宁的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军支,准备组织兵变,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斗争。

4月,侯伯英发展二团六连连长李奇柱(又名李鹏)入党。这年冬天,侯伯英调走,省军委派叶伯刚接替侯的工作。10月,相继吸收六连士兵吴建初、郭林森入党。

1934年春,二营营长彭友朋赴庐山受训,由李奇柱代理营长职务。党员们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从建立个人感情入手,利用同乡、同学、亲朋、宗族等关系,结拜“盟兄弟”,组织“红军之友社”,使社员的思想倾向共产党的主张,逐渐成为革命力量。其后,彭友朋从庐山回来,加强了反共活动,对李奇柱等人产生了怀疑。鉴于形势渐趋紧张,为了加强领导力量,经李奇柱等人请求,省军委相继派共产党员阮自强、熊子祥、王云武三人来到六连入伍(阮自强化名谢得成,对外宣称是李奇柱的妻弟),正式成立了军支,阮自强任支部书记,吴建初任组织委员,熊子祥任宣传委员。

党支部建立后,党的工作加强了,相继发展了黄时金、蒋得钦、汪树西、李钰炽等人入党。党员们在部队中宣传革命,发展力量,准备举行兵变。

1934年10月,六混成旅离开崇宁,开往川北剑阁张王庙驻防。党支部抓紧时机,积极做兵变准备。经过努力,“红军之友

社”社员及“盟兄弟”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有党员十余人。冬月初，部队开往剑阁江口嘉陵江江防前线。二团团部驻穿井山，二营驻守高口坎至风陡坪一带，营部驻高石坎院内。江对面就是苏区，两边动静相互都能看见。

部队驻扎下来后，党员们就经常找当地百姓攀谈、聊天，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打下了群众基础。

经过对各方面的情况侦察、分析，党支部选定渡江方便、距营部驻地十华里处的立沟河为兵变地址。并派党员黄时金渡江，与红军联系并汇报兵变方案：一、接应红军渡江，冲破川军的江防全线；二、请红军配合，吃掉二团，扎住阵脚，继攻旅部；三、打个稀烂，带上枪支弹药，过江投入红军。

黄时金过江十多天，杳无音信。又派党员王云武过江，还是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由于误会，黄、王二人被红军错误关杀）。这时彭友朋等人对李奇柱更加怀疑，加强了戒备，共产党员、进步人员屡遭打击，兵变计划有暴露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党支部当机立断，决定在1934年1月8日晚十一时，按第三套方案举行兵变。关于兵变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依靠革命力量，团结一般群众，强制思想保守的倒戈，打烂营部，进攻团部。具体部署是：李奇柱带第一排攻打五连；吴建初指挥二排，警戒江口方向的三营来犯；李钰炽带领三排，协同八连，攻打营部，挟持七连；阮自强坚守渡口。联络信号是连响三枪，即集合渡江。

1月8日夜里，寒霜袭人，李奇柱到陈家埭与吴建初商量，决定立即行动。吴建初叫起盟兄弟李荣楷，刀劈正在酣睡的二排反动排长潘大章。响动惊醒了同屋住的班长刘德清，刘抓枪不遂，立即窜出屋去，奔往五班。当李荣楷带人去五班时，五班长陈明远开枪射击。原定不响枪的计划就此落空。

李奇柱从陈家埭转去，和熊子祥一起去执行任务。熊子祥用绑带勒死了刚换哨来的反动士兵彭刚（营长彭友朋的侄儿）。在处决彭的过程中，陈家埭的枪声响了，李奇柱也即开枪打死了另一个反动士兵。另一士兵惊嚇求饶，只逃脱了司务长沈清云。

三排在排长李钰炽的带领下，一一解决本排反动力量后，即去打攻营部。八连连长陈汉兴、营长彭友朋闻讯逃走。三排攻击营部，不见动静，又回转立沟河。

另一路，李奇柱与郭林森带领一排赶到五连住地，在院外埋伏好后，派侯万一与另一个士兵进院。侯开枪打倒了李杰三。八连的三个排长躲进了碉堡，并向外开枪猛射，李奇柱、郭林森不得不指挥士兵迎击。

大约在凌晨三点左右，各处枪声停止。江对面的苏区仍无动静，而团长汪良调动的一营、三营兵力，已开始从南北两路抵近。所幸晨雾弥江，敌人一时还不敢向兵变人员贸然进攻，李奇柱、阮自强、吴建初立即决定发号收兵，登上由当地群众帮助准备的小船，渡江投红军。天渐亮了，敌人袭击的火力不断逼近，而渡船很小，兵变人员得分几批才能渡完。第一船渡的后勤人员，第二次渡过的一船人，站在对岸用火力掩护，待第三次渡过李钰炽等人后，由于敌人火力更加猛烈，再已不能返回渡人。这样，留在西岸的刘清云、夏子恩、祝青山、汪树西等，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赵云等七人亦遭杀害，蒋得钦被羁押。

1月9日早晨，参加兵变渡过江的五十七位战士，带着枪弹药品进入了苏区，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接见了全体人员，五十七位赤子从此成为光荣的中国工农红军。

（中共剑阁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云阳武装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等地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川籍青年学生赵唯等人，先后回到云阳，积极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赵唯在集镇窄口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又接通了农坝乡的党组织关系。经过一年的努力，农坝乡党支部控制了农坝乡政权。同时，还通过办“三友社”、白云小学、民团指挥部、民丁干部训练所和贫农团等组织来培养革命力量，并设法与红军联系。1933年11月，谭林、邓友民、孔繁祐受上海军委派遣回到云阳组织工农武装起义。他们认为这时川东已无红三军、红四方面军合围之势，反动势力暂时稳定，立即组织武装起义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于是在盘石镇成立了党支部，以此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云阳青年反帝大同盟盟员。随后又建立了云阳城党支部，通过社交，组织“七九篮球队”、“五四球队”、“++球队”等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还把《云阳日报》变成了党的宣传阵地。

经过党组织艰苦的工作，云阳北岸的农坝，城关和南岸的盘石等地党组织和青年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得到开展，并影响到了云安盐场的工人及船工、学生，以及地方武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1934年夏秋间，谭林、赵唯等成立了中共云阳工作委员会，积极准备进行武装斗争。派孔繁祐到上海向军委请示汇报工作，并通过不断做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和派人打进民团去的方式，掌握了一部份武装，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还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使

云阳拥有十个党支部，近百名党员。至此，中共云阳工作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决定成立“云阳工农武装暴动委员会”，并制定了暴动的详细计划。但由于孔到上海迟迟未归，暴动被迫推延。

1935年1月，由于敌人对云阳党组织的活动有所察觉，开始实行白色恐怖。谭林、陶闾、赵唯决定提前于1月19日夜举行起义。当时云阳城的敌人除了实力较强的杨典文中队和马仲云警卫排外，还有各处来县接受检阅的十个民丁中队。19日下午，指挥部得到报告：农坝乡的队伍和其他各路队伍正在预定地点——城北校场坝附近集合待命，约百余人，引起敌人警觉。于是指挥部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晚上九时，起义队伍分兵两路，由赵唯、张建武率领同时攻打团务委员会和杨典文督练部。但在和敌人遭遇之后均失利，伤亡很大，指挥部命令部队撤回校场坝集结待命。部队刚到校场坝就遭敌军包围，指挥部撤到制高点——观音阁，指挥部队突围。蔡明典为了保护指挥部安全，率掩护部队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后撤至小河口，为了吸引敌军注意力，强渡汤溪，向北往农坝方向撤退。在蔡部的掩护下，指挥部撤至五峰楼山梁，在栖霞宫召开紧急会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停止进攻，起义人员隐蔽待命。并派赵唯、陶闾、温作民去上海向军委汇报。随即，起义主要领导人分散撤退，分别在端午节前后到达上海。

云阳起义后，敌人更加紧了白色恐怖，谭端生、张功武、赵禹等十余人被枪杀，几十人遭逮捕关押。并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谭林、赵唯、陶闾、温作民等人。起义遭敌镇压而失败。

(中共云阳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峨眉武装起义

1935年1月27日，共产党员和成孝（即何克希，峨眉城人，当时系二十四军中校参谋、《川康新闻》社长）、和成弟、唐杰等，根据中央“开拓新的游击区域，发展与创造新的苏区，赤化全川”的指示精神，在峨眉县城举行了武装起义。他们的计划是：动员一切力量，组织起义，占领县城，扩大影响，继续组织力量，打通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创建雷马屏峨赤区，牵制军阀刘湘的军事力量，迎接中央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

当时，峨眉城内仅有地方武装——团务委员会，直辖两个常备中队，第一中队驻县府，中队长是县长的心腹方炎章，第二中队驻团务委员会，中队长是董效舒。而副委员长贺侣皋是书生带兵，徒有虚名，控制不了部队，部队的掌握和调度全在委员长赵明松（县长）手中。

贺侣皋与和成孝、和成弟是表兄弟关系，董效舒又是和成弟的内兄，和氏弟兄则利用这种亲戚关系，常往来于团务委员会，结交一批官兵，进行策反工作。并与中共嘉定中心县委早派往常备队做军运工作的中士班长唐杰互相配合，做好基层士兵工作，组织一批起义骨干力量。同时，利用方吉廷、高德辉两支哥老武装和社会上一批进步青年。和成孝在雅安则利用同事、旧交关系和国民党二十四军一批失职官兵组织了三十余人参加的起义队伍，凑集了一批武器弹药。这样，经过一番组织工作，初步组建了一

支起义的武装力量。

1月14日，和成孝从雅安派许国澄回峨眉与和成弟联系，了解准备情况。16日，许回雅安向和汇报后，19日，和在《川康新闻》社内召开会议商定：1月27日午后四时，以县府东西辕两处的手榴弹响为起义信号；起义人员一律以红棉带系腰为标志；布置了各担负的攻守地点、街道；指挥所设在城南外十方院高地。22日，雅安到峨眉参加起义的三十余人先后出发，许国澄24日抵峨，方言廷25日到达九里场待命，和成孝26日到达峨眉。傍晚，在小南门外观音井召集主要成员开会布置。会后，唐杰偕同苏子模去进一步做常备队班长赵玉贵起义的工作，赵也欣然同意。这样，县城的小南门为唐杰班守卫，县城的大南门为赵玉贵班守卫，大、小南门就成为起义人员进出的通道。

1月27日早上，唐杰派人在县府电话室附近监视，窃取县长的情报，并布置了起义后截断县府、团务委员会的电话线。上午，一中队分队长方炎章有所觉察，询问赵玉贵。赵即将唐杰约他参加起义事供出，方就布置赵监视唐的行动，并随即报告县长。县长赵明松闻惊，一面在电话上通知驻九里的常备分队跑步回城，保卫县城；一面派方炎章立即率人至小南门逮捕唐杰。唐已从监视电话人处得知这个情况，作了准备，带领士兵向方开枪还击。唐杰和士兵五人寡不敌众，边打边退，跳城墙而逃。苏子模不知赵玉贵叛变，仍按原计划到大南门约赵玉贵起义，赵即向苏开枪，苏跳墙出走不及，左腿受伤被捕，于翌年1月8日杀害于北门城墙边。因敌人抢前行动，起义被迫提前到午后一时，而城外参加起义的人员尚未赶到，接应不上，城内的起义人员难于应战，陆续撤退。县府命令关城搜捕。

撤退至青龙一带的部份起义人员，遭到国民党派来镇压峨眉

起义的二十一军模范师刘绍斋团的“围剿”，被围困在八仙洞的人员，在粮尽、烟熏的情况下，奋起突围，杨楷、唐凯等人被捕。唐杰转移至峨眉边活动，被出卖遭捕，解送回峨眉，投入大监。唐杰、杨楷、唐凯等人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惨遭杀害，悬首“示众”。由于刘绍斋残暴地执行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清乡”政策，还使一百多无辜群众惨遭屠杀。

另一部份起义人员撤退至雅安后，由和成孝收集一百余人，在洪雅至雅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曾想抢越飞仙关去找红军，但为国民党二十一军杨子惠部死守，未能实现。这时，国民党悬赏通缉和成孝等人，又调集大批部队进行“清剿”，和部只好化整为零开展活动。4月，和成孝只身到成都向省委请示，省委负责同志将其派往上海。

(中共峨眉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川南游击纵队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川南地方党组织——泸县中心县委，决定全力加强长江南岸渡口工作，派李亚群为特派员，去南岸组织武装，相机接应中央红军。此前，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已将工作重点转向叙永农村，他亲自去黄泥嘴视察了这年8月成立的叙永游击队，审查恢复了游击队负责人王逸涛的党籍。并派县委委员张友德、党员梁亚伯到游击队加强领导，带领游击队在川滇边境田沟、木厂一带发动群众，破仓分粮，搜集枪弹，扩大武装。与此同时，（古）宋、兴（文）特支决定将秋后成立的宋兴游击队和江（安）长（宁）游击队合并，改称南六游击队，郭平安为队长，特支书记刘复初兼游击队政委，在江、长、兴一带活动。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在黔北土城与川军两个旅激战失利后，分三路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域。

1935年2月初，叙永游击队与红三军团取得联系。2月4日，军团长彭德怀接见了游击队领导人王逸涛、张友德等人。党中央得知叙永游击队的情况后，即派红五师十四团总支书记何宗舟、原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周守如带领数十名红军和一批武器，扩充到叙永游击队，指定王逸涛任队长，何宗舟任政委，下编三个大队。

1935年2月，红军进驻云南扎西时，中央军委决定选派一批干部和战士，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央指定徐策（三军

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八军团民运部部长)、夏才曦、邹风平(泸县中心县委书记)五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以徐策任书记,戴元怀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川南特委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领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活动地区及泸县中心县委所属地区的工作。

2月中旬,中央红军回师黔北,途经川南时,又抽调了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队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个修枪工人,加上一批伤病员,共四百多人,与叙永游击队汇合后到五龙山召开大会,由徐策传达中央指示,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纵队司令员王逸涛,政治委员徐策,副司令员曾春鉴(三军团六师参谋长),参谋长刘干臣(新编师师长)。纵队共约六百人,编为五个大队,大队设大队长和指导员。纵队有党团员一百多人。特委召开了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的决定,宣布了特委的组成以及健全纵队党组织,纵队建立一个党总支、五个党支部和一个由总支直接领导的三大队党小组。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成立以后,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特委带领游击纵队向川南纵深穿插,迷惑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回师黔北。这时,敌人对红军突然东返的意图捉摸不定,把进至叙永黄泥嘴一带的纵队当作是红军留在川南的一支主力,以为红军仍要攻占叙永、北渡长江,于是急令川军第一路范子英旅兼程由金鹅池向两河口截击,第二路达凤岗旅回守叙永,魏楷旅驻防古蔺。滇敌也深恐纵队乘隙入滇,急令到达分水岭之龚顺璧旅回守滇边。纵队2月21日进至琐马附近,与范子英指挥的边防四路顾晓帆团遭遇,激战三小时,毙敌分队长王凯等十余人,伤敌团

长，然后沿木厂河前进。敌人惊疑不安，增调田冠五旅援防叙永，张竭诚旅进驻川南，参加堵截，滇军三个旅也在毕节、镇雄一线观望不前。这样，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就吸引和牵制了川军和滇军主力好几个旅，迟滞了敌军的行动。

1935年3月4日下午，纵队在叙永落包与经黄泥嘴追来的顾晓帆团周营和两河镇民团一中队展开激战，毙敌十多人后移到木厂大山梁子上。次日拂晓，敌人利用晨雾两路包抄纵队驻地。战斗十分激烈，纵队四大队长梁亚伯牺牲，队伍在大雾中被冲散，三天后集合拢来，西进兴文建武城。南六游击队得到消息，刘复初立即赶到建武向特委汇报情况。特委研究决定，南六游击队改称红军川南游击支队，直属特委领导，继续留在当地配合行动。纵队继续向川南腹地穿插，3月14日到达长宁梅硐，次日进驻距长宁县（双河镇）仅七里的罗家岩一带，逼近长江，直接威胁纳溪、江安、宜宾，密切配合了中央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的战略行动。敌人急忙调整部署，令陈万仞师扼守江门、叙永、赤水河一线，以黄锦章团指挥江安、长宁、古宋、兴文四县团队向纵队扑来。

3月26日晨，纵队在兴文大石盘山上，陷入黄锦章团和保安大队附李品三率领的江安、长宁、兴文、古宋四县团队的包围。特委组织部长戴元怀带通讯班阻击逼近驻地之敌，掩护部队突围，在激战中英勇牺牲。以后，纵队在川滇边界长官司、罗布坳、簸箕坝、三口塘，斑鸠沟一带迂回，击退叙南保商大队和江安保安大队的围攻，火烧米家山大土豪的碉楼，活捉威信分水乡乡长。4月30日打下水田寨。5月1日移到叙永水潦乡落堡，召开军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徐策在会上作形势报告，颁布了特委制定的《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

为了给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有利条件，中共川南特委陆续派红军干部戴元昌、黄子能到叙永田中山区，动员组织贫苦农民，收留医治数十名红军伤员，建立农民武装，成立了田中区委和赤卫队；派红军干部邓楷（戴德昌，人称“戴麻子”）到长宁梅硐，在余泽鸿父兄的掩护帮助下，串连发动群众，成立了妇女小组、游击队和梅硐区委；派霍绍文（即郝谦）、周守如、朱华清（朱光壁）到叙永两河口，组成两河口区委，在春荒期间，深入偏僻山区，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粮食，并多次为纵队购买子弹药品；派红军干部阮光明、张志高等到威信高田地区，组织农会和农民武装，发展了一些党员，成立了李家沟赤卫队、高田赤卫大队、高田区委和钵咀乡革命委员会。由于地方工作开展得较好，再加之纵队所到之处，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宣传“斗争纲领”，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群众纪律，为民除害，扶穷济贫，因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尽管反动派残酷“清剿”，环境十分险恶，很多贫苦群众还是不顾个人生命和家庭安危，心甘情愿为纵队送粮送菜，带路传信，收留红军伤病员，掩护部队。并有不少各族贫苦青年参加红军游击纵队。

游击队在动员和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的同时，还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纵队每到一个地方，特委都要派人联系或送信给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绿林武装头目和地方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为重，停止内战，不要为虎作伥。其中一些有识之士在党的正确主张感召下，表示拥护抗日，不愿与纵队为敌，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有的还帮助购买子弹，修理枪械，医护伤员，收留失散的红军等。有的绿林武装头目还率部参加纵队，或协同作战。敌人把日益发展壮大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视为心腹大患。蒋介石亲自召见江西吉安专员莫雄，令他

把吉安专署原班人马搬到贵州毕节，“负责剿办”。还从湖南调陈光中师到毕节归莫雄指挥。李云杰二十三师和裴昌会四十七师也奉命开进黔西北相机“协剿”。

5月上旬，中央红军逼昆明，渡金沙江北上之后，敌人将滇军安恩溥旅从元谋调回，驻防彝良、威信，任命镇雄独立营长陇承尧为镇、彝、威民团指挥；川军陈万仞师驻防川南，以穆肃中旅驻叙永、古宋、古蔺，达凤岗旅驻长宁、珙县、高县，周化成部驻兴文、江安，对纵队进行“围剿”。与此同时，游击队领导人王逸涛已对纵队斗争的前途悲观失望，在敌人密信的诱逼下，离队逃到黄泥咀，与特务勾结，叛变投敌。两河口区委成员被迫疏散，交通员王木匠因此被敌捕杀。特委查悉王逸涛叛变，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由徐策兼纵队司令员，并在马家坝召开纵队大会，宣布了这一决定。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纵队于5月26日突袭珙县洛表，打垮叙南保商大队。然后出敌不意，再入长宁。当各地官绅纷纷告急，陈万仞派陈团、顾团和李品三保安大队几路扑来，纵队已迅速转移到川滇边长官司一带休整。6月下旬又插回长宁，接连攻占富兴乡（观音堂）和梅硐场，在梅硐区委和游击小组的配合下，毙伤民团多人，缴获一批枪弹，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名义，张贴布告，处决了压迫群众，勾结军阀团保进攻红军的富兴乡团总余海洲。以后，纵队在周化成部的尾追之下，进占珙县回龙场、筠连新场、沐爱，插进云南。7月4日攻占威信县城。不久，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合，川南特委改组为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组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转战三省边区二十余县，牵制着敌人大量兵力。1935年冬，在敌人重兵“会剿”下，游击队在兴文的炭厂、长宁的梅硐遭到袭击包围，政委余泽鸿牺牲，余部二

十余人转移到连天山坚持斗争。1936年春，游击队逐渐恢复，得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毕节，便开会决定牵制敌人配合长征，在柏洛林、炭厂等地袭击敌人。红二、六军团得知游击队消息后，派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司令阮俊臣率部到川南寻找游击队。6月初两队汇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以阮俊臣为司令、刘复初为政委，共达八九百人，声势大振。敌慌忙部署“三省会剿”，游击队在川滇黔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伤亡减员，到1937年春归于失败，余部在云、贵边分别坚持到1945年和1947年。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张新时整理）

川 陕 游 击 队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在连续发动广昭战役、陕南战役时，为防止敌人趁机反扑，于2月初决定，抽调红三十一军政治部特务队，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三营九连，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一营二连，组建成“川北边区留守阵地游击队”（以下简称“川北游击队”），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一营教导员刘子才为司令，率队驻川陕交界的四川南江县桃园寺。川北游击队又吸收陕南战役初期在小坝、喜神坝建立的地方游击队编为一个团，刘子才任团长。随后，周纯全又以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南江和英安（今旺苍英翠）两县地方干部、南（郑）褒（城）沔（勉县）西南区游击队，同刘子才一团扩编为红军独立师，刘子才任师长。陈昌浩又派去二十多名连级干部和送去五六百支枪。四方面军主力横渡嘉陵江时，九军二十八师宣传队渡江未成，也加入独立师，总共约千人，干部百余人，大部为通南巴籍，陕南人约占四分之一。

独立师在主力红军退出川陕苏区后，即利用川敌尾追红军主力西去，陕南之敌刚受红军“陕南战役”打击，尚未作出新的部署之机，提出守住桃园二百里阵地，把部队发展到一个军，积极向陕南发展的计划。5月至9月，在南郑庙坝、小坝、喜神坝建立两个乡苏维埃、11个村苏维埃、四支地方游击队。独立师又以“川陕游击队”称。

1935年9月，川陕游击队以火堆虚布兵营，神像伪装岗哨，

诱国民党三十八军陈鹏、王耀震两团合围扑空。并化装奇袭魁星楼，重创南郑县保安队，部队活动扩大到南郑黄官岭、沔县园墩子，纵横约五百平方公里的地区。1936年3月，由于刘子才为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麻痹轻敌，在敌三十八军一部追击下，造成游击队二百余人伤亡。随后，又再度遭敌围攻，尽失军事辎重，又牺牲百余人。部队辗转回到桃园台上时，仅存二百六十人左右。而刘子才麻痹轻敌的错误仍在发展，干部普遍不满，推选特务连连长吴三保代理其领导职务。吴三保将部队缩编为两个营，一营（营长王天海）和二营（营长赵明恩）两个作战单位。但又犯高度集中驻守的错误，8月中旬游击队遭到敌三十八军驻红庙塘一部和喜神坝民团的夜袭和持续两月之久的围攻，仅存干部战士六十五名，驻大河畔一岩洞中。一营仅存八九人，二营保存最多，一营遂合并于二营，由二营营长赵明恩领导。

赵明恩将尚存的六十余人，编为一、二两队（每队两个班），另一个独立连，赵明恩任党支部书记。全队开会五天，总结过去一味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教训，决定重建桃园战略根据地，制定了“安川打陕”的方针，纠正了过去的“左”倾做法。加强部队建设，纠正了部队中曾一度滋长起来的害怕高山苦寒和悲观、动摇的思想情绪。

部队经过这次整顿，回到桃园铁炉坝，受到村苏维埃主席欧元富和革命群众的支援，很快立住了脚。赵明恩还向关两乡文君蔚、民团大队长朱和元、南江县壮丁总队副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致使各地方势力都不敢轻易对游击队“反脸”。复辟的地方反动政权也变成“两面政权”，从而使桃园根据地获得巩固。

部队为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修改“安川打陕”为“安川不打陕，自立求发展”的方针。制定了基本符合当局法律，有

利群众生活的九条纳税规定，同时新编“护路班”，武装保护商旅在川陕间一百华里内的生命财产安全；鼓励商贩、农民将部队所需的生活用品运到桃园出售，既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又利于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为了贯彻自力更生方针，游击队采取多种方式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如吸收根据地内三三两两的青年农民参军，接纳西路军失败后归来的流散红军，招收成队行劫的饥民，招编改造土匪队伍等，充实和完善了部队的建制；建立了“传令班”，健全指挥系统；建立新兵连，对新吸收的每一个战士实行训练和考察后，再编入一、二、三、四、五队和独立连。还建立了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情报系统和军需储备。部队针对根据地的特点，将耐寒训练列为特殊科目，并将一年四季不准盖棉被立为军纪。

1938年10月，国民党“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令国民党二十八军新编第九师师长兼广元警备区司令杨晒轩任“巴山清剿指挥”，于11月以两团兵力，向游击队作“铁壁合围”。1939年2月下旬，便正式向游击队发动进攻。游击队事前已经得知敌人的意图，作了准备，在回龙坛夹击来犯之敌，取得胜利。

2月，桃园一带天寒地冻。敌新九师兵员大部份来自川西坝子，完全不适应高寒山区作战。游击队则焚毁甘家垭营房和所囤积的粮食、肉类，将部队转移到更为高寒的第二道防线——大小园仓营部，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诱敌深入，然后相机各个击破。新九师欲求速决，见到那个山头冒火烟便奔袭那个山头，屡扑屡空，日趋疲惫。游击队又用“增灶法”诱惑敌人到最寒冷的“阴山”，让风雪将其团团围困，再施夜间袭击，屡战屡胜。敌新九师被迫撤退游击队，取得了反“清剿”战略防御第一阶段的胜利。

1939年夏，“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主任祝绍周，在陕西南郑悬赏三百元买赵明恩首级，并令陈兰亭等四个正规团和两区六县加地方部队，总共达六七千人，对游击队进行第二次“清剿”。杨晒轩又给李子猷转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清剿令”，特委李子猷为“剿匪督办”。李子猷令驻壁口和宁羌两地土兵集中广元开往南江，随之陕西高副司令也到南江“配合”。

李子猷，曾任第五路第八旅第二十二团团团长，有同红军作战的经验，又谙熟通南巴和游击队的情况，采取“空山”的毒计代替了新九师的“封山”办法。李子猷采取处死、威吓和驱赶居住山边的六十二户农民离开住地。游击队同群众鱼水相依的关系被李子猷的“空山”政策所隔断，一度陷于困境。但是，由于在进行根据地建设时，就在山上建立了若干战略储备点，活动仍然相当自如，并相机打击敌人。敌人除继续实行“空山”策略外，还采取“以军代民”、“抢断交通”等等办法，不让一个老百姓进山，使游击队同群众完全隔断。赵明恩召开会议，分析了李子猷实行“空山”、“筑碉储粮”、“抢断交通”的作法，已造成同游击队决战的形势。决定立即向陕西方向突围，由张绍祥带领独立连留驻盘龙湾吸引住敌人，掩护主力转移。这时正直严冬季节，积雪很厚，突围未成。李子猷将其旅部由南江县城推进到桃园焦家河，前线指挥部推进到桃园铁炉坝。游击队则“昼伏夜动”，集中打击目标于敌人补给线，使其“筑碉储粮”变为无源之水，把自己绝粮的地位换给李子猷。赵明恩仔细分析战争中的虚实关系，果敢地选择以敌前线指挥部为突破口，向四川一侧突围转到了外线。

1940年1月27日，游击队转移到五棵石欲往通江的时候，原副营长管业元叛变（后改名管清山），致使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完

全为敌掌握。赵明恩率游击队跋涉无人烟、无道路的山梁，到达陕南石岩河。管业元已领敌军早在石岩河“以逸待劳”。赵明恩为保存有生力量，与敌稍事接触即转移至转水塘。管业元领敌衔尾而至，游击队与敌展开激战。最后，由于敌众我寡，游击队四个作战单位被敌穿插分割冲散。赵明恩率二队余部从麦子坪上到铁船山时，只剩下四五十人。16日又在碑坝后河同敌遭遇。18日，赵明恩、李润德等五人前行刚刚走过老枫树，敌新九师刘玉洁团任以昌连，将游击队余部三四十人前堵后击于一段悬崖峭壁的险恶地带。游击队战士有的在打尽最后一粒子弹后，毁枪跳岩英勇牺牲。

赵明恩带着通讯班长杨芝芳、勤务谢顺朝已转至南江杨坝猪槽沟，拟取道小河子回到达县、宣汉一带继续组织革命武装。叛徒杨芝芳乘赵明恩熟睡之际，举枪杀害了他，取下首级背往桃园向李子猷请赏。刘子才在转战中被敌冲散后，潜往沔县，复回南江长池化名陈机匠，以纺纱织布为掩护，已逐步联络到一些为敌打散的游击队员和长征中途受阻回乡的红军战士。不料又被早已成为敌人鹰犬的管青山密探逮捕，就义于南江县城。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沐川天宝山农民暴动

1935年2月23日（阴历正月二十），沐川县凤村乡天宝山的农民，在党支部书记胡立本的鼓动下，捆绑了前去催收捐税的两名区丁，暴发了武装起义。

天宝山属凤村乡西甲，党员刘本昭的家住在这里。他和表兄胡立本，常在这一带地方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

1935年2月初，胡立本在舟坝和赵启民接上组织关系。听赵说中央红军已进至贵州，要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以迎接中央红军。胡又联络张兆延、刘本昭等人各自在舟坝、凤村等地积极向群众宣传：“红军已在长征，徐向前的部队要来，我们要积极响应”，“农民团结起来，推翻反动政权”。2月中旬，胡立本借春节去给姑妈拜年之机，约会表弟刘本昭，又约集张兆延、杜明德前往商议。2月23日，西甲甲长刘泽高在龙兴寺召集农民齐团（即开会），催交捐款，胡立本、刘本昭等四人借机前往了解情况。适逢利店区团部派出的两名团丁前来收款，农民纷纷陈述捐税太多、太重，无力交纳，遂与区丁发生冲突。胡立本趁机号召大家抗捐抗税，群众义愤起来，捆绑了这两名区丁。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胡立本、刘本昭等立即商议，决定以“川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路纵队第五小队”的名义，宣布武装暴动，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到转角庙集中，准备对付区、乡丁的攻击，同时截击经凤村回利店的区团正肖善之。到转角庙集中参加暴动的群众约五六十人，由胡立本部署防御警戒。

由于看守不严，一名被捆绑的区丁挣脱绳索逃跑到凤村，向乡民丁中队长刘泽安报告了情况。刘立即告诉乡长肖华春，肖大为惊恐，急呈报利店区团部，同时派人去关上乡向肖善之报告。肖火速返回利店，命令精选中队连夜出击。队长李正波率领精选中队赶到凤村后，即派刘泽安带一个班的乡丁和佩短枪的两名区丁先头行动，查探虚实。他们在凉水井碰上暴动队伍的第一道警戒，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劝散了警戒人员，占领了凉水井。24日黎明，战斗打响了，精选中队从正面进攻转角庙，乡丁从旁助攻，暴动队伍用土枪土炮回击敌人。由于暴动队伍准备不够，仓促上阵，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强敌对阵，只有一面还击，一面撤退，最后分散躲藏于山野草丛。敌人进行搜山，胡立本、张兆延、袁公和被捕。接着转到天宝山逮捕刘本昭，因刘本昭隐匿，便将其兄刘本俊、刘本才捕走，一齐送到利店关押，后解送沐川监禁。不久，刘本才、袁公和具保出狱。3月26日，土匪赵要山与屏山县团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五区团长的王仲枢发生冲突，火烧沐川，开监放出全部在押人员，胡立本、张兆延、刘本俊始得出狱。

天宝山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要求，教育和锻炼了群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中共沐川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合江石鼎山武装起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拟在宜宾与泸州之间北渡长江。此时，泸县中心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估计红军可能在川、滇、黔建立赤区，要从泸县渡江。红四方面军可能从长江北岸接应，敌人定要派重兵封锁长江，切断南北交通。会议决定中心县委不能离开泸县，并派常委李清泉（即李亚群）为南岸特派员，去合江、赤水相机组织武装暴动，牵制打击敌军，配合红军北上。其他同志加强两岸渡江工作，迎接红军渡江。

李清泉根据组织决定，秘密到了合江县石鼎山附近党的联络站红岩子，同我党有密切联系、在赤合一带很有威望的进步人士邹华轩取得了联系，由邹安排在松柏园向子彬家教私塾作掩护策划武装起义。

石鼎山地处合江西陲，与叙永、赤水接壤，因远离县城，三县的反动武装各据地自守，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之地。这三县的地下党组织又同属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从地理条件看，这里峻岭纵横，易守难攻，进可直捣合江、赤水，退可隐居山区打游击。李清泉到后，立即发动群众，提出“穷人团结起来破仓分粮，反对拉兵拉夫，抗租抗税”等口号，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同时秘密串连，物色对象，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起义作准备。经过邹华轩的介绍，李清泉结识了余德章（即赵欲樵）、冯吉、向玉章等，并与袁崇杰、贾审修接上了关系。这批人忠实可靠，在群众中有号召力。余德章1927年在泸县军事政治学校学

习时就倾向革命，现任精选中队队长，统领三个分队，掌握有一百多人的武装；冯吉是精选中队三分队的队长，驻防石鼎山附近金宝山；袁崇杰和贾审修都是1928年入党的，会做群众工作；向玉章在当地群众中有威望，思想较进步，拥护革命。为发动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清泉一面派余德章向团丁进行宣传教育，培养积极分子，一面又考虑到兵变必须与农运相结合才能生根，故派冯吉在农民中积极组织青年赤卫队，发动农民暴动，配合精选中队武装起义。

3月，主力红军重返川南。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下令各路人马进行追堵，妄图聚歼红军于川南。当时，石鼎山一带的农民在党的“破仓分粮，迎接红军”的号召下，已发动起来；精选中队士兵也情绪高涨。3月初，李清泉在桂林园向玉章家召开行动会议，杨其生、余德章、冯吉、邹华轩、袁崇杰、贾审修、任圣林、向玉章、赵世成等出席了会议，一致决定在3月10日举行起义。

3月10日晚，余德章驻五通场的精选中队一分队起义后，前往驻防黄大桥的精选二分队会合。两分队连夜向石鼎山挺进；杨其生、冯吉也于是夜规定时刻率精选三分队、鸟枪队前往赤水大同镇，夜袭区公署，全歼大同区队，胜利返回石鼎山。李清泉、袁崇杰同时率领赤卫队和破仓分粮队，连夜赶赴落窝潭大地主刘丕平家破仓分粮，将刘丕平押回石鼎山进行审判。11日午后，三支起义队伍在石鼎山的月台山大庙里胜利会师。12日上午，在月台山召开公审刘丕平的大会，到会群众近五百人，根据群众要求，枪决了刘丕平。紧接着宣布“川滇黔边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正式成立，全队共二百余人。会后整编了队伍，杨其生任队长，李

清泉任政委，余德章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设组织、宣传、后勤三股，还设有总务和交通联络。为了便于指挥，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一个中队以原精选三分队为基础，加上部分新参加的农民，冯吉任队长，二中队以原精选一、二分队为主，也有少数新参加的农民，杨其生兼队长。把家庭负担重，不宜长期远离家乡的编为两个赤卫队，全归游击队领导。

3月13日，从多方面获悉合江团练局团总吴本昆已从县城调来三个中队五百余人，驻守五通场，老庙上驻有一个中队，乡公所驻两个中队。游击队领导认为团练局人数虽多，但战斗力弱，新来情况不熟，我军士气正旺，故趁其立足未稳，出其不意于14日夜分兵四路袭击五通场，取得了胜利。

夜袭五通后，反动派更加胆战心惊，调动了合、赤、叙三县团练二十四个中队和川、黔军阀的部份武装共有二千多人，从四面八方围攻游击队。采取封锁要隘，盘查出入，断绝交通，搜查山林等手段，妄图消灭游击队。游击队则利用地形熟悉，群众支持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在石鼎山一带的崇山峻岭中周旋，战斗了一月多。由于敌强我弱，多次遭到袭击，人员减少至五十多人，又与泸县中心县委失去了联系，派人与叙永游击队联系也无消息，孤军作战，非常困难。4月上旬部队在马草坪梨子垌煮饭时，川军和泸县肖镇南的清乡队以十倍的兵力包围了游击队。李清泉向冯吉提出立即转移，杨其生则认为白天撤走危险大，不如居高临下，反击敌人，挫败其锐气再撤。于是杨、冯两人各率一支队伍左右伏击，敌人虽从三面发起猛攻，但由于战士们的奋勇抵抗，均被打退。不幸，杨其生正在指挥突围时，腰部中弹，在撤退中牺牲。

冯吉等保护着李清泉撤了十余里，到红岩口时只有几个队员

了。李说，现在敌多，只好解散，各自隐蔽。他和冯吉在队员和农民家隐蔽几天后，由交通员刘连成护送回泸县中心县委。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

(中共合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王有奎整理)

隆昌石包店工农暴动

1934年秋至1935年春，正当中央红军转战于湘川黔滇四省时，中共隆昌特支响应泸县中心县委“开展武装斗争，迎接红军到来”的号召，在隆昌石碾乡的石包店一带，秘密组织麻布机织工人和农民群众起来暴动。

中共隆昌特支成立于1932年底，属泸县中心县委领导。1934年5月，中心县委负责人文光斗被捕，因文光斗是与特支的直接联系人，特支怕受牵连，主要领导人和多数成员撤离隆昌。以后，中心县委派喻文若来隆昌指导工作，改组特支，逐渐将工作重心移向石碾乡石包店一带。石碾乡位于隆昌东北部，距县城七公里，石包店是县城同石碾乡之间的中心点，为浅丘地带。泸县中心县委与特支的联络点就设在石碾乡镇上。

1934年夏末，喻文若调走。秋，中心县委派向天宝、黄壮怀、杨大容、黄振声到隆昌加强特支工作。在此之前，隆昌特支即着手筹划组织石包店机织工人、农民群众的暴动。那时，特支已在这一带的机织工人、农民群众中开展了宣传组织工作，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向天宝等人到隆昌后，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有了较快的进展。根据中心县委的部署，特支把“开展武装斗争，响应红军入川，建立根据地”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抓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特支成员分头到自己联系的赤色群众中，宣传迎接红军和开展武装暴动的重要意义，并让赤色群众在自己的亲戚熟人中开展宣传工作，扩大影响，发展暴动队伍。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川南。泸县中心县委开会研究如何策应红军，估计红军会很快打到长江南岸，川南革命斗争的高潮即将到来，发动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各县党组织“加紧筹划暴动工作，开展一场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迎接红军的到来”。隆昌特支积极响应，加速了暴动的组织工作。一方面在赤色群众中宣传，红军已入川，我们要赶快组织暴动迎接红军；一方面筹集经费准备购买一些枪支，还在赤色群众中发动捐款支援红军。与此同时，加快扩大暴动队伍，由特支联系的赤色群众出面，在亲戚朋友中采取喝血酒、拜把兄弟等方式发展成员。到1935年春，暴动队伍已发展到数百人。这时，暴动领导成员有特支的刘乾量、廖隆海、谢明芳、杨大容、黄振声，还有机织工人领袖、特支发展对象王德洪、肖世兴、宋金和等。石包店袍哥组织“文武社”的谢玉庭和陈少三也参加了领导工作。向天宝、黄壮怀虽已调到内江，负责内、隆特区的工作，但他们经常到隆昌检查指导。经暴动队领导成员多次研究，决定于1935年5月27日晚上举行暴动，先到城内东北镇夺驻军和城防局的枪支，然后各路人员在城内禹王宫集中。计划在暴动成功后将队伍组建成一个团，带去参加红军。

由于筹集的枪支没有如期运到，暴动时间被迫推迟。不料，5月28日被坏人告密，国民党东北镇城防局立即动手，由镇长余华甫带领几十名便衣武装到石包店逮捕了几名参加暴动的成员，当即在石包店鬼弯子樗子树下枪杀了机织工人领袖、暴动领导成员王德洪、肖世兴、宋金和三人，其余参加暴动的成员闻讯后即四散隐蔽。石包店暴动义旗未举，就这样被敌人镇压下去了。

(中共隆昌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南部升钟寺独立师

1932年升钟起义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和南充县委在1933年初，又先后派于江震、项召开、汪治国、何芬、李德丰和张人权等，在中共南部县委派的陈洪钧和赵文浩的协助下，到升钟地区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1933年春，在皂角乡任家湾建立了中共升钟特别区委，由何芬任书记。之后，重建了升钟游击队，有队员一百余人，由于江震任总指挥，下设两个分队：一分队队长杜彦波，活动于赵家沟一带；二分队队长江元品，活动于向家坝一带。游击队积极组织群众打上豪，破仓分粮，重新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5月，游击队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血债累累的反动分子，升钟区团总何义普、甲长李宗林等。秋，红四方面军到达南部县嘉陵江以东地区。为了配合红军战斗，升钟特别区委将区游击队分为若干战斗小组，先后攻打了凤鸣区公所和一些地主庄园，镇压了恶霸地主何节斋、赵一阳、朱南山、敬正平和作恶多端的乡丁赵连武、何国斌等。

升钟地区游击队的再度兴起，使敌人惶惶不安。军阀田頌尧派人在皂角乡召开了阆中、剑阁、南部三县联防保安会议，部署再次清剿升钟地区。会后，扩大为有盐亭、梓潼和江油参加的六县联防“围剿”。南阆“剿共”司令马邑章带队进驻升钟后，在场镇要道安岗设卡，日夜搜山；在双柏桧“清乡”中杀害了升钟小学团小组长、共产党员蒲成春和给游击队运送弹药的女青年向四儿。不久，张人权在枣碧被捕遭害。区游击队针锋相对，开展了反清剿

斗争，一次在赵家沟击毙了敌军排长、班长各一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赵家沟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在一次突围作战中，遭到重大伤亡，分队长杜彦波负伤被俘。从此，区游击队的活动再次处于低潮。1933年9月，于江震带领游击队转战到苍溪，9月9日，苍溪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江震任区军事指挥长，负责指挥游击队。1934年春末，于江震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1934年9月，红军解放了南部县嘉陵江东岸，于江震等受中共川陕省委派遣回到升钟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为迎接红军西渡嘉陵江准备条件。于江震等将原来隐蔽起来的游击队员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之后，升钟地区的游击队再度活跃起来。1935年2月上旬，游击队员袭击了皂角乡公所。中旬，袭击了升钟、保城两个区公所，先后缴获敌电话机两部，长、短枪十余支，毙敌4名。2月下旬，红九军、红三十三军在苍溪、阆中和南部三县相继强渡嘉陵江，南部县令龙杰山和城防司令陈尽忠仓惶逃走。2月25日，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在师长王波率领下，进驻升钟，同该地党组织和游击队一起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3月8日，在皂角乡绵竹湾地区，建区苏维埃一个、乡苏维埃三十一一个、村苏维埃十七个。4月中旬，原游击队扩编为游击大队，由于江震任总指挥。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教育下，广大贫苦农民踊跃报名参军，仅二十一天，报名参军的达三千多人。5月初，游击大队扩编为红军独立师，由于江震任师长兼政委。接着独立师在于江震的率领下，离开升保地区，1935年5月编入红四方面军三十四军，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中共南部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沐川高笋农民暴动

1935年5月10日（阴历四月初八），沐川高笋乡发生了一起农民武装暴动事件。一百多农民手持刀矛，在绣着镰刀斧头标记的红旗引导下，攻占乡公所，没收地主财产，活捉恶霸地主，大张旗鼓宣传“推翻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倒官僚豪绅，实行分田分粮”。这次暴动，是继天宝山农民暴动之后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

早在1932年秋，高笋及其近邻的舟坝、凤村和犍为县的同兴乡就有了党的活动。中共嘉定中心县委陆续派了梁祚超、段祺臻、周南薰等人到这些地方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支部。1933年夏，中心县委进一步明确将这些地方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开展游击战争。至1934年，党的组织有所壮大，发动群众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转战云、贵、川边境。为了接应中央红军，支援川北红军，牵制军阀后方，高笋农民武装起义就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爆发的。

1934年12月，青神的西山农民暴动失败后，参加过这次暴动的张啸涛（赵启民）和段玉章，于1935年1、2月先后来到高笋。他们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组织领导，加快了工作步伐。由张啸涛对舟坝、凤村、高笋、同兴等地的活动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在这段时间里，张啸涛发展了农民张玉清和宝兴炭厂职员钟福兴为共产党员。还建立了农民协会，下面有农协小组二十多个，

每组三四人或五六人。钟福兴、张子林负责发动宝兴炭厂的工人筹建“炭业工会”。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

4月下旬，张啸涛听说中央红军准备渡江，即找段玉章、张玉清、钟福兴、朱成元等人商议，拟定成立“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四川第四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武装暴动。随即缮写了标语、布告，绣制了红旗，刻了两枚圆形的印章。这些工作就绪后，便召集石堰（现仁和乡）、舟坝、关上、青龙、杨树、高笋、同兴等地代表，在高笋李山张玉清家中开会，协商通过了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两个委员会正式成立。“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二十五名，张玉清任主席，钟福兴、费熙延任副主席，朱成元任秘书。“四川第四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六名委员组成，张啸涛任主席，王正海任副主席。军事委员会辖两个大队，总指挥张啸涛，政治部主任段玉章，副主任胡立本。张玉清、钟福兴任大队长。这就为暴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张啸涛亲自担任教员，对部分骨干进行了一般性军事常识的学习和射击训练，安排黄文开、黄文学打制了部份刀矛。经过一系列的教育，争取了少数保丁，掌握了团枪六七支。这就为暴动作了军事上的准备。

党组织领导的这一系列活动和2月凤村天宝山农民暴动的影响，引起了高笋地区土豪恶霸的注意。5月上旬，团总，副乡长李如珍数次派保丁到宝兴炭厂捉拿钟福兴，命令保长尹朝兴擦洗枪弹，作好镇压游击队的准备。敌人磨刀霍霍，情况迫在眉睫。5月7日，张啸涛派张玉清通知有关人员于5月6日到李山开会，分析李如珍的动态，商量应急对策。这天，张玉清、钟福兴、刘本昭、段玉章、李桂方等人到会，正式决定5月20日（阴历四月十八）举行暴动。打击的主要目标，一是李如珍，二是乡公所。

如果暴动成功，则乘胜打击舟坝、黄舟等地的敌人，迅速扩大红军游击队。张啸涛还准备在此基础上，带一部份力量去赶上长征的中央红军，若失败，则退守金台山，建立根据地。会议进行中，接到朱成元叫刘世蕴报来的消息：农协小组长刘世友在汤家岩开会，发动群众，被乡公所逮捕，准备5月11日解送沐川。为了营救刘世友，会议决定暴动提前于5月10日进行。当即安排部署了力量，规定了行动路线，派人通知同兴的潘英仲带领队伍到高笋会合，决定钟福兴和王堂恩立即到金台山通知尹绍清，不要放三铁炮以免惊动敌人和地邻。5月10日拂晓，暴动队伍一百余人，兵分两路，一路由张玉清率领，打着红旗进攻高笋场。乡公所已事前得知消息，全部人马逃往场外以东三华里的平顶寺山寨。暴动队伍顺利占领了乡公所，救出了刘世友，没收了乡长莫明和的财产，张贴了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和四川第四路红军游击队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以及大量的标语，进行了革命宣传，午饭后撤至场外以西两华里的火林冲待命。另一路约四十人由张子林率领包围李如珍的家，李如珍跳楼往黄丹方向逃跑，队伍攻下碉楼，活捉了老地主李俊山，缴获了全部枪弹及土炮，没收了部份财物，押着李俊山向火林冲进发。两路队伍会合后，张啸涛同张玉清分析了情况，决定作好迎击反动武装来犯和退守金台山的准备，部署了警戒，安上了土炮。李如珍逃跑到黄丹，向区团长杨九光报告，杨九光立即率领区团队赶来，不断地开枪鸣号。暴动队伍据守阵地，开枪还击。敌人改用包围战术，在暴动队伍的正面和左右两侧发起攻击。在强敌面前，暴动队伍边打边撤，终于被敌人冲散，躲藏于深山密林，整个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同兴的潘英仲等接到通知，立即带队奔赴高笋，途中受阻，后又得到暴动失败的消息，便撤回。

敌人轮番搜山，党员朱成元，骨干李桂龙、何安宾、谢平安、梅世权相继被捕入狱，朱成元于1936年死于屏山监狱。参加暴动的其他领导人和骨干张啸涛、钟福兴、张玉清、张兆延等也被迫出走他乡。

(中共沐川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冕宁抗捐军

1935年春，红军在川滇边活动频繁。驻川康的二十四军加紧修筑工事，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搜捕共产党员，以保其后方安全。共产党员陈野苹、廖志高只得隐蔽于石龙、宏模一带活动。当得知县城官吏逃亡，红军快到冕宁的消息，立即在石龙作了迎接红军的准备，并派人到泸沽一带联络。进步青年肖佩雄等在县城也作了欢迎红军的准备，故红军先头部队一进县城，便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满街挂着红旗、红灯，贴满标语。许多场镇也出现欢迎红军的动人场面。

红军进城后，根据扎西会议《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和在长征途中建立游击队的决定，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决定在冕宁县建立地方政权，组建地方武装。5月22日，地方工作部部长陈云接见了陈野苹，听了陈对于冕宁地下党和社会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了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抗捐军的问题。当天晚上，由陈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由陈野苹任主席，李井泉任副主席。第二天，在县文庙大成殿召开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的群众大会。下午，即以到会的一些青壮年为骨干建立了冕宁抗捐军，红军干部黄应龙任总司令，陈野苹任政委，大队长肖佩雄，副大队长李发明、彭杰。地方工作部发给抗捐军一些枪，多数战士是使用火枪、长矛、大刀等武器。

抗捐军是针对国民党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命名的，有利于号召群众起来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抗捐军成立不久，仅城内就有几

百人参加，设有五个中队，即城区中队，惠安中队，大桥中队，回龙中队，复兴中队。抗捐军的活动主要是给红军带路、站岗、放哨，收缴官吏和劣绅地主的钱粮物资。缴获的粮食、布匹、财物除分给穷人外，部份上缴红军。

地方工作部决定李井泉、廖志高、王首道随红军北上，另派三军团干部刘彬带一个红军连队为骨干，留冕宁组织游击队，配合抗捐军活动。九军团离开冕宁后，抗捐军也撤出冕宁准备打游击。到了城北的小堡村，与红军留下的游击队会合，两支当即合编，仍称冕宁抗捐军。

第二天队伍开大桥，小约达便派人来向抗捐军要枪。这时场内街上已住满果苍、罗洪、保伍三支彝民队伍。当晚，抗捐军领导人共同商量，这里已无法坚持斗争，决定尽快脱离这个危险区，追赶红军主力。29日晨，抗捐军从大桥出发，三支彝民队伍三三俩俩插进队伍中来，队伍行列就乱了。刚到俄瓦山，彝民便开始抢枪，黄应龙司令被劫持，刘彬被打倒在地，队伍失去指挥，队员就跑散了。第二天，地主武装开上北山灵，北路区长李绍周带领团丁到处搜捕抗捐军战士，在大桥抓到肖佩雄、彭杰、黄兴梦、邓尚三，当场打死在大桥街口，其余被捕的抗捐军战士被送县城监狱关押。

这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到冕宁，委邓秀廷代冕宁县长，邓以土豪劣绅为基干组织了“善后委员会”，大肆逮捕杀害参加过抗捐军的人。各地豪绅地主也带领团丁逮捕抗捐军战士，有的抓住就地杀害，有的送县狱短期关押后杀害，前后被杀害的达四十多人。

川东游击战争时期*

王 维 舟

自从军阀割据以来，人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在万源、城口、宣汉和达县横行霸道，残酷地掠夺农民，在田租、烟款、高利贷和重重苛捐杂税的压榨下，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

“五四”以后，革命思潮波及到了川东。1923年前后，我和一些同志在宣汉清溪场等地进行过革命活动，在地方上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之后，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戴治安、张鲤庭等）以达县第五高级小学校为基点，展开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1926年，在张鲤庭的领导下，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王波等又在达县中学发起组织“烂漫社”，发行“烂漫旬刊”，宣传社会主义，进行反“狮子派”（即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培养与锻炼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达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由武汉潜回四川，拟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城口、万源、巫溪等县建立革命根据地。在万源一带，由固军坝进步青年李家俊（他在上海读书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出面号召，并利用他父亲地方势力为掩护，组织农会。农会刚刚组织起来，就被刘存厚匪军发觉，万源一带的农会被匪军捣毁，革命

* 标题系王维舟《我的回忆》第十节的小标题。

群众受到严重的摧残。我们立即调其他地区的游击队，并组织群众与匪军作战。在此地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以农会代替苏维埃）。1929年，川东军阀刘存厚部的一个连，携枪八十支，在宣汉的七星峡起义，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声威大振，川东游击队日益壮大起来。

第一次失败后，我与同志们又在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一带组织发动第二次游击战。

不久，奉省委命令，将虎城场一带所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拉到梁山县属太平场，与该地的李光华、李次华、李维等为领导的农民武装配合，组成一支三千多人的川东游击纵队，发动游击战争。党决定李光华任总司令，我任副总司令兼总指挥。这支新军成立后，军阀刘湘派了两个师进行“围剿”。沙河场一战，我军把敌人两个师击溃。之后，又在忠州后乡，歼灭了民团数百人。此时，川东游击纵队又奉命远征，包围武汉。部队到忠州石宝寨渡江开往石柱。先头部队刚到达石柱后山，不料刘湘派陈兰亭带一个师从后尾赶来。我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损失惨重。李光华同志不幸负重伤，被俘殉难；光华之弟次华亦被匪军屠杀。李光华同志牺牲后，我即率领所剩下的几百人，顽强抵抗，突围出来。

当时我是反对李立三路线的。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左”倾路线，只知道这是不懂军事的错误做法。游击队都是刚组织起来的四川农民，军事上没有经过训练，就被调去攻打武汉，远离家乡，军心涣散。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动员，领导上也没有思想准备，盲目乱干，怎么能够打胜仗呢？当初我是极其反对的。在忠州后山黄金场召开的党内会议上，我和有的同志提出：“应接受第一次东征的教训，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远征作战是不

行的，最好再向省委请示”。后来省委派来刘大明（牛大鸣）在会上说：“这是上级党的命令，下级党应该服从！一定要执行省委的决议。”在此情况下，我又建议：可去一部分人，一部分人留下，一来继续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二来可牵制敌人兵力。但是这个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只好服从命令。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又一次使川东游击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在石柱战斗中突围出来以后，回到老根据地，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平（梁山）、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1931年4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开会，我同王波前往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奉命返回川东进行第三次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王波因另有任务，省委决定其留成都工作。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悬赏十万大洋捉拿我，因此我不得不化装上路。我在万县等候交通员，护送我去根据地，住在我胞兄佐卿家里的楼上。第二天黄昏，因天气异常闷热，在楼上更觉暑气难当，于是独自到盘龙石公园散散步。由公园出来时，只见路上警戒森严，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路上遇到我在旧军队中任职时的副官长李培之，他是特来找我的，一见面拉着我就走，并告诉我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原来我到万县的消息，叛徒已向当地匪军王陵基告密了。在我离开胞兄家约五分钟后，王陵基的部队即将胞兄寓所包围起来，严加搜索。找不到我，便把我胞兄、胞弟及二侄捕去，并严刑拷打，追问我的下落，他们始终没有说出我在什么地方。

听了李培之所说，才知情况十分危险，必须立即离开万县，但一时又走不出去，因路上到处都有敌人警哨盘查。李培之急忙把我领到一位好友李重人的父亲开的钱庄内藏身。当时，万县全城都处于戒严状态，匪军的气焰嚣张极了，四处搜索捕捉共产

党人。李培之、李重人见形势危急万分，便将我化装成妇人，抱着婴儿，坐于轿内，外面打着钱庄商号的灯笼，抬出了警戒线，到后山葵花寨李重人父亲的佃户家住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李重人的父亲天天都来看我，把王陵基部队的动态和我兄、弟、子侄受到酷刑等情况都告诉我，我听了心中怒火炽烈，总有一天，我要同这些匪帮算帐报仇。三天以后，红区的交通员来了，我便回到根据地去。

我在万县脱险后，回到梁山、开江、宣汉、达县一带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决议，重新组织川东游击军，准备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党决定我任总指挥和川东军委会书记。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宣汉芭蕉场附近贺值三家里，贺全家都参加了游击队的工作。我及时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总结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经过热烈讨论，总结出以前遭到失败的原因有下列几方面：

- 一、懂军事的人才少，对敌人估计不足，未掌握敌情；
- 二、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缺乏革命游击战争的锻炼；
- 三、反动势力强大，陈匪有一个师的兵力，我们游击队只三千多人，武器弹药装备又很差；
- 四、我无后方，伤病员得不到抢救医治；
- 五、没有充分的计划和准备，没有充分的政治思想教育，即远征作战，草率从事；
- 六、离开有党组织的农村，脱离群众，没有群众掩护。

总而言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的结果。

有了两次失败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左”倾冒险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根据省委的指示和游击队广大干部的意见，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确定了对敌斗争的明确方针：

一、加强党的领导，普遍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成立县委，建立支部。加强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要进一步加强干部的思想工作，坚定革命斗志与胜利信心，使群众斗争有党的坚强领导。

二、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会、基干游击队。实行破仓分粮，打富济贫。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拉夫抽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三、军事上采取游击战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灵活地使用兵力，用化整为零，合零为整，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巧妙办法去打击消灭敌人。

四、对各地保甲长和土豪劣绅，实行正确的政策。对顽固的、坚决反共的首要分子，坚决镇压，为民除害；对一般的大多数则争取利用，扩大游击军的政治影响。

由于广泛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开创了新的局面。总指挥部成立后，游击队改编为三个支队，分布在梁山、宣汉、达县、开江、万源等县进行活动，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在斗争中来锻炼队伍。我在广福场从一个已被反动派撤了职的团总曾某处借来步枪六七十支（曾某对反动派很不满，因他过去和我认识，同情游击队，故能借到他私藏的枪支），重新开始发动组织第三次游击战争。

第一支队首先发动起来，以蔡奎同志为支队长。因吸取了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次在进行工作时特别谨慎小心。年轻的游击队对于公开的敌人，是有高度警惕性的，但是对暗藏的阶级敌人却放松了戒备。第一支队成立不到一个月，遭到敌人暗算，混入

游击队的富农分子被刘存厚收买作了奸细，在饭中投毒。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蔡奎带领游击队从远地破仓分粮回来，队员们吃饭后全部中毒，腹痛昏倒。正在这时，这个富农分子勾结刘匪军队四面包围上来，支队长蔡奎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一支队遭到严重损失。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对阶级敌人，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该有丝毫的麻痹。于是，我们及时认真地对内部进行了组织整顿，清除了阶级敌人和不纯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并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提高政治警惕，丰富对敌斗争的经验。

当红军游击队正在顺利发展，根据地逐渐扩大的时候，敌人步步为营，在各乡镇驻重兵把守，保甲长、团丁及匪特相配合，到处侦察游击队和指挥部的住地。刘存厚又增派他的第二师到铜鼓石下八庙一带，向游击区“围剿”。有一天晚上，游击军总指挥部正在贺值三家里开会，被敌特发觉，敌人连夜派了一个营来包围总指挥部。当我们接到情报时，已万分危急，总指挥部在游击队和群众的掩护下迅速转移到桐家山。指挥部离开不久，敌人就包围了贺值三的家，进行了搜查，并将贺值三、贺泽忠、贺宝庭捕去，关进监狱。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并用金钱引诱等卑鄙无耻的手段迫使他们说出游击军的行踪。他们忠于革命，意志坚定，始终没有屈服，敌人没有得到任何口供。贺泽忠被敌人枪杀，英勇起义。贺值三、贺宝庭被关押数月，也几乎丧命，后被营救出狱。不久，贺家又被叛徒李光年出卖，敌人将贺江氏（贺长清同志的母亲）抓去，悬吊屋梁毒打，要她交出总指挥部的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但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口供。

游击军总指挥部积极调动各地游击队主力，进行反围剿斗

争。在宣汉、铜鼓一战，将刘存厚增派的第二师击溃，并活捉了匪军陈团长（刘存厚的表弟），给敌人以沉重的痛击，使匪军内部受到很大的震动。这次战斗的胜利，给各地游击队和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从而使革命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31年底，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南江县。我们积极准备，以便和红四方面军配合进攻，夹击田頌尧和刘存厚匪军。我们派人迅速前往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但由于反动派在各地警戒森严，联络非常困难，派了几批人去都无消息，也得不到省委的指示，只有继续进行准备，等待时机到来。

1933年9月，红四方面军向万源进攻，我们派蒋群麟同志前往，终于取得联系。10月，互相配合进攻宣、达，夹击刘存厚匪军，一举奏效。一开始刘匪全军调至万源前线，后由黄金口、峰城清溪场向开县溃退，我即调部队于峰城清溪场等地截击。但因敌众我寡，刘匪退到南坝场一带固守，我即请求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派军前来配合我游击队，以便一举歼敌。徐向前派许世友率一个师配合我川东游击军，并组织了数万农民游击队，在下八庙会合，一举全歼刘存厚匪军。

至此，红旗插遍了川东、川北，宣、达、万数县全部解放，各地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尽情庆祝胜利。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

红三十三军之成立*

傅 钟

当红军占领绥、宣之后，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以川东区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当时川东梁达中心县委书记）任政委。当即决定以南坝场方面之游击队编为九十九师，以宣汉之游击队编为九十八师，以绥定方面之游击队编为九十七师，总计一万余人。其他独立营及游击支队亦达六千人以上。当时宣达一带的群众如潮水般地涌进红军与游击队中，不少一家人、几弟兄、几叔侄相率而来之范例。凡受游击军与川东党之影响的地区，群众自动组成地方独立连或营，自称为三十三军之部队者亦多。故红三十三军在很短时期内，由分散活动的游击部队而变成一支更加具有战斗力的正规红军了。这支新建部队的特色是它与地方群众保持有密切的联系。……

1932年秋末，川北地方党的工作急剧地深入农村。红军入川后连续获得胜利，给川北党的发展和分散活动的游击队以极大鼓舞，当时仅苍溪一县的游击队员即达千人以上。在红军进入该地之前，1932年初，以阆、苍、南中心县委所领导之二万余人的升钟寺起义，建立政权，分配土地，造成群众斗争的热潮。后来红军刚进入苍溪之边沿区，而地下党即发动三磊寺（三堆石）之起义。此次起义参加群众约二万人以上，武装有一营之众，枪三百余支。这给主力红军的行动以极大的援助。

（原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5年第3期）

* 标题系用傅钟《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的原文小标题。

回 忆 廖 玉 璧

张 翼

1933年夏，我和党组织联系上，在白庙周朝智家开会，党组织要我去廖玉璧那里帮助廖做土运工作，并开了介绍信叫我去找朱联青。我到朱联青家后，一天晚上，朱把我带到两三里外的陈具周家的地下室里见到了廖玉璧。朱向我介绍说“这是布克（党员）老廖”。我一看是大汉，长着络腮胡子。他又向廖玉璧介绍我：“这是布克张翼！”这样我就参加了廖玉璧的游击队活动。廖玉璧的队伍住魏家沟，大约有四五十人，后来和绿林队伍刁玉甄联合行动。刁玉甄住在离魏家沟不远的文昌寨上，有一百多人，有长短枪，都穿便衣。

1933年的下半年，廖玉璧和我们二十多人去大石桥打团防，取得成功，提了十几支枪。1934年8月我被捕出狱后又到廖玉璧队伍活动，在广岳河东一带进行打富济贫活动。1935年1、2月份，廖玉璧、金积成、夏林等在岳池高兴乡鸽笼山下一带活动时，廖被杨森部队逮捕。

（中共安岳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谈 孝 泉 兵 变

骆 是 愚

廿六团军支成立是在1931年初，军支书记曾海云。当时我在绵竹中心县委，1931年下半年，省委派我到安县，接通了已经和省委中断关系的安县县委的组织关系。中心县委驻安县，省团委苟永芳同志住安县秀水河。当时秀水河已发展了党、团组织，有一定工作基础，中心县委便决定以秀水河为中心，广泛发动农民开展农民运动。1932年春，农民运动已经有一定基础，我和王敬德研究，计划1932年4月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经请示省委同意由王敬德作起义军的司令，曾海云作党代表，赵炳贤作参谋长，骆是愚作政治部主任。兵变的步骤：1.破坏交通；2.肃反；3.建立苏维埃。进军路线：齐天——富新——拱星——汉坝——沸水。兵变的直接领导是中心县委。目的是到安县建立苏维埃及红军根据地。根据省委部署，把王敬德调到安县查看晓坝地形，张绍武先到拱星活动，由拱星再到晓坝。赵炳贤也到过安县。

1932年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农民运动已有相当发展。在安县秀水河举行了一千多人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减租抗租”等口号，震动很大。当时，我党在田頌尧二十九军第二混成旅第二十六团中的三个营已发展了组织，争取和发动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工作也有一定基础。中心县委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10月起义。当时省委派刘逸仙同志任中心县委军支

书记，直接随军行动，为起义作政治思想准备。在新店子时即到处张贴标语，宣传“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田頌尧得知后，准备解决二十六团。如果在新店子解决，二十九军在新店子驻了八个旅，怕引起波动，遂把第二混成旅调德阳孝泉。刘逸仙因太暴露，便在部队开往孝泉以前，由新店子回安县向中心县委汇报后，便返回省委。田頌尧调二十六团去孝泉后，二十六团被置于第二混成旅的另两个团的密切监视下。因此，中心县委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到该团去成都参加巷战之前，定于1932年10月25日。并派王敬德先回部队作准备。23日晚他们在田坝头开了一百多人的积极分子会议。开会时，敌人也在巡逻。我们发现敌人已有所警觉，又临时决定提前一天起义。因此，有一个营未通知到，以至起义时枪打响了，这个营的同志还不知道。共产党员任卓章同志带起部队冲出，误中了自己同志的子弹，他仍高呼：同志们快跟上来！同志们前进！前进！最后倒在血泊之中光荣牺牲了。

起义枪打响了，大家十分兴奋激昂，从总指挥到群众都只顾高呼口号：“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军阀！”“反对军阀战争！”“实行革命兵变！”一片口号声，惊天动地。两个负责人都说，怎么光呼口号，赶快指挥行动呀！这才指挥队伍冲出孝泉，沿着既定的路线经齐天、富新到大石坝进入沸水庙。沿途因后勤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未跟上，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又要对付敌人的追兵，部队饥饿疲惫，终因敌强我弱，到沸水庙时，绵阳、德阳的敌兵已追至，只好将部队全部解散，起义宣告失败。

（中共德阳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周映壁、江放勤整理）

我参加升钟寺暴动情况*

冯成义

1984年5月，在皂角乡座谈升钟寺起义史料时，原升钟寺起义游击队员，八十七岁的冯成义讲：“……升钟寺暴动时间，张友明原定的在第二年是民国22年农历2月28日，以放‘洋灯’（是当地春节期间的一种传统节目）为号开始暴动。由任足才先与陈凤仙取得联系，然后陈凤仙又去联系陈顺仙。陈顺仙在民国21年农历10月10日在蒙垭庙台子向豪绅杜彦凯说：张友明在闹共产。杜叫陈到县上去告。陈说没有钱。杜当即说需要钱我给你。他们在台子讲的这些话是我亲自听到的。我立即向张友明讲了，张友明和任足才研究要注意陈顺仙的行动。陈顺仙第二天到南部县城去了，大家分析肯定是告张友明的状去了，就派人通过杜彦凯的长工张思喜了解：陈顺仙找杜彦凯要钱进城告张友明，杜先给陈顺仙银子八钱二，陈说：“不够，我要在城里找人，自己还要盘缠费。”杜彦凯第二次又拿了九钱二银子。

陈顺仙农历十月十一日在南部告案后，18日，县城就派了十二个人，各配一支枪，另外两个伙夫，到升钟寺区署团防，要捉拿张友明到县。杜彦波就将这一情况派人送信给张友明。

根据情况的变化，暴动时间被迫提前。10月28日，升钟区署团总何义普的儿子何光荣结婚，我们就借这个时机举行暴动。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原来张友明说暴动时还有部队来支援，由于暴动提前了，支援部队无法赶到。事先，我们已组织串联了五六百人，但远的因没有得到通知也未及时赶到。实际上这晚在铁罗寺集中的只有二百多人。因天很黑，我只看到任足才，其他领导人当时未看到。

吃过晚饭，部队从铁罗寺出发，游击队先到陈顺仙家把他的住房包围，捉住陈顺仙，将他捆在柱头上，用马刀杀死。然后游击队才到升钟寺。游击队到升钟寺河边埋伏好后，任足才带我和任国隆、任春华等六人一道去伪区署后面。杜彦波从区团防给我们运了十多支步枪出来，我们把枪运走后，老覃又给我一支短枪，叫我和任国隆还有几个人负责控制大队长伏蕴山……”

（中共南部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蓬溪东乡民众自救团暴动

蒋仁风

我们领导这次暴动的核心组织，先叫四川人民除暴团，旨在纪念1928年前四川人民除暴团反军阀的光荣传统。暴动后，以农民增多，更名四川农民除暴团。团内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如王叙五、柏勋、蒋叶南等，他们掀起这次革命风暴有自己的政治目的，是要为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而战，他们是在红四方面军的鼓舞之下，要以一次大暴动来表示热烈欢迎。……

4月中旬，杨森部刘治国旅直驱我乡，把我团作为进攻目标。刘治国蓬溪任隆人，对我乡人事地理很熟悉。当我军将主力转移到集凤荷叶之际，他兵分三路向集凤荷叶任隆推进，企图将我军及土匪压迫至高坪地区，逼下涪江。各部退至高坪这个脱离四周山险，孤峙涪江北岸的高地，才发现敌人以远撒网、近收绳的战法逼入彀中。蒋谓溪、欧耀光部警觉较早，先渡江在南岸坝射击逼近北岸之敌，并在河下设置缆渡，以支援林钜卿、段大奎部抢渡。林、段有百多人，在高坪一面抵御合围之敌，一面渡江，经过两小时激战，全部到达彼岸。这次战役，林、段两部死亡很大。当时我带起十多人，行近高坪，听到四面枪声，知是敌军合围，继续行进，准会凶多，就掉转队伍，从高坪荷叶穿过敌军夹缝，安全脱险。

(中央蓬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中江文家桥农民暴动经过*

钟炳云

1933年12月(农历)20日,有些区委和支部反映:我们闹共产党闹了这么久了,又快要过年了,要求开展破仓分粮斗争。县委向省委打报告,省委派刘思沛拿了一封信来,批准中江开展争取群众的斗争。县委召开第三次县委会,讨论破仓分粮斗争的具体行动。这个会议各区委书记、支部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决定:21日到永太主任团正曾万一家去破仓分粮。会议布置各区委、支部负责人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参加,并带上口袋和武器(刀矛、棍棒等),要保守秘密。

19日一早,天未亮,永太的反动团队突然来了几十人,在文家桥抓人。我们知道后,决定提前暴动,并立即通知北区区委,并派人鸣锣通知文家桥、地藏寺及附近的群众赶来参加暴动。早饭后,附近的党团员、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儿童和一些没有参加组织的农民约三千多人,一齐来到文家桥。反动团队见到来的人多,很快就退走了。这时,我们便从中挑选出二十余人到大石缸(现三台县金石区,离文家桥很近)去活动,分散田颂尧的炮兵营的力量;又组织二十余人监视内部的反对派。把这些人组织好后,我便向大家说:“我们共产党要抗粮抗款,抗租抗佃,抗一切苛捐杂税,现正是年关”,讲到这里时,我问:大家有吃没

* 标题系编者所加。

有？回答说：没有。我又问：怎么办？回答说：到曾团正家去分粮！这时几千人一齐涌向曾万一家。一部份群众进屋，把曾家的粮食、衣服、棉花、现钱全部拿了，去的人都弄到了东西。大家非常高兴。接着，反动团队又来了，我们立即组织群众分三路撤退。为了保护撤退的群众，我带了一些赤卫队员抵抗反动团队，天黑后就各自散了。

（中共中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苍溪苟英寨农民暴动

何知春

1932年下半年，地下党派来陈子谦同志，来到我们这里接上关系，领导革命斗争。

陈子谦同志任我们的指导员，指示我们要革命就要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要开展武装斗争，才能打垮敌人以及土豪劣绅和军阀。我们按照这个指示，研究决定：一要继续发展组织，充实力量，二要大搞宣传，三要打土豪，四要向地主武装——民团夺取武器。宣传工作主要是大量的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宣传党的主张，教育穷苦人民起来革命。组织工作不仅要在地方上去发展，还要找线索打进团防内部，发展我们的人，便于掌握他们的情况和消息。

一天晚上，我们开始了打土豪夺武器的第一次行动。到了龙王场、包包上（地名）大地主祖元直、陈家沟天主教神父头子白某，本地的地主杨老三（仕均）及马廷深家，先后夺取了五条钢枪和部分子弹，还没收了大量物资准备做军装。有了枪、弹药、大刀、长矛等武器，大家的劲头更足了。

1932年冬天，红军从鄂豫皖苏区西征进入四川境内，开进通江城，距离我们这里只有八百多里，土豪劣绅望风而逃。红军入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广大的劳苦人民也比以往更为积极地拥护和支持我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土岭坪和陈家沟的组织发展到七十多人。王渡地区和三川地下党组织也和我们有联系。

2月的一天，我们开会决定公开武装暴动。当时形势很紧迫，任务艰巨，我们的住地处于三面团防的武装包围之中，东面二十里新观场陈家团防，北面十里宋家团防，南面五里左右是本地的地主、团正、保长，杨李几家的团丁武装。敌我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为了使革命力量不受损失，就设计赶跑敌人。整个会议决定了三条：一是用计谋赶跑敌人，二是赶制镰刀、斧头红旗，三是多搞武器、弹药。

我们派人化装去捉了团总、保长的两名狗腿子。然后把他们放走。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让他们回去向其主子报告，我们游击队力量强大，人多枪多。红军入川已使敌人闻讯丧胆，狗腿子回去一报信，团总、团正、保长等大小恶霸更是坐立不安，当夜立即带上团防武装、金银财宝、老婆儿女绕道连夜逃到苍溪、重庆一带去了。吓跑了敌人，我们的计划成功。第二天就公开活动。打土豪，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参加工农游击队，扩大武装，又开仓分粮。在实践中，广大群众觉悟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穷苦人民的大恩人，只有共产党指引的工农武装暴动，才是翻身求解放的正确道路。参加游击队的人数迅速增多，不到五天的时间，队伍扩充到五百余人。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整编了队伍，成立了一个基于游击队一百五十人，其余的编为赤卫军，共同守卫革命根据地，进行防敌斗争。

革命武装暴动成功后，我们就派陈子谦同志去通江县同红军取得联系。1933年5月，陈子谦同志来信，叫我们整理好队伍，马上去广元庙二湾镇红军三十一军军部（原为七十三师）领武

器。

队伍立即整顿，把自己改制的军装和八角帽穿戴起来，枪支、弹药、刀矛也作了调整，整齐威武的游击队打着红旗开始夜行军。由白云庵出发，经过雍河镇、富家槽、庙哑口下山到了张化沟休息，这时天色已亮了，再往前走不到半里路，碰上红军的搜索队伍接上了头，一起开到庙二湾红军军部，住了一星期，接受审查教育。

部队审查教育结束的一天晚上，红军发给了我们二十支枪。我们游击队的活动，有力地打击反动统治当局，苍溪伪县政府为了扑灭革命烈火，拿出了他们的全部人马——武器装备较好的县大队，开到我们附近进行反革命“围剿”。

为了粉碎敌人“围剿”，决定抢先占领苟英寨。我们化装成敌人的民团，去苟英寨，把敌人骗出来。驻守的敌人根本没想到我们有这一手，毫无防备，被我们左右包抄，正面攻打，很快就拿下了寨子，余下的残敌逃出寨外。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击毙敌人三十多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大获全胜。

这是游击队实行武装暴动以来的第一次较大的战斗。

游击队又配合正规红军取得了云坛庙战斗的胜利。

游击队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壮大了。后来又配合红军围攻广元县城。到了1933年6月，在广元县九皇岩，将游击队编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七七一团三营特务连。这时我任排长。部队编为红军后，陈洪钧、陈子谦二人已离开游击队到军政治部去了。

从三堆石到延安

赵 继

一、(略)

二、三堆石苏维埃的诞生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入川，很快建立了通、南、巴根据地。1933年春，三堆石地下党即派人到通江去与红军取得联系，得到了“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成立游击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此时三堆石地区的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游击队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枪几十支，由车云海、孟知先（又名孟晓川）分别作队长和指导员，分为几个小队进行活动。农协会发展到上千人，遍布周围农村。

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继续向苍溪的白庙靠近，三堆石党组织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的形势，认为在这一带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其一，红军的乘胜进军，敌人已经很恐慌。其二，这一带是几县交界的山区，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其三，各地党小组和农会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可以控制整个局势。其四，我们已组织起游击武装二百余人，有枪数十支，可以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其五，烟烽楼、老观场民团已争取过来，并可为我们所利用。

基于以上因素，党组织决定立即筹备成立苏维埃政权。先成立了一个九人领导小组，由主席罗旭初（又名罗文荣）、副主席陈子谦负责，积极筹备成立苏维埃的各项准备工作，如组织武装，争取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等。

1933年5月的一天，由赵鲁平（又名赵文治）主持，在三堆石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诞生。那天各乡各场的农协会员举着红旗，抬着大肥猪。儿童团、少先队举着刀、枪、棍棒。还有从老观、白庙、文昌等远路赶来的群众，都从四面八方涌进了会场。当新选的苏维埃主席罗旭初宣布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时，台下、台上锣鼓声、口号声，随一片红旗人海响彻云天。

会上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1.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2.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发展农协会。3.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恶霸地主，保卫红色政权，迎接红军到来。会上选出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罗旭初，副主席：陈子谦，组织委员：孟知先，宣传：陈子谦，武装委员：黄维德、车云海，统战委员：陈洪钧、罗孟修，少共委员：罗治平，土地委员：陈邦玉，交通委员：李廷斌、赵四孝，还有行政、财务、妇女、生产委员等等。

三堆石苏维埃政权管辖的范围，包括三乡（土垭、柏山、中土）一镇（王渡）二十余村，基本群众数万人。

这时反动政府十分惊惶，慌忙集中了苍溪、阆中两县民团数千人，沿东河以西的回龙、王渡镇、麻溪壕、元坝子、歧坪、东溪，南面的土垭、老观一带组成长80余公里的防线，并且封锁了全部渡口、要道，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困死。

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于是党组织决定，第一件事必须首

先抓武装，即将原来已发展到五百余人，枪二百余支的游击队改编成独立营，由车云海任营长，苟正贵、黄维德、赵继胜任副营长，下设三个连，一个直属排，分驻麻坪梁、三堆石、王渡山，负责保卫各地不受敌人的袭扰，并配合政府镇压恶霸地主。

独立营虽然装备很差，二百余件武器尽是些夹板枪、套筒枪、毛瑟枪、火药枪、大刀、长矛等，但这毕竟是三堆石红色政权的第一支人民自卫武装，战士们热情很高，一切都很正规。出操、军训，还讲军事课，确实象个军队的样子。通过军事训练，我们不但懂得了红军的政策，加强了组织纪律性，也大大提高了这支新建部队的战斗能力。同时，我们还在东河沿岸布防，封锁道路，修筑工事，建立哨所，严防西岸之敌的侵犯。

为了监视敌人，苏区不分男女老少，一齐动员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白天由妇女二人一组站岗，晚上换成农协的男同志二人一组，轮流放哨。儿童团、少共组织则分两层监视要道路口，首先发现敌人过河，即点火为号。驻在河对岸烟丰楼民团团总罗敬三还按约定暗号，将敌人的活动情况、口号、部署等送过河来。

虽然河对岸有十几个团对付我们，但在武装起来的群众面前，他们丝毫也未占到便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独立营参加大小战斗十多次，缴获枪几十支，俘敌近百。民团始终也未在河东立住脚。

由于形势发展很快，6月中旬红军逼近苍溪，7月上旬独立营接到上级指示扩充为独立团，下属三个营，由车云海任团长，黄维德任副团长兼参谋长，李斌、赵继胜、罗治平分任营长。后来四蛮寨李开湘领导的游击队也参加了独立团，这时独立团共有一千二百余人，四百余支枪。

7月底，敌人眼看民团不行了，又调来军阀李家钰一个营，

配合民团向三堆石发动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扫荡”。

在敌人进攻之前，民团罗敬三即派人送来了紧急情报，敌人有一个正规营加上民团、民伏约三千余人要进犯三堆石。得到情报后，团长车云海、参谋长黄维德立即召集了军事会议，决定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主力。由黄维德、李斌率两个连埋伏于麻坪梁右翼，赵继胜、罗治平带两个连隐蔽于冉家梁左翼，断左路敌之后路，中路由车云海带两个连和农民自卫队诱敌深入，再留两个连做预备队。通讯员连夜把命令传达到各地，一直忙到天亮。

第二日，敌人开始行动了，他们从麻溪壕、朱家壕滩口分两路过河，企图对三堆石形成钳形包围。埋伏在麻坪梁的游击队放过敌人，将其退路切断，而车云海则按计划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两公里以外的元山子。这时团长命令吹反击的冲锋号，只听军号一响，埋伏的部队、自卫队、群众几千人便如潮水般涌来。号声、喊杀声吓得敌人忙从原路撤退，待退到麻坪梁、冉家梁又遭我黄维德、赵继胜两部的夹击，敌人更加惊惶失措，抱头鼠窜。我们则放过罗敬三民团，集中火力攻击敌主力。敌毛营长急喊罗敬三增援，罗假意增兵，途中尽被我活捉。这一仗，被我打死打伤，还有摔死、淹死的敌人不计其数，仅俘虏的就有二百多人，只三分之一的敌人逃回西岸。罗敬三的人一个没伤，抓着的都放了，后来听说他还得了敌人的嘉奖，说他支援解围有功，对他反而更信任了。我们把缴获的枪支武装了独立团，敌人尝到了苦头，再也不敢轻易行动了。

1933年8月中旬，红三十军部队到达老观场，8月13日，红军一个主力营和我们独立团配合作战攻占了太和城。这一仗也是打得相当漂亮的。

太和城位于王渡镇背后十余里，建于宋代，历史上曾是阆中州治所在地。它三面临水，一面接陆，古城四周悬崖陡壁，形成天然屏障，从军事上讲确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要塞。城中驻有李家钰部十三团一个营，我们决定夜袭智取。

8月13日拂晓前，由红三十军二七〇团一个连长、一个司号员和我独立团战士宋功文组成尖兵，在蒙子溪踩滩登岸，摸了敌人的第一道哨，然后攀树扭藤登上悬岩，又解决了敌第二道哨。当红军和独立团包围了敌设在杨家岩的一个连时，敌人还沉睡梦中，稀里糊涂地便全部做了红军的俘虏。我们立刻占领了西门制高点，向敌人发起了全面进攻，守敌一个营全线溃散，逃往鸡公寨、牛家坡，我乘胜追击到铜鼓山口。逃敌企图负隅顽抗，但突然从铜鼓山庙后冲出十二位红军战士，打得敌人丢盔弃甲，逃至张家山。当伪师长罗迺琼得报，急令十五团增援时，红军和独立团已打扫完战场，押着俘虏和战利品胜利回到了东岸，无一伤亡。8月18日，独立团又配合红军一个团攻占了元坝区，歼敌一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9月初，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收缩阵地，暂时撤出了三堆石苏区。敌人主力杀向三堆石，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他们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抢粮、抢牛、抢东西、杀人、毁房，苏区群众受到惨重的损失。

9月20日左右，三堆石独立团奉上级指示要全部整编为正规红军开赴前线。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全区涌现了一个参军的热潮。据后来初步统计三堆石、王渡镇、中土等十个乡镇当年参军的就有近二千人，留地方政权工作的50人，已牺牲95%以上，三堆石人民对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临走前，苏维埃政府为独立团召开了万人欢送大会，群众抬着猪、羊、草鞋、粉条等

为我们送行。全团一千二百余人把全部武器弹药留给地方赤卫队。在车云海、赵继胜等同志带领下，于9月下旬赴万源县，正式编入了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成为红军的一部份。（以下略）

（中共苍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参加阆中老观农民暴动情况*

赵承丰

老观的农民运动1932年就比较活跃,游击队因此也比较活跃。最早建立起来的是基干游击队,开始在老观地区打土豪、打恶霸,不少土豪劣绅不敢在家住,躲藏起来了。1933年是正式游击队组建的时期,到了6月份老观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一举捣毁老观区乡旧政权,在苍溪白庙建立了游击队独立营。营长是红军派来的老冯,侯正方是党代表,张兴帮为营副。独立营编入红军后,我同张兴帮编到八十八师。

(中共阆中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遂安农暴前后*

邹风平

这时（1933年——编者注）省委补充执行委员缺额，我被选为省委委员。

8月，罗世文被派四方面军工作。省委改组，廖锡坤（即廖恩波——编者注）任省委书记，原秘书长史伯康任组织部长，我任常委兼秘书长。两月，廖锡坤赴沪转中央苏区，史伯康代理书记，不久，徐平被中央派回省委。9月底，遂宁、安岳县农运发展，省委派我为特派员领导遂宁、安岳农民游击战及地方运动。到达后工作一月多，农运发展如火如荼，三个区纵横五十里有组织群众五千多人，游击队成立了三个中队。赤卫队，各乡农会都有。党员近二百人。四方面军在前方节节胜利，农民在李其相军阀、土匪压迫之下，积极要求武装行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是具备了。本来准备在年关斗争中发动，不幸于冬月初，凉风店区遭受破坏，区委被捕，影响到中心区通贤场。农民茆茆惶惶不可终日，地方团队已注意日夜在各隘口布防，农民轮番请求武装行动。省委派来的军事指挥员又于凉风店被破坏失掉关系。我一书生，自知不能任军事，迟疑纳日。到冬月初六下午，形势更加紧张，团队驻军已开始向农民进攻，发生逮捕等事。知暴动亦牺牲，不暴动亦牺牲，乃将农会、党团县委、游击队长、赤卫

* 标题系编者所加。

队长召集一扩大会，组织遂安工农革命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决定晚上9时分别集中于通贤场附近三个山上，到时即按所定计划夺团队枪，打土豪，行动起来。是夜，各游击队、赤卫队、农会会员组织了许多人，集中三处，共计约四百余人，当即打了几家土豪。我所领导的一队夺了二十几条枪，与另几队被军团阻住失掉联系。在与军团激战中，农会领导同志的房屋被军团焚毁而战争又失败。到天亮时，我所领导者已逃跑得仅有四人四枪，到一群众家，他不敢收留，我说服了他。初七晚上大搜捕，我昼伏夜出活动了三夜，队伍组织不起来，群众天天被捕，家被抄没。我于7日化装到龙台场区巡视布置了工作，准备通贤场恢复了武装行动后，龙台场即发动举事。一星期后我又到通贤区……，住了几天，又到凉风店。这段时间县委的人全部不见了，以为是阵亡，又不见尸……，我到凉风店时即派一交通到省委报告经过，并说明恢复武装行动计划。1934年1月12日（旧历冬月二十七日），交通回凉风区，省委要我立刻回省，不得停留。我布置了一下工作，即于14日动身，17日一早抵省。当到了省委，才知遂安县委于暴动失败后第三日即到省委了。

在省委前后十四天，检讨我的错误，由徐平来同我谈话若干次，结论指出以下几点：

1. 忽视日常斗争，只重军事暴动。
2. 党与群众混淆，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混淆。
3. 英雄主义。

综上所述，给我的撤销特派员处分，并严重警告处分一次，我完全接受，并补述我不懂军事。

土地坡暴动和弹子山游击队

廖瑞呈

在丰都后街的一间秘密屋子里，我会见了田鹤鸣、戴北星、卢文修等人，也有这家屋子的主人。鹤鸣给我们互相介绍，说他叫秦石琴（秦一九），叫我以后称他秦大哥。这天晚上，鹤鸣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当然也有秦大哥在座。他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和上级的指示，要求我们离开丰都城到农村去搞组织发展工作，扩充实力，进行武装暴动，然后到山上打游击。当时，我们有几支手枪。弹子台乡间，秦大哥还可以发动群众二十多人，长短枪十余支，大家决定先去袭击土地坡。因为那儿条件很好，土地坡团练队长王伯瑜，也是一个地下党员。我们派人去和他联系，叫他作为内应，把团练的枪全部夺过来，我们的实力就大了，再到大菁山打游击。事情决定之后，秦大哥就派人到土地坡去联络。土地坡又名平安乡，距丰都城只有五六十里，属涪陵管辖。派去的人转来回信说：“王继尧（应为王伯瑜）完全同意，并决定旧历正月十五日行事。”秦大哥马上派人到弹子台去约人，约定正月十四在丰都上面朱家嘴（距丰都十余里）朋友家等候，来时都要三、五人一组，夜间行走，以免扩大影响，引人注目。十四日这天黄昏时候，我们城里面的同志也身藏手枪到朱家嘴与弹子台的同志汇合。我们到达朱家嘴，弹子台的同志们有的在养精蓄锐睡觉，有的在站岗放哨，以防万一。夜晚，皓月当

空，照耀大地，不用手电筒都能辨别方向，看清道路。大家兴致勃勃，直往土地坡进发。下半夜三点钟左右，就到达了土地坡附近约三里许的一家贫农家里。是（王伯瑜）先给我们安排好的集中点。这天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旧的习俗都要玩龙灯，又逢土地坡赶集的日子。因此，赶场的人，络绎不绝，街上显得特别热闹。王这天很慷慨，特地买了很多酒肉，晚上和团丁们欢庆元宵……，故意殷勤劝酒，吃得团丁们醺醺大醉。夕阳西下，接近黄昏，四乡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拥进了土地坡。藏在乡下老贫农家的同志们随着人群迅速而又机灵地来到街上预约的地点集中。鹤鸣发出命令，以三分之二的兵力由鹤鸣率领，进攻团丁营房（三层楼碉堡）；以三分之一的兵力由北星率领捉拿住在街中大院的伪乡长（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大家听信号枪为号，一齐动手，完成任务后以哨音联络，到下场口集合。布置妥当后，各自按照指定地点前去隐蔽，候信号行事。……只听“砰”、“砰”两声尖厉的枪声，鹤鸣和秦大哥带领着同志们冲进营门口，敌人无力反抗，全部缴械。我们把所有的人押在空屋里锁着，才走出营房，前去接应戴北星。殊不知戴北星比我们更为顺手，他听到枪响后，就走进乡长院落，高喊“乡长，拜年罗！”乡长正在大厅里，华烛高照，举行夜宴。他听到喊声，急忙离席出来迎接……，北星飞跑上前，将他一把揪住拉了出来。来接应的同志听说北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就同到下场口集合。清点人数，一个也不少。这次战果，计获手枪三支，长枪二十余支。……后来我们听见远远的枪声……，鹤鸣、北星等商量，先解决了他（指乡长），也为人民出一口气。于是北星提枪上前，砰砰两枪，就结果了他的性命。我们趁着月色，迈开大步，向着弹子山飞奔而去。

我们来到山上，都住在贫苦人家。起初，他们都有些畏惧，

不愿和我们接近，有的甚至把粮食和贵重的东西藏起来逃跑了。后来我们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专为穷人打天下和撑腰的。他们见我们态度和善，言语诚恳，并没有危害他们，才渐渐和我们亲近起来。我们又向他们了解当地有哪些是专门欺压和剥削穷苦人民的恶棍和土豪，他们都一一向我们说了。我们根据他们的介绍去惩治了这些坏家伙，帮他们申冤，替他们雪恨，并给他们（从地主手中）夺回粮食财物，以一部份作为我们的粮饷，其余的部分给贫苦人家。这样，他们就更和我们亲近，并暗中为我们刺探消息，当向导，对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大。

我们的行踪没有一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都在弹子山周围百余里地进行活动……在竹枝坝，也曾有地方团练来阻击过我们，经我们奋勇抵抗，打得他豕逐狼奔，此后再也不敢来和我们较量了。

（摘自《廖瑞呈回忆》，中共涪陵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谈 越 西 起 义

陈 占 英

1934年5月，越西王家屯一带的彝汉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廿四军，开始酝酿组织时，我不大清楚，因为当时我在地主安国桢家里帮工。到了打响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那天是王家屯逢场赶集，起义军首先把驻扎在王家屯关帝庙中的一连敌军的枪缴了，并把那些兵押起来。不久，越西城的敌军团长聂秋涵派兵增援王家屯。起义爆发以后，我们瓦岩乡和后山村调口岩的穷苦人都是参加了的。我们一直打到离越西城不远的大寨，又去攻县城，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据城死守。我们的人很多，但是枪弹太少，多数是火药枪。那天晚上雨落得很大，许多人带来的干粮也不多，又冷又饿。我们坚持战斗了六天就失败了。只有王义芳、王义全和蒋明远等人各带领一百多人。后来蒋明远转移到彝区被敌人捉住了，王义全也被敌人抓去关在狱中，敌人准备把蒋明远等人押解到西昌去杀害。

我们到王家屯去参加起义军时，蒋维州，蒋明远、王义芳、王义全等人我都看见过，蒋明远、王义全还给我们讲了话，当时，他们已把王家屯的国民党军队解决了。蒋明远说：“我们穷人要翻身，要吃饭，要穿衣，要打倒土豪劣绅，攻下越西城，打到会理与红军汇合，大家要鼓劲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讲红军，没有听到讲共产党。在他们讲话的旁边，还插了一支绣有镰刀斧头的

大红旗。我第二年参加红军以后，才发现那支旗子与红军部队的旗子是一样的。

(中共越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回忆酉阳南腰界红军游击队

原川黔边独立团班长：刘应学

战士：陈洪开 符志义 秦仁佐 任永光

1934年6月，贺龙军长带领红三军来到南腰界。红军到南腰界后，一面打土豪惩恶霸，一面组织工作队到人民群众中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根据地建设。贺军长、谷志标参谋在南腰界小学亲自召开积极分子会，研究建立红军游击队和打土豪的问题。在红军的组织和帮助下，先后在南腰界及其周围建立了南腰界、唐家溪、龙池等几支红军游击大队。

红三军来到南腰界后，贺龙同志亲自接见了当地农民武装队长陈玉良，作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长谈。第二天，贺军长亲自带他到红军中去看了看，让他找红军战士交谈。第三天回到山里，便同我们讲述了他会见贺军长的情形，大家听后，个个都兴高采烈，心花怒放。不几天，我们在陈玉良队长的带领下，整个队伍下山跟红三军会合。从此，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就正式编为红军游击大队。不久，我们这支游击大队由原来的二十多人发展到四十多人，陈玉良任大队长。1934年7月，我们这支游击大队连同南腰界、唐家溪、龙池等三支游击大队共三百人，均编入红军川黔边独立团，由红军覃治安任团长，跟随红军转战在川黔边。

1934年8月初，红三军主力到贵州木黄阻击进犯川黔边苏区的王家烈部队，团总冉瑞廷偕其儿子冉崇侯，带领地主武装窜回

南腰界，疯狂屠杀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及其家属。贺军长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派钟子廷团长，率队星夜返回南腰界，配合游击大队围歼冉瑞廷，冉瑞廷见红军主力部队返回，再次遁入深山。

8月28日，红军分三路进攻冉瑞廷的反革命据点——大坝祠堂。川黔边独立团由覃团长带领，由土门上马家寨，这里两面是山，地势险要，敌人先守住了这个地方。我们一到，他们凭借地势，居高顽抗，我们一个冲锋，就打退了两边山上的敌人，队伍继续向大坝祠堂前进。

9月12日晚，贺军长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沿阵地，命令用炮轰塌了围墙，由红军团长钟子廷带领突击队（当时叫：敢死队），其中有陈良玉、陈良贵等多名游击队员参加，每人两支枪一把刀，每个突击队员都用湿棉絮裹在身上，从准备好了的铺在烂田里的竹子和木板上冲击过去，与据点里的顽敌展开了肉搏。9月13日晨，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歼敌四十多名，冉瑞廷儿子冉崇侯也被击毙。

为了巩固和发展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扩大红色政权的影响，打击反动武装。在1934年的8、9月间，我们南腰界的几支游击大队配合红军先后在川黔边境，参加了大小战斗二十多次。

在转战川黔边的日子里，我们还先后在甘龙活捉黔军一个团长，缴枪八十支，在杉树坳击溃敌军两个营缴枪十五支，在盘溪活捉乡、保长十四人，缴枪十支，子弹两箱。我们南腰界的几支游击大队，在川黔边独立团的领导下，同印江、黔东等几个独立团一道，配合红三军，纵横驰骋于川黔边各地，英勇打击敌人，奋力保卫苏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4年10月，红军二、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合以后，南腰界几支游击大队组成的川黔边独立团，又编入黔东独立师。为了更有

效地打击敌人，红军主力东征湖南，就留下独立师在南腰界坚持武装斗争，并担负牵制敌人，掩护二、六军团主力进军湘西的任务。

（中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张祥珍整理）

一九三五年峨眉武装起义情况*

和成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党内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组织起义，迎接红军入川，建立根据地。当时，我出于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义。因为我在1930年就在忠、丰、石一带参加过武装斗争，有打游击和改造土匪队伍的经验，自认为有把握；又因蒋介石已进川，蒋派来的参谋长张伯言找我谈话，对《川康新闻》报导的新闻不满，警告我说：“我相信你不是共产党，别的都好说，这是要杀头的”，已传闻派人接办《川康新闻》。当时我是《川康新闻》社长，有可能成为刘文辉的牺牲品，真是逼上梁山。

这次武装起义的力量组合是利用社会关系、旧同事关系和地方社会哥老武装。敌县团委会副委员长贺侣皋与我是表兄弟关系，他管辖的常备队第二中队长又是我弟和成弟的内兄。但贺是书生带兵，对部队控制不了，起义前他是一无所知，我只是利用与他的这种关系，挖他的墙脚，把他的队伍拉过来为我所用。在雅安我找过二十四军的一些同事，如旅长徐光普等支援过武器；当过营长的许映海、杨硕容等正想找得一官半职，他们倾向我们，既懂军事又是我的同学，约同他们串连一批人参加起义。在峨眉，我只知道我的弟弟和成弟和唐杰，皆是中共党员，做了不少具体工

* 标题系编者所加。

作。同时，还利用了方吉廷、高德辉两支社会哥老武装力量，虽然他们是土匪队伍，不属于我们的圈子内，正好利用、改造他们。

事情经过一些准备后，在《川康新闻》社内和同志们一齐研究布置，曾设想，这次起义胜利了，继续扩大力量，建立雷马屏峨（峨眉、峨边）根据地，再依靠中央红军入川的力量，和红四方面军联成一片，在四川建立根据地。若失败了，就上山打游击。现在回忆起来，这次不成熟的起义，果然失败了。我到了雅安，把撤出来的约一百人的队伍在雅安、洪雅一带地区打游击。曾在洪雅打过一个镇子，我把缴获所得，一部份分给当地穷人，一部份用作部队给养，一部份用来拉拢上层。在此期间，曾想抢越飞仙关去找红军，因杨子惠部守得很紧，未能通过，而部队中又传闻红军已经北上，我还不相信，还叫辟谣。后来，由于敌人“围剿”、“清乡”，我离开部队到成都找车耀先汇报情况，请示部队怎么办？车指示我迅速离开四川，介绍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找丁华同志接头，我就走了。

（中共峨眉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关于叙永地区游击队的一些情况

朱光壁

1934年春节，由张友德代表党组织通知我调叙永县团委工作。当时叙永县是贵州军阀侯之坦的防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但这个县里也同样设有一个“清共委员会”，是一个叛徒叫郑雨生的任副主任委员。

1934年8月，泸县有个叛徒卿德玉到了叙永。这时，黄泥嘴的团员王元贵到叙永对县团委书记曹德渊说：王逸涛的兄弟王元德（他当时在叙永县团练局当队长），带上了一支手枪连夜回家（在黄泥嘴）通知其兄王逸涛，说有叛徒要去抓他。王逸涛随即从他家里把自己的两支手枪、三支步枪都拿出来拖上山打游击去了，王元富和王元贵也参加了进去；并说，王逸涛要求组织上派人去领导和筹建部队。当时，经县团委研究决定：我和曹同去，曹先走。

我回叙永几天后，县团委委员李祝秋在叙永县新城的一个书报社被捕。当晚，曹刚从黄泥嘴赶回，得知李被抓的消息。和我研究决定：曹第二天仍返回游击队，我到泸县向中心县委去汇报关于游击队的情况和李祝秋被捕的问题。我去泸县向中心县委书记作了汇报，又返回了游击队。

不久，邹风平到了游击队，解决如何建立游击队根据地的问题，并恢复了王逸涛的党籍。

游击队成立后，群众很快的发动了起来，又组织了一支赤卫队，由我负责。赤卫队的任务主要是组织群众，配合游击队行动。我们还发动群众破仓分粮、站岗放哨和进行除奸工作等。王逸涛飞扬跋扈，不接受党的领导，个人独断专行。鉴于他的这些表现，我和张友德向泸县中心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增派李石坚和梁正伯到游击队加强领导。

后来，李石坚去叙永白杨河一带组织了一部份群众武装合并到游击队。部队经常活动在五龙山、谢家沟、谢家寨、六堡、九龙寨等地和四川云南交界的大山区。这些地方，反动统治力量薄弱，是苗、汉杂居的地区。在游击队和赤卫队里，就有不少苗族同胞参加，他们对革命忠实，作战勇敢，所有苗族同胞同我们的关系都很密切。

游击队中党的组织是一个区委，由张友德任书记，王逸涛也参加区委。团的组织也是区委，由我任书记。这时两支队伍合起来有七八十人（除去当时投靠我们的杨登高、杨永安弟兄俩的绿林武装）。王逸涛负责军事，王元德派驻泸县中心县委作联络工作。

1935年1月下旬，红军进到贵州赤水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当即派出侦察员探得红军已接近我们的驻地，立即派张友德带上一个队员去联系。第二天清早（即1935年旧历正月初一日），张友德回来了，还跟来了一个红军同志，谈了联系情况之后，我们随即将游击队和赤卫队靠拢红军的大部队。

当我们向三军团靠拢住下来以后，我和张友德、王逸涛、李石坚等随同三军团派来的联络员去和军团首长见面，我们向三军团的首长汇报了游击队的情况，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则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形势；讲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为什么要北上抗日；讲游

击战术等。当晚，首长们就留我们住在军团司令部。次日，三军团司令部拨给我们五十支汉阳造的步枪，另有六挺重机枪（重机枪没有子弹，当时交给杨登高掩埋起来，后来，杨逃跑了，并将机枪也交给了敌人）。三军团的首长们当时还给了我们收容安排红军伤病员和派出向导给红军部队带路的任务，我们都照办了。另外，还指示我们动员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工农红军。当我们将离开军团司令部之前，在我们的要求下，军团首长特派了一位负责同志，给我们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讲了话，对我们的鼓舞很大。

我们离开红军大部队后，游击队先后收容了掉队的伤病员同志数十人，加之，又发动了一些贫苦群众参加游击队，部队扩大到一百八十人左右。赤卫队和游击队合并，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军事负责人王逸涛，政委何中舟（原是红三军团某团总支书记），下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是梁亚伯；第二大队队长是李石坚；第三大队队长是杨登高（他原系一支绿林武装部队，约三四十人枪）。

在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还新成立了两支游击队。一支叫做“赤（水）合（江）游击队”，一支叫“古宋游击支队”。“赤合游击队”的负责人我不清楚，“古宋游击队”的负责人是刘复初。

为了扩大游击区，邹风平和游击队党组织决定把我和曹德渊派在叙永的两河区一带工作。主要是在游击区边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配合游击队行动。

关于青神西山暴动

周亚光

1934年夏秋之际，青神中心县委曾向四川省委送去一份即将举行暴动的报告。约11月下旬，省委即派我去青神中心县委传达如何进行斗争以发展到武装暴动的指示。

由段玉章同志引导到莲花场开了一次中心县委各同志许黄牛、段兆麟、邱骏、毛慈影、刘怀斌等参加的会议，统一了思想。认为：青神暴动条件已存在，但还不成熟，必须立即发动各式各样的斗争以走向暴动。

会后，我连夜同毛慈影同志一道，赶回她工作的所在地住下来，在该地试点。

我们确认暴动条件已存在，军事准备工作必须加紧筹划。约在12月上旬，省委调我返省讨论武装问题。

我刚回成都两三天，国民党报纸即登载青神方面已发生暴动，省委当即决定派我返青神协助领导。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起身，国民党报纸又登载出青神暴动已被国民党迅速镇压而失败的消息。省委决定改变我的任务为返青神清理组织。

到青神，闻悉许多同志的殉难，更多农民群众的遭受蹂躏和残酷迫害，悲痛和忿怒的心情真不可名状！

这次西山暴动，是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的，是党的青神中心县委所主持和发动的。

（中共青神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剑阁县高石坎革命兵变始末

李 鹏

1935年1月，我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了二十八军第六混成旅第二团第二营部分士兵兵变。

当时，敌人是沿嘉陵江江岸单线配备，后防直到距江边九十里之剑阁县。

兵变的发动，决定于1月9日晚11时。计划先进行肃反和破坏工作，由少数党员和赤色群众负责，并决定了破坏和肃反的具体对象与方法。

肃反后，一排由李鹏指挥，运动至左翼相距约五里之五连附近埋伏。二排由吴建初指挥，运动至右翼相距约三里之三营附近埋伏。三排留一个班由阮自强指挥守渡口，两个班由李硕指挥解决营部，并援助第八连兵变。八连取得胜利后，再配合三排向第七连进攻。以上进攻部队和八连，以第三排在营部处（距渡口约八里）的枪声为号，一齐开始进攻。

在上述进攻战与第八连兵变的过程中，如取得胜利，并有对岸红军接应渡过河来，则一直继续向左右两翼横扫，以击溃敌人全团为目的，最后在黄金口对岸集合。如进攻失利，对岸红军又无行动时，就以渡口处三次连二响的枪声为号，到渡口集中渡河。

当天黄昏破坏电话线后，发觉十一时略嫌过早，因部队上的

赌痞和大烟鬼们，平日此时都还没睡，因又改为一时，但实际是在十二时开始肃反的。两点钟以后，进攻失利，原联系配合起义的对岸红军也无动静，而即发出集合枪声，进行渡河，往返三次。最后一渡上岸时，天已大明，还剩下来向三营方向警戒的同志，未渡过河，其中被抓去的夏子恩、刘青云、祝青山等人遭到敌人杀害。

此次暴动，总共渡河进入川陕苏区的人数有五十七名，长短枪三十九支。

(原件存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资料室)

回忆云阳武装斗争（节录）

张述成

1935年1月19日晚上八点钟，在川东云阳县爆发了武装暴动。这天的韵目代号是皓日，所以旧日云阳民间称它为“皓变”。

1932年“一二八”战争后，即有个别曾在上海从事军事斗争的同志回到云阳进行革命武装组织工作。1933年上海党组织指派一批有一定革命经验的党员如谭林（谭右铭）、陶闇（陶季騫）等到云阳领导武装斗争。由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云阳人，熟悉云阳情况，有利于领导云阳武装斗争的开展。

他们回到云阳后，立即与云阳原有的革命力量如赵唯、赵禹、危翼成、赵腾芳等汇合行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们主动与万县、奉节、梁平、忠县等地的部分党员取得联系，团结部分革命青年，秘密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力量。他们又利用旧的社会关系，取得云阳县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如陶闇当教育局局长，谭林当云阳县图书馆长，赵禹任云阳农坝乡白庙子小学校长等。此外还掌握一部分地方武装团队，如谭端生在云阳南岸作南防总指挥，赵唯任云阳北岸农坝乡窄口子一带团练局队长。经过党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觉悟有所提高，纷纷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云阳暴动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紧接着，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购置军火，买了一些手榴弹

和手枪，积极准备起义。

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六路“围剿”，乘胜南追，红军一直打到开县杨柳关；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呼应，经恩施、利川，指向云、奉边境的白杨坝。云阳地跨长江南北，南接利川，北接开县、城口，这时正是起义的好时机。谭林他们一方面积极准备暴动策应，另一方面派人争取川东特委领导，配合川江南北红军活动。但因与特委未联系好，迟迟未动手；再加上他们想等南北红军攻拢一些，暴动稳当些。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攻方向不在于立即占领云、开、万，在佯攻杨柳关之后，就西渡嘉陵江北进了。不久，贺龙部队也停止了北攻，撤回鄂西和湘西。这样，推迟了暴动的进程。

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撤走后，云阳反动派立即加紧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的迫害，阶级矛盾已达尖锐化程度，如不立即采取革命行动，革命力量将受到极其残酷的摧残。在这种紧迫形势下，他们曾派孔繁桔（垫江人）去上海请示，但迟迟未回来，得不到中央的指示。他们考虑到，虽然红四方面军已经北撤，红三军已到贵州，也仍然要暴动，给反动派以打击。他们打算暴动如成功就占领云阳，暴动失败就撤到红四方面军控制的根据地去。

1935年1月19日的云阳暴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的。根据事先对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和分析，他们制定了这样的战斗计划：赵唯带部分人打团练局；张建威（群众，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下级军官）率部分武装攻打保安队；并派出侦查人员，将这两个部队的情况了解清楚。暴动时使用的武器弹药，因短枪便于携带，事先发给暴动部队，长枪不便于携带，藏在女子师范学校内，起事时临时发给部队。除此之外，还准备在打下团练局后，利用该局当时新购而尚未使用的积存枪支装备我们的徒手

部队。暴动时间决定为1935年1月19日晚上9点钟。凡参加暴动人员，领系白巾一根以示区别。

1月19日，暴动队伍按照计划准备就绪，暴动人员陆续向县城秘密集中。晚上，他们把暴动人员安置在茶馆（其中有一百多人是外来的，他们挎着手枪，在当时稽察监视很紧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在女子师范学校发枪、发子弹时，被几个过路的老百姓看见，只好把这几个人扣起来。由于这两件事都很危险，他们只好临时决定提前一点钟起事。由于起义提前，好多人都准备不及。临起事时，张建威还没有到。于是临时决定调换赵唯打保安队，张建威部改由温作民率领打团练局。这一对调，双方对事先侦察的情况来不及交换，特别是张建威部对团练局楼上枪支积存柜和驻地情况，都不甚清楚。

暴动队伍在县府后坝集合，谭林作了简短的交待后就同时分别出发，奔赴暴动点。团练局驻西城内，保安队驻西门城外双松堂，从集合地点到团练局路程接近，到保安队有三里左右。部队到团练局等了许久，保安队那边还没有动手。由于部队多是民间武装，有些还是徒手，不敢在门口停留过久，只好决定先打。本来暴动队和团练局内部人员联系好的，由赵部直接进去，活捉局长马仲云，因为赵在当时是团练局的队长之一，配带有进出符号。但因队长临时换了，进不去，只得硬打。我们的同志一进团练局门口就打死敌人的卫兵，跟即暴动部队也冲了进去。团练局局长马仲云听到门外枪响，知道出了事，慌张地从墙上取下一支手枪，从天窗逃出。英勇的暴动部队与团防进行顽强战斗，没有多久就击溃了团练局部队，胜利地占领了县城。

打保安队的部队还没有走到双松堂，保安队听到团练局枪声，立即集合赶出来，双方在路上打了遭遇战。保安队人多，我

们人少，为了免受包围，赵唯部只得且战且退，退入城内把守西门。保安队想夺回县城，遂组织力量向我猛攻，特别是争夺西门战斗最激烈。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被我们的手榴弹、冲锋枪的威力压退。

这天晚上，双方激烈鏖战。谭林、陶间、温作民等考虑到敌人主力未被击溃，死守在城内不行，决定撤离县城，向五凤楼制高点进发，准备退往云、开边境，在农村扎根战斗。部队撤出云阳县城后，为保存革命力量，纷纷潜伏农村各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部分领导人员，先后回到上海。第一次云阳起义，就这样由公开的武装斗争转入经常性的群众武装活动。

（摘自《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

刘琳、蒋思敏、袁文质记录整理）

战斗在川滇黔边区的红军川南游击队

朱光壁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是中央红军长征过四川，与川滇黔边区游击队会师后，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正式成立的一支游击队，是我党播在川南的革命种子。

1935年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云南威信（即扎西）整编期间，党中央决定：“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见《扎西会议决议》）。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加强地方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长征，经党中央决定：抽调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中央纵队干部团政治科长、上干队政委余泽鸿，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新编师师长刘于臣等一百多名红军干部和国家保卫局第五连（连长黄富山）全连武装共二百余人，在威信石坎子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由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直属中央），徐策同志任特委书记兼政委，余泽鸿同志为宣传部长，戴元怀同志为组织部长，刘于臣为参谋长，龙厚生为特派员。游击队成立后，徐策等同志带领部队，随同主力红军东进，于2月12日至叙永坛厂底塔同红军大部队分手后，去树坪庙门前与叙永“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前来迎接的同志会了面，然后到黄泥嘴五龙山与游击队会合整编。

原中共泸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这支叙永地方游击队（即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系1934年8月在黄泥嘴附近成立的。初期，仅有几条枪，十来个人，主要活动在黄泥嘴五龙山区，一开始，泸县中心县委就前后派出曹德渊、朱华清（现名朱光璧）、张友德、李石坚、梁亚伯等干部领导这支游击队，由王逸涛负责军事。经过组织串连，发动劳苦群众参加，游击队逐渐扩大起来，原川滇边境的一支绿林武装，杨登高及其弟杨永安曾一再提出要求，后来也参加到了游击队，但仍分开活动。1935年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一），当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的红三军团行经五龙山区时，游击队负责人张友德、王逸涛、朱华清、李石坚等前去军团司令部汇报游击队的情况，三军团负责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讲述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希望进一步扩大游击队组织。2月5日，三军团即将离开五龙山区时，曾拨给游击队步枪五十支和重机枪六挺，还留下三军团四师某团总支书记何中舟等数十名伤病员在游击区治疗。这时，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约一百八十人左右），经党组织研究决定，遂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队里设指挥部，下属三个大队。这时才将杨登高所带的三四十人编为第三大队，游击队指挥部由张友德负责党的工作，何中舟任政治指导员，王逸涛负责军事，朱华清负责团的工作。红军在扎西整编期间，三军团向中央汇报了这支地方游击队的情况。后来，王逸涛也去到扎西，自称是朱德总司令的学生，要求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或中央派人加强游击队，当中央决定在石坎子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时，即任命王逸涛为红军川南游击队司令员。

红军川南游击队在五龙山与地方游击队会合后，共约五百多人，编为五个大队。

红军川南游击队成立后，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久即投入打击敌人、牵制敌军的斗争。1935年2月下旬，在叙永木厂梁子击溃追击主力红军的川军一个团，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第一大队队长梁亚伯（泸县中心委派到游击队的干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3月，游击队转移至兴文大石盘，与川军激战，组织部长戴元怀同志在掩护司令部、政治部撤退时，壮烈牺牲。

1935年5月1日，中共川南特委带领游击队，在叙永坛厂落堡，开展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书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纲领；宣传川南特委制定的《川南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共十二条）。这个期间，游击队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财富、抗捐、抗税、抗债……等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还经常派出地方工作组，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组织串连，建立地方区委。这时，游击队有了较快的发展，声势愈来愈大，敌人深感威胁，遂调集重兵对我游击队进行“会剿”。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投机革命的王逸涛及其弟王元德，于5月在五龙山区借故逃跑，他们逃跑后，曾杀害了游击队一个姓王的交通员，并从他身上窃取了游击区边沿区委写给川南特委的绝密报告。不久，王逸涛弟兄二人通过两河口区长，投敌叛变。使游击队原开辟的游击区和地下区委几乎遭到很大的破坏。这时，三大队杨登高及其兄弟杨永安也脱离了游击队。

王逸涛叛逃后，游击队转移至云南威信马家乡，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徐策政委在会上公布了王逸涛叛逃的罪行，宣布了川南特委关于开除王逸涛党籍，撤销其司令员职务的决定。在会上，徐策同志号召全体指战员“革命到底”，并非常坚定地说：“将来革命成功后，一定要审判王逸涛，杀他的头”。此后，游击队更

加坚定团结，大大增强了战斗力。1935年6月，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叙永分水岭击溃川军教导师一部，打下朱家山，缴获敌炮五门，不久，又于来龙火石坡袭击川军顾小凡部，缴获敌人一个连的武装。6月下旬，夜袭长宁红石同场，缴获敌保安大队及民团枪一百二十支。

1935年7月，由张宏光、陈宏（原红军十一师十二团团长）等同志领导的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叙永朱家山与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两支红军游击队合编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政委，张宏光任副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陈宏任参谋长，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组织部长，李青云任特派员。纵队下属两个支队，川南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每个支队下属三个大队，共六个大队，约900多人。

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成立，游击队在朱家山大地坡召开了庆祝大会，搭戏台、演节目，进行宣传。朱家山的穷苦群众都参加了庆祝活动，观看了演出。游击队还将打土豪所得的粮食、猪肉、衣物等分给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不久，游击纵队转移至云南威信长官司（旧城）。

在长官司，游击纵队遭到川滇敌军的突然袭击，激战数小时后，副政委张宏光阵亡；政委徐策同志身负重伤，拾到萝卜坳牺牲；参谋长陈宏被俘（禁锢宜宾监狱三个月，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指战员共牺牲百余人，游击队损失很大。部队撤至威信箍箕坝，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泽鸿任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刘干臣为司令员，周大山为参谋长，部队转入隐蔽活动，进行休整。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道休整后，战斗力有所增强，

部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游击队指战员们怀着解放川南劳苦群众，为徐策政委等死难烈士报仇的决心，准备对川南敌人展开积极的进攻。这时，兴文、高县、珙县、筠连四县之敌，十分恐慌，特别是高县、筠连县尤为惊恐。豪绅地主纷纷携眷向宜宾方向逃窜。这四县的敌人均向伪第六区（宜宾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去电告急。宜敌深感形势紧迫，手足无措，摸不清红军游击队进攻的方向，只得将兴文、珙县、沐爱、筠连作为第一道防线，以长宁、高县为第二道防线。宜宾为后方，进行布防。

1935年8月的一个下午，余泽鸿同志带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自滇道入川，迅速挺进至筠连县境之吴家坝，打垮敌前线防御部队。我军乘胜前进，第二天拂晓，又攻下了距离筠连城约三十华里的隐豹关。敌人已无险可守，红军游击队于当日上午一举攻占了筠连县城。

红军游击队进驻筠连县城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打开公仓，将粮食分给劳苦群众；召开军民联欢会，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座谈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打开监狱，释放被监禁的受害群众，惩治了恶霸豪绅。游击队在筠连期间，遵纪爱民，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深的影响，不少劳苦群众积极参加了游击队。

红军游击队进攻筠连县城时，伪县长罗崇礼多次急电宜宾求援，宜敌令其：“竭力防堵”，“必须固守县城，至少要支持三天”，“必须死守，决不能后退，援兵很快就可到达”等等。但在红军游击纵队的猛攻下，不到一天，敌人节节败退，罗崇礼闻风逃跑到筠连城外十来华里的海营。当我红军游击纵队打下筠连城后，伪四川省政府，对宜敌及罗崇礼严加斥责，罗崇礼受到撤职处分。当红军游击纵队撤离筠连后，随即向江安、珙县、高

县、兴文、长宁、古宋等县，向敌人进行积极进攻，打下了安宁桥、红桥等大小城镇多处，沿途对土豪恶霸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大长了人民的志气。游击纵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5年9月上旬，余泽鸿同志通知活动在川南的另一支地方游击队，由刘复初带至兴文博望山与纵队会合。这支游击队系1934年底(或1935年初)，在泸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由古宋地下党员刘复初、郭平安、杨泽久等人，分别在古宋、兴文、长宁、高县、珙县、江安等地边境，以“红军之友社”的成员为主，组织群众武装暴动建立起来的。1935年2月，红军川南游击队来到兴文建武时，刘复初前去联系，当时，中共川南特委决定：这支游击队为“川南游击支队”，仍继续留在古宋、兴文、长宁、高县、珙县、江安等地活动。

这时，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余泽鸿，委员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刘复初。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兼政治主任余泽鸿，司令员刘干臣，参谋长刘复初。司令部下属三个支队，红军川南游击队为第一支队，红军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川南游击支队为第三支队。游击纵队为了威胁泸州、纳溪之敌，向兴文、古宋、纳溪等县境进发。9月中旬，在大洲驿击溃刘奉章团防后，进驻叙蓬溪，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惩治土豪恶霸，将其财产分给群众。10月以后，敌人对游击纵队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省“会剿”。在敌人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的不断袭击和川军一个团的跟踪追击下，游击纵队处境越来越困难；加上游击队成立以来，战争频繁，经常行军，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在敌人“围剿”愈加残酷的情况下，伤病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后勤困难，游击纵队人员逐渐减少。1935年12月，当游击纵队转移至长宁县境时，仅剩下一百多人。特委在贾家湾召

开紧急会议，将现有人员分为两个支队，余泽鸿、刘干臣带领第一支队，以长宁、江安为活动地区；龙厚生、黄富山带领第二支队，转移至云南威信、镇雄和贵州毕节等地的山区活动。当第二支队进至兴文炭厂时，被川军打散。敌人又加紧对第一支队的“围剿”追击，余泽鸿同志带领20多位指战员自长宁突围，撤到江安边境活动。1935年12月15日，当部队将移至江安碗厂，被川军及李品山保安大队围捕时，余泽鸿同志不幸殉职。刘复初、李青云带领十多名指战员上连天山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司令员刘干臣在古宋阳杉树湾，被敌人围捕时牺牲。

1936年1月，刘复初、李青云等十多人由连天山转移至兴文县洛柏林，与龙厚生、黄富山等同志会合。特委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三省“围剿”时期的经验教训，决定重新组织游击队，创造条件，建立根据地。会议决定：刘复初为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龙厚生为特委宣传委员、游击队司令员；李青云为特委组织委员、游击队特派员。

此后，串连了江安、长宁、古宋等地失散的游击队员数十人陆续归队，游击队又逐步发展起来。

1936年春，游击队仍活动于川南的叙永、兴文、江安、长宁、珙县等县境。当游击纵队得知红二、六军团进入川黔边境时，为了配合二、六军团的长征，游击队主动出击。1936年4月底，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向西康、甘孜地区挺进后，继续在川、滇、黔边开展斗争，在威、叙地区开展活动。这期间，贵州阮俊臣部（原绿林武装）前来接洽，要求与我游击纵队联合行动。在这之前，阮部已在毕节与二、六军团联系过，二、六军团将阮部改称：“川滇黔边抗日先遣队”，并派欧阳去该部作政治工作。阮部后又联合了黔军起义的陶树德一个营，共有五百多人。

经我游击纵队与阮部代表协商后决定：与阮部联合后的部队，总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队”，下编为三个支队，阮部为第一支队，起义黔军陶树德为第二支队，红军川滇黔边游击队为第三支队。中共川滇黔边特委对阮部支队的实力（阮部共有五百多人）及政治情况进行了分析。为防止发生意外，并由于阮部不能吃苦，不接受教育改造，我游击纵队即秘密脱离该队单独活动，向镇雄、威信及川边发展，沿途收缴了一部份反动武装。游击纵队又有了新的的发展。

1936年6月，游击纵队在威信簸箕坝活动时，刘少成、蓝澄清带领驻珙县地洞铺的川军一个连起义，向红军游击纵队投诚。这时红军川滇黔边游击队，已发展至五百人，龙厚生为政委，刘复初为司令员，曾春鉴为参谋长。

1936年夏，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由四川边境奔袭川黔边境燕子口，击溃川军杨森部一个营，缴获马驮子五十多个，军用物资一百多挑，子弹十二箱。不久，在大庙战斗中，击溃伪珙县县长刘治国带领的保安队和团丁四百来人，刘治国被我击伤后化装逃跑，珙县第二区区长被我俘虏。

这期间，游击纵队还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和惩治国民党收款委员、卡员，组织分粮队，开展分粮活动。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壮大和积极斗争，使敌人感到莫大恐慌。1936年秋后，川、滇、黔敌人又对游击纵队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会剿”。

1936年冬，在各线敌军包围截击的情况下，游击纵队遭到重大损失，最后剩下几十人。这时，司令员刘复初因重病寄养云南大雪山（后被敌军俘获，禁锢泸州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经

党营救出狱去延安)。政委龙厚生带领同志们从大雪山开往水田寨，途中又遭敌人突然袭击，龙厚生仅带着余下十多人（大多是干部）到达水田寨后，惨遭大地主艾中凡、郑耀东杀害，其余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指战员们，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贯彻《扎西会议决议》，前仆后继，为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为川滇黔边区的人民解放事业，坚持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陕南游击队和川陕游击队*

袁克服

陕南游击队的前身是红二十九军。

1933年红二十九军在西乡失事后，留有一部分人和红四方面军的特务队合并，组成了陕南游击队。当时有两个连，三百多人，后来由我指挥。其中陕南人有四分之一，西乡人多，城洋人少。

川陕游击队司令部留有五百多人，干部有一百多人，大部份是通南巴的人，那时刘子才担任道委书记兼司令员。

刘子才是达县道委书记，陕南游击队的一百多人是由他（刘子才）指挥。

（中共南部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谈沐川天宝山农民暴动

张兆廷

1934年8月，我入党后担任联络……1935年正月，天宝山农协会员情绪很高，要求发动起义，抗粮抗捐。当时上级有指示“在白区的同志要无条件的发动游击战争，牵制军阀后方，支援川北红军”（当时正是四川全省军阀在川北围攻红四方面军）。刘本昭从天宝山来舟坝约我上天宝山去研究，刘头天走，我正月十八或十九到天宝山，胡立本也在那里。那晚上召集农协开会，农民要求抗粮，遇到两个武装区丁来催粮，农民抗粮不交。以刘本昭为主，提了区丁的枪，把他们捆起。然后将牛儿炮、梭标为武器，以川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路纵队第五小队名义宣布起义。第二天利店来了保警中队，我们把炮架起打了几炮，保警从下面打上来了，因农民未经过训练，抵挡不住跑散了。我们也跑，刘本昭地熟跑脱了，我和胡立本不熟悉，搜山时抓到我们，同时被抓的有刘本才，还有一个农民共四人，在利店关一晚上送到沐川即收到监内。

（中共沐川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发动石鼎山起义策应红军*

李亚群

1935年1月，红军已到遵义，泸县中心县委书记召开过一次常委会，讨论如何接应中央红军，分析了红军可能在川、滇、黔建立边区，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也可能从北岸在泸县迎接中央红军。敌人方面，潘文华部驻在泸县，可能封锁长江，切断南北交通，中心县委不能离开泸县，决定派我任特派员去南岸，负责全权处理一切，相机与中央红军接头，报告四川形势。中心县委其他同志则全力加强北岸渡口工作，准备迎接红军渡江。

当时合江五通乡有个邹华轩（解放后在省参事室），是清水袍哥，曾经受到刘伯承、恽代英的教育影响，倾向进步，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还有个赵欲樵，曾经在刘伯承起义时所办的团练讲习所学习过，受过影响，想参加革命。当时他在刘湘的精选队（地方武装）当队长，手下有一连人。他与邹风平的关系很好，赵先想弃职逃跑，个人投奔革命，邹劝他别忙，答应给他介绍关系，这样就找到中心县委。邹风平同志派我带周义容，瓷厂的赵子明（合江先市人）和一个工人同志一起去五通乡，相机行事。

到了五通乡，我先找邹华仙了解赵欲樵的情况，又和赵本人见面，详谈起义计划。我开门见山，首先就跟他讲党的组织纪律要求。他有三个小分队，一个小分队在观音沟，队长叫冯吉，是

* 标题系编者所加。

赵的表弟，还有乡长黄体全，是他的姨父，这都是最可靠的。他先把我们送到冯吉那里去住下，我当时考虑，兵变要与农运相结合才能生根，因此就叫冯积极组织青年农民。同时，经过了解、观察，吸收了赵、冯和一个班长入党，建立了党组织。另外，还有个老党员袁崇杰，曾在合江开栈房，此人很会做群众工作。当时我们提出“破仓分粮，反对拉夫拉兵”的口号发动群众，这在饥荒严重的情况下，很符合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因此农民群众象潮水一般积极响应，我们只感到党员骨干太少，组织工作跟不上。

当时红军前哨部队距离赤水只有30多华里，我们估计川、滇、黔一定要建立根据地，准备组织群众武装暴动来迎接中央红军。但忽又听说红军绕过去了，感到很纳闷，也很失望。我们仍然继续积极准备，我又专程返回泸县向中心县委汇报，要求派军事干部来。县委听了汇报，同意我们的计划，只是说军事干部太少。最后商定派杨其生同志跟我一路去，先看地形，做好准备工作。杨任游击队长，我任特派员、政委。我们转去后，形势发展很快，由赤水到泸县的大路上写了很多“红军来了！”的大标语，革命空气很浓。

当时我们还没有接触毛泽东思想，只晓得破仓分粮，组织农民自卫军。至于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打游击，却毫无经验。红军又迂回转去了，我们决定还是要干。因此，在正月底二月初召开了行动会议。合江还有些另星组织，如邓之久、贾审修等人也派人前来参加。但正在这时，邹风平同志派了一个党员叫任胡子（任圣林）的送信来，要我回去代理他的书记职务，因为已经与中央红军接上了头，他要去叙永开会。我想这时候我怎么能走，想等武装暴动以后再说，因此，我们还是按商定的计划执行。精选队冯吉分队的队伍就在观音沟，决定当晚由杨其生、冯吉率领，

去贵州大同场夺取武器，并派交通去通知赵欲樵，由他和袁崇杰发动破仓分粮，然后由他考虑：（一）扣留乡长，捣毁乡公所，焚毁文件，把队伍拉到观音沟；（二）如无可能，借追剿为名，把队伍拖来汇合；（三）如还无可能，可按兵不动，暗递情报。结果赵按第一条执行了。其实，照当时情况看，第三条最有利，只让一个分队破仓分粮，乡上的力量留下来作掩护工作。

去夺贵州大同武器的有四十多人，由杨其生亲自带领，三十多里，走去一枪未发就夺到了，武器并不好。天亮后，敌发现夺枪的不是红军队伍，就派人来追，在石鼎山接火交战。我也赶到了石鼎山，战士们见“余老师”（我当时化了名）来了，很高兴。我与杨其生研究这样相持下去不行，准备等到晚上撤退。结果敌人不敢进攻，倒先退走了。我们也退到了牛尾岗（一条深沟）。本来我们该分散或者转移，因为敌人是肯定要组织兵力来“围剿”的。但当时不懂，反而在石鼎山扎了营盘，继续发展，扩大队伍。赵欲樵把队伍拉出来了，这时听说黔军派出了一团人来进攻，我建议先来个奇袭，免得被他们包围。杨其生同意，他亲自带人去夜袭五通乡，冲了几次都没有把敌人冲垮，只消灭了一些分支队伍。我方也有损失。天亮前我们队伍回来，还是没有转移。黔军逼近了，先攻岗头，攻不下。坚持到晌午，忽然听到一排激烈的枪声，黔军吹起“调号”逃跑了。我们以为是哪里的援军来了，那晓得是来“围剿”我们的川军，他们以为黔军也参加了起义，所以又在后面追击黔军。我们弄清情况，知道敌众我寡，只有突围转移。这时群众知道我们溃退了，很难过。我们白天不便行动，只能在晚上转移。写密件派交通员去叙永（与游击队）联系，也无下落，我们成了一支孤军，就这样坚持了二十七、八天。有一天晚上，在马草坪地主家里驻扎，被敌人发现了。我们看见相隔

一华里的对面梯田里，敌人正在动员围攻。我说要走，杨其生说不能走，如果被敌人发觉我们只有几十个人，就更要追，只有坚持硬拼，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时敌人已分两路包抄过来了。杨带一小组打退了一边，那边又来了。我身边只剩下冯吉与另一个姓侯的战士，敌人已经冲过来了，杨命令冯、侯二人把我抱着拖下沟，淌过了河，又由交通站送我回泸县。赵欲樵在大包围时，被派护送一个团员出去给县委报信，失散了。杨其生同志就在这次英勇牺牲了。（以下略）

（摘自李亚群《留给孩子们》，中共合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对石鼎山起义的回忆

赵 欲 糕

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抵贵州遵义一带。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屡受挫折，十分狼狈。四川军阀郭翼之部，奉命去贵州土城一线增援，堵截红军。基于上述情况，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为了牵制川军的增援，决定在具有一定条件的合江县西五区五通乡民团精选中队发动武装起义，并组织农民暴动。中心县委委员李清泉（李亚群）负责此项工作。他和当地进步人士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邹华轩同志一块来到五通场附近一个独立家屋“红岩子”和我接头。商谈了政治形势和民团的内部情况，确定的任务是：通过工作，做到：随时相机起义。工作方法是：个别谈话，进行宣传教育，培养积极分子。还作了具体分工：清泉同志负责在石鼎山附近做群众工作兼做驻扎在金宝山的民团三分队的工作。我负责做驻扎在五通场街上和黄大桥的一、二分队的工作。

到了1935年2月中旬，清泉同志约我商量起义的具体部署，谈到当地情况紧急，川军有继续增援之势，我们要很快行动，拉住川军的后腿。我把发动起义的工作和部队的思想情况作了汇报，一致认为已具备了起义的条件。确定把很快起义的计划向中心县委汇报，并请再派力量加强领导。

会后不久，在3月上旬，五通赶场的一天中午，清泉同志派人送来密信，指定本日晚上十二点钟左右，住五通场和黄大桥之精

选一、二分队，由我负责就地起义。我向起义队伍作了简单的动员：说明我们穷人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已经隔我们不远了，我们马上起义去投红军，和他们一块闹革命，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并宣布了夜间行军的一切注意事项。队伍出发了，天很黑，好在是熟路，仍然以每小时十多华里的速度迅速前进，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二分队的驻地黄大桥，我照给一分队讲话的内容，说明情况，队伍继续前进。

到了会合地点天已大明。中午时分，突然石鼎山上枪声大作，原来是三分队痛击尾追之敌，把敌人打回去后，接着就下山和我们会合。两支队伍互相交换了获胜的情况，皆大欢喜。清泉同志说：“昨天晚上，他和中心县委派来的军事指挥员杨其生同志，三分队长冯吉，还有伪乡长黄体全之子黄崇旋等，夜袭距石鼎山四十华里之贵州赤水县大同场伪区公所。三十多名团丁在睡梦中被缴了枪，有的吓得浑身哆嗦，哀求饶命。他们以为红军来了，后来发现不是红军，才派团丁来追我们。”

第二天转移到月台山附近，进行整编队伍。把所有的人员（包括起义的一个精选中队和参加的农民群众，约二百人左右），整编为一个支队，由杨其生任支队长（代号叫何三哥，是泸县中心县委派来负责军事指导的），李清泉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设组织、宣传、民运三个股。组织股由中心县委派来的任圣林担任（外号任胡子，中共党员）；宣传股由中心县委派来的赵世咸担任（中共党员）；民运股由袁代新担任（又名袁崇杰，是个老党员，刚从合江县监狱里取保出来）。支队下面设两个大队，一大队由中心县委派来的侯殿臣担任（中共党员，有战斗经验），二大队由冯吉担任。

整编告一段落，即开展破仓分粮运动。

从多方面的情报得悉：五通场街上集结了民团千余人，由伪团总吴本昆率领，准备向我进攻。乘敌人立脚未稳之际，我们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夜袭五通场。这次战斗略有缴获，只轻伤一人，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勇气。

突袭五通场数日后，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首先占领了离我住地数华里的高地“石鼎山”，然后从“月台山”附近向我进攻，几次进犯均被打回了去。断断续续打了一天。晚上从敌人侧翼摸了过去，安全转移到叙永县象鼻场一带活动，转来时在观音沟与敌遭遇，支队长杨其生同志腹部受重伤，不久，光荣牺牲。当时形势有个重大变化是：我中央红军已从贵州土城一线撤退回去，四川合江县的敌军（主要是民团），都集中压向我们，方圆数十里的隘口要道都有人把守，我们活动的地区非常狭小。加上群众工作基础较差，供给极感困难。我们又无开展游击战的经验，而较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杨其生同志又不幸牺牲。在此情况下，政委李清泉同志决定将部队分散隐蔽，以后待机再起。

应该说，我们这次起义是失败了，党的力量遭受了一定的损失（杨其生同志牺牲，任圣林、黄崇旋等被捕）。但对当时战局，多少起一些牵制作用。并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好的印象：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穷人要翻身只有跟共产党一块闹革命。

（中共合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注：赵欲樵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当时名余德章，石鼎山起义领导人之一。

沐川高笋农民暴动情况*

钟福兴

张啸涛（即启明）是和朱成之、张兆延一起直接到炭厂来找我的，由朱成之向我作了介绍。晚上在炭厂里我的寝室开会，有谢平安等十多人参加。张啸涛在会上说：川东、川西、川北都有工农红军了，我们这里也要成立工农红军，成立了就要打倒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农民才能分田分地，工人一天做工八小时。还说：厂里要成立工会，农民要成立农协会，还要成立苏维埃政府。这次会议以后，就在农村进行宣传。但是，炭业工会和农协会都没有成立起来。成立了川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张玉清任主席，钟子贤（即钟福兴）、费熙延任副主席。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张啸涛任主席，王正海任副主席，张啸涛还任川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路纵队队长。

1935年5月9日，张啸涛在李山张玉清处召开重要会议。通知各乡均有人参加，张啸涛主持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要求立即起义，于是决定5月10日，即第二天就干。第二天刚刚天发白时，张啸涛就派我同王堂恩上金台山，控制保长尹绍清不准放三铁炮。到下午，我和王堂恩心中着急，今天不知怎样干的，还没有响动。下山一看才知张啸涛把李如珍的家抄了，率领队伍走到了火林冲，在火林冲田内插有大旗，张兆延背着布告、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印信在火林冲休息。张啸涛喊我同王堂恩去高笋场吃饭。到了高笋场，听说杨九光已调人来袭击起义军，我同王堂恩走出场口，和尚坳炮声响了，子弹如雨。我两人本想到火林冲，将至鹰嘴岩，听说张啸涛向鱼桥沟退了，我两人也退鱼桥沟，才知暴动已失败了。次月，捉了我们的同志五人，有谢平安、李桂龙、朱成之、何安宾、梅世权等，被高笋乡的团正蒋福安送至屏山，朱成之牢死在屏山。后半年，王慕堂又捉张玉清，在郭岩把张玉清枪杀。

（中共沐川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谈冕宁抗捐军

陈野苹

（前略）九军团走后，我们这个抗捐军就撤出冕宁城，敌人跟着追上来，我们就转移到小堡，在冕宁县城北门外一里路的地方。当时小堡还留下一支红军游击队，约有百来人。抗捐军开始有五百多人，刚刚才组织起来，还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多少枪，以后形势一紧张，就跑了一些人。在小堡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就合编了，名称仍是抗捐军。合编第二天，部队由小堡出发向北走，到达离冕宁城三十里的大桥，九军团的人还没走完，我们就在场外休息，等他们走了我们再进场。这时，小约达，就是和刘伯承喝血酒的那个彝族头人的弟弟，他们打起“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子，一来就向我们要枪，我们说没有枪。当时，抗捐军住在乡公所，街上涌满了彝族果基家、罗洪家的人。第二天队伍出发时，他们就插进队伍，把队伍搞乱，一看这情况不妙，我们几个负责人就一路走，一路商量怎么办。这时，突然接到罗洪家送来的情报，说土军阀邓秀廷绕视槽沟、曹古坝到前边截击我们去了。我们上了俄瓦山就宣布队伍原地休息，几个负责人和小约达谈判，……彝族就开枪打起来，当下把红军游击队长打倒，队伍失掉指挥就乱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共党最近之工作计划及其组织

(甲) 组织士兵暴动与建立红军

(一) 目前全党的中心政治任务是在争取全国苏维埃政权之彻底的胜利，应注重四川党团工作，以夺取武汉政权为中心路线，所以应严厉猛烈地去组织士兵暴动，以成为全党全团的实际任务。

(二) 四川军阀制度的存在，反动统治更日趋于崩溃，因军阀相互扩张实力的结果，反动军队组织数量，甲于全国任何一省。同时，兵士生活之痛苦与恶化，亦比较其他各地各省特别厉害，似此环境，本党工作极易发展。

(三) 军阀战争迫在眉睫，促使四川的革命形势得着猛烈地开展前途。

(四) 在目前四川兵士群众中，有一个不正确的问题，便是消极逃走成为狂潮，平均每周每连要逃去十人以上，因此逃走随即发生了兵士群众更厉害的虐待，既须整天操作不息，因而致死者每连日必数人，又星期不准外出，不发薪饷，若拿着逃兵，非立枪毙即打烂两腿，兵士生活遂日趋于奴隶化，本团应乘机去积极煽动作为组织兵变的基础。

(五) 据上数理由与目前四川军阀准备战争，大批招募新兵的情形之下，直向军队中去工作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省委号召全川团员起来认识这种工作，在总的工作计划中，全川应新调同志八十人到军队中去。其数目分配如下

成都特区十五人 成华八人 新都一人
 绵竹二人 崇庆州一人 彭山一人
 眉山一人 自井五人 自井特区十六人
 青神一人 荣县五人 威远二人
 内江二人 富顺二人 江巴五人
 江津三人 合川二人 铜梁二人
 荣昌一人 宜宾五人 高珙五人
 嘉定一人 潼川二人 射洪一人
 南充共五人 梁山三人 万县二人
 忠州二人 涪州五人 其他七人

到军队中去组织兵变，到失业工人中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宣传以及号召广大青年群众来参加。

(六) 组织士兵暴动，更加要发动士兵的斗争，我们要利用士兵日常生活的不完备，去感动士兵仇视官长，要利用公开组织去领导各俱乐部、士兵委员会等。

(乙) 省委七月十五宣布扩大与组织米荒的斗争，在四川任何一县都发生严重的米荒及对米荒的斗争，现正表现着非常迫切，应成为革命斗争之中心问题。我们当领导扩大成为有组织性的，而且要组织示威，向国民党军阀及豪绅地主索米粮，反对捐税，要求增加工资及米贴，反对高利贷，反对欺骗的借贷和麻醉群众的平崇，实行抢米，没收豪绅地主的米粮及财产和土地，在这一斗争中组织游击队，扩大红军，组织平民协会。

(丙) 省会议决各地多开书店，以转变青年学生之思想。去岁合川各地对于学生工作颇感困难，其后得同志在彼开设书店贩本党宣传书籍报纸，学界购阅的甚多，数月后工作进行颇为顺利。

（丁）党之组织

省委为一省最高机关，各县设县委，县委之下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小组，每小组至多五人至少三人。

目前军队中党的组织规律

一、团设正副特派员，营设正副特派员，连设支部，排设小组，每组至多不过五人，一连至多不过十五人，一排有五人以上者，宜分为两组，但仍须注意发展的平均。

二、组员只许知道组长，组长只许知道支书，一点不知有旁的。组长支书只准知本连同学及营正特派员，不许知道别的。营特派员只准知本营的状况及团正特派员，而不知别的。团正特派员只准知本团不准知别团。

三、副特派员可以同正特派员商量事，而知道下面的全体情形，但为下面全体所不知（或知为同学而不知其负何职务），平时态度也较灰色，他的职责是候补的性质，尚若正特派员遇害被逮捕，或立即逃跑时，副特派员即递补其缺，履行正特派员的职务，连支书也应有候补人员。

四、团以上即可成立军委，以三人或五人负责之，其军委书记可与该地地支负责人接洽而受其指挥。

（摘自国民党二十九军破获我党的文件，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士兵运动大纲

(一) 总纲

(1) 由工农小资产阶级破产，流落江湖列身行伍的士兵，其生活从历来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痛苦的，因此以他们的阶级地位及其生活而论，无论如何都是应当站在革命战线上，与我们合作的，无如彼等因生活的流浪，智识的浅薄，而遭一批反动的军官利用、压迫、麻醉，弄成革命的绝大敌人反动武力，这是很不合理的事，所以目前的革命，假使不将这一批痛苦的群众唤醒起来，使同阶级自相残杀，绝不能保证革命前途有胜利的，因此党于目前除了努力建立工农武装而外，破坏反动军队的士兵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工作。

(2) 反动军队是我们惟一的敌人，但是具有绝对反动意识的是他们官长，士兵不过是一时受其利用而已。所以我们在反动军队中的工作，是征取这广大的痛苦士兵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使在党的口号之下动作，反对官长的压迫，在某时间即完全脱离其支配，而张出红军的旗帜。

(3) 征取士兵的惟一方法，是除了暗地的宣传组织训练而外，要完全站在士兵阶级立场，作日常的提高生活的斗争，不管其长官是否同学，都要如此。因为不如此，不足以取得士兵的信仰和提高士兵的反抗性，但是要注意！森严的军队中，是绝不许士兵有反抗和要挟的发生；所以里面的斗争，最容易起到极端——不是哗变，便是士兵受严重的处罚或枪毙，因此指导斗争的人要

注意：（一）参加斗争的要有很多的群众；（二）口号不要提得过高，以容易要求到为限；（三）观察群众的情绪和长官的态度，如不能得到绝大的胜利时，宜于得小胜利即行收束，以免失群众的信仰；（四）留意胜利之后，如何向群众宣传，如万一失败时将如何处置？

（4）我们在军队中又要发动斗争，又要不及时就走到极端的原因是：（一）我们要作有统一的破坏，等各部队均有基础有民众皆起来暴动时，我们即一致动作，可以一鼓而消灭反动武力；（二）部份的哗变容易被解决和惹起各军官长的严重防范和监视，使各处以后不好工作；（三）我们的目的是在使敌人不知不觉的已在内里形成了庞大的势力。

但是这也有例外：（一）假如住近农民已经暴动起来，而本军又是开起去打，此处斟酌情势是可以叛变；（二）农民已有广大的暴动，我们可以自动的去响应他；（三）长官已经知道了我们，将要全体解决，逮捕我们，那我们须立刻拖上山；（四）假使某同志一人为官长知道，可以立马转学无须全动。

（5）严密组织，谨守秘密，执行纪律等，在军队中的组织特别要认真。

（6）介绍士兵同学宜特别慎重，务使忠实，觉悟、勇敢，秘密机警较完全的然后收，使其一以当百，（注意有能力的欠忠实，忠实的又欠能力）否则宁缺无滥收，因乱收人不易守秘密，不做工作而坏纪律也。此外特别看重外围工作。

（7）士兵是流氓无产阶级，生活虽然痛苦，但总虽彻底觉悟和完全，就我们的范围，我们只要能到破坏反动军队和得他们的同情援助的就完全够了，若果认为这种被我们运动了的军队就可改了旗帜做红军，这是错误的（即或如此，也须经过严格的甄

别），我们的红军是由暴动出身的工农组织的。

（8）做士兵运动是我们中之一部分，我们最主要的工作还在于唤醒各地的工农群众，所以军队住在地，假使无地支，做兵运的人就应负发展地支的责任。

（摘自国民党二十九军破获我党的文件。四川省博物馆复制提供）

成华特区军事工作的提案

A. 今后军事工作的布置

(一) 兵运的布置

I. 成华兵运的布置

(1) 将成华驻军的驻地画分区域，并指中心部队分配给军委委员与地支，作经常宣传鼓动工作，务须于最短时间在中心部队内发展组织。

(2) 建立独立的印刷机关，经常出宣传品，有计划的发行到群众中。

(3) 加紧发动斗争，在斗争中扩大党的政治去发展外围与党员。

(4) 开训练班训练兵运人材。

(5) 地方支部经常讨论兵运工作，并由军委派人参加。

(6) 建立中心工作。

II. 川西各县驻军的兵运的布置

在目前党的组织革命兵的新策略下，川西兵运布置，根据主要的军支与将来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先决定的军队与地区如下：

(1) 彭崇郛灌的江防军

(2) 成华驻军无组织的各部

(3) 金堂一混成旅

(4) 绵竹的二十九军

(5) 马部的温江三混成旅新繁四混成旅

(6) 新津廿四军的田旅

以上各县的驻军，在党目前组织革命兵变的当中，应先择各该县的中心部队，加紧工作发展组织。

Ⅲ. 开始川西上匪运动的工作（原文缺）

Ⅳ. 工农武装的工作

(1) 扩大武装宣传

(2) 在赤色工会内，开始组织赤色队的雏形——纠察队，并在各工会内组织纠察队委员会。

(3) 起草赤色队的组织大纲。

(4) 编辑赤色队的教育训练材料与计划。

Ⅴ. 党员军事化的工作。

(1) 扩大军事化的宣传。

(2) 有计划的分配同志，打入军队或反革命的军事学校，及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机会学习军事。

(3) 办军事训练班与组织军事研究会；研究军事技术与理论。

(4) 支部会议中经常讨论军事研究会的问题。

B. 今后的策略与路线

(一) 号召全体同志以至赤色工会农会的群众，起来参加士兵运动。向所在的士兵群众作宣传鼓动。

(二) 为了要动员全体同志与工会群众参加士兵运动起来，今后一般的支部应以士兵运动为支部的中心工作之一。

(三) 在军队中的支部务须针对着革命兵变的行动，有计划有组织准备的去组织兵变，尤其在军阀战争将要爆发的，目前更要加紧工作。

(四) 加紧反对改良主义的宣传，揭破改良主义的黑幕，消灭群众对改良的幻想，一切宣传都联系到反改良主义与党的政治口号上。

(五) 加紧发动斗争，促进阶级分化，加深官兵的仇恨，提高士兵的革命情绪。

(六) 建立中心工作。

(七) 建立检查督促工作。

(八) 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同志的政治水平。

(九) 扩大（扩大二字为衍文）使部份的斗争扩大，同时并注意斗争的联系。

(十) 以士（兵）联合名义提出斗争纲领，用政治口号公开号召群众。

(十一) 宣传特别注意革命兵变的意义与任务及红军军纪粮食等问题。

C. 组织问题

(一) 注意质的发展，应站在质的基础上，求数量的发展，从斗争中去发展，严格要求入党的条件。

(二) 发展求普遍，各营连都要有组织。

(三) 建立中心支部，各团营都要有中心。

(四) 建立支部工作。

(五) 发展批评，严格执行党纪，站在教育同志的观点上处罚同志。

(六) 加紧教育训练工作：(1)有计划有系统的训练干部(2)在支部生活中，训练同志，加深同志的政治理论，提高同志的工作能力。

(七) 严密组织，严格断绝一切横的关系；各级关系务求正

确。

(八) 交通工作。

D. 宣传问题

- (一) 经常出文字的宣传品，号兵刊册子等（原文如此）。
- (二) 提出宣传的中心口号。
- (三) 注意宣传的对象与宣传方式。
- (四) 提出统一的宣传领纲由各级讨论执行
- (五) 去群众中搜集实际的宣传材料。
- (六) 指定同志负责搜集兵刊材料。
- (七) 多输送宣传品到士兵群众中去。
- (八) 指出士兵的痛苦与出路。
- (九) 指出官兵生活的不平等及官长对士兵的欺骗与麻醉。
- (十) 多传播工农革命与革命兵变及红军的消息。

E. 斗争问题

(一) 斗争是解除群众目前迫切的痛苦，促进士兵对官长的阶级分化，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展党及群众组织斗争，是兵运最主要的策略，不可忽视。

(二) 发动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联系到政治斗争，以挑拨士兵对长官的仇恨，加强士兵的政治组织，提高党的领导权，由反对官长发展到兵变，使他们组织归于破坏。

(三) 注意斗争的方式与战术。

(四) 随时注意斗争的机会，不失时机的去鼓动领导。

（摘自国民党二十九军印发破获我党文件，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成华特区军事工作报告

A. 川西一般士兵生活状况及工作环境

(一) 川西为三军阀割据的区域，三军阀经济的来源，虽因地方经济不同，而剥削的方法各异，但军阀为了要维持他反革命的统治和剥削及扩大他的剥削范围——地盘，准备混战以及供给他个人特殊的物质生活——修洋房子讨小老婆等，对士兵工农残酷压迫剥削同是一样。

(二) 三军的饷制仍袭用旧例，二等兵的月饷为六元六以七成关发，而且军阀剥削来的钱虽多，每月仍还不能按此极低限度的规定放发，除伙食外，每星期仅发零用贰角（按月发饷以及八九成关放而施行改良主义者仅仅很少的一部份），至于医药草鞋等费，概由士兵自给，因此一般士兵的生活日趋于恶化。

(三) 三军统治下的士兵，思想上则受封建军阀的封锁与麻醉欺骗，同时又加以囚犯或禁锢看守与管理及残酷无情的体刑与刺戮或活埋逃兵等，虐待一般士兵，在这种环境之下，感觉非常痛苦，同时另一方面士兵群众感受了工农革命的影响，日趋于革命。

B. 过去的工作缺点和错误

(一) 工作路线的错误

士兵运动本为整个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部份，在党的总路线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过去党对于这一工作都未充分注意，尤其是未动员全党同志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去向上大作宣传鼓动的工作，

是严重的错误。

（二）组织方面的错误

1. 做军事工作的同志多有做官的倾向，上层化浪漫自由，不肯迅〔近〕群众惟〔怕〕艰苦工作，认为革命高潮是遥遥无期，因而对革命等待悲观，抱取消主义。

2. 过去若是和平发展；现一般同志和平发展的倾向很浓厚。

3. 组织不严密，如四五六人为一组，各级未设副负责人，横的关系未断绝。

4. 发展的路线不正确，如由上而下与感情结合，同时发展未注意质量与普遍。

5. 缺乏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训练工作，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线低，如阶级观察模糊，不明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偶像观念深，对于革命兵变怀疑自己的长官，给养困难，伤亡无救济，餉款无来源。多认为将来仍是拖队伍招安土匪式的办法，对土地革命苏维埃游击战争等都极模糊。

6. 同志对党的观念薄弱，不明了党的系统。

7. 未建立中心工作。

8. 未建立支部工作。

9. 无检查督促工作。

10. 指导机关不健全。

11. 是感情结合并未因政治口号去号召。

12. 缴纳党费不踊跃，不按期开会，关于军委本身的组织及其他军官的。

（三）组织状况

（1）军委以下设秘书处、组织科，士兵运动委员会至四月份添设参谋科与赤队委员会。

(2) 各军的组织人数详另表。

(3) 宣传与斗争方面的缺点。

① 宣传是机械的，同时缺乏文字的宣传。

② 未建立经常的宣传工作。

③ 斗争多是自发的，党缺乏有计划的去发动，并未领导未扩大未抓住群众。

④ 干部同志对于斗争的战术策略不明瞭；不能正确的运用。

(摘自国民党二十九军破获我党的文件，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注：按文件内容，编者判定以上四个文件的形成时间为1930年。

南溪农民起义全县震动*

十七年春，知事李凌霄，召集各乡民团开观摩会，到会者二千余人。逾二月，遂有共产党之乱。共党者，初仅少数人以农民协会号召，乡愚盲从景附，党徒渐众。又籍烟捐、印花税为指目，是年闰二月十七日猝起于牟坪场，焚场杀人。次日，遂据场为巢穴；宋家场民团，杀其队长李某响应之；二十日，外东土匪起，至仙临杀团总与之合，全县震动。驻军营长邵国斌，由宋家场进攻牟坪，乡民皆溃散，杀数人而定。余匪攻李庄亦溃散。独立混成旅旅长徐廷秀到县，鉴民团之不足恃，议增常练名额，以款绌罢。

(摘自《南溪县志》民国二十年本，卷三，武备第十五页，
中共南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邻水县知事呈请并恳通令严缉事

钧部训令第830号开，飭即查拿近有石稻场之冯全山，石龙场之龚成林、陈俊山等敢于暗勾乡愚，宣传口号，迹似共产工作，倾已派探密侦。该冯、龚等行藏不定，应仰该知事通令各团严缉惩办，以遏乱源等因，遵查该陈俊山等假冒共产，希图煽惑诈取乡愚钱财，在石稻场各乡僻秘密开会。职署亦有访闻，曾于二月二十八九两日，密飭各团按名拿送，并将该党徒等现在之宣传勾煽，意在诈欺取财，将来之危害地方，等于洪水猛兽，布告全县解其胁从各在案。兹奉前因，后飭各团务将该陈俊山等□缉送究□上紧侦察间。四月十九号阴历又二月二十九日，即据丰禾场民王沛仁等具极其弟王绍烈夫妇，于十八号夜，惨遭无名凶犯杀戮，其弟绍烈之妾杨氏同时并逃，恳予缉究前来，登即派队并飞飭各团一体查拿。五月二号，即据王家场团总将该逃妾杨氏拿获送案，当即提讯……王□等因之商同该党龚成林即少波、冯全山、谢银廷、杜海廷、任纯如、甘海棠、甘业宾、何子华、陈啸、林长安、同王吉、刘芝廷共十二人，于又二月十八日夜，乘王绍烈夫妇深夜煮烟，后户未合，由刘芝廷引导入室，将绍烈夫妇同时治死……除由知事仍飭团队务获在逃之凶党陈俊山等十一犯，并又召集各团，严定清查共产，一家有犯，九家连坐条例，宣布实行外，所有此案获凶，供出共产党徒，到案凶犯一名，业予依法惩办，未获各犯，恳予通令□由，理合具文呈请。

钧部俯赐核示备案，并通令严缉逃凶，遵谨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罗

第十一师二十二旅旅长王
邻水县知事张敬中
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中共邻水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四县团防围攻凌霄山*

一、长宁县志第十二卷载：

十八年夏间，王泽嘉作乱，扰南六县殆遍。次年正月，据凌霄城。县长张撤率本县团会同江安、兴文、珙县团及军队游击围攻，至五月击毙之。

是役击毙匪七十余人，王亦授首，余均逃散。然团队劳役至一年，耗亦不貲。

二、长宁县志第八卷载：

秦德武，城厢镇人。民国十八年五月，匪劫碉底场于栏杆石堵截阵亡。

三、长宁县志第三卷载：

民十八之击走股匪于建武。据建武、兴文乞援，局长陈子方率团四百余人往击之，死团丁一人，缴获马十余匹，匪溃逃，是役一切费用皆本县担任，以与兴文有联团之约也。

（摘自《长宁县志》，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绵竹农民暴动大纲

在四川这个无间断的军阀混战的多头政治的环境中，工农及一般破产的小有产者的生活，总的是痛苦极了。军阀的苛征苛派，官吏的横行，豪绅的搯索，地主之剥削，团阀之仗势欺凌，以及所谓清党反共之一切屠杀，还有金融之紊乱，劣弊划条——银行执照——无限制的行驶，影响物价倍增，社会生活日益提高。盖以天时干旱，栽插稀少，农民之收入绝望，下车军火，筹款拉夫，人民之负担加重，此等事件陆续不断加重。已逼得一般小有产者甚至中小商人都走投无路，除急反抗力求解放外，只有坐以待毙，呻吟就死。这些事实之演化，早已造成有产者分化的连续解体运动，和工农暴动的客观条件，随时随地，都布满着有爆发直向暴动的可能性……。

（摘自国民党二十一军《整理共案后的总报告》，

中共绵竹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绵竹被围 全城戒严*

绵竹四日特约通信昨三号夜一钟，该县突有大股匪徒先在小西门外蚕桑局放火焚烧鸣枪抢劫，城中闻警，一时警钟乱鸣。当由团长兼知事曾起戎率兵一营开城出击，匪徒遂分向大西门及北门两处放火攻城，时城上已由驻军第二营及团防扼守，未能攻进。而开城出击之部队，亦分路追击，一时火光烛天，明如白昼，前进号喊杀声呼声，如万马奔腾，军队奋追击，至四钟时，匪势不支，始纷纷逃去。当场擒获持械及徒手匪三十二名。时记者由梦惊觉，开门出视街面已驻军，第三营设哨戒严，该营禁人出视，故城中秩序尚属井然。及至天明，记者出外探询，据官厅方面传出消息，此事在罗江发生变故，及前日此间突有市民请愿团发现后，即已虑及暗中曾派人侦查并一面戒备。殊不料发动如是之迅，幸已戒备未遭剧变。捕获之三十二名已讯明分别监禁矣！

本月四号，因恐城内藏有匪党，各城门均紧闭。驻军一连，沿街戒严断绝交通，每数家门首，置步哨一名挨户清查，共清获嫌疑者四十二名，均暂羁禁县署中。又闻昨夜某乡实练员王某被匪戕杀，民丁枪全被提去。又某处卡员亦有被害之说，因城门紧闭不知实否。又据官方传出消息云：昨夜什邡、安县两县亦有匪徒攻城，闻什邡有被匪攻破之说。

（摘自《大中华日报》1928年7月14日第6版。）

中共绵竹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张治关于绵竹暴动向省委的报告

我这次担任西区的职务。在七月×日午前十钟，大中雨同学作遍街□□宣传，领导工农约一千多人，在县署请愿后，作示威游行。当夜在某地开县委会及活动分子扩大会。所议决的事项如下：A、健全县委；B、健全区委；C、健全各支部小组；D、成立革命委员会；E、各区成立区指挥部；F、依照各区所规定行动大纲及中心口号，各区直接行动。（略）

我当时即召集土门乡工农，只来二十五人……广济乡工农只二十人，……高桥及王泉乡工农，因时间太促，没有去召集。我将队伍编好，即开赴邓家林，又将该地团枪拖来六支响枪，跟即将烟酒公卖局卡员枪毙，开赴县时天已亮了，没法攻击，只得焚烧房屋即退却。城内军队即跟追来，我们到土门乡杜家巷一带，即将队伍偃伏，军队即由王泉乡绕道土门乡驻扎。我们从另一方面说哥老会五百人，首领系王□□、李□□、杜□□、徐□，均为民左分子。有加入怒潮社教民百余人，头目邓□□、谢□□，约他们同我们在土门乡是夜袭击军队，他们都承认了。殊不知赵包袱与他们说不可在土门乡场上摆出滥事，我便不负责。他们听得这话，就不敢行动了。……赵故意到境带人到王泉乡托故清乡，使其农民不敢动，而孙少祥（劣绅团委之一）又带兵三连与赵合说，大约许以恢复九大队之领袖。赵遂煽动我们已召集之哥老队伍及教民，暗中又送军队回县，……他说他现在奉驻军命令逮捕某某多人，并不准我们的队伍在他们地方驻扎，且派人将山口封

锁，我们无奈才解散队伍。

（摘自二十一军《整理共案后的总报告》，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丰都栗子寨打出红军旗帜*

丰都五月十八日通讯县属崇德乡之栗子寨，距城百余里，山势险要。顷闻寨上有匪千余，内中青年学生颇多，已打出红旗招牌。尚在调集各方匪党，意图大举。此间陈司令闻耗，特派侦探前往侦察，俟得确报后，即派队前往兜剿，以消隐患。

（摘自《民国公报》1930年5月18日第5版，

中共涪陵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平民革命军揭竿而起*

本报特讯万县武陵被劫等情，曾志本报。兹探劫该场者，系石宝寨之秦伯卿，闻系共匪，有枪数百支。劫该场时，揭出平民革命军旗帜，焚掠一空，并掳去一百余人。又忠州昨日专讯，忠州石宝寨秦伯卿，民团暗匪，近月来，曾劫枪西界沱等处。二十军第三师师长陈兰亭氏，迭次派员往查，查得该匪竟图扰乱下东，为他人作军事上之工作，正拟调队往剿。前日该秦匪，又复到武陵场围提团枪，劫抢沿河船只。陈兰亭师长得报后，昨〈十一〉即亲率廖万两团，乘轮到西沱合一旅两团四面包围，剿灭该匪，以除民害。

（摘自《万州日报》1929年10月13日第7版，

中共忠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城口被共军攻下

重庆秋阳社 三月二十一日绥定特约快讯：

李家俊率领农民数千人，进逼城口消息，已详18日通讯。兹据记者探悉，李家俊是次率领之农民，但受过相当军事训练，并有共产中坚分子从中鼓动领导，其战斗力本强，加以神兵数百人在前线冲锋，其势尤不可挡，竟于昨日廿日由神兵先行爬梯进城，农军继之，将城口刘□卿团全部缴械，并将县知事枪毙。各局卡悉被烧光。李家俊入城后，发布告示，宣传没收土地、焚毁契券等共产政策，自称红军总指挥。对于各乡之土豪劣绅，则交由各乡农民协会从权处理，其罪重者则处以死刑。已被处死的豪绅已达十余人。因此，各地农协人数，日益众多，势力日益扩充，乡村政权，已为彼等所掌握。至于驻军刘积之方面，刻正调集大兵准备围剿，籍作一劳永逸之计云云。

(摘自《新蜀报》1930年4月3日第5版，

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涪陵县长谢汝霖给刘湘呈函

军座钧鉴：四月九日曾肃一函，计邀钧览。清溪镇所属罗云坝发现红军一事，职最初接报，即令清溪镇一、二、三、四中队开往土地坡截击。旋又派城区保卫团第一大队率两中队，驰往剿办。顷接报告，业已将该匪击退，该队等已进驻罗云坝。查为此次主动，系罗云坝团正尹颢阳，中队长刘伏阳，教育委员李焕堂，与叛军连长赵启明等均系共产分子。与匪勾结，拖去团枪约数百余人，幸防堵迅速，未至蔓延。迨该队到罗云坝时，查知共匪机关，为文德高小学校。当搜获宣传品暨红军日报共一十五件，根据探报，该坝等因铜矿山股匪已向丰都退去，难以联合，现尚在新场附近盘踞。职已飞令白涛镇团总率队前往会同陈骏如等兜剿，不难指日歼灭。兹将所获该匪宣传文报，封呈钧座查阅，以后情形，再行续报。

涪陵县县长 谢汝霖

(中共涪陵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注：此件无时间，据文件内容判定该件形成时间应在1930年4月。

涪陵的红军

（前略）在川省，过去有旷继勋是张着红军旗帜，结果是力量薄弱失败，随时都有哗变的士兵，没有立足余地，便拖到山林中聚啸当共匪，美其名曰游击队。一方面又宣传各地的民团，拿各种职务去诱惑。有些机会主义的团阀，一被共党包围，就无形软化了。这次涪陵发现红军，便是这样一回事。因为涪陵多山，匪徒素来猖獗，而坏蛋团阀，更是狼狈为奸，鱼肉乡民，平时已经无恶不作，这下改变方针借拥农工利益，来实行强盗主义了。谢汝霖县长呈报军部一函，试举如次，（函件内容略，见涪陵县长谢汝霖给刘湘呈函——编者注）

这些共匪，是钟鸣（李鸣珂）在指挥，是二月三十一日的红军日报上载有：红军总指挥钟鸣，日前赴彭（水）组织兵变，刻已就绪，大抵日内由彭返涪，至各地红军区域内指挥游击战争云。

据他们自己说：“刘雨卿、鄂军旅长，听说兵变，出来以后，同涪陵各镇乡的农民合作起来，组织红军，到达杀豪绅地主，作游击战争，新庙子杀了四个，鹤游坪杀了两个，鸭江乡杀了五个，清溪镇杀了四个，其余还多，还有一些没杀倒，正在四处捕杀。他听得这话，骇死在屋后树林里，”他们那种暴动屠杀情形，全是令人不寒而慄。

（摘自二十一军《十九年度整理共党的报告》，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梁山虎城乡又发现红军游击队*

本报梁山通讯 县属虎城乡原为赤匪之大本营。军团为肃清匪巢，以免赤祸蔓延，特联合清剿，各情已志前讯，兹据特务大队报告进剿情形，并据有共党布告函件。其布告署名为川东红军新编游击队第一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维舟，政治委员蔡奎，其旗帜则为川东赤卫大队及手枪队等。据云本月廿日夜三更时由反共之王会廷到镇公所报称，有共匪三十六人，住峨眉山下，有手枪十六支，步枪十六支，经人施放毒药，除步哨外，余多中毒，余镇长当即派特务队队长李植生率队守寨，一面派手枪兵十余人前往缉捕，南亚场队长金方勋（去年反共者），亦率同反共最努力之同志五、六十人，协同兜剿，除搜出重要文件，并拾回中毒死尸二人，内中一人系共党省委特派员盛易平，又拾回匪尸周玉山一名，蹙即毙命。其余中毒者闻先后殒毙。团队两人，被匪枪伤，势颇危险。此间近来反共者将达二千人，共党在梁虽潜伏力甚大，但以当局清共之势力，人民受赤祸甚深，恨之刺骨，而内部又起分化，党员大批退出，不难肃清云。

（摘自《万州日报》1932年7月29日第6版，原件存重庆市北碚区档案馆，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江津兵变与合川地方暴动

江津军支，是四川大军支之一，据说是费了四年艰苦的经营，差不多省军委认为最健全的组织了。从去年八月一日起开始准备工作，历时一月之久，他们要脱离机会主义的羁绊，而要完成四川在争取武汉首先胜利费〔责〕任内的任务。所以决定了江津军支发动兵变，成立四川第五路红军游击队。

原定九月一日午后二时为暴动时间，因为通知没有注意及秘密技术，遂被一般幼稚的兵士党员哄传到官长耳中，登时全部队的武器库把守起来。而前敌委员会要提前一小时发动，结果，便因防守严密，而第一次计划失败了。跟着第二日又准备第二次暴动工作，决定三日午后五时发动，一由四团三营特某在本连发动，冲进东门解决东门内各连。一由委旅李某发动西门外机关枪连进西门解决西门及衙门前师旅部等。到五时半西门外机关枪连进城发动了，东门外没有发动起来，在街上巷战六小时以上。总共发动了五连多人，前委书记及派去指挥暴动的人没有参加行动，据说是畏缩藏起来了。

暴动队伍在是晚集合后，分两路离津，一渡河北向璧山永川方面进发，一南向綦江进发，大约变了两营及机连特连等千把人，拖去后省行委派人去追赶，不获而返。

暴动的结果，全城被捕者约计二百余人，杀戮者八十余人，惯爱玩把戏的共党份子，全躲起来，牺牲的还不是兵士群众！叛兵走到暴动之途，其路线只有拖上山作匪之一法。究竟利益在那里？而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江津军支的负责人轻敌自满，以为推翻统治权易如反掌，差不多认为不成问题的。加以他们不深切了解他们负的责任，自己尽管不参加，跑的跑，藏的藏，弄得暴动的主体失了领导，所以又遭失败了。这是江津驻军疏忽于防范兵运的结果，所有兵变的情形，大概如次。

合川地方暴动

共党在合川的城市工作，过去成绩很好，但城市贫民自青龙街拆房斗争失败后，业已放弃；工人自黄包车夫罢工后，又完全放弃。余如丝厂的罢工与示威，狮区的抗捐斗争，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在去年八月以前，对工人方面，开始加紧城市工运，城市贫民运动，组织罢工罢市等工作。农民方面，加紧秋收宣传鼓动，改编红军预备队，组织暴动队，组织雇农工会，登记党员，组织妇女团，组织少年先锋队，儿童团，救济会，加紧农民群众的政治军事训练等工作，这便是事前的准备工作。

更因为拆房争斗及车夫罢工失败后，党的负责人便一心一意注重兵运工作，兵士支部发展到驻军各半数以上，（驻军总共三团以上）做兵运的人只注意兵士们的枪杆，那一连解决那一连，如军队彼此火并一样，结果也是失败。

（1）城区兵暴之经过

第一次兵暴是八月廿二日，（星期五）县行委所管理的破坏队，如南津街电线之破坏则完全办到，北门外则破坏了十分之八，塔耳门亦破坏三分之一，仅易××等同总指挥所担负中门破坏工作，没有做而逃跑了。

至兵士方面，原定当夜电灯熄后，一致屠杀官长，举行兵暴，不料临时兵士全体喁喁私语，互相等待，因特派员高子钧，令其

所认为最好之第三营首先发难，但是暴动队之不见一人，于是高子钧认为失败，便卷款数十元而逃跑。同时合武行委兼总指挥路委政治委员之赵范亦率同易××胡×等逃到赵家渡。他们归咎于合川党组织之不良，以掩饰其临阵脱逃之丑。当经合川行委驳斥赵范之因畏怯而走入右倾取消派的路线……范原在合川行委议决下参加二次兵暴，赵则承认畏怯。因此合川行委与合武行委大起争执，合川行委坚持再干，合武行委则主张来渝请示。结果，因慑于群众情绪。乃一致决定暂时参加行动。定于九月（？）日（星期一）举行第二次兵暴，但同时合行委之何×坚决提出其取派主张，骂组织暴动为命令主义，骂不待群众自发而动而加以人力推动为盲动，坚决不肯参加。又由合行委定以唐×秦×监督何×领导纯阳山各连兵暴，仍以范及新来之蔡××领导第二团兵暴，以后一切政治军事会议计划，仍由合武主持，合行只立于监督地位。

决定发动时之记号：（一）电灯燃时；（二）枪响；（三）炮起。

关于放炮情形如下：

××主张以预防同志畏怯起见，须于山上放火烧草树，既无人救火，又多烧两处，兼无危险。伯×则坚持主张在城内放火扩大影响，并可逼陈书农逃跑。“及决定在城放火时”，荣×又主张由同个人家起火，以免同志畏怯及旁人发觉之弊。但伯×又坚决主张须在栈房放火。嗣后表现，则学生同志愿出钱而不愿放火。××所担负之小南街放火，和王××同下手，及已点救，不幸火刚上屋，又被扑灭。丁××所担任之衙门口放火，因畏缩不敢动手。秦××所担任之北门外裕祥宾馆放火，则由栈房一度改为在友×家中，但临时又因赵×之阻挡，秦又改为焚烧其侧之厕房。因靠近高墙，不能引火延烧，于是以红旗宣传品三大捆，作为引火材料，突有人过，遂惊走，行人检视引火红旗宣言，轰传

共党放火，大众惊告，于是放火一事完全失败。

至放枪一事，原以李×及谭×携手枪混入第二营，不幸为长官发觉擒获，四处令戒严，于是主要之二营不能发动。而次要之纯阳山，一方面是打头炮之路，×既未入营，而在营外指挥之唐秦何三人又因遇着传令兵搜阅，遂全逃，而各处士兵又空等一夜，既不见火起，又不听枪响，第二次的兵变又流产了。

（2）云门镇兵暴之经过

据吴×之报告，云门镇之失败，完全由何子瞻之虚伪与畏怯所致。他在事前极力向县委夸张，云门镇士兵之能动，但即将动时，又畏怯而往天心场，掉戴×到云门镇。而会议时又不接受戴之贡献，致戴愤而走到云镇，交通不在，则亲往营门口去会同志，致为长官捕，收出日记名单，影响当地士兵组织，何子瞻决定即夜暴动，但因计划不周，命令未得到以致流产，而何亦抛弃一切，逃遁来城，一口咬定是皮×告密，于是当地士兵亦纷纷逃跑，云镇遂塌台了。

（3）狮滩农民暴动之经过

狮滩场因为负责人的畏缩，虽于某夜集合百余人，但无勇气督率去干，农民有数人爬上城墙，却无人继上，迁延很久，以天将破晓不干了。第二次结合，到者更少，负责人更不敢言干，几被农民愤怒杀了。第三次暴动，合行委乃以农民围攻各地驻军（第五连之两排人）而使兵士同志从中响应，以发动其他群众，至发动时，领导人又以子弹告乏，不能立刻进攻，于是又归失败。合行委又坚决组织四次兵变，但因五连负责人严春楚枪毙（原文如此），李秉奎部分驻各地，不能集中，秦友义等逃避。而驻军逮捕党人又急，故四次暴动又完全失败。

（摘自二十一军《二十年度办理共党之经过》，

四川省博物馆提供）

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一师司令部训令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暂编第一师司令部训令

去字第371号

令江津县长方海星

为令遵事案，查本部前次九三事变前后，因涉嫌被逮寄县各犯官兵等，计四团一连连长彭树森，连附马辉武、骆青山，三连连附毛为麟、田书之，六连连附唐廷栋、钟仕臣、刘树华，机关枪连连附马焕章、吕占鳌，师部实习员江国勋、录事李崇实，犯连长吴毓英之族弟吴主文，犯兵李绍云、李建廷、吴世昌等十六名，前经本部依法会审，逐一评讯并抄录供词咨呈军部请示在案。顷奉军长江电内开，查四团一连连长彭树声一名，罪情重大，按律着处徒刑十年；三连连附毛为麟、田书之二名着各处徒刑三年；犯兵李绍云、李建廷、吴世昌三名，着各处徒刑十年，发交江津县执行，仍将执行日期报查；其余六连连附唐廷栋、钟仕臣、刘树华、一连连附马辉武、骆青山、机关枪连连附马焕章、吕占鳌、师部实习员江国勋、录事李崇实等九名，情节较轻从宽撤职免议。犯连长吴毓英之族弟吴主文一名准予省释等因，除将唐廷栋、钟仕臣、刘树华、马辉武、骆青山、马焕章、吕占鳌、江国勋、李崇实、吴主文等十员应提回省释外，行令飭遵照执行。为此令仰该县长即便遵照，将彭树声、毛为麟、田书之、李绍云、李建廷、吴世昌等六名，照科定刑期分别执行，期满释

放，仍得执行日期具报备转。

此 令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七号

师 长 刘文辉

副师长 张清平

(中共江津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铜梁县保卫团办事处 咨文

铜梁县保卫团办事处咨；为咨请究办事由，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二日，案据土桥场第二团正肖伟清报称：本日午前八钟，松林口发现匪徒三百余人，九钟时来场散发传单标语，打毁当铺、钱庄、验收所及民间房屋数间，打断电线。团总夏作舟出谋弹压，行至场口，伏匪四起，团总被杀，团丁枪支损失。约数分〔钟〕时间，匪向巴岳山窜去。特具实呈报，恳请亲临验办等情前来。当派第一队长王幼滋率队追缉随往澈总副团总调集山防各队亲往，行间督同搜索，先后擒获周江河、柏道光、陈东山、潘云清、潘志诚、彭张氏、蒋吉山七名内，姓陈东山系彭东山之误，余多重大关系相应咨解。贵府查核讯办以遏匪焰，实为公便。此咨。

铜梁县长陈

总团总 陈文府（章）

副团总 冷天庆（章）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九日（铜梁县印）

（中共铜梁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国民革命军二十八军 第十二混成旅司令部训令

令铜梁县县长陈文府

为令饬缉究事，照得地方治安，极关重要，戢奸除暴，除法尚严。该县近忽相继发生保卫团叛变及匪共劫掠土桥等场情事，似此胁众叛变，杀人越货，扰害治安，势非彻底缉究不足消弭乱源。又查该土桥迭生事变，市井相传，均谓为暴徒藏伏之所。为此，令仰该县县长即便遵照，对于上述两案，严密查办，所有在逃之队长黄明渊及首要匪犯务须设法缉获归案，按律严惩，以伸法纪而遏乱萌。其余胁从队丁人等，则权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仍将办理情形具报查考。此令。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八日

四川陆军十二混成旅（关防）

旅长 游广居（章）

副旅长 杨锐（章）

训令 速办

转咨保卫团彻底清查，分别设法，务获送办。

十月十日陈文府（章）

（中共铜梁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富户陈益卿等人恳请铜梁县府 缉拿严办共党人员的呈文

具呈土桥场公民陈益卿、张吉平、唐青廷、李明昭等为赤祸荼民，恳请缉拿严办，以杜蔓延而靖地方事情。共党自去岁在民乡秘密活动以来，已联得大批党员不下数十人，其中坚分子刘海云、彭建奎、谢炳清、朱锡山、彭海山、彭世贵、肖麻山、潘延兴、陈国卿等在本乡未暴动以前，即将各富户枪弹调查清楚，故于暴动时海云等劫夺团枪垂手而得，潘延兴家为该匪党巢穴，现伊家尚有标语文件可查，肖麻山曾随匪队去而复返，携回广枪一支，匿藏家内。如刘海云、彭建奎等前在贵州为匪，有案可查，朱锡山前在县内捣毁邮局，殴打县议会议长、议员等种种暴动行为，早已露其共党手段。现时特充保卫团差遣朦身，示众不疑，故敢于是日暴动时率领征得本乡党羽于马滩桥与黄队长会合，诱得夏团总枪杀后，立即场上佯若不知，其党已开始暴动，反证系驻军演习野外，使众不啐，以待党前来如意妄为，其掩耳盗铃行为，惜执事诸公未加考察，致贻该暴徒率性妄为，荼毒生民，现仍伏居本乡，意图再举，若不铲除，将来为祸不知伊于胡底，是以报请县长按名拿办，若有应质讯之处，俟该匪党刘海云等被拿获后，民等即赴案投质，如有虚诬，民等自甘反坐。此呈

(中党铜梁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廖玉璧在岳池从容就刑*

岳池通信吾岳著名匪首廖玉璧，年在县境各场聚众抢劫，累经官军击扑均未得获。现廖匪恶贯满盈，被驻军精练司令部谍查长曾鸿策于前日在黎梓卫捕获，并搜得手枪二支，当经解部究办。据伊供称，曾留学京沪，后返县任教育半年，嗣因暗杀李成林案件，遂畏罪为匪，藉图逍遥法外，数年间拉拢边棚多起，凑得人枪百余，现因清乡甚重，同党多已星散。至抢劫地带多在资马各场，今擒获有死而已，云云，向廷瑞司令以该匪所供危害地方不虚，当即命令斩决，用清乡阁，而昭儆戒。昨日（二十七）午刻即将匪验明正身，绑赴刑场（临绑时曾摄照片）该匪押至途中，形色怡然，就刑时态度从容，斩首后旋又摄影，并将首级悬于县府门口示众一般民众。以此要匪伏法无不称快云（三十一）。

（原载《新蜀报》1935年4月3日，

中共岳池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任伟章率部在南江起义*

通江既陷，南江巴中动摇。罗驻节巴中，李旅犹在前线，士无斗志，再战斜奔……一面李伟如援通江，一面罗屯巴中，一面促刘汉雄由北道救南江。巴中陷而南江危，匪攻南江，汉雄应战互有胜负，兼戕匪之劲干，匪警雄之罗易御也，增调精锐，巡城掷弹，雄开关迎敌，匪退数里，勉守十日，卒以罗招安之匪任伟章报变，绕刘之后，刘乃退出南江。……初，民二十一年六月，任伟章抢掠南部，经仪陇至广元庙二弯，刘汉雄截御于黄洋，适大雨，黄洋水涨，旺苍坝得以保全。任匪窜入八九区，据山险行赤化，是时贛匪在泽，窜通之祸，任已先示其兆矣。……

(摘自《广元县志》，中共南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德阳孝泉发生兵变*

该县南里所居之孝泉镇、忠孝、桂花××前叛变一营各情，已迭志各报。兹据本社绵竹专讯称：此次孝泉兵变官兵，现经廿六团派兵追击，及独立二团所派汪团附率兵会剿暨安县军团之一部尾追，已于昨夜半一时，在大石坝彻底解决，至于所收缴之大股人枪已由罗团长派汪团附点交廿六团接收处理矣。刻下全县治安甚为安定，不复如前之紧张，惟银价仍甚高涨云。〈协进〉

（摘自《国民公报》1932年11月7日，
中共德阳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给南部 县政府训令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司令部训令南部县政府

事由：办理该县民赵一阳等清派兵搜剿共匪一案。附件一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令。法字三〇一号。

令南部县政府县长李维翰

为令遵事案，据该县升钟乡民赵一阳等以共匪蠢起劫杀掳焚，泣恳派兵搜剿等情呈诉到部，除以呈悉查该县共匪肇乱，昨据该县县长电呈前来，业经令调军团协同剿办在案。兹据呈称各情仰候令飭南部县政府查明分别悬赏，按名缉拿归案严办也此批为语揭示外，合行抄发原呈令仰该县长即便遵照办理，具报察考为要切切此令。

计抄发原呈一件

军长 田颂尧（方印）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共南部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蓬溪东乡民众自救团袭攻县城*

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川战突发，全川军队除二十八军中立外，其余一致向二十四军刘文辉攻击。……十二月十二日夜，县属东乡突有民众自救团，袭攻县城之事。先是二十九军第一路司令部派代经理处长周世维、连长崔伯洲，赴县属东乡一带收款，二人最贪残。仕维于正款外，公然械伤各区长于正粮每两，伊附加一元。伯洲则大设赌场，引诱良民，抽头肥私；而各区长良民缴款稍迟，动辄辱骂鞭挞，人心愤懑已极。兼有少数团甲亏负缴款，见周崔逼款急迫，祸将及身，因共愤周崔行为，组织自救团抗拒款项，适有某防军新委团长某回驻蓬南场，从事编制有人械，委知城中仅驻新兵九连，冀有所获，遂与团绅联合，共定袭城之计。十二月十二日，东乡团练联合处将提款员江忠国扣留，仕维先已被司令部撤职，伯洲已调去。各场练丁及某团长兵在遂蓬毗连之河沙沟集中，黄昏时齐到距城三十里鸣凤场，并约该场团练加入，适有该场蒲松高充公安局收发员假归闻其事，专人飞报于县政府。时近初更，唐参谋长宣耀兼县长始调集驻城兵队，分配布防于距城五里之高家埡、高坟嘴、欢喜埡一带；约四更许高家埡即接触，而驻兵既少已分三路配备，又系初编新兵。至天明时高家埡之兵已退却至南门口；幸先数日来城提款之三师，石排长增伦有兵两排，兵精械良始奋勇冲出截击。该袭城兵团始败退，由鸣凤场一带溃去。是役也，城墙下毙袭城兵一人，伤数人。说非石排长援助，城失守矣！

（摘自《蓬溪近志·兵士后篇》，中共蓬溪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老观农民武装夺取区乡政权*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5月28日，一说为旧历5月15日——编者注）彭蕴山与红军代表冯伦奎，地下党员侯正芳等组织指挥老观农民武装夺取乡政权，作好迎接红军的准备。老观农民武装夺取政权成功，受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赞扬，曾授予“曙光在前”的锦旗，7月上旬驻阆川军和地方民团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反扑，老观一时失陷，彭在掩护乡亲撤退中，中弹牺牲于灌山包下。

（摘自《阆中县志》第二部，民国时期下册第8页，

中共阆中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黔江游击大队的实力调查*

义顺镇通讯 贺匪窜川，滋扰黔（江）利（川）一带，我镇与黔利接壤，共匪到处派人煽惑一般愚民，并组织匪队，贫民流氓，颇为附和随从。同时，土匪活跃，到处滋事，以致近来本镇匪情大有燎原之势，根据调查结果，计有共匪朱清武在水坝，人三百余，枪五十余支；共匪周永立在新场，人四百余，枪四百余支；共匪花副官在毛坝，人二百余，枪四五十支；又联英会龚昌荣在长滩（顺）坝属利川县，与黔江县白石乡邻界，人约二三百，枪二百支；莫子安匪在梨子坝，人六十余，枪二三十支（闻此股有半数系张修兴之练丁）；刘伯祥在双口、河口一带，人四百余，枪二百余支；王毋成地方有匪四五十人，手枪三十余支，匪首姓名未悉，以上系最近匪情，形势严重，居民恐慌。我乡乡长邓永贞大队长杨钧辅，已将上面匪情报告团委会……。

（摘自《丰都日报》1934年9月13日第3版，原件存四川省图书馆，中共黔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龚昌荣率部激战黔江黄泥埡*

本报黔江快讯 自赤匪贺龙前往此间，五师驻军进剿，溃窜贵州边境，所有余党龚昌荣、王文成、花副官等尚散伏于县属两会坝、荆竹盖、毛坝各地，劫杀骚扰时有所闻。县人王蜀屏县长莅位后，当即会商驻军李敬輿团长联合会剿，已于上月二十九日分道出击。连日前方捷报传来，该匪在脉总山、杉木林、黄李〔泥〕埡等地凭险死抗激战竟日，终以乌合之众，势穷力竭，狼狈溃散。龚昌荣确于三十号在黄李〔泥〕埡腹部重伤，势难支持。刻军团正跟踪追击中。兹将该县县长及驻军李敬輿团长分电成都刘军长涪陵陈师长，报告连日剿匪详情，原电录下，可饷阅者。衔略钧鉴，昨日杨营率部联合团队在黄连〔泥〕埡与龚匪昌荣激战半日之久，因该地险峻，龚匪据险死守，顽强抵抗，幸我军团奋勇进攻，猛扑数次，互有伤亡。随另选干队由右翼悬崖攀藤附葛，抄袭匪之侧背，匪即溃退，完全占领黄连〔泥〕埡。是役计伤亡士兵十余人，夺获匪枪十一支，击毙匪徒二十余人。据供袭匪下身受伤甚重，现在军团正追击之中，谨电奉闻请释屣念。四十二团团团长李敬輿与黔江县长王蜀屏叩江印。

（摘自《丰都日报》1934年6月15日第3版，原件存四川省图书馆，中共黔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安县团总被炸受重伤*

成都正志社消息，安县特约通讯县属桑枣团总易吉三（易德斋）等，平日对于地方治安事宜之不力整顿，早为匪等所忌，日前被匪侦悉，遂用手榴弹轰击，当炸死团务人员数名，惟易团总受伤甚重，当即由县中法国人士送往省城四圣祠医院治疗，一面则加派密探，上紧缉拿，务获归案究办云。

（摘自《国民公报》1933年11月28日，中共

安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王敬德在安县被捕牺牲*

华通社安县特讯 前月下旬保卫团副团长林华卿氏，派队将江彰安绵乡村苏维埃干部主任王敬德及其书记陈永安在本县南门外逮捕，并在距城十里之高桥破获其分部，搜出种种文件及传单，并将王陈二匪之妻子，押送县府。闻陈匪之妻，系武胜人，亦系红军中之能员，余匪已逃遁，除陈匪已在逮捕时击毙外，次日即将王匪绑赴刑场枪决。昨得二十九军孙副军长来电嘉奖，略谓该匪迭次勾引本部后方军队哗变，屡次通缉未获，现为该县保卫团所得，虽该匪实恶贯满盈，亦足见该副团长办团得力，除给该县保卫团队丁奖金二百元外，该副团长着即记大功一次云。

（摘自《新新新闻》1933年11月8日第7版。

中共安县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遂安农暴领导人邓雍被捕牺牲*

交通社安岳通讯 县属龙台场前任团总邓雍，于1月内被人告密为共党被捕，既经县府审问，自称任共党安岳二区支书，且云该党组织严密，不久即将代弱小民族铲除一切蠹国害民之军阀，反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并高呼口号，大骂审官。县长杨慧业，见彼青年，误入歧途，可爱可惜，乃善言开导，殊彼辱骂不止，毫无悔心。又令暂寄监狱，使其改过自新，彼竟于狱中大事宣传。县府见其不可救药，并恐酿出意外，遂于昨日处决。当绑赴刑场时，沿街大呼“打倒军阀”及其它口号，慷慨就刑，视死如归，其受毒之深，已可想见。惟另有人言其致死之因，或不此一端云。

(摘自重庆《新蜀报》1934年3月12日，原件存重庆北碚图书馆，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邓雍系遂安农民暴动龙台区负责人。暴动失败后被捕。

涪陵弹子台发现游击队*

本报专讯 县属弹子台发现股匪各情，曾志本报。兹据县政府消息，本月江^①日县府接到顺庆镇电话，有股匪约二三十人、枪十余支，由涪州属土地坡地方提出团枪后，盘据弹子台，即有窜拢包鸾之势。县府得报，立即调集团队两中队并派张督练长午青星夜驰往指挥督剿。李县长以情形紧急张非亲往指挥，不易收廓清之效，复于昨晨率队亲往包鸾督剿。□该匪已成釜底游魂，不难一就擒也。

（摘自《丰都日报》1934年3月6日3版，

中共丰都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① 即3日。

何超腾等五人在万县被捕牺牲*

万县航信三师部几演兵变消息曾志前讯。兹师部复据密报，有共匪万市指委工作之何超腾等，系奉匪省特派员刘平及龙国章指挥，运动军队阴谋暴动，企图捣乱后防，以牵制前敌剿匪军心。当即由部队派遣密探，携枪暗入组织，从中侦悉其野心，历时二十余日，始于前日破获机关。匪市指委何超腾、邓和坤、吴成元、朱斌、曹世新等皆同时就捕，并搜出连枪二枝。经数度提讯，经何超腾自供不讳。三师部以值兹剿匪期间、前敌正用命之际，而该何超腾等竟丧心病狂，甘为匪走，倾覆党国，罪不容诛，爰按紧急治罪法，于昨日（三十一日）将何超腾等五人提出，验明正身，绑赴高笋塘执行枪决，以靖后患云。（真话一日）

（摘自重庆《新蜀报》1934年8月3日第6版，原件存重庆北碚图书馆，中共万县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 标题系编者所加。何超腾系万县第二次兵变领导人。
注：吴成元即吴体珂，邓和坤即邓述民。

青神西山农暴情况*

本报夹江特约通讯 青神为匪党川南中心县委所在地点，潜入党徒颇多，虽经本县当局曾将机关破获，余党实尚未肃清，此次乘眉丹青夹洪峨等县军团进剿孟匪、节节胜利挺进之际，乘机骚动扰乱后方。于昨（十四日）夜三更许，纠聚匪群人枪约百余人，同时分三路进犯青属之梧风场、土主场、及与青毗连里许之新场（夹属）。比时驻守该场之精选队一分队，以众寡悬殊，恐难取胜，急拟申请救援，殊该场电话线，已被该匪割断，始且战且退，据险堵截，飞报复兴乡，转电罗县长。罗县长闻耗，当即电调南安镇之模范队连同城内之特务队，由肖队长指挥，用跑步取道土门场，向土主场堵截，又电调驻守顺河场之模范队及甘江镇之精选队，由何中队长指挥，同时跑步取道新场堵截，并令相继追击，均于黎明到达指定地点，新场秩序跟即恢复，仅抢殷实富绅数家。团队深入青神境界，分头进驻梧风场土主场，始悉匪徒业将该场财物抢劫一空，焚毁契约，并悉米匪系打出□□旗帜，且以西区匪党，西区农民协会，西区匪党妇女部等名义，张贴标语无数，复将梧风场何乡长之介弟及副乡长杨甲长三人杀毙，余受伤者六七人，其势甚为猖獗，夹江团队得悉匪情，即行搜查。当搜获匪侦察一名，严密审讯，供出匪首为青神衙门口之带召王玉林，匪已退出卢庙沟匪巢等情，跟即分两路向匪巢挺进，八时许果于该处与匪接触，激战数小时。青神各乡，未设电

* 标题系编者所加。

话，消息不灵，军团援兵不至，情势迫切，所幸官兵用命，奋勇杀贼，结果毙匪数十，生擒廿四人，内有女匪七名，夺获步枪四支，刀矛赃物无数，并获匪人名册地图，骚动计划等文件多种，直至午后四钟，匪势不支，遂行溃散，斯时青神团队，亦赶至矣。夹江团队仍撤回新场驻守。并将毙匪首级斩下，携回示众。今晨即可将生擒匪犯，及夺获枪矛赃物解送回县核办云。（秋声丙）

（摘自《华西日报》1934年12月18日第2版，

中共青神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青神梧风乡共党暴动*

青神通讯 本县共党素称猖獗，虽经清共委员会迭次破获，然共党重要分子尚未完全就捕，以致不久又将组织恢复。且县中人士，对于清共向不重视，清共会虽加紧工作，但以力量有限，同时又无武力，故非各乡镇长认真办理，难收肃清之效。此次梧风乡共匪暴动，即系该乡长办理不力之所致。缘该乡共党向来极多，在此次事变之前数日，该乡长据土人报称有共党七八十人，在距场数里地点开会，该乡长当云共党未必敢做什么，竟置之不理。继又据报有共党开会，该乡长乃派练丁将其完全逮捕，随即完全释放，并不报告县府及清共会。继经清共会侦察员由桂花场侦察至龙凤场、莲花乡，闻得此项消息，正拟前进。忽见梧风乡宋校长飞奔而来，向乡公所报告，颇有共党百余人，乘罗乡长新落屋成，正在宴客之际，时值深夜即一齐闯入，大举暴动，杀毙多人，乡长队长甲长同时被害，并击毙团丁数名，提去团枪二十余支，随向土主场窜去。全县又无乡村电话，消息毫不灵通，该匪到土主场时，复将该场团枪提走二十余支，向夹江属之新场窜去，适该场团队因公外出未归，该匪仅将乡公所所存手榴弹二枚，及被帐等劫去后，乃退入距场数里之罗庙子山中，此其暴动之经过情形也。在宋校长逃向龙凤乡乡公所报告时，该乡公所即派专人飞报县府，同时清共会住该乡之侦察员，复又化装冒险前进侦查。赵县长据报，即商同清共会张主任，团委会邵委员长，

* 标题系编者所加。

派精选队一队。清共会侦缉宣传员各二员，均带武器，前往该乡进剿。同时城内驻军一连，亦出城外，严密警戒，城内各街，满布警戒，断绝交通。精选队全队跑步出发，到达梧凤乡时，闻共党已到土主乡，跟向土主乡前进，到达该地时将近天明。闻该匪等又向夹江新场窜去，跟向新场搜索前进，甫行数里，即捕获匪党派出侦探一名，乃供出共匪聚集距新场数里罗庙子山上王家院子内。急又前进，适夹江团队亦到，互相联络，施以包围，齐向法院射击，共匪见四面围击，乃仓惶由院内奔出迎战，两县团队见该匪奔出，即施以猛烈射击，当将该匪击毙三十余名，两县团队共擒获男女匪犯三十余名，并夺获匪枪十余支，电机一部，分别解回。该县府获讯：余匪一小部向嘉青夹交界之昆山庙，静溪坪窜去，该正由各县军团联合搜剿中。此次共匪暴动负指挥责任者，系该伪党青神中心县委书记许黄牛，业已阵亡。被擒获中之较重要者为邱骏“井研中校学生”，毛姑儿“富顺人，女子，年十八岁，曾住富女中校，十四年（岁）入党”，赵明清“农人，入党不久，颇努力”，以上三名已一度审讯……，闻赵县长正同清共会张主任在考查中云。

（摘自重庆《新蜀报》1934年12月27日第6版，

中共青神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王逸涛^①对于消灭川南共产党 及赤卫军游击队布置的意见

我们要消灭一个敌人，应该要知道他本身的任务和他的优点以及弱点，他的组织与内部情形，他的兵力与战斗力，日常需用和供给的来源，尤其是当时当地的社会与一般情形，明瞭了这些，才能够决定自己的行动，脱离了这些实际或违反，就不会收得一点效果，或者还要遭到意外的损失。这个赤军游击队的本身任务，他是在川滇黔的边区地方游击创造根据地，并且要在很短的时间生长（一部份生力军）起来，配合中央军的行动，争取川滇黔或四川首先胜利。这就是他的重要任务。在他的组织是很坚固，而且是很统一的，兵力也在一千人的左右（江西来的占十分之六七），器械很好，战斗力也强。因此在这布置上，我有几点意见。

（甲）总的方面

1. 在这三省交界的边区地方，每每此击彼窜，不但不能互相堵截，有时消息也通不到，反为所乘。今后在这三省边区地方，暂时该有一个较统一的指挥机关，如果能够指挥军事和一切更好，最低限度除军事外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来，才能达到任务。

2. 划定区域，如：第七区叙蔺宋三县，第六区的长兴珙高筠五县，云南的镇威县，黔省的毕节，均应列入该区域内。

3. 各区造派得力和熟悉该区情形的干员参加这个统一机关。

^① 王逸涛，四川叙永人，曾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5月叛变投敌，被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任命为川南招抚特派员，1952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4. 收集一切消息，随时通知各部各区，各地应多设座，多遣派侦探，随时与各部各区切取联络。

5. 准备一切军用品供给各部，如粮食、带路人、侦探、支役……等等。

(乙) 军事方面

1. 叙永区配备精兵一团，配合第七区保安队一部，常驻叙永南区一带；

2. 南六县配兵一团，配合第六区保安队一部，常驻建武，或者落表、落亥一带；

3. 云南镇威配置兵一团，配合镇雄独立营以及团队一部，常驻扎西一带；

4. 毕节配置兵一团，配合该地团队一部，在水潦河对岸择地住之；

5. 各区壮丁住守要隘，但只准用最土枪支，发现敌情，施放警炮□方并派人到后方报告详情（如在不得已时，警炮放后可逃避），使后方作战部得充分的准备应付战斗；

6. 各区精选丁和保安队一部，应加紧肃清土匪，如力量不足时，得依情况由该区驻军补助之；

7. 各区作战兵子弹尽量少带，至多不过十余排足矣（因敌人每闻子弹多的队伍，必猛攻夺取子弹，而士兵也随时有盗卖之弊），但须严禁多放枪。

8. 各部不论长住暂住，凡是住营就是得〔注〕意步哨和防御工作，免遭敌人袭击；

9. 各区指挥全权，应交该区保安队司令或者另指定人员，以便收得军团配合，统一指挥之效，否则不易奏效也。

上面的军事意见，完全是布置防御，出击时应该注意下列各

点：这些地方山大，追击困难，最好是等他到了某区，该区就出击；他离该区范围，就不可穷追，并且要防他埋伏、袭击、反冲锋、反突击。在没有十分把握时，不可分兵，不可追击。但是一到某区范围，该区就可出击，行动不可迟缓，宜逃速敏捷，作战时要下决心攻击精神，尤宜特别注意不可犹疑，畏缩，恐为所乘。我是找其紧要写几点。

政治方面

(丙) 坚壁清野

1. 川滇黔边区地方，山洞很多，就旧有的稍加改整，即将附近的土磨石磨等集中搬进洞寨，或者洞寨附近能射击的地方，建立棚厂，集中在内地也可。洞寨须指定团队住守，至少准备一星期粮食，不得任意失守。如能集中土石磨等，他虽有粮也无用也。（集中粮食使群众麻烦，时有彼此盗窃之弊。）

2. 检查人口，配用锅头，其余的锅头等集中进洞寨。如有婚丧，须先报告，团甲发用（但严禁团甲勒索），事毕送回。各居民一闻警号，即将自用锅头带走，最好用本地土产沙锅，带不走时损毁，价值不过数百文钱，所损无几。

3. 考查他日常用品，择其重要者封锁之。

4. 有部份富农地主等，私行请人先到敌部队里交涉。送款送弹物等，以为先交涉好，免后日发生问题。此必严禁。

(丁) 封锁消息

1. 凡该区域内一切报章须即停止，或检查后发放。

2. 检查信件，如稍有怀疑者，或关于消息者一律停止。

3. 乡村各公务机关、学校等文件，随时注意保存密藏起来。

4. 凡有警号之区，停止一切来往人等。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四川省政府保安处第九区代电

（告川黔滇红军游击队活动情形）

（1935年8月15日）

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钧鉴：顷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政训主任办公室第七区主任训练员刘患伯微^①日代电，据称：“川黔滇三省边区之两河镇、长官司、木厂山、罗汉岭一带大山，迭被匪首王一涛乘机骚扰，形同割据。一载以来（？）军团围剿，终属无效。报章所载，均非事实，现势力日渐增大”等语。消息传来，令人寒栗，诚以涓涓之滴，终成江河，此匪不除，隐忧何似！襄者通巴除匪，无异跳梁，一朝坐大，竟成燎原，抚今追昔，余痛犹存。川南不幸，匪患频仍，小民何辜！惨遭蹂躏。去岁（？）朱毛窜扰数次，民力财力早已耗尽，若再任其啸聚，养精蓄锐，蠢动堪虑，将见川南富庶，有不为通巴第二者几希？今该匪首王一涛果尔假朱毛接济以为援，合黔北残匪而四出，如古宋团部，皆为匪党悍将，声势汹汹，企图叵测。地方军团，非不尽量围剿，奈何此击彼窜，到处烧杀，长此以往，祸必滋蔓，不仅为川南各县心腹之隐忧，抑且有碍剿匪之整个计划。应请速筹大计，赶派军团，先行择要封锁，继续断其接济；动员务期一致，工作分段进行，匪虽骠悍，流窜无方，一朝成擒，三省同庆，懿欤休哉！拭目以待，监颖神驰，无任惶恐。四川省政府保安处第九区主任训练员何礼元叩。删^②

（摘自《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部份》，贵州人民出版社）

① 微即5日。

② 删即15日。

四川省第六专署截击红军游击队 报告（节录）

一、1935年9月中旬报告

余匪泽鸿，自窜扰江安属之板桥、梅桥以后，复由梅桥经水炉坝，窜据兴文县城数里之博望山，有众五六百人。电令驻建武之成团，派队到炭厂截击，驻兴文县之韩白雨区队，向匪进攻。匪复由博望山，回窜兴属周家沟、吴家沟、洛柏林等处。经成团追剿，即窜据古宋江安交界之新塘子一带。赵团长已令谢营堵〔击〕，滇军王营亦至，该匪复窜据叙永江安纳溪交界之文昌宫、水口寺、水栏杆一带大山。据探报匪窜驻目的，系购接械弹，招集土匪等语。除电令江安县府堵剿外，并电请第七区裴专员，迅令沿长江纳溪两流域各县府，严密检查往来船支，以杜匪运；复令赵团由拖船场向江纳推进，穆部何营向江安进到，并飭各县团队，严密防堵。

二、1935年10月上旬报告

余匪泽鸿，连日在叙永方面被军团击退，于陷（三十）日回窜兴文，□□逼近县城，入夜退据椒子园碾子湾一带。东（一日）晨派队追击，复窜据珙县周村。支（四）日晨滇军辛营、王师达营及唐营附所部，并团队压迫，由大垭口溃窜恒丰乡。微（五）日窜高县、滩场、老王场，鱼（六）日窜长宁花滩桥附近之罗坪，与达旅周营激战。未刻以一部向长宁桥进扰，申刻周营追至，匪

向桃坪方向溃窜。仄（十）日抵古宋之车场。该匪沿途劫掠，人数仅四五百人。

三、1936年1月中旬报告

奉省府电，对击毙余匪泽鸿在事出力人员，分别从优议奖如次：

（一）第六、七两区司令冷薰南、裴钢及副司令员肖烈、雷清尘，督率有功，着各记功一次。

（下略）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四川省第十五区保安司令部训令

保五字第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号

事由：为奉令转飭查缉匪徒刘子才等一案由，令宣汉县政府本月十日立案奉

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公署征闻边参代电开：

“据杨指挥俭午恭：电称顷据李旅长鸿勋感来电，（一）据最近俘降各匪供称，刘子才即刘涛前伪师长，数日前率三匪已离赵明恩他去，赵现随身十六人手步枪各半，有化装潜逃意等语。

（二）刘子才年约三十左右，二班身材，上咀唇有小黑痣，脚有不少青筋和肉包，小安徽口。（三）赵年约二八九，达县人。身体瘦长，面白瓜子脸，右腮下有核桃大姜疤一个为赘瘤，行动飘忽绰号浪脚鸡，手指细长。（四）除飭军团注意外，祈分极并电有关各县密缉勿使漏网等情。除分电本区各县府一律严密速缉外，谨呈等情仰飭有关各县注意缉拿，毋任漏网为要。”

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飭属注意查缉为要，此令。

兼司令 罗 玺

令各区署警察队
飭属注意查缉

（原件存宣汉县档案局，中共宣汉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敌四五〇旅“围剿”川陕 游击队的经过*

兹复详呈对赵明恩经过

甲、当时奉令经过情形：

1939年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夏秋两季，我任国民党一六四师四五〇旅旅长时，均受杨晒轩师长指挥，在陕西宁强县境赶筑国防工事。杨另一部，即在巴山追击赵明恩。适日寇西犯、襄樊吃紧，杨任广元警备司令，仍兼巴山清剿指挥，见我旅构筑工事已毕，杨即与我转来阆中。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命令：

“所有盘踞巴山国防线赵明恩、袁刚、王三春等余股，均应限期肃清，免为日寇和汪逆所利用，动摇四川复兴根据地。”派我前往巴山接替杨部肃清任务，仍要杨晒轩指挥。陕西并另派有保安高副司令率保安团队前来协助（暗含监视），高本人同驻我旅司令部始终来离。

乙、初到巴山根据地一般情况决定的办法：当我初到巴山据大家所了解的情况，始悉赵明恩系达县人，被刘存厚逐出，不敢回家，又不能随张国焘前去，在山上对川境方面比较稍好，对陕境仍系张国焘的作风。他的人数虽不多，善于昼伏夜动，以前陕西军、团迭次联合上山清剿，及杨部与他作战的经过，均限于地形及食宿的困难，不能持久。于是乃同陕西高副司令商决，先

* 标题系编者所加。

抢要筑碉贮粮，以政治说服为主，军事为辅。广用标语，遍贴崖穴树林，说明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一般囚犯尚多绝粮请纆，你们愿到前线者报表欢迎，愿回家者，另给路资，凭证遣散。愿随我军做事者，一律优待，国防有关的巴山，决不容其再事潜伏，一面抢封交通，划地轮番昼夜呼劝，果由农民引来在龙神店附近常嫖乡妇的管麻子，号青山，安徽人，闻在赵处当副官，首先投诚。跟由管青山及继续来归者，派到前线，按照雪印脚迹、轮番不断的呼劝，收效极窘，凡外省（县）无法归家者，概编为我旅手枪通信排。除最初他们乘黑夜风雨惯来摸袭我哨所外，极少军事接触。被他们拉进崖穴由陈瞬子等（陈实姓杨）看管的五六个男女老幼（南部人），当时同高副司令问明释放。从1939年冬月至1940年旧历二月即将任务完毕，根据先后来归者，证明明确只余赵明恩、刘子才及他随身的卫士二人踪迹不明。

除呈报任务完毕，正整装下山回防的时候，突由刘团陈营某排（班）士兵接近南江之某荒山，先由老百姓发现死尸一具，士兵前往查视，即由投诚随班呼劝的同志认出系赵明恩，他们听见赶到那附近巡视团队的南江叶贡材伪县长带的人说，要拿到城里示众（听说当时军团还在那里争功）因无人抬只将头背走了，叶并赶到，我同高副司令所驻的焦家河来向我说，他督率团队如何努力，请我向上报告文电时，不要说系士兵等发现的死尸，就说我们军队和他亲率团队围攻，在火线上把赵打死的。因旷时数月动员了两省边县这多的团队，也比较光彩些。我说，不向陕西高副司令驻在旅部亲眼看到的，我自觉做军人以来也从未报过轩获无算的扯谎文电，将叶的意见打消。一面重架无线电，将旅部同高副司令，正准备分别复员下山的时候，突由陈营最后某排班士兵发现赵明恩死尸经过，遂行背头赴城情形，复向杨晒轩及阆中

边署均呈报，有案可查。

丙、赵明恩的死：一说是他各人用手枪自杀的，一说是他随身的两个人，因贪财把他打死的，但决不是我把他哄来然后杀的，更不是我买人将他打死的。

（摘自川北行著《李子谿案卷》，中共南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

合江县政府通缉令

总字第414号

为密飭事，据确探报称：此次盘踞五通乡场侧石顶山之匪共约一百八九十人，县籍匪首为余德章、先罗汉、冯泽、袁崇杰、向玉章等，匪拉踞石顶山后，即派多数匪探及联络分赴永、泸、赤属炳滩、大同场、马嶺、魁星场、象鼻子、郟家关、叙蓬溪、白节滩及合属尧坝、先市、二里、东钢咀、新店、玉皇场等处，运动潜伏匪共或团练起事。至于匪探暗记为裤带三节花式或借卖剪刀、泡糖及船伙子等为名，希各乡镇长一体严拿……

中华民国廿四年三月

县长 钱寿嵩

(中共合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供)

屏山县团委会给县政府的咨文

查高笋场前此发现共匪约五六十人，主席张啸涛、农工主席钟子贤于本年五月九日在黄葛坡地方，约集农工前到李副乡长如珍家，提去第三团连枪十余支，即由张岩磷磴石等地蜂拥入场，分劫当地首人，各家银钱什物损失甚巨。该匪等并宣传赤化，张贴标语，盘踞乡内二钟许，始由杨区团长九光、伍大队长南洲，调队击散，并捕获匪谢平安、李贵隆、何安宾、朱成之、梅世权等五人送沐究讯。其同伙均系该乡无识农民，见团队势大，力不能支，且以事难成就，遂纷纷逃散，仅主席张啸涛、钟子贤等率少数匪类退往大窝顶。团队跟踪追击，因时已傍晚，兼之山深林密无法搜查。至次日拂晓，伍大队长复飭中队长李砚夫率队缉捕，竟至一匪无踪。数日后始有人报说：“张啸涛同前沐分处释放之张六呷已向清水溪方向逃匿。至钟子贤不知逃匿何所，现正侦查中。”

查该匪等在该地发动时，实因团队调防安家山，遂从后乘虚扰动，犹幸该乡长在清水溪方面接到中队长李砚夫报告，即飞速转报外区督察处，一面商请犍为所属近郊区乡派团辅助择要截堵。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中共沐川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提供)